



陈云

和他的事业

——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云和他的事业

关于陈云党建
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王世谊

陈云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在其 70 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他历来极为重视党的建设，全面地探讨党的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深入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在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党建思想。他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三卷文选中。认真学习和研究陈云党建思想，对于切实加强改革开放条件下的执政党的建设，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陈云党建思想的科学含义 及其基本内容

陈云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和优秀代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陈云党建思想，有其明确的科学含义，其自身是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它是陈云根据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中的运用和发展。陈云党建思想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党建思想合为一体，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党学说，因而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云在党的建设理论上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较为全面的，他的党建思想的理论体系涉及到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揭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陈云关于党的建设的著述很多，他的党建思想集中体现在这些著述中，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把陈云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理论充分挖掘出来，对指导新时期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报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陈云阐发了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观点，比如，强调思想建设是党的各项建设的基础，党员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自觉地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树立正确的理想和信念。他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提出要在实践中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唯物主义，学会“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法。他提倡要用 90% 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多听不同的意见，广交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他把毛泽东倡导的着重于党的思想建设的原则进一步具体化了。

（二）在党的组织工作方面创造性地提出和阐述了许多新原理和新论断，揭示了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中许多具体规律性的内容。陈云提出：“组织工作要适合于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他提出党支部应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和堡垒，为此，必须下大功夫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1939 年，他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提出了把党员标准和入党条件规范化，并论述了共产党员的 6 条标准。对于干部工作，他提出了干部“德”和“才”的具体内容以及干部的 4 条标准，强调选拔干部

必须“德”“才”统一，以德为主，认为“德才相比，我们要更侧重于德，就是说，要切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他提出任用干部要“人事两宜”，即“用人得当”“适得其所”；他阐述了使用干部的4条“用人之道”：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80年代，他提出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使党具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他多次强调，提拔使用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中青年干部要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

（三）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建党学说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长期以来，陈云非常重视对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培养，要求以这些作风规范全体党员的言行。他提出，我们党是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党，在党内建设优良作风，确立模范标准是十分必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和邓小平一起在继承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在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党风建设的重要性。他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党风问题的核心是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抓好党风建设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陈云的这一命题，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容。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一个富有特色的科学领导方法，陈云关于党支部应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和堡垒的观念，是他的党建思想的独创性观点之一。他还强调要防止党内腐化和骄傲，要密切联系群众。早在1939年12月他就说过：“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陈云认为：“在工作中，不仅要依靠组织，更主要的是要依靠群众。”要把解决群众目前的切身问题同引导群众为自己的长远利益奋斗结合起来，通过多种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他关于群众路线的这些深刻见解，长期以来，是向党员干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对党的建设和实际工作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五）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和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的必要性，以及贯彻民主集中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陈云提出是否按民主集中制办事是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的主要标志。他认为党的纪律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主要保证，“纪律是自觉的，又是强制的。”其基本功能“是为了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也是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统—。”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他指出：“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民主又必须集中”，“‘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11)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陈云认为，“核心领导只有经过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并在实践中经过考验，才能建立起来。”(12)陈云特别强调，要维护和加强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严肃党的纪律，维护中央的权威，对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六）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党内斗争的学说，深刻总结了我们党进行

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健全党内生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思想。陈云十分赞成邓小平提出的今后不再笼统地用路线斗争来概括党内斗争，以便使党内斗争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主张。他认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是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关键和标志。他“主张在原则问题上进行必要的斗争”（13）。“党内斗争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4），“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15）他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期间，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有效的党内组织制度，为正确进行党内斗争提出了切实可靠的标准。陈云关于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思想，在社会转型时期，对于执政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七）精辟阐明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作出了深刻地论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云对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意见。他认为“我们党是执政党，目前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16）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17）精神文明建设应首先着眼于党风建设和社会风气的好转，这是全党的任务。与此同时，他指出，要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维护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党组织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要学习和掌握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采取多样化的思想教育方法。他高度重视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意义，认为经济搞不好会翻船，宣传搞不好也会翻船。

二陈云党建思想的理论特色

陈云党建思想不仅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而且有着鲜明的特色。

第一，高度的全局性。

陈云善于从战略全局的高度，从马列主义理论的高度，指导党的建设工。他的许多观点看似平常，但仔细琢磨就会发现，他从很高的层次思考问题，视野广阔，立意深远，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具有战略特色。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都清晰而深刻地阐明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党建方面基本的、倾向性的、普遍性的问题。在探索研究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把党的建设搞好的问题上，陈云作了许多精辟深刻的论述。比如，在思想建设上，提倡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作风建设上，强调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组织建设上，强调坚持任人唯贤路线，大力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原则上，强调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原则，严肃纪律，加强监督。此外，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论述，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的论述，关于做好党员教育和管理工作论述等等，都具有立足于长远，总揽全局的特色。这些特色还体现在他对执政党的建设进行的系统阐述上。比如，提出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权的领导；提出必须制定制度，实行监督，对领导人员的权力有所制约；提出党的干部要实行交流，教育和监督他们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和克服党内腐败现象；提出要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扩大党内民主等。

第二，鲜明的求实性。

陈云党建思想是在分析了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面临的任务以及党的现状等诸多具体情况，在大量的实际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和求实性。陈云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斗争领导工作，从 1934 年开始一直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有着十分丰富的党的工作实践经验。他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注重调查研究，随时发现问题，随时总结经验，反过来指导实践。他对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阐述，都是针对党建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建立在对党内生活长期考察的基础上。他的党建论著，既有专论性的理论文章，如《论干部政策》、《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等，也有直接回答和解决各种党建现实问题的指导意见，如《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学会领导方法》、《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等。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都是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过程紧密相联的，都是有的放矢的，都有很强的针对性、现实性和指导性。我们阅读陈云各个时期的党建论著，可以令人信服地看到，他的党建思想充满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处处都是严谨朴实语言，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接着对问题进行马列主义的分析论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予正确的解决。例如，他探索党的建设的特有规律，多次指出中国党是一个产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员占大多数。因此，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任务，首先是思想建设问题。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是一项迫切的历史任务。以此为依据，他反复论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重要观点。他抓住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例如党员问题、支部问题、党纪问题、干部选调问题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弄清情况，然后一一予以解决，务求符合实际。总之，陈云的党建思想体现出一种理论与实践统一，原则与现实一致的特色，是一种“活的理论”。

第三，理论的创造性。

陈云党建思想不是教条式照抄照搬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而是在解决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特别重大的思想建设任务中发展起来的。无论是欧洲社会民主党，还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工人党员都占居多数，党的主要活动也是工人聚居的中心城市。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是在一个市场经济很不发达、农民和其它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进行自身建设的。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中心转向农村，党的建设和发展的重点也随之以农村为主要阵地。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密切结合中国党的实际情况，在如何做好党的领导工作，如何加强党员党性锻炼，确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见解。譬如，在《党的支部》一文中，他反复强调要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指出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是教育党员的学校，要健全支部的经常性工作，发挥好支部的作用。在《学会领导方法》等文章中，阐述了党的领导工作方法问题，对领导者提出了严格的标准。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把党员标准和入党条件规范化，此文后来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之一。在《论干部政策》和《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中，具体阐述了干部

标准，提出了做干部工作的“用人之道”。陈云党建思想所体现的独创性，不仅表现为前面列举的各个方面，还表现在其中有许多关于未来发展目标和发展趋势的预测和设想上。例如：抗战时期，各条战线需要大批党员干部，党员队伍亟需大发展，这时，陈云敏锐地意识到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解决好干部队伍不纯的问题，及时提出要处理好坚持党员质量标准与积极慎重发展新党员的辩证关系。1981年5月，他针对当时新老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大声疾呼要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提出了“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这些新颖独到的见解，充分显示了陈云党建思想的智慧和力量。

第四，体系的完整性。

陈云党建思想内容丰富、具体、实用，涉及到党的建设的各个基本方面，同时又并非一般地就事论事，而是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特点。其一，它能够从事物整体出发来分析和把握某一个体，亦即能把任何个体、现象、过程置于一个更为宏大背景关系之中，从而更深刻地把握这一个体、现象和过程；其二，它能够从事物、过程、要素的复杂关系中，把握和抽象出它们的整体，形成对这一事物本质和内在实质的整体把握。具体说，陈云党建思想所体现的这种体系的完整性，主要包含3个层次：一是回答了关于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他关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的论述上。二是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居多数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共产党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他关于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理论上。三是回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如何搞好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他关于建设健全有力的党支部、基层党组织要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和各项工作任务地完成，以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等观点上。陈云党建理论在这3个层次上比较完整地论证和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建设面临的基本问题，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

第五，严肃的批判性。

陈云党建思想是在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在反右特别是反“左”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他批判把党内的民主和集中、党员和领导、个人和组织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从理论上剖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作风产生的根源及危害性。他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抨击以权谋私等党内腐败现象。值得指出的是，陈云党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具有以一贯之的坚定性。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陈云都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党性原则，他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观点从30年代讲到90年代，绝不随风转舵，人云亦云，真正做到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即使在“文革”中，他身处逆境，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性原则，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

总之，陈云的党建思想是一个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科学理论体系。正确认识和理解陈云党建思想的特点，无论是对我们认识其在新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是对我们在党的建设实践中对其加以具体运用都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盐城市委党校）

注释 (11)(12)(13)(14)《陈云文选》第1卷，第220、173、197、196、347、348、348、182、182页。

(15)(16)(17)《陈云文选》第3卷，第360、317、273、275、46、274、352、338页。

陈云党建思想的理论特征

黄文朝

一 着力于回答各个历史阶段全党最关注的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陈云党建思想的理论特征，首先体现在他总是着力于回答各个历史阶段全党最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陈云说他自己的成熟是在延安。如果我们把陈云 1937 年从新疆到延安后至 1994 年这 50 多年间所写的文章仔细看看，就不难发现，他的党建论著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及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侧重点都是不同的。究其原因，就在于这几个历史阶段，党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不一样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适应领导伟大民族战争的需要，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陈云在这个时期的党建理论，正是抓住这一时期的主题，从多方面来展开论述的。第一，鉴于我们党在遵义会议前的经验教训，陈云强调党的建设“必须彻底无保留地打破主观主义、公式主义和生搬硬套书本上的概念，从具体的中国情况出发，抓住中国的特点”；并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特点概括为 5 条，解决了党的建设应该从什么样的实际出发的理论问题。第二，把党建工作放到全党工作中来考虑，强调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要处理好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党的建设要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实行。二是要处理好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的关系，把严密党的内部和加强党的群众工作作为建设党巩固党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陈云关于处理好这两个关系的论述，从理论上解决了党的建设不能孤立进行的问题。第三，根据当时党的自身建设的实际，系统论述了党员学习、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支部建设、党的纪律建设等问题，从理论上解决了如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地位、任务、环境都发生了根本变化。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领导，关键是要努力保证党对重大决策的正确性和高级领导的团结统一。这个时期，陈云在总结正反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保证党的重大决策正确的思想：（一）决策要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特别是要解决城乡人民的吃穿问题。在建国之初，他说：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成了我们的责任。1957 年，他在《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中说，“我们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在暂时困难时期，他认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 5 亿多农民和 1 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他还提出兼顾各方面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思想。（二）决策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陈云为了解情况和决定政策，难者在弄清情况，因此强调用 90% 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 10% 的时间来决定政策。陈云在 1959 年提出的关于钢铁指标的建议，就是深入细致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作出决策的范例。（三）必须坚持“交换、比较、反复”的 6 字方法。为了对问题有全面的了解，就要有反对派，要听得进反面意见，要多交换意见；要有多种方案进行比较（当年搞

统购统销，他就是在8个方案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作出决策的)；还要留下思考的时间。这3个方面从党的宗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解决了如何使党的决策正确的问题。那么，如何增强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呢？陈云指出，关键在于几百个高级领导人。高级干部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头脑清醒，我们党的团结就有保证；再加上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的团结就更有保证了。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处在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我们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围绕这个主题，陈云提出并论证了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重大命题。他认为，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每个同志，尤其是每个老同志，都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把它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大”。他还对为什么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如何按干部“四化”方针提拔干部，以及应该采取的重要配套措施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为我们党的交班和接班大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鉴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党风遭到严重破坏的教训，针对党在新时期面临的新任务和改革开放新形势提出的客观要求，陈云作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论断。他特别强调要发扬实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注意克服以权谋私和警惕对外开放后带来消极的问题，注意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渗入；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严肃党纪政纪，职能部门抓和党委抓要结合，并全面论述了如何搞好新时期党风建设的问题。这些思想对指导全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侧重于党建应用理论的研究，把理论原理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

陈云的党建论著，引经据典不多，也不作纯理论的阐发，而是从党的建设实际出发，侧重于应用理论的研究，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下功夫。陈云党建论著把理论原理具体化，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一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建原理，根据实践的发展加以发挥和补充，使之更加全面和符合我们党的实践。比如，毛泽东讲了党的建设与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的原理之后，陈云在谈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时提出两个要求：“对政治路线的正确了解；对具体情况的切实了解。……要克服‘上级只谈政治路线，下级只谈具体情况’的缺点。”这是对原理的发挥。在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之后，陈云作了抢知识分子的论述，这是对党的决定的发挥。至于补充，则大多表现为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同一个问题，比如，关于党支部的建设，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陈云都有论述，前三者曾对支部建在连上、支部的作用、支部的结构和会议等进行论述，陈云写的《党的支部》一文，则对党支部的重要性、建设原则、基本任务以及上级党部如何领导支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抗战时期，毛泽东、陈云都谈到实行统一战线要防止被资产阶级腐化、保持党的纯洁性问题，毛泽东强调的是要和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陈云则要求每个党组织和每个党员要严守纪律。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深入社会实践的必要性问题，毛

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创作的角度作了阐述，陈云则从作家的为人作了补充。这种补充不仅使道理说得更全面，也易为人们接受。

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通俗化，使之变为全党可理解可接受的东西，便于全党把握其精神实质。他往往用简洁的语言来点明某一原理的实质，例如，他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15个字来说明如何坚持党的唯物辩证法，用“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来解释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含义。他也经常运用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阐述加强党的某一方面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比如，他在论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纪律时，就是用全党所熟知的5个方面的事实，说明严守党的纪律是党坚强有力、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他还以人所共知的“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来强调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陈云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他的话不多，但全党都会从中得出结论：我们党和国家要避免大的错误，要兴旺发达，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从而提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是把党建基本原理具体化，使之变为可操作的东西，充分发挥党建理论在党建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党建理论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要指导实践，还需要把它具体化。陈云重视党建理论对党建实践的指导作用，因而特别注意把党建原理具体化。比如，建设一支宏大的干部队伍和培养成千上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党建的一条基本原理，为了落实它，陈云做了一系列具体化的工作：其一，讲了选拔干部的四条标准，这是对“德才兼备”标准的具体化。其二，具体他讲了12个字的干部政策，操作性很强。其三，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原则，如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人事相宜的原则。其四，提出了一整套干部教育管理的具体制度。其五，提出了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办法措施。80年代，针对干部队伍年龄老化问题，陈云不仅论述了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紧迫性，还提出在中组部要成立青干局、科技干部局来专门抓；要求党委、老干部亲自抓；还要设立一些职务让青年干部在实践中锻炼；及严格把好选拔年轻干部的政治关等措施和办法。陈云侧重于党建应用理论的研究，使党建理论为党的建设实践服务，这一特点为我们党的党建理论研究树立了新风。

三善于从共性中区分出个性，从个性中概括出共性，既有针对性又富于开创性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陈云的党建论著，总是紧紧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精髓，对党建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研究，总结升华，在各方面做出合乎我们党的建设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因而具有针对性，又富开创性。针对性是从理论对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来说的，开创性就是党建理论本身的发展而言的。通观陈云的党建论著，这一理论特征到处都有充分的体现。

首先，陈云注重对于特殊性的研究，从共性中区分出个性。实行分类指导，又从个性中找出共性，增强党建理论对实践指导的针对性。一是对不同地区党组织提出不同具体任务。如在抗战时期，陈云曾对抗日根据地、大后方和敌占城市的党组织工作，分别提出不同的要求。根据地内的党支部要

领导党、政、军、民、学各项工作，其目的是建立和巩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因此，他强调指出：当权的党容易只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东西；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把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做好。大后方党组织是秘密组织，其基本任务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因此，他指出，党组织必须进行3个方面的工作：党的组织的精干隐蔽；熟悉国民党，加强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熟悉社会，深入社会。(11)他强调秘密党要“党内小党外大”，党组织形式必须“杂乱无章”，各级党委必须成为“国民党通”，党员要有正常的社会职业，并适应社会，必须特别研究自己公开活动的专门方面，成为党内的“社会通”、“专门家”。二是对党建中的同一项内容，向不同的方面提不同的要求。比如在于部队伍建设问题上，对党组织，他强调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对干部个人，他则强调要用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同样是对干部提出严格要求，但各类干部的情况不一样，要求的侧重点也不一样。陈云在不同的场合，对新知识分子干部、老干部，专门技术干部，领导干部、军事干部、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很有针对性。新知识分子干部往往把组织安排自己做各种实际工作看成是“大才小用”，据此，陈云指出，知识分子是有用之才，但仅仅是“做人之才”，还不是革命的人才；新知识分子实践经验太少，要在革命实践中增长才干。对老干部，陈云要求他们不要卖老资格，要提高文化，要主动团结新干部，对专门技术干部，陈云要求他们内部要合作，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不要自以为是，也不要自鸣清高。对领导干部，陈云要求他们必须努力学习，提高自己，识大体，顾大局，要赏罚分明；特别是对高级领导干部，陈云要求他们不要骄傲，不要把功劳当成包袱背起来，要加强学习，提高革命觉悟和嗅觉，要小心谨慎，不要头脑发昏。他认为军队干部手中有枪杆子，还有功劳，要防止蛮横霸道的作风。对于文艺工作者，陈云要求他们不要特殊，不要自大，说“小菜煮在锅里，味道闻在外面”，一个人的成就，要经群众的判断和历史的考验，不是自称的。他主张文化工作者也要学政治，不然就会“感情用事”；文人也要下乡，不经历一番实践的磨练，不能成“家”。三是在特殊的要求中强调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各类干部都应总结经验，找出新的办法；要学理论，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要依靠群众，疑难不决的事情，要请教群众。陈云的党建思想中的分类指导理论，其独创性的见解，对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陈云注重对新问题的研究，并善于概括出新的思想，从而拓宽党建理论的新领域，创造出新的结论。陈云说：“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12)他的许多党建理论的新观点，正是他立足于党建工作所遇到的新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才形成独创性的新结论的。例如，关于我们党内第一个用条文形式规定的党员6条标准；关于党支部的4项基本任务；关于一切脱离群众的党部，都是最不巩固的党部的结论；关于开展群众工作是当前地方工作的中心的要求等等，都是在他担任中组部长期间碰到问题后研究的成果。再例如，关于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论述；关于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面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段落建议；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论断等等，都是他总结党在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训，考虑如何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和

指导地位，研究解决新时期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得出的成果。这些成果为我们党的建设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

四态度恳切而不失原则，语言质朴而说理透彻，具有民主性和说服力

坚强的党性原则与恳切的态度相融合，用质朴的语言来论述深刻的思想，让人们从其说理中受到启迪，抓住根本，明确前进的方向。陈云党建论著的这种鲜明的理论风格，体现了科学的民主性，彻底性，从而增强了理论的说说服力。

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统一，是陈云党建理论的鲜明风格。陈云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内长期身居高位，但他作报告写文章，从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教训别人，而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与同事、下属平等地研究问题。比如，他长期学习革命理论，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广博的知识，但他在谈到党员学习的时候，却十分谦虚地说：“象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13）他很重视向社会学习，在强调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干部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时说：“我对于缺乏工作经验的干部，丝毫没有轻视的意思，而且我自己也是缺少工作经验的一个。但是缺少工作经验的同志，需要经过哪条道路才能把自己充实起来的问题，是需要弄清楚的。”（14）他在党的七大作题为《要讲真理，不讲面子》的针砭时弊的发言时说：“同志们研究，看我说得对不对，不对的可以批判，条条可以驳。”（15）这些都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民主精神。陈云在长期的党建实践和领导活动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党性原则不动摇，并对许多党建理论问题作过精辟的论断，但绝不武断，他的结论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以客观现实材料为依据，并进行科学的论证，得到人们的认同。他对党内存在的片面的认识、陈旧观念和错误的倾向，总是实事求是的提出来，分析其原因，指出其危害，说明改正的办法。比如，怎样看党性的纯洁，怎样对待党分配给自己的实际工作，怎样看待自己的前途，怎样正确估计自己的功劳，怎样对待自己的错误，都有深刻的分析。特别是对他自己在认识上和工作指导上的失误，曾经作过多次的自我批评；而把工作中的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群众，其鲜明的是非荣辱观，其态度的恳切，跃然纸上，让人信服。

陈云的党建论著，语言质朴而含义深刻，准确而不呆板，活泼而有法度，有时还在严肃中透露出一点风趣。他的党建论著，言简意赅，并善于从纷繁的现象中指出本质，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关键，从矛盾的不同侧面中强调矛盾的主要方面，让人能从中抓住党建工作的根本。陈云在延安时期就提出，当权的政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为根据地党的建设指明方向。他讲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指出，首先弄清情况，这是关键问题。在新时期，他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的党风。他还说过，下级干部的个人主义，高级干部的个人主义，性质是一样的，但是如果高级干部中间有这种倾向，那危险性一定大于下级干部和中级干部。陈云的理论语言虽然质朴，但他常用比喻、比较的手法，也不乏风趣。例如，他勉励业务干部要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不要老呆在地下室。他把代表全局利

益的话称为“北京话”，把参加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称为“后排议员”。他鼓励没有文化的青年干部进“长期大学”，坚持自学，说学成之后就是头号的“博士”。他把解决问题从容易的方面着手称之为“雷公打豆腐”。他强调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问题。这些风趣的比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云的党建思想，把党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方法论和独特风格融为一体，展现出他的党建思想别具一格的理论特征。这些是他的“唯实”观在党建理论研究中的生动体现，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党建理论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广西百色地委党校）

注释

(11)(13)(14)(15)

《陈云文选》第1卷，第235、220、220、195—196、212—213、109—122、173、236、188—189、254、291页。

《陈云文选》第2卷，第15页。

(12)《陈云文选》第3卷，第85、298、310页。

陈云与社会主义 新时期党的建设

迟爱萍

早在建国初期，陈云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中的重要成员。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后，他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仅就这一时期，他在党的政治路线的确立、中青年干部队伍的造就和党的作风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作一初步探究。

—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以及全会前后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若干事件，是党的事业由“文革”中遭受挫折到重新走上正确发展道路的序幕。陈云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抵制“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及邓小平的重新复出工作，做出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党内党外很自然地出现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将触及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的问题上，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从而使这两个问题一时成为禁区，拨乱反正工作受到严重阻碍。

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向来以稳健著称的陈云挺身而出，代表党心民心，仗义执言，揭开了全党拨乱反正的序幕。

1977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于会议起始，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便对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样敏感的问题。陈云不顾压力，从全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向小组讨论会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旗帜鲜明地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与此同时，王震在自己所在的小组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当时负责会议简报的同志执行“两个凡是”的方针，要求陈云按他们的意见对书面发言进行删改，被陈云严正拒绝。结果，这个发言来能在简报上刊出。但由于陈云、王震的发言，触及了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代表了党心民心，因此在会上不胫而走。会后，许多老同志纷纷呼吁要求中央正确解决天安门事件，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面对党内外的压力，在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终于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工作，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方针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恢复和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在这里，陈云以他在党内的威望所起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然而，与“两个凡是”方针的斗争并没因此而结束。8月中旬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虽然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政治报告中，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因而，这次会议未能完成从理论上和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为了继续突破“两个凡是”，摆脱人们思想上的各种束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发表文章或谈话，强调和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这篇文章通过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以党的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素材，较为全面的论述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陈云的文章以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谈话和文章一起，为翌年在全国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起了一个先导作用。

2. 推动 1978 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促成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历史性的转折。

1978 年底，中国历史的航船已行进到这样一个关口：一方面，在揭批“四人帮”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党心、民心都迫切要求彻底纠正已经延续了 20 多年的“左”倾错误，把拨乱反正由局部扩展到全面；另一方面，对“两个凡是”方针的批判，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各条战线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的开展，为党实现历史性的转折提供了客观的可能。

可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依然不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他虽然在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接受了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的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建议，但又把三个经济工作方面的议题，规定为会议的正式议题，试图回避“左”倾错误的问题。然而，现实的情况表明：在不彻底清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左”倾错误的前提下，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按照这一计划行事，那么，已经徘徊了两年的中国历史航船将会继续在迷误中徘徊。

在这一关键时刻，陈云又一次挺身而出，发挥了一个老一辈革命家所具有的中流砥柱作用。11 月 12 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以《坚持有错必纠》为题发言，他提出了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的 6 条意见。陈云的发言，冲破了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对会议原定的框框，使原要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变成了纠正“左”倾错误，进行全局性拨乱反正的会议。11 月 13 日，东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的同志们在发言中都表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同志所提问题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议论较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希望中央能给予解决。这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11 月 25 日，在与会同志的强烈要求下，经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革”中和“文革”前被错误定性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被冤枉的一些重要领导同志的平反决定。这些决定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

陈云在提出政治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同时，也提出了经济上要克服急于求成“左”的思想影响的问题。12 月 10 日，陈云在东北组就经济工作问题提出 5 点意见：1. 要重视八亿农民这个大头，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2. 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3. 要给各省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4. 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5. 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其中 1、2、4 点实际上触及了进行经济调整的问题；

3、5 两点实际上触及了改革和开放的问题。这些意见对于促使全党思索党的一些重大方针的转变，起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由于陈云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努力，使与会者放下了思想包袱，畅所欲言，会上出现了文革以来没有见过的生动、活泼、民主、团结的热烈讨论气氛。在这种民主气氛中，与会同志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一战略任务，对当时面临的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讨论，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愈来愈明确，促成了随后召开的党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

3. 抵制怀疑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出重要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就是要彻底地和系统地解决“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问题，全面地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这就需要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加以深刻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要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作出客观的正确评价。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国内存在“左”右两种错误思潮，一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的“左”的错误倾向：一种是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有的思潮。事实表明，如果不能全面地、历史地、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发生严重的思想混乱，党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这显然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盛衰兴亡的全局性问题。

陈云以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敏锐性较早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79年3月，陈云在同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在讲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专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说：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象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对毛泽东的评价要平心静气，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在此之后，以叶剑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契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地将用党的决议形式，对建国以来诸如“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等等作出正式结论的问题，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从11月起，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邓小平为决议的起草提出3条明确的指导思想，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陈云积极赞成邓小平的主张。1981年3月，陈云对前来商议《决议》起草的邓力群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达到这个目的，陈云建议《决议》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的历史段落。同时，陈云还建议中央提倡学习，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3月24日，陈云向前来探望的邓小平，重复了上述意见。邓小平十分重视陈云的意见。26日，邓小平在与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陈云同志关于“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的意见很好。“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邓小平还委托起草小组负责人将陈云关于中央提倡学哲学的建议，转告总书记胡耀邦；并且指出，在《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5月19日，邓小平在讨论《决议》草稿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决议》起草过程中

吸收了许多好的意见时，特别指出：“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决议》。这一成果对中国政治生活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陈云在《决议》起草前及起草过程中所发表的意见，对于全党全面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二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如何为实现正确的政治路线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便成为具有头等意义的任务。陈云在延安时期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长达7年之久，对党的干部政策曾有过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建国后，他长期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对培养和造就党的干部队伍，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在新的时期他凭借自己长期积累的政治经验，对推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成千上万地培养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意见。

1. 力主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以此作为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班的一种好形式。

经过十年浩劫，党和国家百废待兴，中央领导的工作异常繁重，但许多老同志年事已高，难以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而且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也启示人们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以制约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因而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的意见，这一主张立即得到陈云的复议。他认为重新设立书记处，“可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可以减轻年迈同志的工作；也可以避免中央领导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陈云的意见受到中央的重视。翌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重新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陈云在会上就书记处成立的意义、工作范围、工作方法等问题作了扼要的发言。

重建中央书记处，在加强和完善中央领导体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又是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并为中央集体交接班作准备。

2. 提出“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建议，为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奠定了组织基础。

能否培养出一支合格的干部队伍，是关系到党的盛衰兴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也是一个党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在“内乱”得到大治之后，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多次呼吁，要把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提到全党议事日程上来。1979年3月25日，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提拔四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作“后排议员”。1980年2月24日，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陈云又提出，要把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作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要选择党性强、有干劲、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年轻干部；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在此期间，邓小平、叶剑英对提拔干部的标准等问题也作了阐述。在这个基础上，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各级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是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方针。

正确的方针确定之后，落实就成了关键问题。为此，陈云作了大量指导工作。1981年5月8日，陈云在杭州休息期间，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并将此文分送胡耀邦和邓小平，后在6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印发，在党内产生很大影响。7月2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又作了题为《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陈云在这两篇讲话中，针对文革后干部队伍的状况，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原则，强调：第一，必须成千上万的提拔中青年干部；第二，绝不能提拔文革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两点意见，陈云在以后的若干关于培养干部问题的论述中，曾反复强调，可以说是他新时期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核心意见。陈云在这两篇讲话中对干部队伍建设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他特别强调了干部的实践锻炼，为了搞好中青年干部的选拔，陈云建议中央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部局；在提拔干部的过程中，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台阶论”，使被提干部基础巩固扎实，本领全面。

陈云上述意见，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81年8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对调整领导班子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指示的几项工作》的通知，对大批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筹建青年干部局等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随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客观形势对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根据形势的需要，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十二大、十二届三中全会、1985年党代会上，对干部队伍建设又提出一些新的重要意见：第一，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论述中国党培养造就中青年干部队伍的重要性。认为如不能保持干部队伍的梯形结构，改变青黄不接的局面，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第二，特别强调选拔干部的政治思想标准。德才相比，要更侧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由此，陈云继1981年7月提出不能提拔的“三种人”之后，又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发言中提出了不能提拔的“两种人”，即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第三，提出要大力加强干部的教育和培训工作。1983年2月25日，陈云在全国第二次党校工作会议期间，致信中央党校负责同志、希望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和解决这个思想把培训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党政领导骨干作为党校的迫切任务。

3. 指导全党妥善做好老干部离退休工作。

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和老干部的离退休，是干部队伍建设过程中紧密相联的两个问题，所以，陈云在反复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也一再告诫全党要做好老干部离退休工作，并且身体力行，亲自参与对老干部离退休政策的研究。

1981年5月8日，陈云写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邓小平表示赞同陈云提出的“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意见，同时指出，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陈云在6月8日又召开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同志座谈会，并写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在《纪要》中，陈云明确指出：干部必须实行离退休制度，“这是根本办法”；它关系到几十万应该离退休的干部，而且也关系每个干部将来必

须面对的现实。因而“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必须做好的大事”。《纪要》强调要妥善处理好离退休干部的政治和物质待遇等问题，并提出党必须制定干部离退休的条例。7月2日，陈云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读了这个《纪要》，以引起党内对离退休干部工作问题的重视。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4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陈云在上述《纪要》中所阐述的政策精神，在这两个关于离退休制度的文件中都得到了体现。

在这前后，陈云在党的一些会议的发言中曾多次强调要重视老干部离退休工作，不仅要安排好他们离退休后的生活，还要发挥好他们晚年的作用。

三

十年内乱，党的作风遭到严重破坏，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下，党风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以致使端正党风，惩治腐败成为整个社会关心和呼吁的热点问题。这个问题也引起了陈云的极大关注。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全党推举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以后又连任一届。在此期间，陈云始终把端正党风作为中纪委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在中纪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会的讲话中，他明确把“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作为中纪委的基本任务确定下来，他的讲话确定了党风建设在整个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位置。

在这之后，陈云不断在党内的讲话和批示中，从保持党的性质、保证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贯彻执行、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及国家政权的建设和巩固、社会风气的好坏等方面，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他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很快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党风建设重要性的至理名言。

对如何加强党风建设，陈云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

1. 在党风建设之中要坚持严肃党纪和加强党员思想教育相结合。

对于党内严重的腐败现象，陈云始终要求中纪委“全力以赴”，“抓到底”。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原则和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对触犯党纪国法的党员，进行严肃地惩处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党的作风建设绝不仅仅是解决几个违纪分子的问题，而是要提高广大党员的素质。只有提高了全体党员的思想素质，才可能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氛围，从根本上杜绝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党内的蔓延。因此，陈云认为，从严治党，除了对少数党员严肃党纪外，还必须着眼于对绝大多数党员的思想教育。

2. 扶持党内正气，以正党风。

以正压邪，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良好道德风尚形成的重要方法。在陈云党风建设的思想中，这一方法的体现是很显著的。陈云常常是在批评一种错误思想作风倾向时，同时提出应大力发扬的另一种党的好的作风，以引导党风向好的方向发展。比较突出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批评党内存在的非民主，一言堂的倾向，提倡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传统和作风。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陈云曾提出，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出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陈云大加赞扬。后来，在党的

会议上又曾出现过个别压制不同意见的现象，陈云对此提出严肃批评，他鼓励党内的同志按照组织原则和程序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才能使党立于不败之地和兴旺发达。

第二，批评党内存在的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的倾向；提倡恢复和发扬党的坚持原则，分清是非的精神。陈云认为，党内、社会风气中，是非不分，有些同志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在1982年9月13日的中纪委讲话中，提醒各级纪检部门在选择干部时，要选择那些有坚强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而不是在原则问题“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

第三，严厉批评党内存在的革命意志衰退，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腐败现象，教育全党要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的侵入党的队伍。陈云尖锐地指出，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就以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从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共产党员具有远见卓识的表现，是共产党员的精神支柱。因此，陈云强调在党内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要使全党每个同志明白，“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3.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做端正党风的表率。

端正党风是全党共同的任务。但由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处于领导地位，其言行影响更大，所以更应严格要求自己。领导干部只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才有资格规范和约束别人，实施有效的领导。所以，陈云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端正党风的工作中要身体力行，作出榜样。1986年1月，针对个别高级干部向下属单位要新的高级小轿车的事情，陈云严肃的指出：中央要求北京的党、政、军机关，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出表率。我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他建议，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

陈云上述关于端正党风问题的具体意见，对于指导全党搞好党风建设，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及商品经济发展的考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云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党的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对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重要作用，而且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292、303、306页。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陈云在中组部文件上的批示（1982年1月13日）。

《陈云文选》第3卷，第347页。

论陈云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论贡献

郑帼英 赵泉钧

陈云在领导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对毛泽东思想关于党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多方面的贡献。特别是他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尤为深刻与丰富。在贯彻与执行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时，认真学习陈云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具有特别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试就陈云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作一概论。

一 论述民主集中制是一个辩证统一体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具有深刻的内涵。1947年4月，陈云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工作会议上，针对辽东党内存在着的组织生活不健全的状态，提出了“党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主张，并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作了精辟的论断。他说：“民主不仅一般需要，在目前情况下有特殊需要，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同时又指出：“民主又必须集中。个人意见不被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决定。”建国后，他又明确地说：“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在讲到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时，他说：“纪律与自由，是矛盾的统一。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陈云这些讲话，正确地辩证地阐明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关于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这一矛盾统一的关系，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主集中制思想的重要发挥。

首先，他的论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规律，是党的组织、党内生活、党的活动的基本原则。既然是规律，那就必须遵守，决不能违背，否则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其次，他的论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民主集中制包括着民主与集中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民主与集中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它们互为前提，互相依赖，互相渗透，缺一不可。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基础和条件，又是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特征和内在要求；集中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反映民主的要求，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保证。脱离了民主这个基础，集中就会是空的、假的、错误的，就会产生个人专制或官僚集中制。民主也应该置于集中的指导和制约之下，否则，就可能滑向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

其三，他的论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民主集中制又是自由与纪律的矛盾统一。在党内不可以没有自由，但自由是要受到纪律的约束的。两者互相依存，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正如陈云所说：“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纪律有没有束缚性？……我们的纪律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害革命的东西，就象游泳术对于游泳的人只束缚他不要淹死一样。”“如果我们一定要革命，又一定要施展一些妨害革命的‘天才’，那么对不起，就得束缚一些；如果不是这样，

就决不会感到是束缚。”这段话，对自由与纪律的关系讲得多么生动、多么深刻啊！

其四，他的论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民主集中制既是目的，也是手段。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要在我国造成“六有”的政治局面，这可以说是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目标。陈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提出要“真正实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说“这个问题最大，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将无法估量，”当然，要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又要依靠民主集中制这个手段，通过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途径来实现。

二提出民主集中制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组织保证

政治路线的正确制定过程，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党的政治路线能否正确制定，固然有许多重要的因素，但都离不开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因为，只有充分发扬了民主，才能使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愿望、要求充分反映出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能制走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发挥全党的集体智慧和创造精神，避免少数人凭主观臆断决定政策。只有充分发扬了民主，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坚持正确，纠正错误。只有充分发扬了民主，才能在民主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达到决策的科学化和全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

党的建设实践证明，凡是党的政治路线发生错误或失误（“左”的或“右”的错误）时，就其组织方面的原因来说，都是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贯彻或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陈云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将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怎样贯彻民主集中制，坚持民主作风，保证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同毛泽东所犯的错误的以及“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加以对比，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同样，凡是党的政治路线正确时，都是切实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正确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迎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好形势。

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实施，也需要民主集中制作根本保证。陈云在谈到组织工作要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时说：“有两个要求：对政治路线的正确了解；对具体情况的切实了解。只谈路线，不了解具体情况，是空谈。只知道具体情况，不了解路线，是盲目。要克服‘上级只谈政治路线，下级只谈具体工作’的缺点。”因此，政治路线必须要让人民群众所认识，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只有他们接受了，才能变为他们的自觉行动，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而努力奋斗；必须让广大干部所掌握，只有他们才能带领、组织和团结人民正确地贯彻实施政治路线，正如毛泽东所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它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以便随时纠正错误，不断补充、完善并在实践中发展；需要在贯彻中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和破坏，等等。而所有这些离不开民主集中制的贯彻，离不开发扬民主，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当前，我们在贯彻十四大确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坚持和运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地处理好各种新问题和矛盾，确保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

在党和国家的内部关系上，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地方必须服从中央，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维护中央的权威，反对地方主义、分散主义。任何采取各行其是，各自力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都是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陈云指出，“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就无法稳定。”邓小平指出：“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力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11）

在领导体制问题上，必须正确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但这还刚起步，在双重体制此消彼长的转换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种种矛盾和困难。因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既不能宏观限制微观，统得过死，也决不能让微观放任自流，恶性膨胀，不受控制。“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12)

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必须正确处理好国家利益、局部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应该重申和强调全局观点，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以上所说的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13)

三阐明民主集中制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条件

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是保证我们事业胜利的法宝。要达到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是重要条件。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坚持实事求是。没有民主集中制，或者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实事求是的原则就难以坚持。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破除本本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陈云的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深刻阐明了这一真理。不唯上，不是说不执行上级的指示，而是要与实际相结合；不唯书，也不是说不要“本本”，而是不能搞“本本主义”。陈云不仅是我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模范，而且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认真读书，总是同党的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与解放思想、唯实创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结合。他一贯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作风。他说：“必须彻底无保留地打破主观主义、公式主义和生搬硬套书本上的概念，从具体的中国情况出发，抓住中国的特点。只有这样，革命工作的广大园地。才会真正发现。”(14)

实事求是就是探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陈云说：“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15)“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16)“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17)这就需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对客观情况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是科学制定政策的基础。陈三一再强调对客观规律要全面认识，“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他批评有的同志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指出“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18)为了达到实事求是，陈云不仅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而且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他说，所谓全面，就是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仅要听正面的意见，还要听反面的意见，“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19)陈云指出：“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20)所谓比较，有左右的比较，有前后的比较，“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21)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22)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然后再作决定。“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这里重要的，是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正确的东西，是在否定错误的东西中生长起来的。”(23)陈云这些论述蕴含了深刻的思想，生动揭示了坚持实事求是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辩证关系。

提倡实事求是，还必须总结经验教训，随时纠正错误。陈云说：“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领不大。”“应该小心谨慎地前进，并在前进中随时总结经验，这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24)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他特别强调总结经验，他说，“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与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

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26)“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27)，而这同样需要充分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因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正确总结经验，达到实事求是。

四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实行集体领导的基本准则

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党的一个优良传统。陈云一贯强调“要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27)。因为，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

坚持集体领导要正确处理好领导集团内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任何个人都有局限性，个人只有依赖于集体，同集体相结合，才能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实现正确的集中，发挥正确的作用。陈云说，“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28)领导集团内部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必须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处理，一要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二要处理好少数与多数的关系。陈云指出：“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29)“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30)当然，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发挥集体的智慧，并不意味着降低个人的作用，减轻个人的责任。坚持集体领导，必须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充分发挥党委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任何淡化集体领导，片面突出个人或个人不负责任，否认个人的作用，都是错误的。

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就必须遵照陈云的教导，反对个人专断和家长制作风。个人专断作风，往往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是几千年来封建特权阶级专制主义的残余在党内的反映，它与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根本对立，是根本违背民主集中制的。我们必须坚决同这种错误作斗争。

五强调民主集中制是维护党的团结的重要武器

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护与增强党和国家的团结与统一。毛泽东早就指出，“要把我们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31)。陈云指出：要遵照毛泽东的教导，造成“六有”的政治局面，他说：“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32)可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基础。

要同违背团结与统一的行为作斗争，就要严格执行纪律。陈云指出“纪

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33)“怎样才叫真正遵守纪律呢？一句话：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为什么执行决议是遵守纪律的表现呢？因为党所规定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无非是用这样民主集中的制度来作出党的决议，统一党的意志和行动。”四个服从完整的纪律体系。“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遵守纪律首先要从自己做起，要与党内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但尤贵于与自己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34)在执政与改革开放条件下，陈云特别强调要研究新情况，严肃党纪国法。他说：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党员可以利用手中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35)“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36)

要达到党的团结统一，必须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这也是发扬党内外民主的中心一环。陈云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提倡原则精神，反对和稀泥。“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37)陈云一贯主张对党内生活不健全的状况，“必须以严肃的原则性去对付之”，“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这是应有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38)实现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化，必须用民主集中制来规范。

能否真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关键在于领导，陈云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要从领导做起。“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39)陈云提倡“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他说：“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常常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不讲出来。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40)针对有些干部只听别人好话的情况，他指出，“其实光说好后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决不是件好事；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41)

实现党的团结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要防止党内出大乱子，这是极端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陈云也说：“我们不要高枕无忧，认为党内不会出怪事。”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呢？他说，翻来覆去地想，“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我看这是我们党的团结的可靠保证。再加上一条，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42)陈云的这些精辟论断，不仅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而且对于今后的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领导人，都要把提高革

命觉悟放在首位，要有十分清醒的头脑，遵纪守法，坚持民主集中制，以确保党的团结统一与国家的长治久安。陈云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中的重要财富。我们要遵照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和研究陈云的思想，进一步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把我们的党和国家建设得更好。

（作者单位：浙江杭州长征中学、浙江大学）注释

(14)(33)(34)(38)(41)《陈云文选》第1卷，第347—348、197—198、276、220、235—236、196、126、347、121页。

(12)(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2)(35)(36)(37)(39)(40)《陈云文选》第3卷，第270、380、350、250、235、188、34、46、46、47、236、47、107—108、279、338、270、46、353、270、240、331—332、275、274、275、361页。

(42)《陈云文选》第2卷，第232—233页。

转引自邓力群：《陈云同志是实事求是的模范》，载《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页。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第526、535页。

(31)《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第1097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176页。

陈云对党的纪律建设的 理论贡献

邢家强

陈云在延安时期担任过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担任过9年中纪委第一书记。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他一贯重视党的组织建设中的纪律建设，特别强调党纪在治党治国治军中的作用，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同时也在组织上作风上建设党的建党路线。他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不仅包括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原理，而且包括党的纪检工作的基本理论；不仅体现在执政前，而且贯穿于执政后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理论对于建设一个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我们新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科学指南。

一 丰富了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原理

（一）关于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性

陈云在延安时期就对党的纪律建设十分重视。在无产阶级政党创建的初期，马克思就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列宁在总结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功的经验时，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陈云坚持了马列主义关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的基本观点，把要不要加强党的纪律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他提出：“可否不要纪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这是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的论断的新的发展。列宁把组织作为武器，作为思想统一的物质力量。陈云则进一步把纪律作为武器，指出“纪律是保证政治上组织上统一的武器。”

纪律之所以是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唯一武器，就在于全党严守党纪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要“用纪律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有了严格的纪律，我们党才能有组织和统一；有了纪律的物质力量，全党才有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一致；“有了铁的纪律的党，才能建立有铁的纪律的军队”。陈云很早就从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中，看到了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马列主义教育是重要的，但不是万能的，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也很重要。他说，“我看不能因为有马列主义教育，以后就不出问题了。张国焘不是老党员吗？他比一般干部受的马列主义教育还少吗？但是他叛变了。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具有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党的建设中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要使我们党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党，要确保领导权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要避免“亡党亡国亡头”，我们在斗争

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的就是党的纪律。

党在执政以前，没有纪律就不能巩固自己，团结群众，坚持斗争，战胜强敌。党在执政以后，还需不需要坚持党的纪律呢？陈云揭示了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的规律。他说：“共产党下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陈云不仅把组织与纪律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党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指出不坚持党的纪律，就没有好的党风。他在延安时期就对权力的两重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指出，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党员违犯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11)所以，在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以后，他认为对于党内状况不能盲目乐观，并分析了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产生的主客观原因，他认为，在主观上，有的党员和干部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出了问题，他们“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12)在客观上，执政的条件和和平环境使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13)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进一步看到我们党面临执政的考验和改革开放的考验。他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14)。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中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和违纪现象增多了，“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15)。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受处分的党员中有相当数量的中高级干部；党员违纪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违纪有上升趋势。所以，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党的纪律，越要加强党风建设和进行反腐败斗争，“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16)这可以说是陈云为我们揭示的又一个党纪建设方面的重要规律。

(二) 关于党的纪律的基本特征

列宁指出：“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17)陈云坚持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纪的基本特征的思想，揭示了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和自觉的纪律的统一。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18)

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是一种权力威信，是思想统一的物质力量，因而是铁的纪律。铁的纪律首先就在于纪律的服从性。陈云指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19)铁的纪律还在于服从的无条件性。陈云指出：“个人对组织，少数对多数，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服从是无条件的。组织、多数、上级、中央的决策正确时，自然要服从；如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怎么办？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同时应该按党章规定的权利，提出建议，或保留自己的意见。”(20)服从的无条件性是党的组织原则中的基本问题，是遵守党纪的集中体现，陈云阐述的这个原理对于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一个战斗力的马列主义的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铁的纪律还在于服从的无特殊性。陈云指出：“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21)“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22)。

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不仅是铁的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陈云指出：

它不排斥“党内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在决议作出以前，有争论的自由；在决议作出以后，有保留不同意见的自由”（23）。党员还有申诉的自由，对批评和处分辩护的自由，要求进行复查的自由，选举的自由等，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和自觉的纪律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首先表现在“坚定的革命者视纪律为自由”（24）。“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25）

其次，铁的纪律和自觉的纪律的辩证统一，还表现在党的纪律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铁的纪律，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铁的纪律才能有效地执行。而这种自觉性，陈云指出，是源于党员的“高度的政治觉悟，对革命有无限忠诚和责任心”（26）。共产党员有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坚定信念和顽强的英雄气概，有了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和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才下会为个人的生死荣辱而改变信念，违犯党的纪律；才不会为物质利益所诱惑，以权谋私而破坏党的纪律；才不会为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而无视党的纪律；才下会为一时的挫折心灰意懒一蹶不振而不遵守党的纪律。总之，有了理想，才会有铁的纪律。

（三）关于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遵守党的纪律的主要原则

陈云把严守党的纪律作为共产党员的一条重要标准，他坚持列宁的建党原则，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遵守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如何遵守党的纪律呢？他要求共产党员“要特别注意真心地遵守和具体地遵守”（27），指出：“遵守纪律首先要从自己做起，要与党内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但尤贵于与自己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28）他还指出：“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只有具备这样坚定和顽强的英雄气概，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29）

陈云还把守纪律作为干部的4条标准之一，对领导干部遵守纪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指出，领导干部要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原则。他“希望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30）他反复强调要学习列宁，说列宁是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但还是少数服从多数”（31），直到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中形成多数时，才决定签订和约，在党内斗争中，陈云认为，仍要遵循党章的规定，严守纪律。他指出：“在革命成败的紧急关头，对错误领导者进行斗争是必要的，但仍须遵循党章的规定，采取合法的手续（如遵义会议）。”（32）“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坚决主张尽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并在党的会议上为邓小平的复出大声疾呼，说：“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33）他还在党的会议上为薄一波等61人证明，说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因而他们不是叛徒。陈云在党内斗争中正确运用党的纪律建设理论的实践活动，为我们中高级领导干部如何遵守党的纪律树立了光辉典范。

二奠定了我党纪检工作的理论基础

纪检工作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没有纪律不行，有了纪律，没有纪律检查工作来维护也不行。陈云在长期的纪检工作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纪检工作的基本理论观点，为形成我党纪检工作的一整套正确的理论原则和正确的方针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关于纪委的基本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建中纪委。陈云指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30) 纪检机关不仅是党内的“执法”机关，而且是加强党风建设、反腐败的职能机关。因此，陈云希望纪检部门的同志要时时刻刻注意：“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认真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35)。他提出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36)的科学论断，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由于陈云不仅把党的纪律建设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而且把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这就明确了纪检工作在党的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关于纪委应有4项职能的基本思想

纪检机关是党内对党的组织和党员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执行纪律的职能机关，其职能和功能可以概括为“保护、惩处、监督、教育”8个字。这4项职能统一于纪检工作的全过程。陈云虽然没有提出4项职能的概念，但陈云对纪检工作的许多论述中，实际上，提出了纪委应有4项职能的基本思想。早在延安时期，陈三就提出要爱护和保护干部。他认为，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辩证地看干部的“纯洁”，才能成大事业。他提出要“反对轻视干部政治生命、随意摆布干部的倾向”；“反对滥用纪律惩办干部”；“处罚干部必须适当”(37)。他要求组织部门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采取正当的方法，做出符合实际的书面结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提出：“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38)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陈云关心爱护和保护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保护党员和干部的民主权力使之下受侵犯的思想。陈云明确提出了纪委的惩处职能。他说：“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的工作是：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39) 纪委不仅要追究那些违法乱纪的个人，而且要追究那些在执纪方面失职的党委和纪委的责任。陈云还提出了党员和干部要接受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的思想。他说：“力维护党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每个组织，都应该自觉自愿地接受其它党员和上下周围组织的监督，同时诚恳虚心地接受群众的监督。”(40)“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必须成为严守党纪的模范。要特别防范高级领导人破坏纪律的行为”(41)。陈云一贯重视对党员进行纪律教育以增强党员的纪律观念。他说：“在党内尤其是新党员中加强纪律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做才是遵守纪律，什么事是违犯纪律的等等一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42) 陈云的这些论述为纪委履行4项职能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新形势下从整体上维护党的纪律，提高纪检工作水平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关于纪委的体制、纪检工作的方针、对纪检干部的要求和纪检工作的指导思想

纪委要不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陈云根据长期纪检工作的实践，明确表示“各级纪委应在同级党委统一领导之下”⁽⁴³⁾工作。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保证了党委对本级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纪委相对独立地行使职权，又防止了同级党委权力的过分集中。

纪检工作应实行什么样的方针？对这个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陈云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⁴⁴⁾这是有了理想才有纪律的基本原理，在纪检工作中的运用。显然，只有着眼于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消极腐败现象。只有以教育为主，纪检工作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正确执行纪律才有保证。

纪检干部应由什么样的人来充当？对这个问题，陈云 1982 年 9 月 13 日《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回答：“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⁴⁵⁾这就是说，纪检干部应当是敢于弹劾百官、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的包公式的人。

党的纪检工作指导思想是什么？对此，陈云虽然没有直接回答过，但他 1986 年 10 月 4 日《在会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时的讲话》中指出：“党的纪律检查部门，要在纪律检查工作上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党的纪律检查部门要坚决反对和认真纠正各种妨碍和破坏改革的行为，使纪律检查部门成为保证和促进改革的重要力量。”⁽⁴⁶⁾这就告诉我们，纪检工作的指导思想应当是保证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纪检工作要成为促进改革的重要力量，要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坚持生产力标准，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树立新观念；要支持和保护改革者，帮助失误者，惩处违纪者。这与反腐败并不矛盾。因为，反腐败正是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的重要保证，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重庆市委党校）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13 页。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 卷，第 181 页。

(11)(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2)(37)(40)(41)(42)《陈云文选》第 1 卷，第 275、213、139、196、195—196、183、197—198、348、197、196、126、197、197、276、128、276、126、140—141、197、217、197、196、128 页。

(12)(13)《陈云文选》第 2 卷，第 232—233、231、231 页。

(14)(15)(16)(30)(31)(33)(34)(35)(36)(38)(39)(43)《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275、331、331、275、353、241、230、240、348、273、273、356、357 页。

(17)《列宁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1 页。

(44)(45)(46)《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1、 279、 304 页。

试论陈云关于支部建设的 论述及其现实意义

赵清城

重视党的支部建设是陈云建党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陈云在不少著作中都谈到这一问题。他还以《党的支部》为题，对支部的重要性、基本任务及上级组织如何领导支部等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这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中是不多见的。陈云的论述，不仅在实践上为建设、巩固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提供了指导，而且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的党建理论。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地位、作用和基层组织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但陈云关于党的支部建设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界定支部属性，强调 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

把基层支部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环节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初期，就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党的基础，明确要求建立从支部、区部、总区部到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的自下而上的组织体系，使党成为一个统一整体；并且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支部，应成为工会及其他社会群众组织中的“中心和核心”。列宁在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中，把支部建设作为党实现核心领导作用不可动摇的基础，他指出：“工人当中的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先进分子所领导的地方党支部，尤其是工厂的党支部——这就是我们赖以建立起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不可动摇的坚强核心的基础。”我们党从建党开始，也十分重视党的支部建设。在1972年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后来，他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时，认为这是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还认为，地方党的支部如果不能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建设好，那么“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将是很困难的。这实际上是把党的支部建设提到决定党的整体战斗力的高度，表明我党对基层党组织作用认识的进一步提高。

马克思主义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是陈云支部建设理论的依据。抗日战争时期，陈云连续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着力研究和领导了党的建设。他把马克思主义支部建设理论和我党的实际相结合，在《党的支部》一文中，对党的支部作了科学界定，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支部的重要作用，使党的支部建设有了较完备的规范。陈云关于支部重要作用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

第一，“支部是党的最下层的组织，也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这是陈云对支部属性的科学确定。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一个严密整体。党的基层组织——支部，是党组织系统中的基本细胞，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正是通过数百万个基层支部把众多的党员集聚、组合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成为一个有高度战斗力的政党。每一个党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必须加入党的一个支部，执行党的决议。如果没有党

的支部把全体党员组织起来，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党的领导就无法落实，就不可能形成全党的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的先决条件。

第二，“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组织。”党的支部处于同人民群众接近的地位，同群众的联系最密切。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愿望要求，要通过党的支部不断地反映到领导机关，才能保证党制定的方针政策符合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党的一切口号、主张、政策，依靠支部才能具体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支部在群众中日常的宣传组织工作，才能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口号、主张、政策之下，进行革命运动。”

党的基层组织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的职责，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党的支部处在最基层，处在群众之中，人民群众则以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和周围党员的表现来认识党、了解党、评价党。因此，建设好党支部，依靠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才能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心协力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而努力。

第三，“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党的支部是教育党员，训练党员最基本的学校。它负责组织党员学习，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监督党员履行义务，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按照党章规定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清除腐败分子。党支部又是发展新党员，壮大党员队伍的基本组织，担负着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考察工作，把群众中符合党员标准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而“共产党组织力量的扩大，是革命运动发展的主要保证”。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党员队伍，党就难以广泛地发动群众，就难以实现党的各项任务。党的队伍的壮大与发展，主要是通过活跃在各条战线的基层支部进行的，党的基层支部把本阶级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断给党增添新血液，才能使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陈云在阐述党支部重要作用时，特别强调加强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的基层支部成为群众的核心，他以列宁反对社会民主党下以支部为领导群众的核心、而把支部当作选举运动的竞选工具为例，鲜明地指出：“支部不但要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核心的堡垒的姿态，而且要在实质上真正能起核心的堡垒的作用。”“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群众核心的时候，那个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那个支部才是党在群众中的堡垒。”这不仅是对党支部的地位的明确规定，而且是对支部建设目的的严格要求。党的支部成为群众的核心，党的支部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战斗堡垒，党才有战斗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工作任务、活动方式也才因此而有依托。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基层支部作为党执政的基础、作为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组织，其核心堡垒作用的发挥显得日益重要。江泽民说：“党的战斗力，党的力量，表现在哪里？我看首先表现在近 300 万个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然，中央的领导作用从哪里来？如果党的基层组织统统都淡化了，我看总书记就一定会变成‘空头司令’。”所以，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否认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必然会削弱党的领导。”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变了，但党的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堡垒作用没有变，必须始终保持。这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保证，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结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确定、实施和维护基层党支部的核心堡垒地位，并

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干扰或阻力，影响着党的领导作用的实现。远的不说，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多次出现过怀疑否定基层党组织核心堡垒作用的倾向。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有人提出，“包产到户，不要支部”。确定厂长（经理）在企业中的中心地位时，有人认为党组织可以不要了，甚至提出党组织“撤离企业”，“厂长说了算，党委靠边站”。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后，有人提出“党政一体化”，“建党于政”。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提出后，有人提出“按照国际惯例，不需党支部设置”。这些观点共同一点就是从否定党支部在农村、企业中的核心堡垒作用出发，进而削弱、取消、否定党的领导地位。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不就是从“淡化”、否定基层支部的领导作用开始，进而发展到要求共产党“下台”、“解散”，以至导致亡党亡国的吗？这种教训极为深刻。学习陈云关于党支部“要在实质上真正能起核心的堡垒作用”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基层支部作用的认识，纠正忽视基层支部建设的倾向，强化基层党支部的地位和作用。

二 明确支部的基本任务， 指明了支部工作的方向

党支部要真正发挥核心的堡垒作用，“必须建立起它自己的基本工作，分配和责成每个党员去执行。”（13）陈云在论述支部重要作用时，对支部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多方面要求。这些论述虽然是战争年代讲的，但对当前加强和改进基层党支部建设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把做好群众工作作为党支部的重要任务。陈云认为，党支部要完成党的各项任务，中心环节是开展群众工作。党支部要善于找到提高群众积极性的环子，抓住这个环子来推动支部工作，推动全盘工作。“支部在周围群众中间工作的好坏是测量支部工作好坏的尺度。支部中每个党员积极地、经常地进行群众工作，是支部周围的群众工作开展的基本条件。”（14）做好群众工作，首先要求支部及其每个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布置，在群众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群众自觉地接受党的主张。陈云要求地方各级党组织在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时候，要把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列入日常的议事日程，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认为这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问题。其次，要把开展群众工作与党的中心任务结合起来。陈云举例说，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群众工作的中心是“组织和领导群众参加抗战”，“同时，应该领导群众开展生产运动，进行经济建设，改善群众的生活”（15）。这是由当时全党的中心任务所决定的。第三，改进群众工作的领导方式和方法。陈云指出：“支部的领导方式是做好工作的关键，有了正确的决议案还不够，要把正确的决议运用到群众中去，成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还必须经过一种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16）办法从何来？关键是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17）陈云要求支部的党员“要以民主的作风与群众在一起工作，不要包办”，“要经常注意团结群众的领袖，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18）要处处事事为群众着想。“讨论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

问题，形式要生动活泼，而且不能耽误群众很多时间。”(19)开会时少说群众不爱听，听不懂的话，“可以自由谈天，不妨讲讲《三国演义》，吹吹‘山海经’，谈谈国家大事，说说家常琐事。”(20)

(二) 支部领导班子的建设始终是关键性问题。陈云认为：“支部领导机关的健全与否，对于党的任务的完成有决定的作用。”因此，党的基层支部必须“慎重地选择自己领导机关的人员”(21)。首先，对支部班子成员严格要求。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必须是政治坚定，忠实执行党的政策，有工作能力并为大家所信仰的党员”(22)。其次，要加强班子成员的思想作风建设。要建立和健全支部班子正常的学习制度和组织生活制度。领导班子内要经常交流情况，沟通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进班子的团结。班子成员一方面要善于引导和教育党员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恰当处理党内矛盾和纠纷；另一方面要模范遵守党内生活准则，既不要搞家长制、一言堂，也不要搞自由主义。第三，上级组织要加强对基层支部的领导，注意培养支部干部。陈云认为，地方党委对基层支部的领导对支部组织生活和群众工作的健全有决定意义。“正确的适当的领导可以使不健全的支部健全起来；没有这种领导，即使好的支部工作也会退步，党员积极性不能提高反而下降。”“地方党部对于支部领导上的重要一环，就是培养支部的干部。”(23)要尽可能举办支部干部训练班，或者经常地通过进行个别谈话等方法培养支部干部，帮助他们提高素质，掌握开展工作的方法，提高工作责任心。

(三) 实现党员被育和管理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陈云指出：“支部是教育党员训练党员最基本的学校。”“在支部的日常工作中，要监督党员遵守党的纪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员中间各种脱离党的理论、政策、党规、党法等错误倾向。”(24)陈云这些要求，实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按照陈云讲话精神基层支部在这方面主要应该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对党员要进行经常性的教育，教育内容，“首先着重于共产主义的基本教育，以坚定党员的革命人生观。”(25)还要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通过学习，不断增强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二是加强党员管理、监督。“必须用纪律来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每个党员要树立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不仅要在口头上讲党的纪律，拥护党的决议，更重要的是要“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26)。三是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这是党组织加强对党员、党员干部进行经常性教育和组织管理的基本环节。四是积极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支部是征收党员的机关。”(27)要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吸收新党员必须把考察和教育结合起来，在“日常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在群众运动的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28)，要加强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发展党员。要坚持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按规定程序履行申请、审查、通过、批准手续，确实保证质量合格，防上不够条件或是投机者、坏分子混进党内，要切实做到“既要保证支部能大量地征收党员，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混入党内”(29)。

陈云支部建设思想丰富而深邃，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有力的思想武器，我们要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研究陈云的支部建设思想，并从基层支部的各自特点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改进基层支部的活动方式和方法，把党支部建设成为领导群众

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的政治核心堡垒。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卷,第 386 页。

《列宁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 页。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陈云文选》第 1 卷,第 145、148、145、145、150、147、165、175、146、148、148、148、24、169、149、175—176、159、147、147、154—155、151、139、149、150、151 页。

《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第 440 页。

陈云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大后方党组织建设的特殊贡献

魏峡

陈云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以极大的精力和智慧，指导了大后方党的组织建设，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大后方党的建设方针，巩固党的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并且在实践中积累了秘密党组织建设的丰富经验，为了后方的党组织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

陈云对大后方党组织建设的特殊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全党组织建设带普遍性问题的指导，同样适用于大后方党的组织建设，比如他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以及关于支部工作、群众工作、党的纪律等方面的一系列文章、指示，对全党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也是大后方组织学习的重要内容和工作的重要依据。二是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大后方党组织建设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参与制定甚至起草了一系列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建设的文件、指示。对此，本文拟作一粗浅探讨。

一总结和汲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肃清过左观点对大后方党的影响，从根本上扫清了大后方党组织建设中的思想障碍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 1927 年的“八七”会议上作出决议，由公开斗争转向秘密斗争，从此开创了白区工作领域。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导致了党在白区的组织大多遭受完全的失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于 1937 年 5 月召开白区党代表会议，对白区工作进行总结。这次会议没有把白区工作中的错误当做整个“左”倾错误的一部分来总结，因而在白区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没有取得共识，以致白区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在大后方党的建设中又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来。对此，毛泽东曾尖锐批评说：“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看得不严重”。由此不难看出，“左”倾错误的影响，已成为大后方党组织建设的严重思想障碍。陈云首先把这种思想障碍的出现同白区党代表会议联系起来，指出了白区党代表会议的严重不足和肃清“左”倾错误影响的迫切性。他说：“1937 年在延安举行的白区党代表会议，虽然一般正确地决定了具体工作的转变，但内战时期工作错误的传统仍旧或多或少地在今天大后方的党内存在着。因此，现在党中央虽然指出了大后方党的任务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但在许多具体工作上还必须根据过去失败的教训加以深刻的反省，大胆地解脱历史成见的束缚，否定那种过去错误的或不合现时的方法和组织形式，而做出正确的规定。”陈云在这里明确表示，总结白区工作的教训，目的在于加强大后方党的组织建设。

陈云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担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对“左”倾错误给

白区工作造成的危害有切身体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掌握了“左”倾错误在大后方党建设中反映出来的许多现实材料。因此，他对总结和汲取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发言权。为着肃清“左”倾错误对白区工作的影响，陈云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陈云抓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工作错误的实质，结合党的整个“左”倾错误来加以剖析，指出“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错误是基本的错误，也是当时整个错误路线的一部分”。当时，中央对“左”倾错误尚未作出正式结论，陈云能作出这样的判断，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陈云指出白区工作遭受严重损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党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认识，在大革命失败后对政治形势估计错误，没有实行暂时退却、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方针。”这就明白地告诉大后方党，如果不彻底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将会重蹈白区工作错误的覆辙，招来重大损失。

再次，陈云总结出白区党的重要教训，是党外群众工作没有尽量开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白区工作中，天天在工厂内、学校内、农村内寻找“斗争”，制造“斗争”，结果使党外工作完全垮台，党的秘密组织因缺乏外层的掩护而暴露，最后必然使秘密组织遭受敌人的打击。因此，陈云指出：“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党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因为没有正确了解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及其区别，因此党外的群众工作没有尽量地开展，已经建立了的党外群众工作又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而使许多地方的群众工作完全垮台。……这个痛苦的经验，应该成为现在秘密党的借鉴”。

此外，陈云身体力行，和西北局的同志一道，总结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结合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创造的大后方党组织建设的新经验，提出了关于陕西国民党区域党的组织的决定草案。这是陈云摒弃白区工作的旧传统，制定秘密党组织办法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陈云把总结白区工作经验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推动了中央和整个大后方党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大后方党的组织建设办法。1941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陕西国民党区域党的组织的决定草案，陈云在会上报告说，我根据南方党的工作经验，参加了西北局关于陕西党的工作的讨论，我提出国民党区域党的工作问题，现在来总结我们过去10余年白区工作经验，是特别有意义的。过去白区工作会议虽然停止了暴动政策，但未彻底改变过去错误。陈云的发言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毛泽东在发言中说，这次陈云及陕西党大胆研究新的问题的态度是好的。会议通过了关于陕西国民党区域党组织的决定。中央书记处还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和主要精神向南厂局作了通报。南方局也召开会议，总结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秘密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同志作了重要发言。随后，各省、特委通过对中央和南方局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使大后方党的广大干部对白区工作错误的实质、原因、重要教训，有了明确的认识，从思想上解脱了历史成见的束缚，对加强大后方党的组织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在大后方党组织的危急关头，
提出特殊的组织建设办法，保

证了隐蔽方针的贯彻执行， 保存了党的组织

大后方党组织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发展起来的。当时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度出现了团结抗战的较好局面。大后方党组织在这种形势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党的组织公开或半公开，党的干部大都暴露。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在日本政府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对华政策诱惑下，开始转向反共，随后由“限制异党活动”，发展到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肃清”中共组织。面对国内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党中央作出巩固党的决定，制定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发出了“应付突然事变”的警告。围绕巩固党的组织这一中心任务，陈云指导大后方党采取了一系列组织建设措施，其中包括撤退已暴露干部；提拔和培养新干部；情洗内好和防止内好；保证领导机关安全；缩小组织，整理组织，提高党员质量；转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等等。经过这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党的组织从半公开状态向秘密状态转变，逐步成为完全秘密的党，增强了应付突然事变的能力。但是，这种组织形式的转变，在大后方的发展很不平衡，整个大后方党，还是极下巩固的党，为避免突然袭击，还须作出更艰巨的努力。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又一次掀起大规模反共逆流。根据中央掌握的可靠情报，蒋介石已经下令，要在6个月内，逮捕已被特务机关掌握的中共党员，全面破坏大后方的中共组织。大后方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由于公开的合法的八路军办事处、交通站多数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往来于延安经重庆、贵阳至桂林的交通线被迫中断，成批地输送党的干部已不可能，党的组织失去了合法机关的掩护，要保存下来十分困难。此时，保存大后方党的组织，不仅是摆在南方局面前的严峻任务，也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任务。1941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天国民党区域中心问题是如何保持得住党的组织之存在，并决定由陈云负责起草一个指示电。

陈云紧紧围绕政治局会议决议的保存党的组织这个中心，根据已掌握的大后方党的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负责起草了《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指示》进一步强调了撤退已暴露干部、党员扎根社会、加入国民党、对自首分子的策略等等问题以外，在组织工作上作出了许多重要规定，主要是：“坚决地勇敢地打破组织上的公式主义，因为一切组织与行动上的公式主义，仅便利于特务，而于党却是不利的”；“在特务严密监视的部门中，不建立支部，党员独立活动，上级只与其个别联系”；“一般的不开支部会，仅个别接头，党员各自进行文化与理论的自我教育”；“党员转移时不转党的关系，仍由原组织与之发伞关系”；“各级领导机关，一般的不要有书记、组织、宣传，只设个别特派员工作员，切实把握短小精干的原则，领导机关于部所在地亦不作党的活动，如甲地领导干部一般的应住在乙地”；“如党员或各级领导机关与上级失掉联系，须独立工作，不准到处乱找党，同时不准与素不相识的人发生组织上的关系”。5月8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陈云负责起草的这个《指示》电文。

《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产生的时间、历史背景，以及陈云如

何负责起草这个《指示》，笔者曾作过专题辨正（详见《陈云与〈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一文，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4期），这里不再赘述。为着说明陈云在大后方党组织的危急关头作出的特殊贡献，有必要分析和肯定《指示》在大后方党组织建设上的重要意义。

第一，《指示》提出了“坚决地勇敢地打破组织上的公式主义”的口号，这对彻底转变组织形式，在思想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大后方党以巩固党为中心任务，在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过程中，在组织问题上，早已提出了“缩小组织”、“转变斗争方式”、“转变组织形式”等要求。但由于大批干部是从抗战初期的救亡运动中过来的，习惯于组织公开的群众运动，在新的白色恐怖到来时，缺乏思想准备，仍然按常规办事。组织尽管缩小了，仍少不了书记、副书记及组织、宣传、统战等几大部；公开的群众斗争停止了，而3人以上的会议屡禁不止，似乎不开会就没有力党工作，就是不革命。这种常规性的组织方法和活动方式，最容易暴露自己。打破组织上的公式主义成为保存党的组织的迫切需要。《指示》使人们在思想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为彻底转变组织形式奠定了基础。

第二，《指示》针对大后方党所处的特殊环境，提出了特殊的组织办法，为彻底转变组织形式规定了5条重要措施，即：不建立支部，不开支部会，不转党员的关系，不要有书记、组织、宣传，不准到处乱找党。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党的组织原则所不允许的。但实行这些办法并不是不要组织原则，而是在特殊情况下党为保存力量制定的暂时策略，是有条件的。如“下建立支部”，是指“在特务严密监视的部门中”；“不要有书记”，但应设个别特派员工作员等等。这些规定，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的统一。这是党中央在大后方党组织建设的关键时刻所采取的坚决措施，也是陈云对大后方党组织建设所作出的最突出的贡献。

第三，《指示》所采取的组织措施，虽然是针对大后方党组织的特殊情况制定的暂时策略，但它却为提出秘密党的组织办法开辟了道路，毛泽东曾经指出，过去我们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口号提出了，但没有指示具体的组织办法。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原则性意见，即组织的多样性、复杂性。大后方党通过对《指示》的贯彻执行，总结出“平行支部”、“单线联系”、“个人负责”。“特派员制”、“党员转地不转党（组织关系）”、干部“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或合法化）等等具体组织办法。实践证明，凡是这样认真做了的，就保存了干部，保存了党的组织，保存了党的力量。

三指导大后方党深入群众，深入社会，提出了“党内小党外大”的组织形式和进行社会公益事业的操作方式

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宗旨所决定的，既是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又是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重要保证。陈云说：“历来的经验证明，没有一个脱离群众的党组织是巩固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已把深入群众，深入社会作为白区工作的重要条件。1928年10月，党中央在69号通告中提出要求，在白区工作的共产党员，必须“取得或学习一种职业，

打入社会里面”，“埋伏在群众中做群众的领导者”。接着，中共中央在《关于湖北组织问题的决议案》中，又把“深入群众”排在秘密党6个运用条件之首，并提出了“职业化、社会化”的要求，1934年6月，白区工作都把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文件集中起来，编印成册，陈云以《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问题》为题写了前言。在这篇前言中，陈云讲的8个问题，有5个涉及到群众工作，并提出了秘密工作“群众化”的思想。他写道：“秘密工作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深入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和保护。我们的行动和居住应该在群众中，一起日常生活甚至言语、服装要完全当地群众化，与群众打成一片。”陈云关于秘密工作“群众化”的思想，使党中央提出的“职业化、社会化”得到补充和完善，统称“三化”。陈云的这一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通过指导大后方党的组织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第一，针对大后方秘密党的特点，把扩大党外群众工作，报到了组织形式的新高度。

大后方党的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秘密的党的组织。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一是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和抗战初期的半公开的党，而是处于国民党统治势力压迫之下的秘密的党；二是不同于内战时期非常孤立的秘密党，而是有广大群众基础的秘密的党；三是不同于八路军、新四军所在地的有武装力量可以自卫的党，而是仅仅依靠党员的革命意志的坚定，党的组织的严密，党与群众的联系的秘密的党。大后方党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的基本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秘密的党，同时又有广大的革命的社会基础。依据这一特点，陈云断然提出：“只有‘党内小党外大’，才是目前秘密党唯一正确的组织形式。”(11)所谓“党内小”，就是党的组织一定要短小精干，党员的数量不在多，而在于党员质量高。所谓“党外大”，就是要扩大党外活动，并且要公开地合法地进行，通过公开合法的党外活动，广泛联系群众，广泛团结思想上同情党的人和党外的共产主义者。而党外同情者和党外共产主义者，团结得越多越好。

第二，提出了学习、职业、交朋友的新要求。

秘密党员深入群众，深入社会，不仅不能降低共产党员的水准，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而且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文化素质和业务能力。学习内容包括，阅读党出版的书籍或其他进步的书籍，增加知识，自修深造，在政治上不断提高自己；不识字的党员，要把读书识字提高文化作为对革命的责任；还必须学习社会的人情世故，学习一般的社会知识和业务知识，在革命工作的方针之下，善于与社会的各方面融洽。陈云强调说，如果大后方、敌占区的党员人人都这样做，定下一个长期学习的计划，则几年之后会造就成千成万政治上高明的干部，“培养这样成千成万的干部，并且能够保存下来，使用到革命决战关头，实在是无敌的力量。”(12)

大后方的党员，要把秘密工作做好，必须真正取得社会上的可靠掩护。一要获得社会职业，二要广交朋友。陈云严肃地指出：“必须懂得，没有真实可靠的公开合法的社会掩护，就不能保证秘密党组织干部的长期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得和保持社会职业并不比革命工作次要些。”(13)他还说，“每个党员找到可靠的真正的职业，并且广交朋友，建立无数社会联系，以社会人士的面目去取得周围的信仰”(14)，才能使党在社会中打下牢固的基础。

第三，提出了进行社会公益事业这一具有综合效应的操作方式。

陈云认为，扩大党外活动，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不在于发动多少次斗争，在秘密条件下，也不在于组织多少群众团体，吸收多少会员，而在于党员去做许多有益于群众的社会公益事业，各种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公益事业，到处可以做，到处可以取得社会援助。陈云指出：“共产党员是人群中最好的人，而去进行这种社会公益事业，也正是名副其实地成了社会上公认的好人。只要做几次公益事业，就不仅能够社会上被劳动大众所拥护，而且可以获得中上层正派人士的同情，也使反共分子难于反对我们。”(15)因此，进行社会公益事业，既易于操作又具有联系群众，深入社会，广交朋友的综合效应，是实现“党内小党外大”这一组织形式的有效途径。为了说明进行公益事业的这种综合效应，陈云还举例说明：某处乡间，共产党员联络地方上的正派绅士，办了一所学校，这既是统战工作，又交了朋友；学校办起来了，在其中工作，又获得了社会职业，可以合法地公开地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真是一举数得。陈云满怀信心他说：“如果党内是巩固的，每个党员又在社会上获得地位而被公认为好人，这样的地方党组织才称得上是巩固的。这样的党组织，才能完成中央所给的任务：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6)

在陈云的倡导之下，经过南方局的实际推动，进行社会公益事业，成为大后方广大党员、干部的实际行动，他们开工厂、开矿山，办学校、办商店、办合作社，从中学到了本领，获得了公开的社会职业，结交朋友，取得广大民众的信任，打入社会，深藏于群众之中，成为社会公认的好人。大后方的广大人民群众，正是在这样一批好人的影响和带动下，提高了觉悟，凝聚了力量，当革命时机到来时，一呼百应，形成了新的民主运动的滚滚洪流。

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的建设，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3个发展阶段。陈云对于秘密党建设的实践，跨越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不仅指导了大后方秘密党组织的建设，而且指导了敌占区秘密党组织的建设。因此，陈云对于秘密党组织建设的实践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秘密党组织建设思想，是有中国特色的秘密党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陈云关于秘密党组织建设的思想，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发掘，比如还有许多关于秘密党组织建设的文电，有可能出自陈云之手，需要加以考定和鉴别。只有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才能弥补陈云生平与思想研究及中国秘密党研究之不足。

陈云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党给予了客观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他指出：“大后方的党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一部分，则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是不可能的。”(17)对大后方党给予这样高的评价，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这一论断，在当时对克服轻视大后方工作或不安安心大后方工作的错误倾向，保证大后方党内思想稳定，对于增强党内团结，有重要作用；在今天，也可帮助我们正确对待和评价历史上的功过是非。

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各地区各方面的不同情况，实事求是地制定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是陈云的一贯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指出：“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18)抗日战争时期，他根据大后方党所处的特殊环境，采取特殊组织措施，表现出了原则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无论在党的建设中，还是在经济建设中，陈云的这一思想，对于反对“一刀切”的简单的工作方法和形式主义，都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半个世纪前，陈云指导大后方党员进行社会公益事业，要求党员成为社会上公认的好人，从而既深藏了自己，又凝聚了革命力量。在“反腐倡廉”的今天，如果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也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为人民群众多办好事，办实事，不是可以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党的崇高形象吗？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和发掘陈云有关秘密党组织建设的思想，对于我们仍然不乏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注释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第765页。

(11)(12)(13)(14)(15)(16)(17)(18)《陈云文选》第1卷，第233—234、233、233、208、165、28、229、208、206、237、209、210、233、29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陈云在新时期对党风建设的重要贡献

宋毓均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对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大量而深刻的阐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特别是在新时期，陈云针对党面临的执政、改革开放印考验和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的新形势，于1980年11月，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严肃而尖锐地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对新时期党风建设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重视党的作风建设的。毛泽东曾明确提出党的三大作风的概念，把党风问题提到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而陈云根据新时期的实际情况，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提到与党的生死存亡密切相关的高度，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这一论断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丰富了党的作风是党的世界观的表现的原理

党风，是指政党的作风，是政党在从事活动中，在政治、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体现着党的精神风貌。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政党时，就提出共产党人的作风问题。他们指出，“我们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

一个政党的优良作风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党员的特殊品格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党的科学世界观决定的。世界观决定党风，党风是党的世界观的外在表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一个政党和它的党员的世界观是否正确，决定这个党和党员的作风好不好。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有无产阶级的作风；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必然是资产阶级的作风。人民群众对党和党员的认识，往往是通过党和党员的作风来判断的。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不可能正确认识与处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正确认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不会有好的党风。因此，把党风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才能深刻认识它对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得失成败关系的重要意义。同样，把党风问题提到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才能坚决地、自觉地用科学的世界观武装自己，不断加强党员的党性锻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二 阐明了党风建设与党的其他建设的辩证关系

无产阶级政党的作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它同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作风建设不仅反映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成果，而且反作用于这几方面的建设，保证党的这几方面建设的成果得以巩固和发展。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党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广大党员不怕牺牲，不谋私利，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取得了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新时期的实践证明，不抓紧作风建设，就难以继承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而这正是党过去、现在和将来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所以，如果不抓紧作风建设，党的优良作风不能继承和发扬，不仅党风搞不好，而且党的其他几个方面的建设也不可能搞好。

三，揭示了党风问题的实质是 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列宁指出：“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对于执政党来说，“最大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斯大林在《关于党在农村中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这里应该记住列宁的不朽名言：我们党的力量在于保持党和千百万非党群众之间的活的联系，这种联系愈实际，我们的成就就愈可靠。”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三大优良作风的核心内容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必须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就不能胜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建设自己文明、富裕、幸福的生活就不能实现。另一方面，党必须联系群众，扎根于人民之中，在人民中生根开花。党如果没有好的党风，脱离了人民群众，那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失去了力量源泉，不仅不能领导人民群众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自身也不能生存和发展。

陈云“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以及有关党风建设的其他论述，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风建设的理论，而且阐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风建设，搞好党风的重要意义。它使我们认识到：

（一）党风的好坏关系着党能否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党的作风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但党的作风好坏又直接影响着党的性质。党能否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会不会腐化变质？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究其根本，问题出在党内，同长期治党不严，不抓党风建设有直接关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党就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丢掉党的优良作风，党风腐败，就可能导致党的性质的蜕变。党执政后能不能保持党的性质，是关系着党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关

系着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陈云指出。“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贪污犯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共产党员的保护。”如果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丧失警惕，不能有力地制止和克服，那就会有更多的党员和干部变质，有更多的基层组织变质，这势必危及党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对我来说，这是绝对的界限。”党的性质同党的作风建设有直接联系。党风表现党性，党风的好坏同党性的强弱成正比。因此，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必须健全自身的肌体，加强党风建设，防微杜渐，除恶务尽。正是基于上述考虑，陈云指出：“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二）党风好坏关系着党能否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70多年的历史表明，党的优良作风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党风在党的建设中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党的作风好，坚持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正确分析矛盾，集中群众智慧，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能制定出符合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并通过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去影响和带动群众，把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事业引向胜利。党的作风不够好，党内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盛行，不正之风占支配地位，就无法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过程中，也不能紧密依靠群众、结合实际，而是唯上、唯书，搞“一刀切”，或是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结果必然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抑制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正确的路线政策不能得以贯彻。因此，陈云指出：“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三）党风的好坏关系着人心的向背。

党风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对于执政党来说，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党生存发展和实现党的纲领、路线的关键所在。人民群众对党的认识，往往是通过党员的言论和行为来判定的。共产党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就能得民心，就能受到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共产党员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搞官僚主义，作威作福，就会脱离群众，丧失民心，必遭人民的反对。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可见，党风好坏，关系着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鄂州市委党校）注释
《陈云文选》第3卷，第273、331、273、275、331—332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118页。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78、589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0页。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第139页；第3卷第109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469—470

页。

论陈云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思想及现实意义

欧新民 曾祥祯

陈三思想理论宝库中蕴含着丰富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思想。他的这些思想不仅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已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陈云的群众观点的主要内容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陈云认为，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他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十分重视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作用，从而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群众观点。这些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群众是英雄、群众出智慧的观点。

陈云在长期领导我们党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认识和智慧的源泉。早在 1939 年 11 月，他就针对当时某些地方工作的薄弱环节意味深长地指出，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坚定不移、到处适应的办法就是：“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我们的地方党部，我们的区委和党支部，只有收集了群众的意见，才能做出很好的决定，否则是不可能的。”以后，他又多次强调，“没有人民，就没有英雄”，“离开群众，世上是没有什么清葛亮的。”

他指出，一切认为人民群众是什么都不懂，只能听指挥，象算盘珠子那样，只能拨一拨，动一动的看法都是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无论哪条英雄好汉要是这样想，如果我不出来的话，老百姓不得了，中国共产党不得了，那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任何英雄好汉死了，地球照样会转动，革命下会停顿，“老百姓还是要革命的，党还是要继续前进的。”相反，任何所谓的好汉，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就将一事无成。所以，陈云强调，一切群众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最好的学习课本，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缺乏经验的领导干部，要发动、教育和引导群众，就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

（二）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的观点。

陈云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主体力量，只有获得他们的积极支持和拥护，革命和建设才能成功，否则，一切工作都“鲜有希望。”1926 年 7 月，他在总结了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后深刻地指出：“从这次运动的事实分析出来，没有强有力的有组织的下层民众——工农参加，革命是难能成功的。”后来，他又多次强调，无论是我们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秘密工作、经济工作，还是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都一刻也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934 年 9 月，他针对当时游击战争开展不利的情况指出，游击战争开展不起来，“甚至找不到饭吃，归于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去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帮助。”根据地建设“要站住脚，就得有群众。……有了群众，一切好办，可以有军队，清除土匪，经费供给也有来源。没有群众，一定失

败，死无葬身之地。”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始终认为：“群众的发动，是党、政、军一切工作发展的基础”，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三）共产党人足为群众“当差”的观点。

共产党人是为群众“当差”的，这是陈云一贯坚持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大家，为大家‘当差’的，是遵循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意见办事的。” 他在谈到共产党员应具备的条件时说，因为是共产党员，是群众信仰的先进队伍中的一分子，所以，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革命的、本阶级的和党的利益”。为此，他反复强调，各级政府和党员必须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否则，这样的政府就不是人民的政府，这样的党员就是失去了党性的党员。这样的政府和党员就会由失去群众而无立身之地。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扎扎实实地为群众谋福利，“这样人民才会感到政府能够给他们办事，是人民很好的‘公仆’”。(11)因此，他要求我们党的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密切与周围群众的关系，了解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自觉做一个称职的人民公仆。

（四）群众的利益和需求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的观点。

陈云指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劳动者人人有吃有穿，而且要吃的较好，穿的较好。”(12)1980年12月，他又强调，搞经济建设乃至各项工作的最后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他认为，人民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无论办任何事情都要从群众的利益和需求出发，使每项工作都能为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样才不致于背离我们工作的宗旨；才能制定出合乎实际、合乎民心的工作方针，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工作方针为民众所欢迎，并变为群众自觉为之奋斗的行动。他强调，即使在困难时期，我们的工作也不能以损害或者牺牲群众的利益为代价。1944年12月，他指出：“我们以发展生产解决时政困难的办法，与国民党当局以加重老百姓负担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前者达到丰衣足食，后者弄得民穷时尽。”(13)解放以后，他又多次强调，收购农产品手不要太狠，要注意照顾农民的生活。否则，“农民吃不饱，管你棉花不棉花，管你发多少布票，为了吃饭，就会挤掉经济作物。”(14)他还多次重申，无论是钢也好，还是其他基本建设物资也好，如果妨碍了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有必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建设方针。陈云不仅在工作中非常注意维护群众的利益和需求，而且还常常告诫和提醒党内其他同志，都必须时刻牢记我们工作的这一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五）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是评价干部和工作好坏的重要尺度的观 角。

陈云认为，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的服务对象就是人民群众。因此，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理所当然就是评价党员、干部工作好坏的重要尺度。他在担任党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曾多次强调，群众工作的好坏，人民群众的态度，是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是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肖子孙，谁是好党员、谁是混进党来的坏人的重要标准，是清洗党内坏分子的客观基础，测量支部工作好坏、党组织巩固程度的重要依据。因此，他在考虑和选拔干部时，特别重视考察被选拔对象与群众联系的密切程度，并多次强调“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是选拔干部和考察党员的极其重要的条件之一。他说：“对一

个人，如果群众普遍认为是好的，便不会有什么问题。”(15)如果多数群众不赞成，这样的人就不具备当干部的条件。在陈云看来，评价一个人，一个单位是这样，评价某项工作也是如此。他明确指出：“我们认为凡是对群众、对革命有必要的工作，都同样有价值，做好了都同样有功劳。”(16)否则，就是没有价值、毫无意义的。

二陈云的群众路线思想的基本特征

在陈云的文稿和讲话中，他反复强调我们党的工作要依靠群众，深入发动群众，把做好群众工作作为我们党的一项根本工作。综观陈云在不同时期的有关讲话和论述，他的群众路线的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 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教育引导群众相统一。

陈云认为，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党的一切活动、一切任务都不能不建立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点上。但是，这不是说群众就是天生的革命派。党要发动群众必须“教育群众”，在群众运动中“不能放任自流，作群众的尾巴。”(17)在这方面，主要应当做以下工作：

第一，要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1939年6月，陈云在谈到党的支部问题时指出，党的一切口号、主张、政策要具体深入到群众中去，需要党的支部做好教育和宣传解释工作。“支部的责任是要引导群众一步步走向共产党的周围，所以应该在各种斗争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相信我们党的一切口号、主张就是他们的切身的要求，并且为这些口号、主张而努力奋斗。(18)他指出，我们不但要让广大群众充分享受自己的权利，同时也一定要教育他们尽自己应尽的义务，教育他们尽义务，要比教育他们享受权利困难，但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他强调，越是困难时期，任务愈重，越是要提高群众的觉悟，使群众同我们一道战胜困难，度过难关。

第二，要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陈云认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党教育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组织发动群众的重要条件，各级党支部都要认真抓好这项工作。他强调，支部在领导群众的工作中，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应进行文化建设，……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19)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多次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如在谈到基本建设时他就指出：“我们必须重视对基本建设部门的职工进行政治的和技术的训练工作，大大地提高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提高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否则，“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20)

第三，要教育群众正确看待和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的根本利益的关系。陈云认为，这是党的教育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如果这项工作做不好，群众只管提意见发牢骚，终将会损害他们自身的长远的根本利益。1933年4月，陈云在总结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时指出；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存在着极端危险的“左”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是“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21)我们必须“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地联系起来。”(22)建国后，他强调：“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增长的幅度。”(23)他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要经常向职工群众进行关于基本建设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职工群众对整

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认识，自觉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这种教育工作，使群众认清“牺牲眼前的利益，是为了长远的利益，牺牲小的利益，是为了大的利益。”(24)

(二) 坚持发动群众与关心改善群众生活相统一。

陈云指出，人民群众是党的依靠力量，充分发动群众是做好工作的重要前提。同时，“共产党人是主张改善民生的”(25)，“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26)。坚持发动群众与关心改善群众生活统一起来，是陈云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之点。因为：

首先，陈云认为，“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人民群众是党赖以存在、巩固和发展的基础，是党的力量的唯一源泉。这决定了党的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要把充分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作为工作的中心和关键来抓。他指出：“党、政、军、民、学各种工作之健全，虽然都有它们各自的单独的工作，但是把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联系起来，使各方面工作都能进步，都能发展，都能健全，基本的环子就是开展群众工作。”(27)“历来的经验证明，没有一个脱离群众的党组织是巩固的。”(28)“现在党内发生的各种弱点，不管是党的组织方面的还是党的工作方面的，都是同脱离群众相联系的。”(29)所以，他强调，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把充分发动群众这一环节抓住抓好。

其次，陈云认为，“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陈云指出，不发动群众，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不会成功，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得。但是，有很多同志还没有明确了解，“要使群众起来，必须改善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30)“经验已经证明，哪个地方群众的生活改善了一些，群众就更加积极了，群众团体就更有组织了。如果哪个地方没有注意改善民生，或者虽有改善民生的法令，但实际上没有实现，群众就照旧起不来。”(31)因此，“我们要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发动群众的关键。”(32)他还强调，是否关心和改善群众生活，是影响党群关系的政治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得好，群众会更信仰我们党，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越来越高。”(33)他告诫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34)。他认为，解决民生问题应成为重要国策。在国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他提出了“第一要吃饭，第二要建设”的著名论断，主张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

(三) 坚持联系群众与改善领导作风相统一。

陈云认为，能否密切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与领导作风问题息息相关。他对这个问题有不少论述，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克服官僚主义。早在1940年他就指出：“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35)他著文引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说：“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36)因此，他强调，我们必须克服不发动群众、命令群众的错误。他认为，要克服官僚主义，就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改进领导方法。他批评说：“现在许多地方党组织很少问问下层和支部中的情况，很少引导支部去注意群众的呼声，……一般是把工作布置下去，按级向下要这要那，而不大关心下级和群众的日常要

求。”(37)他强调,“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38),“要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者配合起来。”(39)这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完全一致的。

第二,发扬民主作风。是否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党内生活正常或不正常的主要标志。陈云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内没有了民主集中制,取消了集体领导。他再三说,党内生活就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领导干部“要以民主的作风与群众一起工作”(40),“凡是关系到全体人民的事,要召集群众开会,大家讨论。这样一来,我们工作就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了。同时也发扬了民主。”(41)他强调,我们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注意发扬民主,不能反映多方面的意见,作出来的决定则往往带有片面性。所以,“我们不能只听一个方面的话,要听各个方面的话,这样消息灵通,了解的情况就比较全面了。”(42)

第三,加强群众监督。陈云认为,为了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改进领导作风,搞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因为“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43),一些党员有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44),因而有脱离群众的危险。他指出,“监察工作固然重要,但光靠监察工作不行,必须让群众都能讲话,都有积极性”(45),群众“提出批评,暴露我们工作中的毛病,有什么不好?”(46)通过加强群众监督,可以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使其不丢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以使我们谨慎一些,少犯错误,自觉地注意和改善自己同群众的关系,并且及时地同脱离群众的现象作斗争。

三陈云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思想的现实意义

学习陈云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思想,对于我们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当前,我们认为这种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措施,必须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并充分考虑到其心理承受能力。

我国社会正处在转轨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必然会有许多涉及深层次社会矛盾的政策和措施相继出台。要保证这些政策和措施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支持和拥护,就必须坚持以陈云关于群众的利益和需求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的思想为指导,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从切实维护群众的利益出发,确保各项政策和措施出台以后,能为群众带来可感受到的实惠,绝不可以牺牲群众的利益为代价。同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心理承受能力,切不可超越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心理承受能力,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当为了群众的长远利益而必须牺牲其暂时的眼前利益时,必须做好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

关心、投身改革开放实践,一切政策和措施才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事业才能顺利进行。

(二)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充分发挥群众

的监督作用。

党风问题，是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和改革开放事业盛衰成败的大问题。陈云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一切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反对腐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们在整顿党风的过程中，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充分发挥他们的监督作用。一方面，要牢记陈云关于共产党人是为群众“当差”的教导，教育全体党员时刻不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断提高其立党为公，立党为民，坚决反对以权谋私和其它一切不正之风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要根据陈云关于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是评价干部和工作好坏的重要尺度的思想，坚持把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作为整顿党风、清除腐败的客观基础。通过实施和加强群众监督，形成强大的社会反腐败力量，这对于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搞好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切实关心和改善群众的生活。

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改革开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稳步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陈云强调，关心和改善群众生活是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执政党要把它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把它作为一项重要国策。今天，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是否注意关心群众疾苦，真正为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对于促进社会稳定，搞好社会综合治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关心和改善群众的生活，党和人民政府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人民群众才会在思想、政治和行动上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同心同德共图四化大业；也只有充分关心群众疾苦，并切实帮助其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使其安居乐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动和组织群众筑起一道打击各种违法犯罪的铜墙铁壁。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影响群众生活的新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出来，如物价问题、就业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好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林陆军学院）

注释

(12)(13)(15)(16)(17)(18)(19)(21)(22)(24)(25)(27)(28)(29)(30)(31)(32)(33)(35)(37)(39)(40)(41)《陈云文选》第1卷，第169、258、169、293、2、32、315、191、380、138、383—384、282—283、176、274、351、149、153、9、10、173、159、164、165、165、166、166、172、172、221、141、158、160、149、175页。

(11)(42)《陈云文选》第2卷，第139、330页。

(14)(20)(23)(26)(34)(38)(43)(44)(45)(46)《陈云文选》第3卷，第164、313、323、33、210、189、331、331、31、33页。

论陈云关于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特征

吴立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陈云有关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理论，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方面，他又有新的建树。深入学习和研讨这些理论，对搞好新时期两个文明的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时代特征

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一方面国际形势进一步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另一方面，在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受阻，经济陷入危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社会出现动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战后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改革之机，发起“和平演变”的攻势，妄图把社会主义国家拉上资本主义轨道。

处在这样形势下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由于党的个别领导人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出现滑坡现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党内不正之风、消极腐败现象滋长蔓延。

面对这一形势，陈云高瞻远瞩，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著，为全党指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方向。

1985年6月，陈云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离正确的方向。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干部，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人类社会，包括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都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组成的统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要协调发展，社会才能全面进步。经济建设是基础，是中心。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但精神文明建设也要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保证物质文明建设发展的正确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谁也离不开谁。如果只抓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和放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就不可能全面发展，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到损害。而那时，党中央个别领导人和基层一些领导干部恰恰存在着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陈云的讲话正是切中时弊，抓住了要害。这篇讲话既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反“和平演变”、抵制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需要，也反映了四个现代化建设发展全局和端正党风的要求，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理论特征

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和规律的产物，是我们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的组成部分。他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出发，围绕党的自身建设这个中心，论述了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和要求。这些理论党性原则强，要求的层次高，具有很大的影响和说服力量。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党的任务和党的纲领高度上阐述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重大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超过资本主义，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和奋斗目标，也是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一个手段。要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

然而，在 1984 年前后，个别党的领导人处理不好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抓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抓精神文明建设软弱无力，致使党风和社会风气不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不少人觉得似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已经消失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动摇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淡漠了。

针对这些思想问题，陈云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是不能分离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又不可能是单纯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也不可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然后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现在大家致力于物质文明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应当看到，现在确有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而且相当普遍。”这既是对党的个别领导人的批评，也是对全党的告诫。

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头脑不清醒，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误入歧途，犯下历史性的错误。陈云指出：“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要坚持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就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巨大精神动力和保证正确方向的作用。如若不然，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也就无从保证。正如陈云所说：“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在社会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总之，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

（二）从坚持党性的高度出发，提出抓好党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

在 80 年代，党风是群众议论最多、意见最大的一个问题，成为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头等大事。党风是党的世界观和宗旨的外在表现，是执行

正确路线的重要保证。群众就是根据党风状况来判断党的好坏的。党风好，可以带出好的社会风气，党风不好，就要影响和带坏社会风气。党风不正，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发展下去，不仅使党蜕化变质，而且会使党和群众的关系疏远，使人心向背发生不利的转化，以至葬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因此。1985年6月，陈云指出：“要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

为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能够抓住党风这个关键，陈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具体措施：

一是加强法制，打击各种刑事犯罪。他说，“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杀一儆百。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

二是加强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只有通过加强理论和思想教育，才能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觉悟，使他们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自觉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这就要求在党内必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是非，防微杜渐，避免使小问题发展成重大错误。为此，陈云指出：“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三是加强制度建设，领导以身作则。陈云反复强调，一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允许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他特别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他要求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

（三）从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出发，提出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

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贯彻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是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但是，当时上至党中央个别领导人，下至党的某些领导干部都存在着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倾向，“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党内思想作风和社会思想道德严重滑坡。正是从这一基本状况出发，陈云告诫我们：这“绝不是一个不问题，全党同志务必高度重视。”（11）

陈云认为，要加强党的领导，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首先要解决思想上不重视的问题。只有明确精神文明建设的全球战略意义，弄清两个文明建设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象抓经济建设那样抓精神文明建设，做到两个文明建设的重担一肩挑，两个文明的成果一起要，精神文明建设是会搞上去的。其次，必须明确各级领导在抓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职能和责任。他说：“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的工作是：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12）除纪委外，各级党委负有重大责任。对不负责任，后果严重的，要追究其领导责任。“有些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事，违法乱纪的事，如果仅是某一个人的错误行为，那是个人的问题，但是如果哪个单位，哪个地区的歪风邪气大量存在，而长期未得到纠正，那就显然不

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同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领导有关。”“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13)

三方法论特征

在唯物论，辩证法的方法论方面，陈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也有其明显的特征。

在陈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著中，充满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和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原则，其主要特征是：

(一) 独创性

陈云在继承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善于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党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上，第一个提出“党风”概念的是毛泽东，而第一个把党风同执政党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作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科学论断的是陈云。陈云关于党风的这一立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发展，也是对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的创造性贡献。

同时，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独辟蹊径，围绕党的自身建设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辟了党自身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域，这对加强党的建设，明确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推动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二) 实践性

综观陈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工作指导性强。每篇论著中，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实际情况占有很大比重。使理论具有着非常强烈的实践性，在今天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能够总结实践经验，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揭示出客观真理，指明前进方向的讲话、工作指针就是理论，尽管其形式各不相同。陈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是指导党的建设的理论，它既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

(三) 科学性

深入调查研究，从宏观上把握全局情况，微观上对典型事例掌握至精至极，在占有大量真实情况基础上，从“实事”中求“是”，经过“全面、反复、比较”的过程，求得规律，发现真理。这是陈云有关精神文明建设论著的又一特征。他在80年代阐述的两个文明一起抓，被十四大概括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他所讲的党风要抓紧搞，永远搞，被概括成反腐败斗争“一要坚持，二要持久”的方针；他所论述的党风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的理论，经过十年的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真理，至今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玉溪地委党校)

注释

(11)(12)(13)《陈云文选》第3卷，第347、354、347、355、348、273、274、275、352、355、356、356页。

转引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3页。

陈云关于抗日根据地党 与非党干部关系的思想

贾俊民

在陈云丰富的思想宝库中，关于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占有重要地位。而他关于抗日根据地党与非党干部关系的思想，则是将上述理论有机联系的结晶。学习和研究这一思想，不仅对认识陈云的生平和思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深化干部制度改革，促进培养选拔党外干部工作，加强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推进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有着积极的作用。

抗战时期，我党改变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在解放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由“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参加的“民族统一的战线”的政权。为确保人民参加管理政权，1940年后，各解放区都按我党提出的“三三制”原则，改选或新建了政权机构，其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干部人数的三分之一。这样，在抗日民主政权中，非党干部大大增加，所占比重约三分之二左右，其地位与作用空前突出。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抗日根据地党与非党干部的关系，成为极为重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在“目前和将来都是对我们党的一大考验。”

因此，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中国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他关于抗日根据地党与非党干部关系的思想。

一 抗日根据地党与非党干部，是 共产党领导下的“合作共事”、 “和衷共济”关系

在抗日民主政权中，根据地党与非党干部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是不同的。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那么，这些处于同一政权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党和干部是怎样一种关系呢？陈云认为，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合作共事”关系。

这种关系不是任何人主观臆造或硬性强加的，而是由中国国情、中国的阶级状况和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在全国人口中占极少数，共产党员更占少数。这就要求共产党最大限度地团结和扩大同盟者，才能夺取抗战和革命的胜利。而非党干部合作，不仅可以增强革命干部力量，而且可以通过他们，把他们所代表的那些阶级阶层团结到党的周围，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孤立顽固势力。因此，陈三指出，共产党必须“与已经共事的非党干部亲密团结”，“竭诚欢迎广大的党外人士与我们共事”。

非党干部同样存在着与共产党进行合作的基础和要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和贫农一样，也受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但这两个阶级都未形成自己强大的政党，没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国民党对日消极抵抗；对内排除异己，一党垄断政权。因此，

他们不得不把抗日和维护自身权利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向共产党寻找出路。开明绅士，虽属封建营垒，但代表其利益的国民党已退到大后方，他们又处在抗日根据地内，为抵抗日本，维护自己的生存，也只有与共产党合作。非党干部正是上述阶级阶层的利益与要求的政治代表。特别是“团结于党周围的非党干部是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分子”，他们许多人“是破釜沉舟而来的革命分子”，虽然，他们在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上与党员干部存在着差异，但在总的方向上是“与党共同努力于革命事业”的。

由上可见，抗日根据地党与非党干部虽然代表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但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也就有了合作共事的共同要求。所以，陈云明确指出：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都是“在一条战线上奋斗的……革命同志”，二者要“合作共事”、“和衷共济。”

然而，这种合作，决非非党干部与根据地党瓜分政权，平分秋色，不是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更不是不要这种领导，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合作共事。因为，中国国情和各阶级状况，决定了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共产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是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创造者和领导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因而，在根据地党与非党干部的合作关系上，前者无疑处于领导地位。所以，陈云十分突出地强调必须保证党的领导，指出：“要尊重非党干部的思想自由和生活习惯，同时要求他们在工作上服从党的总的方针”（11），在“政治上工作方针上服从党的领导”（12）。

总之，在共产党领导下合作共事，和衷共济，是陈云对抗日根据地党与非党干部本质关系的高度概括。

二要从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的广度，从关系革命胜败的高度来看待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的重要性，反对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

在抗日根据地，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因此，能否搞好党和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合作共事关系，关键在于我们党和党员干部能否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为提高根据地党和党员干部对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重要性的认识，做好这项工作，陈云不仅从干部工作和干部政策本身对其作了突出强调，而且，还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大目光和广阔胸怀，把这一问题同党的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两大法宝有机联系起来，从能否实现全国人民大团结，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加以深刻说明。

陈云尖锐指出：“不团结非党干部，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革命就不能胜利。”（13）也就是说，能否团结非党干部，是关系到能否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实现全国人民大团结，能否取得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大问题。这决非危言耸听，而是陈云根据中国国情，从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如上所述，中国国情决定了工人人数少，共产党员人数更少。要打倒强大的敌人，夺取革命胜利，必须最大限度团结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和阶层以及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实行最广泛的革命和爱国统一战线。否则，单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革命将永无胜利之期。我们党历史上的多次“左”倾错误，实行孤家寡人政策，给党带来的惨痛损失的事实，反复说明

了这一点。为什么团结了非党干部才能建立广泛统一战线，才能实现全国人民大团结呢？他精辟指出：非党干部“是党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14)既然是桥梁，就是说不通过他们，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在这方面，非党干部确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代表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团结了他们就可以把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团结到党的周围。同时，他们中许多人有知识，有比较广泛的社会联系，又有特殊身份，往往可以起到党员干部难以起到的作用：党员干部听不到的意见，他们可以听到；党员干部看不到的情况，他们可以看到；党员干部宣传不到的地方，他们可以宣传得到；同样的话，让党员干部去讲，一些人可能持怀疑态度，而让他们去讲，这些人反而容易相信。非党干部的这种了解群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特殊作用，是党团结全国人民，巩固和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所不可缺少的。正因为这样，陈三认为，“没有党外人士的同情和合作，革命胜利就不可能。”(15)

陈云还把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同党的建设联系起来，以唤起全党的重视，并借以推动党的建设。诚然，党的建设主要是党自身的事，但陈云认为，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搞好与他们的合作共事，对党的建设有重大促进作用。其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必须反映广大群众的要求和利益，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来实现。而非党干部反映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观点、意见和利益，是党听取群众意见，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并使之成为广大群众自觉行动的“桥梁”。因此，陈云指出：“不反映党外人士的意见，党的政策就不会完全正确。不经过党外人的传布，党的政策就不能深入群众”(16)，党的路线就不能实现。其二，非党干部可以直接帮助党改正错误和不足。由于斗争的复杂性和认识的局限性，党在工作中存在缺点，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而非党干部，由于其不同于党员干部的视角，往往可以较早发现并及时督促党改正错误。正如陈云所说，“非党干部的许多意见、批评，不满，常常是正确的，或反映了我们的某些缺点。”(17)其三，团结非党干部是对党的作风、党的领导方法和党员党性的全面考验和锻炼。针对当时非党干部大量增加的情况，陈云尖锐指出：能否解决好与非党干部的团结问题，“目前和将来都是对我们党的一大考验，人心归共，看你的气量如何。”(18)的确，做好团结非党干部工作，需要多方面的较高的品质和素质：要求党员干部，有解放全人类，求大同存小异的胸怀和气量；有平等待人，尊贤敬能的民主作风；有严于律己，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高尚品德。而做到这些，将会使党员干部的党性和领导水平有很大提高，使党的建设跨上新台阶。

这样，陈云把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问题置于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广阔角度，使之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把它提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从而极其深刻地阐明了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的重大意义，唤起了全党的充分重视，这体现了陈云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把党工作的大局与具体工作紧密结合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和高超的领导水平，是他对党的一大贡献。

根据地党与非党干部合作共事，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的最直接障碍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因此，陈云认为，要搞好党与非党干部的关系，必须反对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针对当时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存在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倾向，陈云给予了深刻揭露和尖锐批评。首先，他列举了这方面的各种表现，如不重视甚至歧视非党干部，有才不用；对非党干部深具戒心，

不与接触，或口讲接触，实际疏远；高傲自满，党气凌人，满口原则，不近人情；不求大同，专找小异；不适当地同党员一样要求，不尊重非党干部的个人自由；缺乏自我批评和民主作风。其次，他指出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实质是个人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他针对“许多党员不愿结交党外朋友，不敢向党介绍党外人士，以为‘洁身自好’即为最高之党性，战战兢兢，惟恐有失于党性之纯洁”的现象，尖锐指出：这实际上是把“党性的‘纯洁’变成了排斥非党干部的护符，变成了个人主义的对党不负责任。”(19)再次，他说明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给党与非党干部关系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指出：这种倾向产生了“浓厚的排外”性，“使热心革命者受到冷淡和排斥，已经共事者感到普闷不安”(20)，“使非党干部政治上受着压抑不安，精神上受着冤屈痛苦，深感不能见容于共产党”(21)；给党与非党干部之间隔起了“人造墙壁”。据此，陈云严肃指出：必须“打破‘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人造墙壁”，“党员干部只有团结非党干部之责任，并无排挤非党干部之权力。”(22)他的深刻有力，切中要害的批评，使全党对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实质、危害有了清醒的认识，对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搞好根据地党与非党干部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三对非党干部，要实行尊重团结的方针，采取坦白、诚恳、爽直的态度，还要规定具体明确的政策，给予一定权利

为了正确处理根据地党与非党干部的关系，陈云重申了党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的方针，要求党组织和党员贯彻落实这一方针。同时，鲜明地提出了我党对非党干部应采取的态度，指出，我们“应取的基本态度是坦白、诚恳、爽直。”(23)“只有彼此相见以诚，才能和衷共济。”(24)但是，陈云认为，光有团结非党干部的方针、正确的认识和基本态度还不够，还必须有具体明确的非党干部政策，这就是：(1)政治上信任。对非党干部与党员干部一视同仁，不分“你们”、“我们”，绝不见外。(2)工作上用人唯贤，放手使用。既不按党票安排职务，也不因尊重非党干部安排不适当的较高的职务，而是按才能排职务。人们担任行政领导职务时，要使其有职、有权、有责，同党员干部一样，给予必要的工作条件，施展才干。他们负责某一行政部门领导时，该部门的党的组织应教育党员成为工作的模范，尊重和服从非党干部的领导，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3)要求适当。既要求他们在工作上服从党的方针，忠于本职工作，又要尊重其思想自由和生活习惯，不苟求他们与党员一样服从党的一切组织纪律。(4)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民众选举的政权机关和民众团体中，共产党员和非党干部合作共事，应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5)思想上关心，党员与非党干部之间，要相互开展善意的批评。欢迎非党干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划清其不满和发牢骚的话与反党的界限，发牢骚讲怪话并不等于反党。党组织和党员要把非党干部的善意批评与正确意见，视为鞭策，及时改正；对其不正确的意见，也要进行坦率批评。(6)物质上要给予可能的帮助。这些政策，用现在的说法可概括为：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在工作上放手使用，在生活上关心照顾。(25)

为使非党干部更好地履行工作义务，搞好党与非党干部的团结合作，陈云根据马克思的权利与义务平等的思想，强调应给予非党干部一定的权利，

并对这些权利做了规定：党的一般支部会议欢迎非党干部参加，有发言权，无表决权；定期召开党员和非党干部联合的各种干部会议；党的干部部门要把照顾非党干部作为自己工作的职责；非党干部有直接找部门负责人和党的干部部门谈话之权；非党干部与党员一样，有向党组织直到中央控告之权；党组织要赞助非党干部和党员干部共同组织专门性质的团体，例如自然科学研究会、同学会等。(26)

陈云关于抗日根据地党与非党干部关系的思想，是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党做出的一大理论贡献。这一思想，把干部队伍建设与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工作有机联系起来，既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又有利于党的建设和巩固扩大统一战线，体现了他把党的组织路线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的光辉思想；这一思想把干部队伍的思想、组织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用制度来保证思想和组织建设，从制度上考虑问题、解决问题，体现了陈云的远见卓识；这一思想，既有理论的深刻性，又有实践的可操作性，体现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切实、正确、有效的方针政策的一贯思想特点。正因为如此，陈云的这一思想，为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内容，也使党在“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27)，实行“三三制”非党干部大量增加的新情况下，有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与非党干部的关系的科学而具体的思想和政策指导，表现了我党含川纳海的宏大气度，经受了团结非党干部这一严峻考验。这对巩固抗日根据地，团结全国人民夺取抗战和中国革命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陈云提出抗日根据地党与非党干部关系的思想，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中国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磨灭；其指导意义，未因时代的变迁而过时，首先，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这一制度的根本特点在于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参政议政，共产党员干部与各民主党派干部及无党派干部合作共事。其次，我国正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了经济成份和利益多元化，我国的干部制度、干部成份和干部队伍建设必须适应这种新情况，适当增加非党干部（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干部，下同），充分发挥其作用。其次，我党面临着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结成最广泛的建设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重任；同时，党也需要在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而非党干部，在联系各族各阶层人民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方面，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切都说明，非党干部是我国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选拔、团结和正确使用非党干部，是我国政权、干部队伍建设和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具体体现，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加强党的建设，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的客观要求。

正因为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培养选拔和团结使用非党干部，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下发以后，这项工作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绩。一大批优秀非党人士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在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陈云所倡导的重视和正确使用非党干部的思想，得到了发扬光大。据统计，到1994年底，省、地、县三级政府领导班子中共有非党干部1512人，其中担任副省

(市)长、自治区副主席的 18 人，担任副专员、副市长、副州长的 157 人，担任市辖区副区长的 364 人，担任副县(市)长的 973 人；还有一定数量的非党干部担任了地方各级政府的正职。(28)

但是，也应看到，目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在培养选拔、团结使用非党干部工作上，与党中央要求还有相当差距，一些同志还存在非党干部可有可无，其作用无足轻重的糊涂认识。因此，很有必要重温陈云的有关论述，像陈云那样，把这项工作放在广阔的视野之中，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来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同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运用陈云关于抗日根据地党与非党干部关系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和办法，切实贯彻党中央关于新时期非党干部的方针政策，加大选拔非党干部的力度，加强与非党干部的团结，健全选拔和正确使用非党干部的制度。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断发展在我党领导下，党内外干部同心同德，共同致力于实现四化，统一祖国，
振兴中华，重铸民族辉煌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35、750 页。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陈云文选》第 1 卷，第 218、244、244、246、245、246、247、248、247、246、218、244、244、244、246、218、246、244、245、247、219、248、246—248、248—249、112 页。

(28)1995 年 4 月 28 日《人民日报》。

陈云在延安时期对党的 干部工作的理论贡献

陈立旭

陈云在延安时期曾担任过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对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其中，他对党的干部工作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至今对我们党的干部工作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选拔干部的标准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们党要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需要大量吸收和选拔干部，而吸收、选拔干部，最根本的是确立干部标准。为此，毛泽东曾提出了选拔干部的“德才兼备”标准。陈云不仅正确掌握了这一标准。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又有新的理论建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干部“德”和“才”的具体内容。陈云认为：“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德和才都有具体的内容。他亲自制定的选拔干部的具体标准是：1. 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就是说，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有为党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2. 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是说要了解群众，尊重群众，帮助群众，依靠群众。3. 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就是说，忠于职守，拿得起，放得下。4. 守纪律。这些标准虽是参照季米特洛夫的论述提出的，但陈云结合我党干部工作实际加了许多具体论述，从而把干部“德”和“才”的内容具体化为便于实际把握的标准。

第二，提出了选拔干部要“德”“才”统一，以德为王的原则。陈云提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二者不能缺一，选拔干部必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把二者割裂开来，只强调一方面，就不能选拔出好干部。如果选拔干部只注意“德”而忽视了“才”，干部没有实际工作能力，就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骨干，“不能完成革命任务之德，是不完全的德”。如果选拔干部只注意才而忽视德，干部虽有工作能力，但不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不去为人民服务，那个才就不是革命之才。因此，“德、才不能分开”。

陈云认为，坚持德才统一，并不是不分主次，而是要在注意德的前提下注重干部的才。无产阶级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必然要经过长期艰巨的工作和斗争，党要求干部在工作和斗争中坚持既定的政治目标，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真正成为组织群众的骨干。干部这种政治方向问题对党的事业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德是才的统帅。从根本上说，德是阶级利益在用人问题上的集中体现，它规定着一个人的才能向哪一个政治方向上用，规定着一个人的才是为人民谋利益还是为个人谋利益。因此，党在选拔干部时，不能不特别注意政治问题，即不能不注意干部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等政治大节，这就是注意“德”。陈云在1938年就提出要反对看干部“只看他本领的高低，没有看到他本质的好坏”的错误倾向。他所说的本质，就是指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的政治大节问题。陈云在1939年谈到中央向各根据地各工作岗位派干部问题时又指出：对每个人的政治问题都要弄清楚，选干部要慎重一些才好。他在这里强调的也是要注意干部的

政治方向、政治立场的问题。后来陈云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中进一步提出：“政治、能力，政治为主”，“德才并重，以德为主。”

陈云为什么强调德才统一，以德为王？这是他长期干部工作经验的总结。我党的干部工作经验反复证明：一个干部只有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忠诚于党的事业，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亦即有“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成为党的事业的骨干。一个政治方向错误或糊涂，立场不坚定，没有革命热情，满脑子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人，即使有“才”，也不能很好地为党的事业工作，不能为人民服务，不可能把自己的才干运用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事业当中去。因此，党选拔干部特别注重德，“德才统一，以德为主”，是陈云对党的干部标准的丰富和发展。

二使用干部的原则

有了干部标准，还有一个如何按这个标准了解和使用干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提出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只是指出了一个总的原则。至于怎样去“任贤”，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在党内，陈云是最早系统论述这个问题的领导人。

陈云提出了任用干部要“人事两宜”，即“用人得当，适得其所”的原则。实行“人事两宜”，用干部就要“用其长”，按照每个干部的能力、特长，安排他们到适当的岗位上去工作，“能力大小和工作历史必须符合于位置，即工作称职”。1938年他曾举例说，有的干部懦弱，能力不大，唯谨唯慎，这种人不能做大刀阔斧的事，但可以做机要工作，搞调查统计。而有些高傲自大但有点本事的人，只要指给一定范围，告诉他正确方向，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干部和工作两相宜，既有利于发挥干部的特长，又有利于工作。如果不是按照干部的特长和能力安排适当的工作，就会浪费人才，埋没人才，甚至把人才变成庸才，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另一方面，实行“人事两宜”，要求我们使用干部时要“超过则跌，过降则升。”这就要求干部能升能降，能任能调。干部的能力强，就要提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干部能力弱，就要降职使用；干部适应工作，就任用他去干，不适应的，就调他到能适应的岗位上去。

陈云认为，事物是变化的，党的工作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在风云变幻的年代，形势发展很快，干部变动大，往往我们当初安排的干部很适当，做到了“人事两宜”，但由于形势的发展，工作的需要，还要调动。同时，在干部的使用上，还有一个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关系的问题，干部本人情况不断变化（如能力的提高或减弱）的问题等；这就要求党的组织工作者了解革命形势的变化，了解党在一定时期的根本任务，了解党的工作需要，同时熟悉干部的情况，从全局着眼，统筹使用干部，在动态中达到“人事两宜”。为此，陈云又从全局的角度提出了才干和需要同时兼顾的原则。他认为，使用干部应以“量才为主”，根据才能安排适当工作。但干部因工作急需而变动工作岗位，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党分配干部工作时，要考虑干部的特长，从特长和需要两方面考虑，但主要的还是决定于党的工作需要。此外，党组织分配干部还要有重点，应当把干部使用到当时当地最需要的环节上，而不是平均分配。

陈云认为，干部工作是经常的和有步骤的，党组织在使用干部时要真正做到“人事两宜”及“才干和需要同时兼顾”，就不能临时应付，而必须预先有所准备，经过慎重考虑，适当分配，并保持相对稳定，不轻易调换。提拔干部不能粗心大意，以至于提拔上来又放下去。他反对使用干部像老百姓盖房子的打桩办法，今天好，抬上天，明天坏，打到地下去。他说，一上一下，顶多三次，就把干部断送了。他还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统治党时对毛泽覃的错误组织处理的例子，来说明对干部不能不负责任，乱提乱放的道理。陈云早就提出并一直坚持干部不宜越级提拔的原则，他认为毫无准备而越级提拔，对工作对干部都有害无利。陈云提出使用干部要有准备，有步骤的原则，至今仍是我们的提拔使用干部的正确指导原则。

陈云认为，要真正实行任人唯贤，必须克服论资排辈思想。他指出，论资排辈观念是干部工作的大忌，必须破除这个观念。革命不能排队，不能卖老资格，要真正提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陈云历来强调要重视提拔青年和知识分子干部，这正是他从干部工作的大局出发，坚持德才兼备标准的具体表现。

陈云还提出了对干部要放手使用和检查帮助相结合的原则；任免或奖惩干部不能一两个人说了算而应按照组织程序经过党委讨论通过的原则，等等。陈云所提出的这一系列正确了解和使用干部的原则，是我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应该牢记的。

三掌握干部政策的要点

干部工作是由人来做，干部标准和使用干部的原则要通过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的正确工作，才能付诸实践，见诸实际。做干部工作的同志怎样才能做好干部工作呢？陈云认为最根本的是掌握干部政策，即掌握“用人之道”，这是做干部工作的人应当具备的素质和基本功。陈云用四句话来阐述“用人之道、这4句话恰恰是我们掌握干部政策的要点。

1. 了解人。

陈云认为，了解干部是正确使用干部的前提，“是制定干部政策的基点。”他认为，“量才使用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位的是了解干部。只有知人多，知人深，知人准，才能用得正确。但是，“了解人，要了解得彻底，不是容易的事情，严格地讲是很难的。”因此，陈云特别重视这个问题。他在延安广泛接触各方面的干部，对干部进行详细而全面的了解。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要求做干部工作的同志都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他认为，要了解干部，必须克服两种毛病，“第一种毛病是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不能面面都看到；第二种毛病是只看到这个人今天干了什么，没有看到他以前干些什么，只看到他本领的高低，没有看到他本质的好坏。”他还特别指出：“一般地说，我们有些同志总是看坏的多，看好的少。”(11)他提出看干部要两面看，既看优点又看缺点，干部的长处里同时包含短处，短处里同时包含长处。“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12)用人要用其所长。他反对只看干部今天，不看干部昨天的错误做法，他说：“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13)

陈云所批评的这种毛病，就是形而上学在干部工作中的表现。为了克服这些毛病，他提出，审查、了解干部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客观，严格。”(14)“切忌以主观的推测为根据。”(15)了解干部不能只看言论和态度，主要看本质和实际，不仅看一时一事，主要看整个工作历史。要在干部的日常工作中认识干部，在斗争中考验干部，在群众运动中发现干部，在干部完成任务的表现中考察干部的德和才。陈云在这里提出了了解干部要全面、历史、辩证，要在实际工作中了解干部的观点，是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到干部工作中的典范。此后不久，毛泽东提出了善于了解干部，要全面、历史地看干部的论点，是和陈云的观点相通的。

2. 气量大。

陈云认为，“用人要气量大”(16)，这是我党做干部工作的同志必备的素质。陈云说，要想成就大事业，必须有很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何以孙中山先生能够得到成功呢？原因之一就是气量大，什么红枪会、哥老会、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要，不论党派成分，各种人都要，所以能做大事。”(17)共产党不仅领导抗战，还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谓干大事的，党的事业的广大，使各种复杂的人都来到了党的周围。同时，党又要密切联系群众，做好群众工作，与群众打成一片，因此党组织的周围必然环聚着各种复杂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要推进党的事业，就看你有没有气量，能不能用人。有气量，就不能忌讳干部社会关系复杂，不能吹毛求疵，挑剔人的缺点，甚至揪着过去的错误不放或翻老帐。对愿意参加革命的人，只要一方面的本事，有一技之长，就要用，这就是气量。如果不能容纳这些人，单枪匹马去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人心归共，看你的气量如何。”(18)

陈云还预言，共产党“将来领导全国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那时共产党用干部，就要有更大的气量。

陈云认为，“气量大”还包含着能用本领比自己大的干部，能高兴干部超过自己的意思。陈云要求每个党员必须打掉自以为了不得的观念，他说：“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得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气量，善用各种人才。”(19)陈云在讲到对非党干部也要“用人唯贤”时说，“共产党员应承认人之长，检查己之短。一切嫉妒，一切阿Q精神，都于事无补，既损人也不利于党。”(20)陈云在干部工作实践中正是坚持“有气量”和“用人唯贤”原则的。延安时期，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之下，具体做党的组织工作的陈云，亲自发现、选拔、培养了一大批富有革命精神，具有很高才干的干部。那个时期，共产党里面政治、军事、经济、文艺、外交、新闻等等什么样的人才都有，确实集中了一大批治国

安邦的民族精英，这为后来我党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后来我党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胜利，奠定了干部基础。

3. 用得好。

陈云所说的“用得好”，是指做党的组织工作的同志要善于调动每一个干部的积极性，使你领导下的每个人都能很高兴地工作，都能积极、负责。这就要求做组织工作的同志做到使每个同志都工作合适，都能发挥所长。陈云认为，如果你领导下的干部不安心，要求调动，根本的原因是你用得不好。怎样才能让干部高兴地、安心地工作呢？陈云提出，这需要上级和下级之间

互相信任。对领导人来说，一定要让下级敢于说话，敢于做事，做错了也不要紧。怎样使别人敢于讲话呢？陈云提起领导同志和做党的组织工作的同志注意的是：<1>态度要好，和气，没有架子，使大家喜欢接近；<2>少戴大帽子，不要抓住人家的几句错话，犯一些小错误，就提到原则的高度；<3>要正确地展开批评，批评人要善意，要指出人家错误的根源和纠正错误的方法。不要气势汹汹。而要和颜悦色。领导对下级的批评要适当和正确，不要过火。批评人要区别对象，对新干部的批评特别要注意采取温和的方式去劝导、说服。要使干部放开手脚，发挥主动性、创造性。为此，就不要怕干部有责任心，让干部放开手脚，发挥主动性、创造性。要发挥干部的主动性、创造性，就不要怕干部犯错误，犯了错误，吸取教训，提高能力再干。这样才能使干部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陈云强调，能做到使下级“敢说话”、“敢做事”这6个字，是用干部用得好的根本标志。

4. 爱护人。

陈云认为，做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同志爱护干部，首先表现在使用干部要严肃、谨慎之上，表现在真正按照干部的政治品质和能力把干部任用适当岗位上去，而且，干部任职后还要继续关怀和支持他们的工作。他说，对干部，“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21)党的领导人和做党的组织工作的同志使用干部时，不但要交任务，而且还要教完成任务的方法；不但要布置工作，而且还要检查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不但要使用干部，而且还要教育和提高干部。

其次，党的各级领导人和做党的组织工作的同志爱护干部，就要解决干部的问题，“不论大事小事都不要怕麻烦”，都要帮助干部去解决。陈云认为：“爱护干部主要是政治上爱护”。(22)因此，陈云特别强调对于关系到干部政治生命的问题，要细心调查，郑重谨慎地去处理，决不能在没调查或没查清的情况下，凭推断或印象轻易下结论，草率地作出处理，他坚决反对轻视干部的政治生命，随便摆布干部的倾向，历来主张对干部采取宽容的态度。

再次，对干部不能“抬轿子”，只说好，不说坏。陈云认为，这样做是害干部而不是帮助干部。党的领导人和做党的组织工作的同志平时要严格要求干部，发现问题要及时指出，及时批评，不能纵容、迁就其缺点和错误，直到干部犯了错误才去处理。这样实际上是在坑害干部。对于已经犯了错误的干部。要更加爱护，一方面，要严肃地批评、教育他们，帮助他们纠正错误；另一方面，要帮助他们创造提高自己的条件，帮助他们更快地进步。陈云意味深长地说：“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23)

四 处理与非党干部关系的办法

陈云指出，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有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而许多人才并不一定是共产党员。我们党要发展自己的事业理所当然要任用那些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有专长有才干愿意为共产党工作的人当干部。因此，党的干部工作部门不光是做党员

干部工作的部门，也是做非党干部工作的部门。陈云还把非党干部看作对党的事业有特殊好处的人。他说：团结于党周围的非党干部是社会各阶层

的进步分子，是党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24)我们党如不正确看待和使用非党干部，就不能经过他们去很好地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党也就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即使党有了正确的政策，如果没有非党干部的执行和宣传，也不能深入到更广泛的群众当中去。因此，“不团结非党干部，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革命就不能胜利。”(25)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能否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同样关系到党的事业是否兴旺发达。因此也同样是我們是否做好了干部工作的重要标志。

为了做到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陈云于1942年12月提出了我党处理与非党干部之间关系的办法，这些办法的主要内容是：<1>政治上信任非党干部，重视他们的作用。<2>打破“你们”和“我们”的墙壁，不准排挤非党干部。<3>用人唯贤，注意用人之才，适当安排，不能只考虑干部是不是党员。<4>在生活上要主动关心非党干部，尊重非党干部的思想自由和生活习惯，同时要求他们在工作上服从党的总方针。<5>党要求非党行政负责干部的工作必须符合党的方针，同时要求该行政部门党组织和党员尊重非党干部，保证行政工作任务的完成。<6>在民主选举政权机关和民众团体时，党员和非党员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7>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之间展开善意的批评。<8>党对非党干部应当在政治上、工作上、物质上给以帮助。<9>在组织关系上，欢迎非党干部参加党的一般支部会议，他们在会议上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党的干部部门负有照顾非党干部之责，各部门负责人要听取非党干部的意见，非党干部有向党组织控告之权。这些办法就是我党具体而系统的非党干部政策，这是陈云在干部政策方面为党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

陈云认为，能不能与非党干部团结共事关键在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能否执行非党干部政策。从陈云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陈云在执行党的非党干部政策方面所要求于党的组织和党员的主要有：第一，有解放全人类，求大同存小异的胸怀和气量。第二，要有平等待人、礼贤下土的民主精神。第三，要有主持公道的革命风格。第四，要有严于律己、敢担责任的高尚品格。陈云认为，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具有这样的修养，是党能够团结非党干部的前提。基于此，他指出：发生与非党干部关系不正常的事，主要的责任在于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陈云认为，党要团结非党干部，必须首先抛弃喜欢“清一色”的关门主义观念。他针对这种错误观念指出：不能把党性曲解为脱离社会的“纯洁”，恰恰相反，脱离社会、脱离群众，正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我们党在用干部时，也不能根据一个人有没有“党票”来判断他是否可靠，而应当根据其历史和现实的政治表现来使用干部。陈云批评一些同志高傲排外，“党气凌人”、“满口原则”、“不尽人情”，以成见看待非党干部，苛刻地要求非党干部，“不是以我适他，而是以他适我”。他说，要团结非党干部必须克服宗派主义，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都要以诚相见，互相引为同志，消除“你”、“我”的隔阂，才能和衷共济。陈云在党的干部工作中把党的建设和党的统一战线这两个法宝有机联系起来加以运用，系统地提出了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的思想，为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做出了独到的理论贡献。

五对待新干部的态度

陈云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需要

一代接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党要保持自己事业的连续性，需要不断培养和使用新干部。他早在1939年就指出，如果没有大批的新干部补充到干部队伍中来，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要停顿不前，就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党重视新干部，正是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着的革命事业的需要。

陈云认为，要使大批青年干部成长起来，必须打破对待青年干部的种种错误观念。在延安时期，阻碍大批青年干部成长的，主要是一些人认为新干部没有老干部老练，经验不如老干部多，资格不够的错误观念。对此，陈云批评说，“照这样说来，就没有办法提拔新干部了。很明显，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老干部都是从新干部锻炼出来的，有经验的干部开始也都是没有经验的。新干部经过锻炼，就会从没有经验变成有经验，由不老练变成老练。至于说到资格，那末，资格不老的老干部不一定都做不好工作。”(26)陈云始终坚持按照才干任用新干部的原则。他在1942年11月指出：“革命是不能论资排辈的，后来的可以居上。要看什么呢？这要看他有没有本领，有没有高明的政治眼光，有没有工作经验。”(27)陈云的这些话是合情入理的，是真正从党的事业出发考虑问题的主张。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许多党组织至今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论资排辈的现象仍较多存在。而论资排辈带来的压抑党的生机和活力、增加党内消极因素等负面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陈云看到，我们党吸收了大批青年干部后，在革命队伍里就发生了一个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有些老干部看不起新干部，有些新干部也看不起老干部，引出了许多新老干部之间不团结的问题，这极不利于革命事业。因此，陈云特别注意这一问题，他强调新老干部一定要团结，主张新老干部之间“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28)他后来还指出：新老干部不团结，主要责任在老干部，“老干部是老革命，处于领导地位，应负主要责任。”(29)陈云认为，在于部队伍团结问题上党组织要主持公道，任何偏袒都是错误的。该批评的必须批评，该支持的必须支持，这是加强干部团结的正确方法。

六干部对自身的要求

陈云认为，党的干部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党组织要做好干部工作；另一方面，干部本人也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这是因为党的事业是不断发展的，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干部面临的工作会越来越复杂、艰巨。干部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才能适应工作，做好工作，起到党的事业的骨干作用。反过来从党的干部工作的角度来看，如果每个干部的工作能力增强了，素质提高了，党的干部部门也就有了做好党的干部工作的最基本的条件。

那末，干部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水平呢？陈云认为：

1. 干部要在学习中提高自己。

干部要提高自己的水平，首先要学习。学什么？陈云认为，首先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只有学好马列主义理论才能在万分复杂、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把工作做好。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陈云特别反对对待马列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他在谈到学习理论的同时，总是强调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要向中国的实际学习，要在适应工作中学习，战争时期他强调党的干部要学习军事；和平建设时期陈云强调干部学好经济，有治国之才；而向群众学习则是陈云几十年来一贯

要求于干部的内容。

战争年代我党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从总体上看比较低，因此当时陈三特别强调干部要学文化。他说，干部没文化不行，“没有识字的人，军队中连文书也找不到，工作便不能做好。”(30)他说：“文化和政治是密切联系的”，“如果没有文化的提高，要提高政治水平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有很多理论著作，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如果不识字，没有相当的文化程度，要学懂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的。”(31)

陈云反对一些同志借口工作忙而忽视学习。他论证学习和工作的关系时说，如果一个干部“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32)他认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天抽两个小时读书长本领比一天到晚埋头工作更好，因为这对党的工作有利。

陈云认为干部的学习方法主要是毛泽东说的进“长期大学”，就是坚持自学。他说：坚持几十年，你就是头号博士。在工作中学习是最主要的办法，是最靠得住的办法，只要身上揣着几本书。他主张学习要一步一步来，一本书一本书地读，融汇贯通，加深理解。他说：“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但是，如果书还没有读懂，就不要急于去‘联系实际’，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还不如先把书上的东西读懂。”“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33)学习要有计划，读书要做笔记，互相讨论，最好建立一个学习小组。陈云关于学习方法的这些具体、详尽的指示，是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干部学习的有益指导。陈云本人的精通马列、学识渊博、思想深刻、富有远见，正是他长期学习的结果。

2. 干部要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

陈云认为，学习不光是从书本上学，还要在实际工作当中去学。他特别提倡干部在工作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水平。他说：“实际工作是更重要的教育武器。实际工作的过程，就是教育干部的过程。”(34)他认为，干部到实际工作中锻炼，在工作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增长知识，增长才干，这是更重要的学习过程。1942年，陈云在批评干部中存在的只想进学校长期学习，不愿在工作中锻炼自己、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风气时指出：干部要提升自己，必须到实践中去学习，“事实证明：真正政治上高明的革命家，只能在革命斗争中培养，不能专从学校里训练。共产党的真正领袖不论是苏联的或者是中国的，决不是毫无经验、夸夸其谈的人，而是既有丰富革命经验又有真正革命理论的人。干部也是一样，真正政治上开展的干部，决不是毫无革命斗争经验的。因此，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如果不到工作中取得实际经验，单靠听讲看书，甚至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因为使政治上开展的最基本的东西，是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没有实际经验，就没有政治上开展的基础。”(35)而革命工作现实需要的革命家是“会解决军事、政治、吃饭穿衣的问题”(36)的革命家。一句话，革命需要能解决问题会办实事的革命家。

陈云说：“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不是光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只在学校中学习，要掌握理论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因为理论是实际的反映，归根到底是来自实际，而不是来自书本。”(37)他认为，

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的学习，是掌握书本知识提高自己的根本条件，是更重要的学习过程；“新党员新干部必须从下层实际工作锻炼开始”（38）；经过实际工作锻炼的干部提高得更快。

陈云还强调干部要在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中，在反省自己的错误中，在接受别人的意见中去学习，这样得来的知识更宝贵，通过这些方法去学习，干部进步会更快。

3. 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

陈云认为，不论读书学习还是在实践中锻炼都离不开干部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干部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提高自己。1992年陈云针对干部的不同情况分别提出了各类干部应该注意的问题。他指出，新干部应该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注重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老干部应该注意不要卖老资格，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团结新干部。专门技术干部要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加强与党政干部的合作，增强干好专门工作的信心。陈云批评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只强调党要正确地执行干部政策，而不注意用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错误思想。他指出，作为一个干部应该按照忠诚于党，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服从纪律这4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干部只有这样做，才能不断提高自己。

陈云认为，党的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对此，他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要努力学习，加强自己；二是要克服居功自傲的错误思想。高级干部担负着领导责任，他们除了与一般干部一样必须按照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外，还应该注意提高自己的领导工作能力和领导工作艺术。陈云在1993年7月写的《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和1940年12月写的《学会领导方法》两文中，就专门谈了干部的领导艺术。

陈云认为，干部只要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有针对性地加强自己，就一定能提高自己的水平。如果每个干部都这样做，我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就会很快提高；我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提高了，干部工作也就好做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

注释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陈云文选》第1卷，第214、214、258、258、214、215、213、215、109—110、110、110、111、112、213、214、112、113、218、113、247、122、261、121、244、218、179、266、181、259、177、178、187—188、189、216—217、250—251、256、252、257页。

陈云对党的知识分子 政策的贡献

朱文显

知识分子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几十年来，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历史经验已经证明，陈云作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代表之一。在党的各个历史阶段，他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为建立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广大知识分子 是雇佣劳动者的基本观点， 批判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

什么叫知识分子？列宁认为是指那些“与体力劳动者相区别的脑力劳动者，一般指所有的受过教育的人们，自由职业者（指苏格兰人常说的脑力劳动工人）”。不过，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知识分子，根据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应该主要是指那些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工资以为生活的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此外，我们党也历来把自由职业者和大中学校的学生当作知识分子看待。

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如何正确地看待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客观依据。

陈云建国前在东北工作时就明确指出：“企业内有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人，也有很多脑力劳动的职员。工人和职员，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建国后，又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多数技术人员为了吃饭，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受资本家的支配和剥削。”笔者认为，陈云在这里虽然讲的是受雇于企业的职员（管理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但毫无疑问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事实上，在旧社会，职员是知识分子的上等的和基本的队伍，因为其他受雇于机关、学校、医院、科研机构，新闻出版单位的办事人员、教员、教授、医生、专家、记行、编辑等也都是职员或高级职员，所以，可以说陈云的这些话精辟地阐明了有关知识分子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在旧社会这种属于职员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同工人一样，同属于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都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这也是对于广大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科学界定。

陈云关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雇佣劳动者的观点，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指出：资本家企业内的工程师是“从事脑力劳动”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于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工厂中的知识分子。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

里其他知识分子情况又是怎样呢？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发表划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共产党宣言》时就已经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应该指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知识分子”这个词还没有被普遍采用，因而他们只是偶尔使用过。从马克思罗列的这么多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看来，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对于依靠工资生活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和界定。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按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处的社会地位来说，都属于雇佣劳动者。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知识分子和工人一样，都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拿工资生活的。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问题时，言简意赅地讲明了道理：“同样，工资也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一处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另一处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如果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末，它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真是明明白白，不容置疑。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按其阶级属性讲是雇佣劳动者，和工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或者说从阶级属性上看他们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偏离了这个出发点，就必然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曾将知识分子当作小资产阶级看待。对此，毛泽东曾经正确地指出，这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和“政治立场”来看的，而不是给他们划分阶级。因为所谓阶级，是一个纯经济的概念。“划分阶级应只有一个标准，即占有生产手段（在农村中主要是土地）与否，占有多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生产关系（剥削关系）”，如果将“政治态度和思想也列为标准之一，就是‘左’倾错误。”至于后来将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就更加错误了。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都是两手空空，靠工资过活，他们的“资产”又在何处呢？反过来说，如果哪一个人真正有什么“资产”的话，那已经不再属于马克思所讲的这些知识分子了。当然，如何全面地分析和认识旧社会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把知识分子看做是一种阶级成份。从阶级属性上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属于雇佣劳动者，另一些则属于自由职业者，其社会地位并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在旧社会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群体，在政治上又是分属于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的。按照列宁的说法，有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有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有农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时，既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其阶级属性的问题，又有一个如何正确划分其政治归属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对这一问题在此不作进一步探讨。

基于对广大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认识，陈云一贯在政治上信任知识分子，并且尖锐地批判了对于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

在一些同志看来，知识分子总是和“自高自大”联系在一起。陈云则认为：“自高自大当然不好，是坏的，但是这种看法往往包含片面性。我们要进一步地看，每一个坏处同时也常有它的好处。这个人自高自大，但是做起事来有自信心，这种人多少有点才能，因为他起码总有点本领才敢自高自大。”（11）

在一些同志看来，知识分子（特别是年龄大一点的知识分子）往往“背景复杂”。对此，陈云指出：这种所谓“背景复杂”的人，“在社会上常常是比较有经验的，他们了解许多问题，只要他们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而且现在愿意参加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一同革命，一同前进，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些人虽然“背景复杂”，“但他从自己的经验中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本质也是纯洁的。”陈云进而指出：“青年是纯洁的，但纯洁的不仅仅是青年，老头子也可以是很纯洁的。”(12)这是因为，“我们所说的纯洁，主要的不是年幼龄轻、没有社会关系、单纯的纯洁，而是指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13)这后一种纯洁，是建立在对共产主义坚定信念基础之上的纯洁，因而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纯洁。

一些同志习惯于给别人“戴大帽子”，把任何问题都提到原则的高度。陈云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并且举了很多例子加以批判。比如，有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说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某同志犯了一些小错误，就说人家犯错误根源是由于“政治上的动摇”，如此等等。陈云认为，“把每个问题都提到原则高度是不对的，这种机械的了解十分危险”。因为“如果随便给人家戴上这类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14)这些都是讲的如何正确对待青年学生的问题。与此同时，陈云还反对“对非党干部政治上不信任，疑神疑鬼，任意‘逻辑’”。诸如：不是党员即是“可疑分子”，要求入党者即是“别有用意”等。陈云认为：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人之可靠与否，不在其有无党票，而在其为人的历史和现实的表现”(15)。应该指出，这里讲的非党干部，绝大多数也都是知识分子。

针对党的一些工农干部排挤知识分子，不敢放手提拔使用，下愿意吸收他们入党等错误倾向，陈云指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懂得知识分子的重要，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16)他认为“不敢或不让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做更负责的工作；反对知识分子，不放心知识分子”，是过去“提拔干部中的缺点”(17)。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在共产国际及其领导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曾经错误地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甚至提出了“干部工人化”的错误口号，后果极为严重。应该说陈云的这些主张，是对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错误的纠正，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陈云还一贯主张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他在讲到党员的成分时指出：“党应该注意到贫苦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成分”：一方面“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知识分子中间的革命的贫苦的成分入党”(18)；另一方面“必须打破过去那种‘中上层分子都不好’的传统观点”，“吸收中上层社会出身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的分子入党”(19)。这里所讲的“中上层分子”，毫无疑问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大家知道，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陈云提出的这些组织措施，就为党正确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创造了条件。

二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 关心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

陈云无论是在革命年代和建设时期，都一贯地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是一个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文献，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一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重要论断，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这个决定虽然是毛泽东起草的，但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包含着当时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见解。他在谈到这个决定时说，“党中央最近作出了一个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为什么要专门作出这样的决定呢？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并且是重要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个力量吸收进来，在抗战工作中，在革命事业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20)与此同时，陈云还提出了“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21)

为了使大家正确认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陈云总结了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指出：“在历史上，五四运动就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都有大量的进步学生参加”。“我们再看农村里的革命，不少领导人也是知识分子。彭湃同志在广东省领导过42个县的农民运动，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领导陕北革命的刘志丹同志也是知识分子。再推远一些，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他也是学生出身。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22)大家知道，毛泽东曾经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指出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中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并且认为所谓先锋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23)。应该说陈云的上述论述，就是这种先锋作用的体现。

对于知识分子在建设中的作用，陈云也是十分重视的。他自从1945年9月到东北工作之后，一直在主管经济工作，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对于知识分子重要性的论述，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对于科技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身上。他指出：“据我知道，中国的产业工人不过三百万，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大约三十万。这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是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的，只要领导正确，他们是可以做些事业的。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24)把知识分子当作“国宝”，既表明了陈云的远见卓识，也表现了他对于现代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深刻理解。

为了发挥企业内知识分子的作用，陈云提出在国有和公有企业要建立“由厂长（经理）、工程师和其他的负责人加上从工人和职员中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作为统一领导的机关。针对东北解放初期一度发生的只重视工人，轻视甚至打击职员的“左”的错误，陈云指出：这样势必形成工人与职员的对立，破坏员工团结，其结果必然是妨碍生产，危害企业。他对职员作了具体分析，分为五类，其核心问题是将广大技术人员同少数国民党特务、把头和企业主持人员严格区别开来。陈云指出：“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门家，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而生产及业务的负责管理人员则“有专门知识或业务技能，有组织生产、组织业务的经验，在生产中有重要作用。”(25)他还指出：“我们改

造私营企业靠什么人？派进去的干部是有限的，主要是靠私营企业的工人和职员，要改造企业，必须依靠他们。”(26)这就告诉我们，陈云早就把知识分子看作和产业工人一样，认为他们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

关于企业内的干部问题，陈云认为：“首先靠现在工作岗位上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同时要从有经验有技术的工人和职员中提拔，这是我们干部最主要的来源。”(27)就全国而言，他更重视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在建国初期，他在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就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多。毕业就是失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全国的大学生才有十万多一点，每年毕业二万多人，可是各方面的需要很多。中学生一年只有四十万毕业的，党政军机关都要，不够分。干部‘赤字’很大。”而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在文化教育上投资。”(28)

正是基于对知识分子重要性的深刻认识，陈云一贯在政治上关心知识分子。1937年11月康生回国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知识分子中大抓“托派”，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于这种“托派帽子满天飞”的错误做法，陈云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38年9月，他在论述党的干部政策时，曾经说了两件事：一件是某人被说成是托派，过去的光荣历史被否定了。这个人很悲观，只想到前线去牺牲掉算了。陈云知道后，就根据他提供的证人（其中一个还在国外）进行查证，花了两个多月时间，终于搞清楚问题，给他平了反。另一件是一男一女，也是别人告发他们是托派。陈云亲自找他们谈话了解情况，并保证替他们解决问题。后来花了两个星期就把问题查清了，证明他们不是托派。陈云在谈到第一件事时指出：“调查时间花了两个月，值得不值得呢？我看是很值得的。因为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花两个月挽回一个干部再值得没有了。”(29)陈云当时作为中央组织部长，亲自处理这几十一般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足以表明他对知识分子政治生命的关心。

陈云非常重视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他在这个方面的论述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延安整风时期的《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和《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两个讲话中。当时一些同志有意“压一压知识分子”，因而在批评知识分子中的错误思想时讲了一些过头话。而陈云的这些讲话却娓娓而谈，充满了感情，使人听起来如坐春风。

对于新知识分子干部，陈云认为他们的优点是“对事物敏感，工作热情”，缺点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接着——列举了他们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诸如“自己理想中的革命家与现实需要的革命家不相符”、“想做政治工作，不想做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所谓‘大才小用’”、“所谓‘没有前途’”等，并且——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30)。

对于专门技术干部，陈云认为他们是“革命的专门家，是在困难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专门家”，说他们“不懂政治”是错误的，“不然，他们为何来陕北？”陈云要求他们克服工作中的个人主义，发扬集体主义，在技术人员之间进行合作，不要自以为是(31)。毫无疑问，这些要求也都是实事求是的。

对于文艺工作者，陈云主要是教育他们一不要特殊，二不要自大。关于前者，他指出一些做文化工作的同志认为自己是“文化人”，自视特殊。这种情况不应该在党内存在。文化人也是以千千万万普通党员中的一分子的身份入党的，应该“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因为“只有

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不然，你以“文化人”的资格入党，我以“军人”的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的资格入党，党也就不成其为党，而成了“各界联合会，’了(32)。关于后者，他指出这和“自视特殊”有联系。所以要特殊，就因为自大。他认为，产生这种思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整个文艺工作有不台事实的估计，一是对个人成就、才能有不合事实的估计。”(33)他对这些问题进行的具体分析，也是入情入理的。

陈云对广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也十分关心。1982年7月1日，他专门就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问题致信中央政治局，指出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据中组部了解，35岁至50岁的中专以上毕业生有480万人，如果分两年解决，今年大约要拿出七八亿元，今后一段时间也就是十二三亿元。他认为，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500多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几亿元来解决这些知识分子的问题呢？陈云还指出：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是“基本的基本建设”，“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应该向人民讲清楚，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34)。

三提出了干部“知识化”和“专业化” 的方针，为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全党同志都在对20年来的“左”倾错误进行反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始了党在指导思想和各项具体政策上的拨乱反正。陈云较早地提出了改革干部制度的问题，认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邓小平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许多同志除了不注意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外，对于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也很不重视，这也是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的一种恶果。”(35)邓小平还说：“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是双手拥护。……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36)这些话把陈云的意见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和评价，足以证明在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上，他们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是相通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里把干部的知识化和专业化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联系起来，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陈云的这个意见，不但关系到干部政策的改革问题，而且是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拨乱反正。

陈云关于干部队伍要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思想，实际上是要在知识分子中选拔各级领导干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他指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年内乱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受到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

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时常被拒之于门外，有些长期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在生前往往不能实现，直到他们做出贡献而死后，才被迫认为党员。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加以改变。”他还提出：“党应该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37)根据陈云这个意见，中共中央组织部1982年9月26日写了《关于加强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报告》，经中央书记处同意，于同年10月12日转发全党贯彻执行。陈云认为，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要成千上万，几千，一万，两万”，“为什么要成千上万？一条理由，二十几个省区市，加上中央各部委，提一两百个人够用吗？不够用。成千上万，这是工作的需要。再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经过选择的好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还有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坐镇在那里，只有几个人在那里捣乱，搞不了大乱子。”(38)

陈云还指出，在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时候，邓小平讲的“台阶论”还是必要的，越级提拔的只能是少数。他赞同这样一种办法：“把大学毕业生放到公社里头去做一个时期工作，慢慢地再抽回来，以后到县委，以后再在地委，以后再地到省委，一级一级来。”(39)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选拔干部究竟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标准，是一个长期没有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党的干部标准一贯是要求“德才兼备”，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才”的要求，过去还从来没有同“知识化”和“专业化”联系起来。1958年曾经提出过“又红又专”的口号，指的是要把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既反对空头政治家，又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但它只是作为对于部的要求提出的，并不是选拔干部的标准。加之不久后又提出了“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批判“白专道路”，因而对于干部“专”的要求并没有得到落实。1964年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也都只是从政治方向和工作作风上提出要求，因而是不全面的。所以，邓小平和陈云关于干部“四化”标准的提出，不但在党的干部政策上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而且为建立和完善党在新时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说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展史上又树立起一座新的里程碑。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注释

《列宁全集》第8卷(俄文第5版)，第309页。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1950年8月20日公布)。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5)(27)(29)(30)(31)(32)(33)《陈云文选》第1卷，第352、110、111、200—201、115—116、246、180、214、133、229—230、179—180、181、180、355—356、367、120、256—258、259、274、278页。

(24)(26)(28)《陈云文选》第2卷，第27、45—46、293、13613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443—444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卷，第 253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754 页。

(23) 《毛泽东选集》（2 版）第 2 卷，第 641、565 页。

《中央工委关于阶级分析问题的指示》（1947 年 12 月 31 日）。

(34)(37)(38)(39) 《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312—313、295—296、302—303、301 页。

(35)(36)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26、388 页。

论陈云关于培养选拔 中青年干部的思想

温乐群

大力培养和选拔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全局的大问题。作为一位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中国各族人民彻底解放和中华民族富强腾飞事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陈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进行过深入细致的思考，有着系统全面的论述。认真系统地学习总结陈云关于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造就大批跨世纪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大力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 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 的重大战略问题

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实现党的路线的骨干和保证，党的干部能否后继有人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正是从这样的战略高度，陈云十分关注于干部队伍建设，尤其重视对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切实实现和保证党对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就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反复强调要大力选拔新干部，不断充实到各级组织中去。他指出：“党的干部不同于一般党员，是党的骨干。干部在党的组织中占重要地位。”“因为党的一切决议和政策，都要通过干部去实现。”“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针对当时干部严重缺乏的情况，陈云提出要选拔大批新干部，他说：“现在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开展，新的根据地在不断建立，军队在不断扩大，党在全国需要用很多干部，如果没有大批的新干部补充到干部队伍中来，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要停顿不前，就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陈云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7年中，就党的干部政策、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新干部的教育、培养、选拔、使用等原则、方针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论述，有着重大的建树，为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实践。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视和努力下，党的干部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这就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的重新确立和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全党面前，这就是必须从上到下选拔培养一大批坚决拥护并忠实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因为，“政治路线重新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党的政治路线的态度如何，是否真诚地拥护，能否在实践中贯彻，决定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现，决定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同时，要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长期坚持下去，还必须培养选拔一大批德才兼备、政治可靠、具有相当的领导能力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这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性问题。然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摧残，党的干部队伍实际存在着年龄老化、文化素质偏低等突出问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

作为一位曾经主管过党的组织工作、又长期在第一线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对此表现出十分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他反复强调要大力培养选拔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1979年3月，在主持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陈云就提出要“找一个、二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让他们“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几个月后，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陈云明确指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这些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他特别强调，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

经过几年的努力，干部队伍的状况有所好转。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文化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据80年代初统计，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平均年龄约65岁，国务院各部委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约63岁，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约62岁。省部级领导干部中50岁以下的仅占总数的15%，从文化程度来看，在全国两千多万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20%；从专业结构来看，缺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大多，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鉴于这种情况。陈云于1981年5月专门致信中央，提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两个月后，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他又做了《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大声疾呼，“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并强调：“这是老干部对革命事业应尽的责任”。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陈云又特别提出：“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相当长时间以来就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问题，存在青黄不接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每一个老同志，都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因此，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全面阐述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战略地位的同时，陈云还系统地论述了选拔培养干部应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参与制定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并就中青年干部的培养方法，选拔途径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对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中青年干部

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培养和选拔干部，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原则和标准，对此，陈云反复加以强调，并就这一原则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指出：提拔干部的原则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

所谓德，就是政治标准，是对于部的政治立场、思想作风和组织纪律性

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政治立场坚定，忠实于党的事业，坚持拥护和积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陈云指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在战争年代，他强调，于部政治立场必须是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的事业，做到：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有为党慷慨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总结我党在干部选拔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反复指出：一定要选拔政治上可靠的干部，要培养和选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他多次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此外，“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11），也坚决不能提拔使用。

（二）思想作风过硬，党性强。陈云十分重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他指出“执政党的党风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搞好党风的关键在于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要具有并保持良好的思想作风。因此，他认为思想过硬，党性强，作风正派应该是选拔干部政治标准的一个重要内容。陈云关于思想作风标准归纳起来，主要包括4个方面：

1. 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在1940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当谈到挑选干部的标准时，陈云指出，标准之一就是要“与群众有密切联系”，1957年1月在商业部党组会上，他又指出：“疑难不决的事情，要请教群众。没有这一条，不能算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依靠组织，更主要的是要依靠群众。”（12）

2.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具有民主作风。民主集中制是我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13）总结经验教训，痛定思痛，陈云特别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他指出：“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14）

3. 敢于坚持原则，明辨是非。针对“文革”后党内存在着是非不分，有的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有不敢坚持原则，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的情况，陈云指出，要在党内，特别是党的干部中大力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15）。

4. 谦虚谨慎，作风正派。党的干部都要做到廉洁正直，办事公正，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谦虚谨慎，真抓实干。1945年5月，陈云在“七大”发言中指出：“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就是许多人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的人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16）。鉴于“文革”十年的教训，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又特别明确提出：“绝对不是要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17）。

（三）遵守党的纪律，组织纪律性强。党的纪律是保证党实现领导、发挥作用的工具。广大党员和干部必须遵守党的纪律，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这也是考察选拔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1939年5月，陈云针对当时抗

大学生刘力功不服从党组织分配、闹个人主义而被开除党籍的事例，指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他强调说：“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不管你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纪律”。“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18)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陈云仍然强调坚持党的纪律。1984年10月，他在一份报告中批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19)

总之，提拔中青年干部，一定要把“德”放在首位，“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侧重于德，就是说，要切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20)

在重视并强调干部培养选拔中政治标准的同时，陈云也十分重视干部的“才”，即干部的文化知识，业务水平、专业技术造诣和应具备的领导才能。提出要量“才”选拔，量“才”使用。对于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形势和特点，陈云论述的也有所不同，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要具备相当的，甚至应是较高的文化知识，这是一个干部综合能力和水平的基础。陈云认为：“文化与政治是密切相联的。如果没有文化的提高，要提高政治水平是不可能的。”他指出：“没有相当的文化程度，要学懂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的。”“没有文化，政治水平很难提高，不能看得远，只看到目前，只看到陕北。这不行，要看到全中国，看到全世界。”(21)因此，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是干部选拔和使用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考察、衡量干部才能的基本条件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党在新形势下领导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陈云更加重视干部的文化水平，把干部的文化水平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明确指出：要培训“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骨干”。(22)

(二)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培养大批专业技术干部，这是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论述中一个十分突出的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着重视政治工作，轻视技术、经济工作，许多干部不愿做技术、经济工作的现象，他反复指出：“向全党解释，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23)他强调：“技术、经济、事务工作有其政治意义，政治工作也会带有技术、经济、事务性。”(24)因此，党的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能力，要善于从事某一专门工作。为此，他特别提出要培养选拔一批专业技术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特别强调要培养选拔懂经济、懂管理的中青年干部，要培养选拔能执笔，善写作的中青年干部。在主持国务院财经委时，他重视培养优秀的中青年财经干部。1981年7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专门谈到：“必须培养能写文章的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25)

正是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从重视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考虑，陈云十分重视培养选拔一批政治可靠的知识分子干部。他指出：

“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并且是重要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个力量吸收进来，在抗战工作中，在革命事业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2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大声疾呼：“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27)

除了应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以外，党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还应具备较强的决策能力、组织能力，这也是考察干部才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陈云同志也有过许多论述。例如，他要求干部要多谋善断，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通过“全面、比较、反复”的方法，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分析研究，制定对策和计划。他还指出：“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为此，他特别希望“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29)总之，陈云对干部选拔中的“德才兼备”的原则做了系统的论述，有力地指导了我们党的干部选拔工作。

三中青年干部的培养方法和选拔途径

在全面阐述“德才兼备”标准的同时，陈云还提出了中青年干部的培养方法和选拔途径，对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陈云认为，中青年干部的培养，主要通过学习和实践两个方面，彼此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首先，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历史，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和技术。陈云指出：“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只有掌握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领导干部责任重大，更要努力学习，加强自己。因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指出，“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要学习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30)等等。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要是学习和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陈云说：“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3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多次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陈云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32)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全新的任务。为此，陈云提出要学习经济管理，学习科学技术，提高干部管理国家、领导经济建设的水平。1949年12月，陈云指出：“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发展工业，这就需要技术”(33)，我们的干部过去长期在农村工作，对于管理现代企业知识很少，为此，陈云提出，“要从头学起”，学习经济知识和管理方法。他语重心长地说：“不能总是当外行”，“要下决心学习。不学习，经济

建设一窍不通，那就搞不成。”(34)他提出尽可能地给干部以正规培训，使之尽快地掌握理论和必要的知识才能。1983年2月，陈云明确指出：在党校培训的领导干部“既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以此作为主课，又要学习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必要的专业知识，以提高领导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35)

总之，我们的干部要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结构、又红又专的内行、专家，这是陈云对中青年干部提出的通过学习所应达到的目标。

其次，要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锻炼成长。在重视基本理论、基本业务知识学习的同时，陈云也很重视在实践中锻炼培养干部，强调干部必须到社会实践中去锻炼，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学习，从实际工作成败的经验教训中提高本领。他从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性，指出：“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只在学校中学习，要掌握理论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36)他强调指出：实际工作是教育和培养干部的最重要的武器，“实际工作的过程，就是教育干部的过程。”(37)

在强调从学习和实践两个方面培养干部的同时，陈云还从多方面论述了选拔干部的途径和方法。

第一，善于识别优秀干部。经常深入地考察干部，了解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而不要看一时一事。陈云指出：干部考察和识别，应“先从日常工作中认识之，证明能胜任较繁重的工作；尤须于斗争中考验之，证明政治坚定，主动得力，作风端正。从群众运动中发现和提拔。”(38)在考察中，“不单看言论和态度，主要看本质和实际。不仅看一时一事，主要看整个工作历史”(39)，力求把人选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党的干部选拔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陈云特别强调，一定不能让“三种人”进入领导班子，也不能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但是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的中青年干部，“只要他们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与‘三种人’坚决划清了界限，而且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表现一直好，党就应该信任和使用他们，并在工作中对他们继续加以考察和帮助。”(40)

第二，慎重提拔。经过考察，积极慎重地把优秀干部提拔起来，给他们以适当的位置，使之挑起重任，“提拔干部是经常的有步骤的工作，要有准备，预先审慎考虑过的才提拔。切忌提而不当又放下去。能力大小和工作历史必须符合于位置，即工作称职。”“放手使用，同时要经常地适时地检查和帮助。”(41)

第三，坚持台阶论，不唯台阶论。一个干部的成熟和能力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经过一个过程，而客观世界的丰富和复杂件，又增加了这一过程的难度。这就要求干部的培养要逐渐地，按部就班地成熟起来。同样，干部的选拔使用也要经过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发展起来。陈云说：“台阶论还是对的。……一定要按级提拔。……我看按台阶的办法上台的人，他的基础巩固扎实，本领全面。”但是也不能绝对化，“也可以越级提拔。越级提拔的，只能是少数。”(42)是那些经过慎重考察特别优秀的人才。

第四，设立辅助性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长期考察训练和选拔干部。陈云指出：“为了在工作中考察中青年干部，各级党政军民组织都应该自上而下地设立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43)，如办公室、秘书处、研究室等机

构及相应人员，“让中青年干部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给他们接触全面工作的机会，让他们随时了解工作中的问题。凡属向党委提出的问题或方案，先由上下各级的这些辅助机构中的中青年干部经过研究，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办法，提供党委参考。”“只有这样用大批真正年富力强的干部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工作岗位上调查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方案，才可以减轻各级党委的工作，而且可以培养出大批中青年干部。”他认为：“这种上下对口，使用和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的办法，要成为制度。”“这种办法在中央和省市两级更为重要。”(44)

第五，建立传帮带制度。在领导班子内，把久经考察，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与中青年干部搭配起来，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扶植培养年轻干部，在重大问题上把关。陈云希望老干部“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担负起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任务。……在重大问题上出出注意，把把关。”(4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反复强调要大力培养和选拔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他认为，中青年干部的培养选拔不能是几十个、上百个，必须是成千上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级领导班子中退出的大批老干部的工作都能有人接替；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有较大地选择余地，以便把班文给确实可靠的人。”(46)

要真正实现成千上万地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这一战略目标，必须有强烈的紧迫感，要全党重视，上下一起动手，要建立起干部的梯队结构。

首先，要求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充分认识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重大意义，克服保守思想，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三反复强调这一点，他指出：“现在老干部对于提拔中青年干部还不是很清醒，不是感到很紧迫。如果到倒下来的时候，被迫地提拔一些不理想的人到领导工作岗位上来，这对我们党是很不利的。我们不应该做这种选择。我们要做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立即主动地提拔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党必须这样做，”(47)针对那种认为中青年干部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没有经验，不放心等种种疑虑，陈云明确地回答：“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放到实际工作的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只要有三年五载，至多十年的锻炼，他们是一定能够锻炼成才的。”(48)

其次，要全党重视，一起动手。陈三认为：大量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要靠党的组织部门去做。为此，他提出：中央组织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技术干部局，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但同时，他又强调，还要靠“各级领导干部大家动手去做，从基层单位直到中央，都要一齐动手”(49)，成千上万地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

第三，要建立并保持干部队伍的梯队结构。陈云指出：“干部队伍保持梯队的结构，可以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50)。他特别强调：“必须成千上万地培养、提拔三四十岁的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干部，把他们提到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只要把党的第三梯队建立起来了，经过十年八载的锻炼，他们就可以成为党的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党的领导权就可以保证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50)

陈云关于培养和选拔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的论述，是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贡献。认真学习陈云的论述，按照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造就大批能

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社会主义中国就一定会繁荣昌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注释

(16)(18)(21)(23)(24)(26)(28)(30)(31)(36)(37)(38)(39)(41) 《陈云文选》第1卷，第211、178—179、214、212—213、291、124—126、178、226、256、180、220、142—143、142—143、252、216—217、215、214、215—216页。

(11)(12)(13)(14)(15)(17)(19)(20)(22)(25)(27)(29)(32)(35)(40)(42)(43)(44)(45)(46)(47)(48)(49)(50)(51) 《陈云文选》第3卷，第257—258、269—270、302、297、314、359、316—317、46、274、353、274、293、275、317、322、302、296、353、285、322、316、301、295、315、299、294、295、349、311页。

(33)(34)

《陈云文选》第2卷，第46、133页。

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 的基本思路

韩振峰

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组织建设的核心问题。陈云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总结我们党长期以来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经验的基础上，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战略眼光，写下了一系列有关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文稿，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思想观点。陈云的这些思想，对于当前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推进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纵观陈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的大量文稿和讲话，笔者认为，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思路主要体现在10个方面。

一德才并重，选贤任能

德才兼备，是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的一条重要原则，如何在实践中把握好这一原则，历史上是有过经验教训的，由于受“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在选拔干部标准问题上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并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陈云总结了我党历史上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德才并重”的选干标准。他认为，选拔干部必须“德才并重，以德为主”，既不能只顾才不顾德，也不能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二者不能割裂，不能偏废。因为，离开“德”，“才”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没有“才”，“德”就容易成为空的东西，忽视任何一方，都不能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干部路线，而对一个干部的德和才的考察，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也就是说要看干部的工作实绩。只有从实绩看干部，才能使德才兼备的标准落到实处，否则，就必然陷入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的泥坑；就可能把一些只讲空话，不干实事的空头政治家和口头革命派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又要防止把干部的德才标准庸俗化、简单化，否则，我们就可能选拔一些埋头业务而不懂政治，不辨方向的“盲人”，这将在政治上造成极大的危害。

选拔干部注重“德才并重”，是陈云的一贯思想。在党的十二大上，陈云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德才相比，我们要更侧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陈云总结了我们党在解决接班人问题和建设干部队伍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最重要的是按德才标准把人选准用好，严格把好政治关，注重政治品质和政治表现，指出这是关系到选拔什么人来接班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战略问题。同时，他还认为，一个干部光德好还不够，有德无才的干部，政治虽然可以信赖，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也不能完成党交付的任务，更难于开创新局面。因此，对有德无才的人也不能委以重任，否则，也会误国误民。陈云强调要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且把提拔使用这种德才兼备的干部制度

化，这是陈云关于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

二全面考察，客观公正

如何正确地看待和考察干部，历来是我们党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陈云说，正确看待干部很重要，如果“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正确地看待干部，对干部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是正确选拔干部、合理调配使用干部的基础。知人才能善任。只有对干部了解得多，估计得准，才能把干部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充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干部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骨干作用。反之，如果对干部了解得不彻底，或根本估计错了，用人就会造成很大错误。要么冤屈好人，埋没人才，压抑人才，挫伤干部的积极性；要么坏人上台，以售其奸，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

那么，怎样才能正确看待和考察干部呢？陈云要求我们特别是做领导和干部工作的同志，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干部。

首先，要客观地看待干部。陈云说：“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切忌以主观的推测为根据。”这就告诉我们，看待一个干部的好坏，水平的高低，能力的大小，经验的多少，不能以主观推测为根据，也不能只以干部的言论和态度来判断，更不能以领导者的好恶来决定，而只能以干部在客观实际中的工作和表现为根据。只有认真地、仔细地考察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才能对于部做出实事求是的、公正的、不可反驳的结论。如果不是这样，看待干部靠主观臆断，或者只看其言论态度，不看其工作和表现，甚至以个人的好恶和恩怨来看待干部，那就会对干部做出错误的估计和判断。

其次，要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干部。陈云认为，考察干部，不能“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只看到他本领的高低，没有看到他本质的好坏。”我们看待干部，不能以点代面，以偏概全，而是要全面看待干部。既要看到干部的德，又要看到干部的才；既要看到干部的言论，也要看到干部的实际表现；既要看到干部的资历，也要看到干部的水平；还要考虑干部的特点，等等，并对此进行综合考察，客观分析。只有这样，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住干部的主流和基本点，对干部做出客观公正的估计和结论。否则，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于部做出片面的估计，造成选人用人的错误。

再次，要历史地看待干部。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人的一生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一个干部在成长过程中，由于主观努力不同和客观条件的影响，有时进步快一些，有时慢一些，甚至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都是正常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干部。陈云认为，考察了解干部，不能采取孤立静止的办法，“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只看见今天的好，不看见昨天的坏，或者只看见今天的坏，不看见昨天的好。”这些都是片面的，很容易造成认识和考察中的失误。对于部，我们不能一眼看高，一眼看低。今天这个干部工作做出点贡献，就捧上了天，明天工作出了点差错，就认为人家什么也不行，这就会像陈云比喻的那样，如果对待干部像打桩子，今天这个干部表现得

一点，就把他一抬抬上了天，同一个干部明天表现坏一点，就把他一打打到地下去，这样反复几次，就把这个干部给断送了。

三发挥特长，量才使用

知其人才能善其任。了解、考察干部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使用干部。只有注意发挥每个干部的特长，做到量才使用，才能使其充分施展才能，创造性地做好本职工作。

在量才用人方面，陈云主张“坚持人、事两宜的原则，用人得当，适得其所”；“按照才干，按照需要，同时兼顾”；“量才的原则是用其长，不是用其短。”陈云这些精辟的概括，为我们正确合理地使用干部指明了方向。我们在调配使用干部时，必须力求做到既符合实际工作和建设任务的需要，又要兼顾干部自身的特点和特长。要注意用人之长，避人之短。要细心根据每个干部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考虑究竟放在什么岗位上才会使他们施展自己的才能。能够这样调配和使用干部的领导者 and 干部部门的工作者，才真正称得上高明，也才能打开干部工作的新局面。与此同时，陈云还主张，对干部既要放手使用，同时要经常适时地检查和帮助。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级干部敢于工作，敢于负责，为党和人民做出贡献。

四加强教育，提高水平

干部教育是干部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干部的地位和作用，必须要求干部比群众有更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和革命觉悟，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更强的组织和管理能力。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加强对于部的理论教育，这也是党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陈云一贯重视干部的教育工作，强调要克服对干部“只使用不教育”或“只提拔不教育”的错误。他认为“老干部需要教育，新干部更需要教育”，对干部的“革命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教育要一致起来”，因为“只停于实际，就不会有远大目光；只停于高远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陈云都把对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他认为要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最重要的是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素养。

早在1942年10月7日，陈云在延安军事干部会议上就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应“学理论，学正确的思想方法”。他说：“现在我们的毛病，是马列主义不够。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需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这“对党对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11)新中国成立后，他再三强调要学理论，特别是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学好哲学，终身受益。1981年3月，陈云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中，再次强调学习哲学的重要性。他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的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12)陈云在强调对干部进行理论教育的同时，还十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指出：“实际工作是重要的教育武器。实际工作的过程，就是教育干部的过

程” (13)，如果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不是相辅而行”，那么，“提高政治水平和克服经验主义是不可能的。” (14)陈云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值得我们始终如一地坚持，并不断使之发扬光大。

五关心爱护，处理慎重

陈云在《论干部政策》、《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等文章中，明确提出了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的思想。他说：“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 (15)陈云的这段话，总结了我们党关心爱护干部的基本经验，为我们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充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指明了方向。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干部提到一定岗位后，都有一个熟悉情况，适应工作，积累经验，锻炼提高的过程，都可能在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作为上级机关和领导同志要经常注意下级的工作，并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帮助。要使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有职有权，鼓励他们敢想、敢说、敢做，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地进行工作，在他们的工作出现困难时，要帮助出主意、想办法。不仅要交任务，而且要告诉他们完成任务的方法，不仅要求他们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要帮助他们联系实际灵活贯彻，并提醒他们在工作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和可能发生的偏向，同他们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工作出了问题时，领导要敢于为他们承担责任。这样，对干部既要放手又要领导，才能有利于干部的成长，有利于干部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在用人问题上，不能对干部只使用，不培养；只交任务，不指导帮助，放任自流。“要经常留意他的工作，到他实在不能支持的时候，就要想办法，不要等他塌台以后，再来追究责任，撤换他的工作。” (16)对干部的真正关心热爱主要体现在对他们工作的支持、指导、帮助和信任上。

另外，对于部的关心爱护还体现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认真帮助其改正错误，对干部的处理要慎重。陈云指出：“当着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系列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 (17)干部的政治生命是干部的精神支柱，是鼓舞干部前进的动力。一个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的同志，重视政治生命往往胜于肉体生命。他宁愿牺牲一切，也不愿意被党组织开除。因此对于部的处理，尤其是开除党员干部的党籍，一定要十分郑重，十分谨慎小心，决不能草率从事，冤屈好人。这是真正从政治上关心爱护干部、团结教育干部、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和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表现。

六严格要求，勿忘使命

党的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正像陈云所说的那样，“党的干部不同于一般党员，是党的骨干。” (18)我们党对党的干部的要求，历来比对一般党员的要求更高更严格。他们除了必须模范地履行党员的各项义务，做一个合格的党员外，还必须具备党的干部的素质和基本条件。毛泽东对党的干部应当具备的素质条件作过精辟的概括，他指出：党的干部应该“懂得马克

思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19)陈云也反复强调过党员干部应具备的素质和条件。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政治上首先要过硬，要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群众关系要好，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了解群众，帮助群众，一心为群众谋利益，为党员群众所信任；在工作上要忠于职守，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在作风上要严以律己，遵守纪律。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党的干部都必须具备这些基本素质。

针对有些干部忘记自身的责任和使命，不严格要求自己的情况，陈云严正地指出：“许多干部现在只强调党要正确执行干部政策，而不注意用干部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20)，“一谈到干部政策，就意识到党应如何照顾他，了解他，爱护他”，而对干部标准却“漠然视之，把它放在次要地位，甚至根本忘掉了。”(21)陈云认为，“干部对于党的事业负有重大的责任。”(22)他们担负着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为党的事业共同奋斗的神圣职责和使命。为此，陈云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本人理应多讲标准，多要求自己”(23)，明确自身责任，不忘历史使命，加强自身修养，努力使自己成为真正合格的领导干部。

七增强团结，重视批评

增强干部之间的团结，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从思想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陈云十分重视党内干部的团结，特别是新老干部的团结。在他看来，解决干部之间不团结的主要办法就是加强思想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大家共同提高思想认识。陈云指出：“必须使所有干部认识一个基本问题，领导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党，不论新干部和老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都必须在维护党的利益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24)各类干部都要用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凡闹不团结的，各自都要多做自我批评，不能互不佩服，有功归己，有过推人，而要以党的利益为重，识大体，顾大局，团结奋斗。同时，党组织要主持公道，任何偏袒都是错误的。该批评的必须批评，该支持的必须支持，这是加强干部团结的正确方法。

当然，我们党强调干部的团结，是在维护党的利益和原则之上的团结，对于一切危害党的利益的错误倾向，必须进行必要的斗争。陈云指出：“党内不允许无原则的和平，更不允许相互包庇。有了错误不进行必要的斗争是不对的。”(25)“党内斗争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26)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主要方法，是克服缺点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党的战斗力，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把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对于如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陈云也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要坚持原则，要实事求是，不应随便给别人戴大帽子，把任何问题都提到原则高度。他还认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要从领导做起，不能只批评下面。对下级的批评，务必做到适当和正确。批评要有诚恳的态度，要注意效果。陈云关于加强党内干部团结和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加强党内的干部队伍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八消除宗派，相待以诚

在如何正确处理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的关系问题上，陈云也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在陈云看来，非党干部是党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他们往往可以起到共产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我们听不到的意见，他们可以听到；我们看不到的情况，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宣传工作做不到的地方，他们可以做到。正因为如此，我们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很好地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事业的客观的必然要求。陈云指出：“没有党外人士的同情和合作，革命胜利就不可能。”（27）

陈云分析了党员干部同非党干部不团结的思想认识根源，批评了某些干部的宗派主义思想，指出：必须“打破宗派主义，即打破‘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人造墙壁。”（28）他指出：“在一条战线上奋斗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都是革命同志，人人都有革命、工作、说话之权，党员干部无权垄断革命。在革命工作中，与共产党员负同等责任的非党干部，他就有与共产党员同等的革命功绩。”（29）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的方针，陈云还鲜明地提出了我们党对非党干部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并且详细地阐明了相应的具体政策。他指出，我们“应取的基本态度是坦白、诚恳、爽直。”（30）“只有彼此相见以诚，才能和衷共济。”（31）陈云的这些论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处理党与非党关系的重要原则。

九新老交替，培养中青

重视培养和选拔接班人，搞好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这是包括陈云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直非常关注的问题。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陈云就主张重视培养提拔新干部，发展壮大干部队伍。为了打破论资排辈等各种旧观念的影响，陈云明确指出：“有些人说，新干部没有老干部老练，经验不如老干部多，资格不够。照这样说来，就没有办法提拔新干部了。很明显，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老干部都是从新干部锻炼出来的，有经验的干部开始也都是没有经验的。新干部经过锻炼，就会从没有经验变成有经验，由不老练变成老练。至于说到资格，那末，资格不老的干部不一定都做不好工作。”（32）陈云的这些论述对促进当时干部队伍的发展壮大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对于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问题更为关注。在1980年12月16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明确指出：“我们老干部必须担负起挑选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责任。”（33）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又严肃地指出，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所以，当前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34）他在《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中强调：“要提拔中青年干部，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在党的十二大上，他再次强调，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他提醒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每一个老同志，都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并指出，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

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为了使中青年干部健康成长，陈云还主张提拔干部应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在他看来，按台阶的办法上台的人“基础巩固扎实，本领全面。”(35) 为便提拔年轻干部制度化、规范化，陈云主张建立一套机构，使那些有专业知识、年富力强的干部，能够被及时选到发挥才干的工作岗位上。陈云还特别强调指出，老干部应继续胸怀大志，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重，热心地主动地让出工作岗位，让大批中青年干部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挑起重担，并且随时向这些中青年干部提出建议，给以帮助。这是“老干部对革命事业应尽的责任”。(36)陈云不仅要求老同志让出工作岗位，而且自己身体力行，选贤任能，主动让出自己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一切从党和国家利益出发的崇高品德、为全党树立了光辉榜样。

十以身作责，端正党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所担负的任务，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比起以往要艰巨得多、复杂得多。为此，陈云认为，党的各级干部务必要经得住各种新考验。

首先，党的干部要经得起执政的考验。这是因为执政后，我们党所处的环境变了，正如陈云所说：“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37)因为执政，党的地位变了，权力腐蚀的危险增加了，一些党的干部可能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称王称霸，由人民的“公仆”变为脱离群众的“官老爷”。陈云认为：“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苏区的党和解放区的党，大家忙于打仗和支援战争，另外，也没有什么物质可以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利为自己谋取私利，”(38)因此，我们对党的干部要“在主观上加强限制”。一方面，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传统教育，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为人民群众掌好权、用好权，真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另一方面，要对以权谋私的干部绳之于党纪国法。陈云指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38)

其次，党的干部要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搞改革开放不行，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问题。陈云指出，现在确有少数党员、党员干部，不能坚持党性原则，遇到歪风跟着干。他们钻改革开放的空子，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以至贩卖、放映淫秽下流录相，引诱妇女卖淫等等丑事坏事，都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39)这些腐败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威信，损害了党的形象，损坏了党的声誉，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早在1980年11月，陈云就及时向全党敲起警钟：“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

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40)之后，他又多次强调，如果全党不引起注意，不严惩腐败，就会“使党失去民心。”陈云这些精辟论述真可谓切中要害，意义深远啊！

总之，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论述，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这些精辟论述，不仅在当时我党我军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发挥过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对当前和今后我国干部队伍建设仍将发挥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注释

(11)(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陈云文选》第1卷，第214、214、112、213—214、110、111、214—215、216、261、216、216—217、251、122、119、120、211、255、255、211、255、218、182、182、244、247、247、219、248、179页。

(12)(33)(34)(35)(36)(38)(39)(40)(41)《陈云文选》第3卷，第317、285、281、270、301、297、331、273—274、355—356、273页。

(19)《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第287页。

(37)《陈云文选》第2卷，第231页。

陈云的干部教育思想及其对新时期干部教育实践的指导意义

李有发

陈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干部教育思想对新时期的干部教育实践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

陈云的干部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干部的重要性决定了干部教育的重要性。

陈云从党的干部的重要性出发，论述了干部教育的重要性。他曾引用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名言，指出：“干部在党的组织中占重要地位。”“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而要建立合格的干部队伍，就必须进行干部教育。他指出：干部标准的第一条就是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而“要做到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是一个教育和锻炼的过程。”他明确提出了干部要“努力学习，加强自己”的要求。他认为，要给干部学习机会，使他们在理论上和工作能力上进一步提高，说：“老干部需要教育，新干部更需要教育。”“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正因为他把干部教育看作是关系干部素质，关系革命事业成败与否的大问题，所以，他结合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干部接受教育的方法，以加强对干部的培养。例如，他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革命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教育要一致起来”，强调干部要安心学习理论，同时，又指出实际工作重要的教育武器。在《到什么地方学习》一文中，他对在学校和工作中学习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还在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干部自学以及老干部教育新干部等干部教育问题。

（二）干部教育内容应有层次性和针对性。

陈云根据革命战争时期干部队伍的现状以及革命工作的不同要求，在许多文章里论述了干部教育的层次性问题。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他说：根据目前的环境，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呢？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次，要学习中国历史和时事政治，以规定当前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最后，文化程度低的党员要长期坚持识字和读书、读报，以提高文化水平。在《学会领导方法》一文中，他强调领导干部还要学会正确的领导方法。

陈云认为，干部教育内容要有针对性，对各类不同的干部，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应有所不同。他提出，要提高老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老干部有宝贵的经验，但在政治文化上本领还不够，特别是工农出身的干部更应努力提高文化程度，并且带头学习文化知识，学文化是学其他知识的基础。老干部在自己学习的同时，还要教育新干部。对新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新干部，他提出，必须从下层实际工作锻炼开始，不能只提拔不教育；新干部既要进行学校教育，又要着重在实际工作中学习，以便使其在思想方法、政治理论、党

的路线政策等方面加以提高。有专门技术干部，他认为要在政治上帮助他们，特别是要重视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增强合作精神，并且为他们提高技术提供教育机会。对领导干部，他强调要学习理论，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除此以外，陈云还论述了干部教育过程中的其他富有针对性的问题，诸如新干部与老干部的团结，老干部对新干部的帮助教育等问题。

（三）干部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际工作是最重要的教育武器。

陈云在论述干部教育问题时，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他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说：“革命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教育要一致起来。只停于实际，就不会有远大目光；只停于高远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就辩证地说明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他针对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问题，在《到什么地方学习》一文中说：“事实证明：真正政治上高明的革命家，只能在革命斗争中培养，不能专从学校里训练。”“如果不到工作中取得实际经验，单靠听讲看书，甚至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没有实际经验，就没有政治上开展的基础。”在这里，陈云再一次从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的角度，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性。对于如何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的问题，陈云是这样说的，首先，应从干部成长及工作需要的高度上，充分认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必要性，打破在于部教育中轻视实际的观点。他一再强调指出：“实际工作是最重要的教育武器，实际工作的过程，就是教育干部的过程。”其次，理论联系实际应区别不同情况，突出重点，注重结合的效果，反对形式主义的结合。在《到什么地方学习》一文里，他指出，“除了学习专门的知识以外，一般没有或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应该先到工作中学习。”对于那些必须进学校学习的干部，我赞成他们进学校。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他提出理论联系实际要达到真正的效果。他说：“老干部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来指导以后的工作，但是如果书还没有读懂，就不要急于去‘联系实际’，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还不如先把书上的东西读懂。读懂就是消化。”

（四）干部教育的方式要结合实际，灵活多样。

在《陈云文选》中，尽管没有直接论述干部教育的方式问题，但他的这一思想在一系列文章里都有表现。如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里，他说：“各人的程度不同，环境不同，读书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他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在《党的支部》一文里，他鲜明地提出“支部是教育党员的学校。”他始终强调在工作中学习、在工作中接受教育，指出实际工作的过程，就是教育干部的过程。

二

陈云的干部教育思想虽然大多反映的是革命战争时期的干部教育问题，但学习他的这一思想，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干部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它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新时期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干部教育是实现党的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陈云始终强调干部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干部没有文化，没有知识，革命是革不成功的。今天，我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面临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重，遇到的问题比以往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大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懂科学、懂管理，掌握专门技术的“复

复合型”干部。然而，当前有的部门、有的干部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忽视教育，忽视学习；一些干部愿意学习实用性的技术，不愿意学习马列原理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此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只有充分认识新时期干部教育的重要性，才能保证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其次，它有助于我们改革干部教育内容，使其符合时代要求。长期以来，我们的干部教育内容过分突出了政治，淡化了经济；注重对马列原理原著的学习，忽视了对各种专业技术的学习，使干部教育内容与社会发展相脱节。与此同时，干部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难以适应各地区、各行业对干部的素质要求，难以调动干部受教育的积极性。因此，加强干部教育的针对性，改革干部教育内容，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增设反对腐败等课程内容，增设有关法律、贸易、外经贸知识的学习，已经成为时代对干部教育内容的客观要求。

第三，它有助于我们推进干部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过去封闭式的教育方式，根据干部教育的状况，除了要加强学校教育之外，还应当实行联合办学，加强干部在工作中的学习。联合的方式有，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联合；干部院校与高校联合；各干部院校之间联合；跨国联合办学（以培养大批外向型干部）。此外，还可以采用选派、挂职、直接参加工作等形式，充分发挥实际工作这个重要的教育武器的作用。第四，它有助于反对干部教育中的形式主义。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教育干部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但是，当前干部教育中存在注重形式上的联系实际，而对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联系不够；注重书本上的理论，而对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注意不够的现象。对此，我们应学习陈云有关干部教育要重实效的思想，切实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陈云的干部教育思想内容丰富而具有针对性。我们应当从当前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认识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加强干部教育方式的灵活性、多样性，大力改革和发展干部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造就大批新型的干部。

（作者单位：中共甘肃省兰州市委党校）注释
《陈云文选》第1卷，第211、211、212、261、216、142、216、216—217页。

延安时期陈云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论述及其意义

刘扫尘

共产党员标准，是衡量共产党员是否合格的准则和规范。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一直对党员有严格的要求。但明确提出共产党员标准并概括为 6 条的，则是延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这一标准的提出不仅丰富了毛泽东的建党学说，为延安时期加强党员队伍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而且在今天改革开放年代，为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 党员标准的提出，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一）共产党员标准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时代的产物。1939 年前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不断提高，大批抗日的优秀分子被吸收入党，党员队伍迅速扩大，为党增添了新鲜血液。但因在短期内“猛烈的发展”，党员队伍从抗战前的几万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不少地方对入党条件和手续掌握不严，以致许多普通的抗日分子和党的暂时同路人也加入了党，有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内；这不仅使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和党组织巩固程度大大受到损害，使党的组织与群众抗日团体之区别在有些地方模糊起来，而且使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有机可乘，进行破坏我党的阴谋活动。在当时对日投降与国内分裂的危险同时并存的严峻形势下，对共产党员提出严格而明确的具体要求，努力提高党员素质，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是完成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困难的抗日政治任务的决定性因素。为此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曾提出了共产党员要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成为 5 个方面模范的重要思想。1939 年 5 月，陈云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并首次提出了共产党员的 6 条标准。这 6 条标准，正是这种时代背景和要求的产物。

（二）共产党员标准，是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坚持这个标准，是保持党的性质的前提和条件。

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提出了“在党的建设中党员的意义和作用这一问题，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的思想。为什么党员的意义和作用在党的建设中具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呢？这上要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陈云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保持党员成分的纯洁性，就是党必须是“由无产阶级中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共产党下是“工党”，“不是全体工人都可加入党的，而只是工人阶级中最觉悟、最积极和最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要使党真正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就有必要对什么人才能成为党员，即对共产党员的标准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党员的标准、党员的作用而具体体现出来的。如果不坚持党员的标准，降低党员的条件，党员与一般群众、党与阶级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党的先进

性、战斗力也就会丧失了。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党员的素质直接决定着党的战斗力和生命力；而坚持党员标准又是提高党员素质的关键所在。可见，“党的性质和党员的成分与入党的条件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三）共产党员标准的提出，是对共产党员行为规范的完善，是使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保证。

党员标准既是由党的纲领、性质、宗旨决定的，又体现了党的纲领、性质、宗旨的内在要求，其本质是不能变的，但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是可以而且是应该根据当时党的政治任务而不断予以完善和发展的。这种完善和发展，是对过去党员标准中那些最本质的要求的肯定和坚持，同时赋予党员标准以新的时代特色。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中，最早提出党员条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1847年建立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明确指出盟员必须具备7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承认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不得参加任何反对共产主义的团体等。”1929年12月，由毛泽东起草并经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决议）中，首次把党员的条件概括为5条，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又提出了共产党员必须“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这个党员队伍建设的总的目标要求，并对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要求。他强调共产党员要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远见卓识的模范，学习的模范；还要求在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1939年5月，陈云将共产党员标准概括为6条，并指出：“只有具备以上的6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才不致法污了这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的称号。”这6条，实际上是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目标要求的具体体现，因而是对毛泽东关于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这一重要建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二 党员标准内容的科学概括，是对党员队伍建设的目标要求

共产党员应该具有怎么样的形象，这是党员队伍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陈云在1939年6月关于《党的支部》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员必须是不惜牺牲个人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自觉的战士”的科学概念。这句话，集中概括了共产党员标准的主要特征，鲜明地指出了共产党员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从本质上反映了共产党员的形象。能够自觉地不惜牺牲个人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是共产党员从思想上入党的集中体现，是共产党员区别于一般群众的重要标志，也是党员队伍建设最本质的目标要求。

党员标准作为党员的行为规范，必须具有适应的广泛性的特点，无论教育管理现有党员和发展新党员，以及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的党员都应适用；同时还应具有表述准确、言简意明，便于操作和掌握的特点。

陈云提出的共产党员的6条标准，就是对共产党员要求的规范性和适应的广泛性的有机结合。这6条标准是：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

共产党员之所以必须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这是因为“共产党是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因此，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的人生观。”也就是说“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如果共产主义信念动摇，或者空喊共产主义而不为之奋斗，就不能做共产党员。

（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共产党员之所以必须坚持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是因为“我党是以彻底解放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全中华民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力职志的政党，因此，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与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员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党员的利益同民族的、人民的和党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而不能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陈云特别强调，“党不仅要求每个党员懂得这一条，特别是要求每个党员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坚决地毫不疑撼动摇地执行这一条。”否则，就不能做共产党员。

（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

遵守党纪之所以要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是因为“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全党严守党纪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和最高的责任。每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陈云严肃指出：不愿意遵守纪律的党员，害怕铁的纪律的新党员，尽可出党；“一切破坏秘密工作的行动，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制裁，直到开除党籍。”

（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

党的决议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出的，是党的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反映。执行党的决议是遵守党的纪律的表现。真正遵守党的纪律，就是要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陈云要求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只有具备这样坚定和顽强的英雄气概，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11)如果不忠实于或不执行党的决议，就不配做共产党员。

（五）群众模范。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在于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自己起来革命。陈云指出：“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党组织的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12)，对待人民群众的好坏程度，也是“鉴别谁是真正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谁是别有企图混入党内的坏人”(13)的重要标志。“群众常常根据我们党员的行动来测量我们的党，

所以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加敬重我党。”(14)因此，谁要是严重损害和破坏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

(六) 学习。

为什么要把学习也作为一条党员标准呢？陈云指出：“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共产党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这样“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15)自称高明而不愿学习，是不能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

陈云在延安时期概括的共产党员6条标准，言简意明，科学准确，抓住了信念、宗旨、纪律、模范、学习等党员素质和党员作用中最本质的核心问题，因而使党员队伍建设进一步明确了目标。

三党员在实践中的言行一致，是党员 标准的行为体现

从一个非党积极分子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个质的飞跃的过程，就是按照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规范自己行为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努力从思想上入党的过程，是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过程。这就要求共产党员不仅要懂得什么是党员标准，做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必须具备这些标准，而且要身体力行，时刻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在这里，能不能做到言行一致，成了能否真正成为名副其实共产党员的关键。

陈云在延安时期关于党员标准的论述中，曾突出强调了“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他说：“我们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言行一致，我们共产党内也不允许有对党言行不一致的党员，不允许任何党员对党讲一句假话。我们绝不能象剥削阶级政党那样，党员可以说假话，鬼话连篇，欺骗人民，”(16)“因此，在党员面前放着这样一个问题：你要做一个好党员，就要与自己作斗争，经常以正确的意识去克服自己的不正确的意识。这个思想上的斗争和斗争中的胜利，就是自己思想意识上的进步。自己不跟自己的错误意识作斗争，偷偷地容忍自己错误意识存在着，则错误意识就会发展，结果越错越远，终究会离开革命的队伍”。陈云着重指出：“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这是党规定的。违反了这一条，就是违犯党的纪律。”(17)

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或者经党中央批准和同意的党员标准，是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遵循的准则和规范。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承认党员标准，在实践中却不付诸实现，那就是言行不一，理论和实践脱节，言论和行为相背离，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就会玷污共产党员这个伟大而光荣的称号，就不配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对于这一点，刘少奇曾作过精辟而

深刻的阐述，他说，“这种‘口头’与‘行为’的矛盾事件，在我们中间实际是太多了，然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实质的问题，是他们不会把原则与实际问题联结起来，不会在实际工作中去活泼地运用他们”。要克服这种现象，就必须“把原则与实际问题联结一起”。(18)

陈云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论述是在延安时期作出的，距离今天已有 50 多年。50 多年来，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任务也同过去有所不同。因此，党员的标准应当结合时代的特点，作出一些新的表述。但是，我们党的性质没有改变，党的宗旨没有改变，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没有改变，因此，党员标准中最核心的那些内容也没有并且不可能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在延安时期关于党员标准的论述便不会过时，而且应当继续对今天加强党员队伍的建设发挥指导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注释

(11)(12)(13)(14)(15)(16)(17)《陈云文选》第 1 卷，第 129、132、129、144、137—138、138—139、139—140、140—141、156、165、141、142—143、201、20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72 页。

《中国共产党建设全书》第 4 卷，第 376 页。

《毛泽东选集》（2 版）第 2 卷，第 522 页。

(18)《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 页。

重温陈云《学习是 共产党员的责任》

王志远陈作珊

—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写于1939年12月，收入《陈云文选》第一卷。在文中，陈云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阐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学习，党员领导干部为什么要带头学习，以及如何进行学习等问题，解决了广大党员在学习马列主义过程中存在的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问题。这篇文章当时有力地指导了马列主义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只有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这是为无数实践所证明的真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马列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较短，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它、研究它只有三五年时间，党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掌握和运用，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党内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人不多，能够运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人更少，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很低。因此，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党曾一再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使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

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使得革命逐步走向胜利。但由于战事频仍，没有时间在党内进行系统地马列主义教育；新发展的党员中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老党员中工农出身的占大多数，缺乏文化知识等等，广大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仍没有大的提高。所以，在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解救民族危机，我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的形势下，党内一些同志看不情形势，迷失了方向；更有甚者，犯过严重“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又站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鼓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造成党内的思想混乱。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党所肩负的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大历史使命是不相适应的。加强党员的马列主义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已成为摆在全党面前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因此，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党员的学习问题，明确指出：一个指导“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从此，党内学习马列主义的活动开展起来。然而，一些同志对学习理论的意义认识不足，只把学习当作任务而未看作是党员的责任，又加上处于战争环境，工作紧张，故而在党员中间存在着忽视学习的倾向。为了纠正这种倾向，引导党员深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陈云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写了这篇《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二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主要有：

（一）共产党员学习理论的重要意义。

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在思想的支配下才发生的，能不能树立学习的自觉性，关键在于解决“为什么学”的问题。学习的目的越明确，对学习的意义理解得越深刻，学习的自觉性就越稳定、越牢固。陈云指出：“我觉得对于学习的意义认识得不够，是决定我们能否下决心学习的关键。”因此，共产党员要充分认识学习理论的重要意义。关于学习理论的重要性，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说：“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

（二）学习对于共产党员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党在各个时期总任务的完成，都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一个个环节。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员肩负的历史使命，为完成党的总任务而勤奋工作，是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只有通过党员的勤奋工作，才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才能实现党的总任务，实现最终奋斗目标。但是，仅有工作的热情和干劲是不够的。有热情而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会导致盲动主义，注重干劲而忽视理论的提高会导致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在历史上都严重影响了革命的进程。所以，共产党员要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不仅要勤奋工作，更重要地在于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具有过硬的本领，以搞好本职工作；要有坚定的信念，以保持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做到这些，都需要党员学习革命理论、学习专业知识。陈云指出：“我们好多同志总认为只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就算尽了我们党的全部责任，这种想法是很不全面的。”他要求“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只有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才是完整的，工作才能得到不断改进。

（三）党员领导干部在学习中的应起的作用。

文中特别提出了党员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的问题，精辟地阐述了领导干部加强学习的重要性。陈云指出：“因为你常常担负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你就更有责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这样，“对党更有利”。“因为你是老干部，有斗争经验，学习理论更容易把书本上的东西消化成为自己的，这样，领导工作的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党要培养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干部，也首先寄托在老干部和高级干部的身上，老干部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因此，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努力学习，成为模范。

（四）学习应遵循的原则、方法。

一是循序渐进的原则，“要将现有的主要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既不是

弛怠，也不用着急，一步步来。” 二是熟读精思的原则，“每字每句都要读懂，不懂的就要认真请教。”(11)“不要一知半解”。(12)三是博专结合的原则，“一本书多读几次，逐渐增加参考书，逐渐加深理解，得益更多些。”(13)四是知行统一的原则，“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14)，“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15)

在文中，陈三还论述了几种学习方法。一是学习要做笔记，“这两个好处，一是让你多读几次，一是逼着你聚精会神，认真思索，使你了解深刻些，而不象随便看过去那样模模糊糊。”(16)二是学习中要讨论，“读书最好有个小组，几个人在一起讨论一下，可以互相启发，程度低的还可以得到程度高的同志的帮助。”(17)三是要制订学习计划，“要订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18)

三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从发表到现在已有 50 多年了。5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已实现了由不执政到执政，由战争环境到和平环境的转变，党员人数也由当时的 80 万左右发展到现在的 5400 多万。当前，我们党又处于领导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如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正确处理稳定与发展、速度与效益、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中心任务与部门工作关系，如何做到既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资金设备、管理经验，又不被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所同化；既大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又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保持高度警惕，又不因敌对势力的捣乱而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等等，成为了对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新的考验。要经受住这样的考验，需要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执政本领。但是，由于我们的干部队伍正处在新老交替的时期，大批新同志加入党的队伍，大批新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他们在专业知识和文化程度方面虽然有着明显的优势，有些同志也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然而相当一部分中青年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还较低或者原有的理论素养与他们担负的领导工作很不相称。有的同志虽然理论素养较好，但面临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仍需要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有许多不懂得、不熟悉、不精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认识它、了解它、掌握它。因此，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学习，不仅抓紧学习政治理论，学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抓紧学习经济知识，学习现代科学文化，学习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只有这样，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执政本领才能得到大大的提高，才能处理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矛盾，从而大大提高执政党的领导水平，经受住各种考验。这便是我们今天重温《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注释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第533页。

(11)(12)(13)(14)(15)(26)(17)(18)《陈云文选》
第1卷,第187、142、187、187、188、188、188、188、189、189、189、
189、189、189、189、189、189页。

论陈云关于党员必须加强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思想

谭献民

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加强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思想，是陈云党建思想的显著特色之一，也是他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特殊课题之一，也是他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杰出贡献。

陈云在 1939 年 5 月和 12 月撰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等文章中，根据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条件和所担负的历史责任，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必须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是共产党员党性的内在规定和内在要求，是衡量共产党员党性觉悟高低的基本标准。之所以如此，是由如下两个根本原因所决定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条件，使得党员队伍整体的理论素质和文化素质较低。陈云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原则创建的。“党在开始成立时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便对李汉俊的合法主义的孟什维克的观点作了斗争，根据列宁的原则，奠定了党的建设之基础。”因此，它没有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是马屯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的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年来的斗争中之所以能成为英勇奋斗的强大的党”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国家”，这就决定着党的建设主要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党的发展对象是“广大的、贫苦的、革命的农民群众。”他们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地位虽然决定他们愿意拥护共产党，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帝反封建作坚决的斗争，但由于“遭受种种压迫和剥削”，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理论素质是很低的。即使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城市产业工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压迫和剥削，其文化素质和理论素质也较低。因此，党员队伍的绝大部分是“文化程度低的党员”。加之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投入中国革命的火热斗争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不够，这就使得提高党员队伍的理论和文化水平的历史任务更为迫切。

第二，中国共产党担负的历史使命异常艰巨。陈云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最高纲领）是要在中国和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这一“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中国要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党心须“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不然也就不能规定当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即不能担负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而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是实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事业领导权的先锋和模范，因此必须加强学习，“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特别是党员队伍的整体理论和文化水平较低，这是实现党的领导的一个巨大的障碍，“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

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①，以完成中国革命所赋予的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这既是党的殷切期望，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上述分析表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党员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但是，由于过去革命环境的原因，一些党员干部往往重视理论学习，而忽视文化科学的学习。正是针对这种偏向，陈云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等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文章和讲话中，较为深刻和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员加强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4个重要意义。这4个意义是：

一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是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需要

陈云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战斗性，就在于它指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因而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能够解决中国革命斗争中的方向、路线、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水平。为此，“党要培养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干部”^②。但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所决定，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必须而且只能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客观规律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视角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客观规律，是从理论到实践的理解，而从变化多端的历史知识的视角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则是从实践到理论的理解。显然，后者的理解更为深刻具体，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只有加强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文化科学知识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陈云指出：“学文化不仅是识字，还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包括历史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等等。”^③他还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克服只愿做党务工作，不愿做经济技术或其他工作的倾向。”^④由于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最终依赖文化科技水平，因而每一社会形态内部敌对阶级的斗争与较量，往往是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斗争与较量。这一“斗争”与“较量”，首先表现为抢知识分子。陈云说：中国“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因此，我们“抢得慢就没有了。”^⑤而“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⑥其次，它表现为剥削阶级禁止和压抑人民群众学习和掌握文化科学知识，表现为人民群众为着自身利益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总结各种斗争经验所形成的实践经验知识，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学习和掌握各种文化科学知识，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到这一“斗争”与“较量”之中，一方面“要随时随地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在革命战争年代还“要学习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以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学习群众的实践经验，以便领导人民群众更好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和群众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课本。”^⑦(1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文化，就不可能学懂政治”。^⑧(12)

二 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是提高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

陈云认为，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中提高的。在这个“提高”的过程中，关键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需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因为，马克思主义教“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化程度，要学懂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的。”(13)这里包括三层相关的含义：

第一，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需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结晶。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加强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才有助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下是背诵教条。”(14)所以，“没有一般的知识，那马列主义也不容易消化、掌握和接受。”(15)例如，没有中国历史的知识，你就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以，党的高级干部“现在无论怎样忙，为了把握伟大而又变化多端的中国革命运动，必须增加一点革命的理论，增加一点历史的知识。”(16)

第二，反对教条主义需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陈云特别强调：“不要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不是不读书”，恰好相反，既“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一般知识也需要。”(17)教条主义者所以下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专门知识。他们“虽然认识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但是没有认识中国社会的许多具体特点，并根据这些具体特点来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例如：对于民族矛盾的首要地位长期没有足够的估计，把国内阶级对立与分化，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等量齐观，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完全忽视和拒绝利用；对于在中国进行革命工作不容忽视的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完全不理；等等。”由于缺乏专门的社会历史知识，势心导致“用切断历史和生搬硬套的办法，把书本子上的抽象概念套到中国来，把生动的中国看成僵硬的中国，把复杂的社会看成简单的社会，把广大的革命工作园地缩小到寸步难移，把容易深入的社会变成格格不入。”(18)所以，缺乏文化科学知识是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教条主义错误思想泛滥的根本原因之一。陈云指出：“正因为我们的一般知识和理论知识少，文化程度不够，所以有些同志就上了人家的当，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虏。”(19)

第三，反对经验主义也需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经验主义者误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从而从局部经验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合之则取，不合则弃，使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变成他们主观主义的挡箭牌。所以如此，就在于经验主义者也是缺乏文化科学知识的，这使他们既不能学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不能将局部经验实现理性的升华。陈云举例说：现在白区有些党组织依据内战时期与国民党斗争的经验，视国民党为铁板一块的反动集团，从而忽视抗战时期在国统区与国民党又斗争又团结的工作，即只做群众工作，导致“完全忽视国民党内工作的错误。”为着纠正这个错误，而与国民党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大后方的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学

习各种文化知识，以便系统地研究国民党的组织，“不仅国民党的党部，而且它的政权、军事、经济、民运、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机构、制度、人物，都在研究之列。对于这种研究，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知识，而应深入其内部，并着重于本乡、本区、本县、本省国民党情况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依据中央的方针政策，“综合自己工作范围内国民党的情况，并定出与国民党反共统治作斗争，在国民党内部争取革命力量的办法，熟悉并利用国民党的各种矛盾”（20），争得本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通过举例，陈云指出：我们“要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克服经验主义，既要在思想方法上，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在党的路线上和政策上加强教育，又要扩充他们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经验，并使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者结合起来”（21）；而这两方面都离不开对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

三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是培养 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需要

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强调：共产党员的标准，第一就是“终生为共产主义奋斗”，即培养造就自己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他说：“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22）唯其如此，他才能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而不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党内有了这样为革命力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的党员，才能保证党胜利地完成革命”。（23）那末，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树立是否能够离开对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呢？这也是不行的。因为：

第一，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有助于党员坚定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心。陈云指出：共产党员“怎样才能建立和坚定自己的人生观呢？首先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前途。”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从而使共产党员“从他的阶级觉悟，从他的实际革命锻炼中，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中，深切了解到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懂得无产阶级的利益及其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洞悉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当前任务和根本目标。只有这样，他才能确定自己的人生观，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24）就是说，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是理性与自觉的人生观。而这种“理性”与“自觉”，只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文化科学知识学习的基础之上的。

第二，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更好地从事艰苦卓绝的实际斗争，并在斗争中坚固自己的共产主义人生观。陈云在谈到共产党员怎样才能建立和坚定自己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时深情他说道：“每一个党员应该深刻知道，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在弯曲险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和波折；在与敌人经常的斗争中，在每一事变的紧急关头，还有牺牲的可能。因此，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下怕牺牲，下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25）这个“决心”，也要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文化科学知识学习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这样两个“学习”，才能

搞好本职工作，“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26)，在逐步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之中，锻炼和坚固自己的共产主义人生观。

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是实现党对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领导的需要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就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向全党解释，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因此，“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27)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党的政治工作能否取得成效的前提和基础，所以，“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内的专门家学习。他们的责任是诚心诚意地学习，并熟练自己的业务和技术，使各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并使自己获得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28)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只有由外行变成内行，才能领导好本部门的工作，也才能能力本部门的工作人员所信任和拥护。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陈云受党中央委托前去东北根据地主持财政经济工作。他在1948年8月初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决定《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和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报告《当前全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中，极有远见地指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任务的完成，党的工作重心将会由农村转入城市，由领导革命战争转向领导经济建设，“工人阶级现在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将来还要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因为社会主义可以完全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生产力可以有更大的发展，全体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更高基础之上的，因而经济建设搞得越好，中国“就可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就越有可能胜利地走向社会主义。”(29)但是，“我们现在懂技术的干部很少，能管理工厂的干部更少”，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为此，要从党内“重视和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30)通过依靠“现在工作岗位上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并从“有经验有技术的工人和职员中提拔”干部，以及开办各类文化技术学校，直到“开办工业大学或者工业专门学校”等办法(31)，来鼓励和鞭策共产党员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从而实现党对新中国经济事业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更是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强调共产党员要加强对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他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提出：“工人阶级自己的有高度文化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今后一定会成长起来，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在成长。”目前，共产党员一定要向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近代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他们的生产技术和有用的经营管理知识，是我们所需要的。”(32)1981年5月，他

在《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文稿中指出：“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因此，“党应该重新作出大量吸收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33)1983年2月25日，他又在给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工震的信中提出：“党校学员既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以此作为主课，又要学习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必要的专业知识，以提高领导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34)

陈云关于共产党员要加强学习文化科学的思想，在党的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今天，在我们党率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中，这一思想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和宣传这一思想，从而使党的建设更能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需要。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注释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陈云文选》第1卷，第131、143、130—131、143、142、188、265、181、180、143、266、178、143、261、188、261、235、261、238、251、137、138—139、137—138、138、142、226、227、363、367、367—368页。《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32)(33)(34)《陈云文选》第3卷，第3、296、322页。

论 33 作为哲学家的陈云

王立胜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陈云，久已为世人所敬仰和研究；作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指挥艺术家的陈云，也久已为世人所瞩目和探讨。然而，作为哲学家的陈云，近年来虽亦为国内外某些学者所关注，但总的说来，研究得还是远远不够的。本篇无意于也不可能全面弥补这一缺憾，只是打算通过对陈云实践活动与哲学相互作用几个重要侧面的考察，以初步再现作为哲学家的陈云的哲学活动及哲学贡献，权作引王之砖。

一 哲学家陈云的哲学性格

“性格”这一范畴是心理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其本意是指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本文使用的“哲学性格”这一概念，是指蕴含在特定时代的哲学家的哲学活动、哲学作品、哲学思想中比较稳定的致思趋向及其思想表征的总和。其学理意义在于标示不同哲学家哲学活动及哲学思想的个性特征。提出“陈云的哲学性格”这一概念的用意亦在于突出陈云哲学的个性特征及其与他的实践活动的内在关联，以便于从更深的层次上把握陈云哲学的内在特点及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众所周知，陈云是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社会实践的实践家，他对哲学智慧的追求是服从社会实践的总要求的。正因为如此，陈云对哲学的学习和思考总是与自己从事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陈云的哲学理论成果也表现于他对实际问题的思考之中。他确实没有大部头的或专门哲学理论著作，但在他关于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著作中又无不体现出哲学智慧的光华，正象马克思虽然没有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但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一样，陈云虽然没有写出纯粹的哲学理论著作但却留下了渗透于其经济、政治等方面著作中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逻辑思考。这些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逻辑思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理性结晶，是更有用的活的哲学逻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陈云哲学活动的目的在于实践，其哲学理论的创造又根源于实践，其理论成果的表现又渗透于关于实践问题的理论著作中，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实践性格”来表征哲学家陈云的哲学性格。

具体说来，陈云哲学的实践性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精神特质方面看，陈云哲学的实践性格体现为一种应用哲学。在陈云的哲学视野中，无限、绝对的本体之“道”即存在于当下的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之中，存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因而，本体论和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融为一体的。他认为，一种哲学理论，既表征着一种宇宙观，一种价值观，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体系。于是，陈云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不是将自己的注意力投注于对这种哲学理论的纯粹的哲学本体论沉思，而是将这种理论视为科学指南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突出地强调其哲学方法论意义，陈云曾明确指出，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

背诵教条。陈云哲学的这种精神特质，使他的哲学创造极具浓厚的应用哲学色彩，形成了他的哲学思想同他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其他方面的具体思想浑然一体的思想特征，这种特征既存蓄了哲学走向生活之路的旺盛的生命力量，使哲学有了社会实践的深厚的创生土壤，又使社会实践的发展有了正确的逻辑规范，使具体的实际工作有了方法论方面的导向性基础。哲学的应用化、对象化和社会实践的理性化在陈云哲学的实践性格中融为一体，从而形成社会发展主体的内在创造机制并作用于社会客体以推动社会的合理性调整和发展性运行。

其二，从理论旨趣方面看，陈云哲学的实践性格体现为一种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他还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在这个问题上，陈云与毛泽东有着强烈的共识。1939年12月，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陈云强调指出：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老干部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来指导以后的工作。1940年11月29日，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中，陈三从干部教育和培养方法的角度又强调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性：革命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教育要一致起来。只停于实际，就不会有远大目光；只停于高远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和实际两者不能或缺。可见，陈云心目中的理论或哲学，决不是书斋中的学者出于追求纯理论的逻辑思辨而构筑出来的思想体系，而是产生于社会实践又反过来作用或服务于社会实践的有用的理论。

其三，从思维模式方面看，陈云哲学的实践性格体现为一种知行合一的致思趋向。陈云哲学真正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将知和行、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进行哲学思考，体现出了行对知，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意义，肯定行对知的支配地位，认为行的过程本身也就是知的过程。针对学习问题，他曾明确指出：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地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向群众学习。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和群众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课本。这段话把哲学思维的实践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毛泽东所说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的思路，别无二致。这种知行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还告诉大家：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是一个内在统一的过程。在陈云看来，一方面，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积极地投身于火热的社会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不是光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社会实践的内化过程，即社会实践内化、积淀于人们的主观世界的过程；另一方面，社会实践主体又有改造客观世界的自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的发挥即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是社会实践主体主观世界的外化过程。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就是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要客观世界按照自己的要求改变面貌。这样，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就在现实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获得了辩证的历史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并在两个改造的统一中不断前进的历史。陈云哲学的这种实践性格正是这种历史特征的理论反映。

其四，从价值理想方面看，陈云哲学的实践性格体现为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哲学。陈云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一员，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代表之一，他从事社会实践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在他的哲学思维中，人民群众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人民是他的政治哲学的核心。陈云哲学的价值指向就是人民，其哲学体系中的实践是指人民的实践，其哲学的实践性格最终体现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性格。

二 哲学家陈云对哲学本身的沉思

任何哲学家在进行哲学活动的过程中都会对哲学本身加以思考并形成自己对哲学本身的独特看法。作为哲学家的陈云，既然其哲学活动具有独特的性格，那么，在哲学活动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哲学观即关于元哲学的某些看法也就成为逻辑的必然。陈云的哲学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哲学本质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大部分哲学家都把哲学看作超越其它学术之上的大学问，把哲学活动看作大脑里的思想活动；认为哲学只是一种静观的精神鉴赏品，只能表明思想的此岸性、而无法突破理论的范围，更无法在客观世界的进程中表明自身的现实性；认为哲学存在的依据在于满足人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心理需求，而不是在于满足人们生存上的物质需要；认为哲学的特点在于说明世界的总体，其功能在于提供对世界的解释，而不是对世界的惊天动地的改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哲学本质的看法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陈云的哲学本质观突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论本质，充分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这一基本精神。陈云在讲到学习理论问题时明确指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

很明显，陈云把学习哲学和研究思想方法看成是同等程度的问题。当然，研究哲学不能完全归结为研究思想和思想方法，但突出对思想和思想方法的研究，的确很有见地，它抓住了学习哲学的关键环节。陈云对哲学本身的这种看法是他的哲学活动实践性格的理论体现，也是基于自身实践活动的迫切需要的逻辑阐释。

（二）哲学价值论。这个问题也就是哲学是否有用和有什么用的问题。“学好哲学，终身受用”，这是陈云作为党的优秀领导者对切身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精辟概括，是从主体的角度对哲学价值的充分肯定。陈云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结合自身学哲学用哲学的切身体验，从两个方面说明了哲学的价值。

其一，哲学有什么用。陈云所理解的哲学的用处，既不是把哲学看成是升官、发财和获取实惠的杠杆，也不是把哲学看成是心灵慰藉的精神寄托，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哲学对提高人类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重大促进作用，把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看成是对人类思维和实践能力及视野极限的挑战，看成是人类向知识和智慧更高境界进军的锐利思想武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云告诉大家：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毛泽东曾经指出：“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陈云长期担负着我国经济建设

的领导工作，是参与我国经济决策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写

了多重要的经济学著作，这正是因为他非常重视对哲学的学习，有着哲学家的头脑，能够使自己的思维和实践不断超越有尺限的限制的缘故。1981年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陈云通过回顾自己学习哲学的经验和体会谈了哲学的价值：“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下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作好，一定要实事求是。”陈云认为，正是通过学习哲学，使他掌握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其二，哲学对话有用。任何事物存在的价值或用处，都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主体不同，事物存在的价值或用处也就不同。一般他说，哲学的价值或用处，取决于人的思维活动层次的高低，层次越高，哲学的价值或用处也就越大。当人的思维与活动处于钜具体、个别的层次上时，一般是不需要考虑哲学问题的。基于这种认识，陈云首先阐明了哲学对于作为认识和实践集体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价值或用处。他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作用。陈云的这一判断意在说明中国革命的胜利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陈云沉痛地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就是说，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质下高有关。因此，他一再告诫大家：学好哲学，对于任何工作岗位的同志，对于解决任何问题，都是重要的。他指出：“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陈云还特别阐明了哲学对于党的领导干部或决策者的重要价值或用处，认为不具备哲学头脑便不能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

这里仅举一例便可说明这一问题。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陈云主持北满分局的工作。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北满与全东北、全中国的政治形势都在急剧变化，到处是有待研究解决的新问题，各条战线上的方针政策急需重新制定，领导机关的任务很重。这个时候如何决策呢？陈云向同志们谈了他运用哲学思维进行决策的程序。他说：你们看到我整天忙于找人谈话、开会、了解情况、处理一般文件与日常工作，我并不累，因为那只是在实践中加深对事物的认识，还来不及对重大问题作全面、系统的分析；当你们看到我静下来了，既不找人谈话、开会、了解情况，也不处理一般文件与具体工作，而是一个人呆在这里，关起门来，总是走来走去的时候，才是最累的时候，因为那是在重大问题上集中精力对调查所得（包括集体研究的成果）作全面、系统的思考，是要花力气、下功夫、全神贯注的。凡是做领导工作的同志，都需要这样做，这是任何领导者的主要职责，不如此便不能引导大家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便不能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11)。正因为这样，陈云经常要求每个干部必须注重对自身哲学素质的培养。

（三）哲学发展论。哲学如何获得发展，这是元哲学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如果把哲学仅仅看作是独立于一切非哲学东西而存在的观念的东西，那么，哲学的发展也就仅仅表现为思想运演的逻辑流程。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哲学只有在与非哲学的现实活动的相互作用中才能给世界带来变化，

同时也给哲学的发展提供根本动力。哲学决不能仅停留于思维的领域之内，而是借助于实践使自身加以客观化和对象化，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的时代、自己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自身之中，从而获得不断发展。哲学的发展是以非哲学的现实活动力为前提的。

没有了实践也就没有了哲学，这同样是陈云的哲学观。陈云指出：“认识必须由实践中得来，而且只有经过实践，认识才能发展。”(12)对哲学发展问题的这种看法，使陈云非常重视总结实践经验在提高领导干部哲学理论素质方面的重要作用。在陈云看来，总结经验的过程也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使思想和方法更适合于客观规律的过程，也就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跃迁的过程，也就是哲学理论不断发展的过程。陈云反复指出，我们要提高本领，增加力量，就要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学习。1958年12月，他还提出了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的著名论断。陈云如此强调总结经验对于理论发展和实践进步的重要性，既是他领导经济工作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理论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事实证明，只要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就能够不断提高认识，不断推动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三 哲学家陈云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主要理论贡献

陈云在哲学理论方面的一系列创造，必然鲜明地体现着他的哲学的实践性格，同时也必然贯穿着他的哲学本质观。纵观陈云的著作，不难看出，陈云以实践为内在基础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一系列哲学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推广，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他以实践为基础，在理论形态上实现了以下环环相扣、层层递嬗的三个重要转换。

转换之一：招本体论层面上的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维）的关系转换为认识论层面上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陈云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就从未发生过动摇，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实际工作。因此，关于物质和精神之间谁决定于谁、谁根源于谁的本体论思辨，在陈云那里是不言自明的。进行哲学思考的任务就是把这一本体论或世界观作为逻辑前提并将其应用于实际工作中转化成认识论中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我们在陈云的著作中看到的一般只是关于认识论层面上主观与客观关系的思考，而不见对物质与精神关系问题的本体论沉思。这正是陈云哲学的伟大之处。因为，这种转换使哲学研究已经不再是那种远离实践内容的纯逻辑运演，而是同人们的现实生活发生了密切关联，同时又符合人类认识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哲学的应用和向可操作性方面的转化成为现实的可能。人们活动的计划是主观的，是由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人制定的，但这种计划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才能在实践中变成现实。基于对主观和客观关系的这种辩证思考，陈云指出：“要做到主观与客观一致。领导机关决定计划，执行计划，检查工作，都必须主客观相一致。”(13)为了做到主观与客观的一致，陈云一方面强调要把握客观情况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彻底无保留地打破主观主义、公式主义和生搬硬套书本上的概念的做法，同时还要求人们必须以正确的认识为指导进行改造

客观世界的活动，把人的自由的实现看作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协调一致的优化状态，看作主观与客观一致的检验和证明，他指出，自由是彼认识了必然。人们越是能够实事求是，思想和行动越是合乎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他们也就越能够发挥创造精神。这就是说，虽然客观规律是下以人的意志力转移的，但人们可以认识它并遵循它去行动，从而最终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转换之二：把认识论层面上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转换为决策活动层面上的政策与事实的关系。政策是主观的东西，事实是客观存在，正确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应当是准确反映客观事实的政策。当陈云的哲学思考具体化为对决策问题的研究时，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就立即转换为政策与事实的关系，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就转换为政策与事实的对立统一。陈云指出，制定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而要实事求是，“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14)“**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15)为了制定符合事实的政策，陈云主张要做到6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这6个字的主要意思就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艰苦的调查研究，在充分了解情况和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全面分析，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事实的政策。陈云对政策与客观事实关系的论述正是他关于主观与客观关系思想在决策活动中的具体化或对象化。

转换之三：把决策活动层面上的政策与事实的关系转换为决策执行层面上的“上”、“书”与“实”的关系。在决策问题上有个政策与客观事实的关系问题，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也有个政策和客观事实的关系问题。从动态的角度看，在这两个关系中，“政策”与“客观事实”之间运动的方向是相反的。前者是从“客观事实”到“政策”的过程，后者则是从“政策”到“客观事实”的过程。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前者是从实践到认识、从客观到主观的过程，后者则是从认识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的过程。在这两个关系里，“政策”是同一个，是连接两个“客观事实”的中介，而两个“客观事实”则是有差异的，因此，“政策”即便符合前一个“客观事实”，并不能由此断定它也符合后一个“客观事实”。所以，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还必须重新考虑“政策”与“客观事实”的关系问题。陈云把后一个关系概括为“上”、“书”与“实”的关系问题，并告诫大家在执行政策时要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从而正确地解决了这个关系。在这里，陈云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并不是说上面的话不要听，书本上的东西不要信。他只是告诉人们，上级的政策、指示、决议和书本上的理论都是根据下面的具体情况和实践经验制定和提炼出来的，一般他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能够指导全国或某个地区的工作。但是，它们毕竟是从全国或某个地区带有普遍性的情况考虑的，在贯彻执行中，必须把它们跟当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提出适合本地情况的切实可行的贯彻措施。决不能因为是上级的指示或书本上的东西，就不加分析地盲目地生搬硬套。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上级的政策和书本上的东西，毕竟不是本源的东西，它们虽来源于实践，但还必须随时接受实践的检验。“上”和“书”都是第二性的东西，只有“实”才是本源的、第一性的东西。所以，“上”和“书”都不能“唯”，只能“唯实”。但是，“唯实”又不能理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因为它是受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书本知识指导的。“不唯上、不唯书”与“只唯实”的辩证关系恰恰是主观与客观、政策与客观事实的辩证关系在

贯彻和执行决策过程中的具体化。

通过上述三个转换，陈云哲学以实践为基础和中介，将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决策理论融为一体，为研究和解决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注释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357 页。

《毛泽东选集》（2 版）第 1 卷，第 292 页。

《毛泽东选集》（2 版）第 3 卷，第 815 页。

(12)(13)《陈云文选》第 1 卷，第 252、252—253、220 页。

(14)(15)《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46、362、362、285、285、235、188 页。

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 1986 年版），第 167 页。

(11)参看金铁群，《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回忆陈云同志兼任北满分局书记时的工作情况》，载《理论与实践》1981 年第 9 期。

学哲学是全党思想提高、认识 统一的根本

——陈云提倡干部学哲学的论述及其重要意义

王正萍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在理论上，他不仅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党建理论家，而且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陈云哲学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他把哲学的理论思维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内在完美地结合起来，体现了学与用、知与行、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其丰富的内容，不仅表现在他创造性地提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15字原则上，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经济思想体系、党建思想体系以及政治、军事、文化思想中，都始终内在渗透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创造性运用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实事求是的楷模。陈云反复倡导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好哲学的论述，是他亲身经历的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对于我国新时期全面、准确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陈云一贯重视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他认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而真正做到掌握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又必须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他反复倡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这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他从自己的切身体会语重心长地指出：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他认为，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陈云的这一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恩格斯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毛泽东不仅要求高级干部要学哲学，而且主张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的思想武器。陈云强调干部学好哲学，反复强调的就是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陈云提倡干部要学好哲学的思想，在我们党的不同历史时期，曾经针对当时情况反复论述过。在延安时，毛泽东曾三次同他谈，要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派教员帮助学习。陈云在中央组织部带了一个学习小组，坚持了5年。陈云还把毛泽东从井冈山起到延安写的主要著作和重要的电报认真地读了一遍，受益很大，认为自从学习哲学以后讲话做事有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可以说终身受用。陈云说过，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从那以后，陈云从自己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中，科学概括出领导与指导工作所应该遵循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唯物主义科学态度和“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的科学方法，坚持身体力行。同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头，他总是反复地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党的领导干部学习哲学，要求通过学好哲学，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水平，在工作中少犯错误。1947年2月，陈云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有些同志对敌后斗争形势估计上的错误，提出要学习哲学，避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才能少犯错误。1957年1月，陈云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的讲话中，从领导方法的角度主张：“在我们的工作中，建议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口号。否则，工作的盲目性无法改变。我们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带有原则性的领导方法的错误”，并强调要把学习理论，首先是要学哲学，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作了《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讲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和中央以及省市一些领导人谈话中，仍多次提倡学哲学，强调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陈云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会最深的就是实事求是。因此，干部学习哲学，就是要求做到实事求是。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承认实事求是并不难，问题是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却并不那么容易。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陈云概括为15个字，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15字原则是陈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科学概括，是对实际工作中如何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创造性发展。

按照陈云的切身体会，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中要做到实事求是，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解决一般原理、原则和具体实践的关系，解决片面的实际和全面的实际的关系，以及弄清情况和决定政策的关系。

第一，原则不是问题的出发点。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来说，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要有理论、原则的指导，否则就陷入盲目性。但是，要具体认识问题，却又不能从理论、原则出发，而必须从实际出发。陈云概括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原则，就是解决一般原理和具体实践关系的彻底唯物主义原则的科学概括。按照陈云的解释：“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

这是最靠得住的。”有的人把陈云的“不唯上，不唯书”理解为不看文件不读书，不执行上级指示和不要理论的指导，这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陈云是非常重视和提倡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认真学习、研究贯彻上纵指示的。但是我们在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和把理论的指导转化为实践的时候，就必须从具体实际出发，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行，而不是不根据实际情况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也不是从某一理论原则出发，生搬硬套去剪裁现实。从唯物论的原则来说，上级的指示、文件，书本上的原理、原则，如果是来源于实践，并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它是正确的，那么它对新的实践就可以起指导作用，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避免工作中的盲目性。但是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和执行又必须和当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是机械地照搬。书本、理论、文件、方针、政策，对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不是研究处理问题的出发点。研究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只能是实际。恩格斯说过：“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

第二，关键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处理问题，既是唯物论，又是辩证法，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但是为什么有些同志的主观愿望也许是想从实际出发，而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呢？陈云精辟地指出：“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有些同志不花时间去弄清楚全面情况，弄清楚事物的本质，而是看到一些现象，就想当然，发议论，作结论，这是十分有害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在这里，陈云极其深刻地揭示了片面性、表面性是主观性、主观主义或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源。这是对列宁关于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的原理的创造性发挥。列宁说过：“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因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而是无限地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引到唯心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所以，列宁指出：“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陈云指出：“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11)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看问题的片面性而达到全面性呢？陈云概括为3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交换、比较、反复”这6字原则，是陈云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创造性发展。列宁在论述辩证思维方法时，把“考察的客观性”，“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作为辩证法的首位的要素，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12)如何达到全面性呢？列宁认为，要抓住对立面的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要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

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把世界一切过程当作矛盾的统一体来分析和认识。陈云提出的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方法,就是揭露矛盾,分析矛盾,研究矛盾的发展及其向对立面转化的方法,是防止和克服认识片面性达到认识全面性的有效方法。这6个字作为辩证思维方法的范畴,既明白通晓,便于把握,易于操作,又十分科学,内涵很深。在层次上,也是逐步深化的。

交换是考察、认识一个具体事物本身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其实质就是把任何一个事物和过程当作有正、反两方面以上的多种联系的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和把握,揭露事物矛盾的各个侧面,使认识从片面达到比较全面。比较则是进一步分析矛盾,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达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事物的本质即内部联系,并通过分析、比较,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作出比较科学的决策。反复则是进一步分析矛盾的发展及其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的转化。由于人们的认识不是直线,而是近似螺旋的曲线,认识上的反复过程,是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事物内部都包含的正面与反面,有利与不利,顺利与困难等互相对立的因素。这些因素,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活生生地可变的。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认为正确的东西,由于条件的变化,可以变成不正确的。这在认识上就需要出现反复。同时,人们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有时看到有利方面多些,而对不利的方面则看得少些,或者相反。通常在一定的条件下考虑问题往往有一个侧重面,认识的全面性就是要求从各个侧面都充分考虑一下。这种考虑有时候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决定问题,特别是比较重大的复杂问题的决策,就要留有反复考虑的时间,不要马上匆忙地作出决定,也就是列宁说的,要把握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以达到全面性的要求。这就是古人说的要“三思而后行”。用辩证法的范畴来说,就是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的反复,使我们的认识和决策更正确,更符合实际、更科学、更可靠。在决定了对策以后,还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再认识,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

陈云概括的“交换、比较、反复”,正是科学地揭示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揭示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不断深化的方法,是使认识从片面到全面,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认识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重要贡献。

第三,用90%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

陈云认为,要做到实事求是,领导机关制定政策,最重要的是把实际情况弄清楚。要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下列10%的时间就够了。这一原则,意义非常深刻,非常重大,是关系到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关系全党的作风的重要问题,是对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思想的创造性发挥。讲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如果离开调查研究,则实事求是就会变成空话或套话。调查研究也有不同的调查法,有的粗枝大叶,走马观花,也是一种调查研究。但是,我们要真正弄清真实情况,只靠走马看花、粗枝大叶是远远不够的。不仅在时间上,要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而且在方法上要采取多种形式的切实有效的方法。陈云提倡高级干部要带头学哲学时,不仅强调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根据他的亲身体会,还总结出调查研究的有效方法。1990年,陈云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怎样做到实事求是问题时就说过:“搞调查研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亲

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两种调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13）

在青浦调查中，小蒸公社当时有15个养猪场，陈云去了10个，亲自看了农民私养的猪，并召开了几次座谈会，然后又向嘉定地区、苏州地区若干公社的干部进行调查，既解剖了一个点，又联系到各个面。最后得出结论：私养母猪比公养母猪养得好。这一基本情况弄清楚以后，便很容易作出正确的决策，即决定大部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这就是陈云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无数生动例证之一。

陈云在讲到领导机关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决策时，强调指出：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

三真要做到实事求是， 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

陈云提倡干部学哲学的思想，其目的是要求广大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问题。这是提高全党干部和党员队伍的政治素质和革命觉悟的根本，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学习和把握的最重要的东西。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研究马列主义，“就要真正能够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14）陈云对此作了创造性发挥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三者既有区别，又是互相密切联系和统一的。

所谓立场，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通常指阶级立场、政治立场，是指立足于哪个阶级的地位，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说话办事，也就是毛泽东经常说的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从广义来说，立场也指人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具体立场，这里有根本对立的敌对阶级的立场区别。在人民内部，有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的立场区别；在劳动人民内部，由于存在个人、集体、国家（全民）三者之间的矛盾，所以也存在着个人主义立场和集体主义立场的区别。解决的办法，就是坚持马列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立场，反对和克服个人主义的立场。党风问题上的以权谋私、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等脱离群众的错误思想和作风，其思想根源都是个人主义。如果遇事都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看问题，就不能很好掌握辩证唯物的观点方法。所以，从立场、观点、方法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说，立场是基本的首要的，对于立场还没有很好解决的人来说，学哲学首要的是解决立场问题，要克服个人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对党员来说，还要解决好个人和党及群众的关系。陈云指出：“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说不能这样看。”（15）陈云

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任何英雄好汉离开了人民群众都将会一事无成。从党和个人的关系来说，任何个人的作用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从党和群众的关系来说，党是领导群众前进的，但是党也必须依靠群众，党如果能够正确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依靠群众力量是能够对历史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如果党脱离了群众，则同样是一事无成。所以，归根到底来说人民群众的因素应排在第一位。党的领导作用，排在第二位。然后才是个人。所以，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原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灵魂。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滋长了个人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出现了脱离群众的倾向。陈云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尖锐地指出：“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大个人主义。”⁽¹⁶⁾陈云指出这种个人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提醒全党在胜利的国家里和物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要不忘革命，防止腐化，关键是几百个高级领导干部头脑要十分清醒，千万不要“伤风”；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一些党员经受不住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极端个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陈云及时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强调关键是解决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主要是立场问题，包括阶级立场、政治立场和个人主义立场问题；立场问题解决了之后，最要紧的，就是解决思想方法问题。陈云强调学习哲学，学好哲学，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

四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陈云关于干部学哲学的重要论述，对于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他关于“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的论述，对于解决当前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对于加强新时刚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作风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水平，加强党员的党性锻炼，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学习哲学，并列若干专题，请专家辅导，结合实际，边学边议，给全党带了一个好头。

陈云关于干部学哲学的思想，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我们学习他的光辉实践、伟大人格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真正学好哲学，就是我们对陈云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卷，第 15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 卷，第 118 页。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 卷，第 443 页。《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45 页。

⁽¹¹⁾⁽¹³⁾⁽¹⁷⁾《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45—46、360、371、46、371、372—373、362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 卷，第 74 页。

- 《列宁全集》第 55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11 页。
- (12)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 卷，第 453 页。
- (14) 《毛泽东选集》（2 版）第 3 卷，第 814 页。
- (15) 《陈云文选》第 1 卷，第 346、293 页。
- (16) 《陈云文选》第 2 卷，第 231 页。

陈云经济哲学研究

徐景祥

陈云的经济哲学，就是陈云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中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就是贯穿于陈云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始终的经济唯物论、辩证法和发展的观点，是陈云经济思想的哲学精华。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逻辑学、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应用于经济科学一样，陈云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论、辩证法和发展的观点，都很好地应用和融合于他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在已经出版发行的《陈云文选》三卷中，几乎篇文章都闪耀着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光辉。其中有许多经济文章同时也是哲学著作。陈云之所以有那么多至今看来仍然具有强大持久生命力的观点和主张，就是因为它的底蕴是永放光芒的哲学精华。陈云经济哲学，无疑是陈云经济思想、经济主张、经济实践中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下功夫加以研究、发掘、阐释、应用和光大，使之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正是为了这个宗旨，本文对陈云经济哲学的丰富内容，作一初步研究。

一 以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实在可靠为特征的经济唯物论

1. “基本国情论”。

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首先弄清基本国情，吃透基本国情，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这是陈云经济唯物论中的第一个重要观点和主张。离开了基本国情，就离开了唯物主义，就必然犯各种唯心主义的错误。

陈云说：“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一百多年来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经济的落后状态。”他又说，“我国农业经济比重很大，农业生产和财政收入有很大关系……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是很大的。”因此，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就很难发展起来。陈云还说：“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过程中，始终格外重视城乡中场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力图以此解决中国众多人口的民生问题。

陈云还有许多关于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必须弄清基本国情，必须符合基本国情的论述，这是最本源的东西，是决定我们的认识和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计划等等是否正确的唯物主义基础，例如，我们建国后的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之所以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繁荣生产，发展经济的目的，其根本原因是由当时5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再如，陈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发言中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应适当变更国家计划管理方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的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也是由当时的国情所决定的。他

说，这样做决不是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去，而是适合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国家市场上存在着的若干问题。

所有这些，都是陈云反复阐明的经济建设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的根本原则的重要性和不可动摇性。实践证明，离开了这条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就要犯脱离实际和超越阶段的唯心主义错误，给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这样。因此可以说，陈云关于经济建设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的原则，是永放光芒的唯物主义原则，也是必须遵循的规律。

2. “量力而行论”。

“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这是陈云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陈云经济唯物论中又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和主张。陈云在领导和主持经济工作中，即使是被说成是保守主义甚至是右倾机会主义，也仍然一贯坚持和实施这项主张。他在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说，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5亿多农民和1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和市场，其他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和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年好起来。讲到这里，陈云意味深长他说：“同志们，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非常明显，陈云把经济建设要不要量力而行，建设规模要不要与国力相适应，经济计划要不要先顾民生，提到重要国策的高度，提到关系人民政权会不会丧失掉的高度。这是陈云总结和纠正我国最大的一次超越国力的大冒进的惨痛教训而得出的重要结论。为什么一再强调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却一再出现超越国力，脱离国情，“左”倾冒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反复折腾的错误呢？究其原因，除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外，主要是思想路线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怪。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了量力而行的原则，超越了国情国力的界限，什么时候的经济建设就出现大的冒进、大的混乱和大的损失。量力而行原则是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国策。是一条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不例外。

3. “唯实求是论”。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陈云在延安时期经过认真研究和反复思考提出来的。“唯实求是论”，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具体化，是他在经济工作中始终坚持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领导方法。在主持和领导财经工作期间，他一贯坚持和具体运用这一唯物主义的原则，因而正确地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陈云

仍在谆谆教诲浙江省党政军领导同志，要很好地坚持这一唯物论原则，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我们当前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真是太重要了。可以说，它决定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成败兴衰，因为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毛泽东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指出，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必须使我们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和措施等等这些第二性的东西，符合第一性客观规律。违反规律是不会见效和成功的。陈云领导财经工作之所以那样成效显著、功绩巨大、令人敬眼，首先是因为他认真坚持“唯实求是”的唯物论。他的许多经济观点和政策主张，都是建筑在实事求是的科学基础上的，因而至今放射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芒。

二以总揽全局、驾驭矛盾、把握适度为特征的经济辩证法

1. “抓住重点、照顾其他，统筹兼顾、把握适度”的经济矛盾驾驭法。

经济运动 and 经济发展充满了对立和矛盾。从它们的形成与表现来说，分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动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因为工作失误和处理不当而产生的人为矛盾和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矛盾三大类。从经济运动 and 经济发展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来看，它包含了许许多多纵横交错、纷繁复杂、各种各样的矛盾关系。我们党的经济工作或者经济工作的领导者，就是正确认识这些矛盾关系，采取符合客观规律的措施，妥善处理 and 解决这些矛盾，从而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步、快速高效的向前发展。

陈云熟练地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经济矛盾的大千世界里显示了高超的分析矛盾、把握对立、掌握适度、驾驭平衡、运用规律的领导艺术。他的真谛和奥妙就是抓住中心、重点、本质，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统筹兼顾，照顾其他，注意次要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从而掌握经济运动的运动规律。他说：“工作要抓住中心，照顾其他。中心为主，做到全局与局部的一致。”“工作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平均使用力量，瞎抓一气，必无成效。”对财政工作也应这样，“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如果面面俱到，便会一事无成。”

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内容和范围也很广泛，国营与私营之间、私营与私营之间、农轻重之间、各经济部门之间、内贸与外贸之间、地区行业之间、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之间，长期、中期、短期计划之间等等，都要统筹安排。例如，在调整公私关系统筹兼顾 5 种经济成分方面，他有许多精当的论述。他说：“我国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要统筹安排。只管国营不管其他，是会出毛病的。”因此，“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顾国营，不管私营的倾向；另一种是私营工业自己不想办法，坐待国家给办法的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陈云关于掌握适度，驾驭矛盾的辩证艺术，集中体现在他的综合平衡的理论和实践上。它的核心是把握适度，不打破平衡的界限，在一系列平衡中

求得稳步快速高效的发展。此外，在处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计划与市场、集中统一与分权放开、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经济效益与发展速度、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内含式扩大再生产与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方面，他都提出了正确看法和意见。有的在当时被采纳实施并取得了成效，有的则没被采纳，有的甚至受到误解和批评。现在看来这并不是重要的，最力重要的也是最需要我们学习的和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他处理经济矛盾的辩证方法。这是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功。在矛盾关系更为复杂且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掌握这个基本功更加重要和迫切。

2. “交换、比较、反复”的客观规律掌握法。

这是陈云为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而要求采取的辩证的方法，所谓交换，就是为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必须防止和克服片面性，办法之一就是多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对事物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认识。过去我们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所谓比较，就是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作比较。这样上下左右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所有的正确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所谓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大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决定。反复并不是反复无常，犹豫不决，而是决策的多谋善谋，深思熟虑。人们对复杂事物和客观规律的认识，往往不是一两次就能够完成的，必须经过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比较全面，由现象到本质的反复过程。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认识论，也是主观辩证法符合客观辩证法的过程。

我们只有坚持这种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才能认识和掌握客观经济规律。列宁说，真理是全面的。毛泽东说，有比较才能鉴别，只有反复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与此相反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弊病的思维方法，它割裂事物之间的联系，用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和处理问题，而经济工作却最容易犯这样的形而上学错误。虽然现在我们党已经纠正了过去的经济工作中的主体性的“左”的错误，但是经济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毛病仍然存在，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的条件仍然存在，特别是从事更为艰巨复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仍然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干扰，所以掌握和运用陈云这6个字的唯物辩证法，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九分调查研究，一分讨论决定”的正确政策制定法。

这也是科学正确的决策法。陈云说：“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他还说，“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下研究实际情况。”(11)一个是调查研究弄清楚实际情况，一个是根据研究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这两条概括起来就是，“调查研究，制定政策”。

那么，拿出正确的政策干什么用呢？处理和解决各种矛盾关系，促进经

济协调、健康、快速、高效的发展。他经常说，所谓政策，无非是处理各方面的关系。而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就是各种经济矛盾关系，它的核心与实质是经济利益的矛盾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这样。为此，必须掌握调查研究的基本功。经济工作的领导职能，就是“调查研究，制定政策”这8个大字。为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必须首先搞好调查研究。要搞好调查研究，一是要虚心地、经常地、深入地进行实地调查，掌握直接的、全面的、真实的、系统的、质量和数量上充分够用的实际材料。二是一定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用此指导调查，特别是研究工作，否则是得不出科学成果，制定不出正确政策的。陈云就是这样进行调查研究的楷模之一。例如，在制定和执行“一五”计划期间，他始终坚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所以“一五”计划比较从实际出发，比较符合国情，比较科学。在执行“一五”计划过程中，特别是对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他大都是亲临现场，调查研究，一个一个地摸索情况，解决问题，因而“一五”计划取得了辉煌成就。

陈云在制定政策、编制计划、解决问题之前总是进行调查研究。1959年，毛泽东请陈云落实当年的钢铁指标。当时冶金部提出3个指标，陈云经过3个月认真调查研究和反复测算比较后，向中央建议，1959年的钢产量只能落实到比较可靠的1300万吨，这是最低指标。在当时头脑发热、“左”倾冒进、指标越高越好的形势下，没有大无畏的求实求是精神是不敢这样做的。陈云先后做过工业调查、农业调查、交通运输调查、财贸调查和市场调查等等。1979年，他不顾年高体弱到上海进行了宝钢建设的调查研究而得了肺炎，这种身体力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精神多么感人。

三以持续稳步、综合平衡、快速 高效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新观

1. 持续稳步的发展观。

陈云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10亿人口，8亿农民，底子很薄，经济落后的大国搞经济建设，不可能一下子就出现一个什么大跃进，创造什么惊人奇迹。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长期艰苦奋斗，持续稳步地向前发展，这是实在可靠的唯物主义的经济发展观。而急于求成，头脑发热，不顾国力，超越现实，急躁冒进，盲目飞跃，不但欲速不达，而且造成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陡升陡降、经济混乱、社会动荡，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和倒退。显然这是一条危害极大的唯心主义的路线。陈云说，经济稳定不稳定的界限，是建设规模与国力是否适应，两者适应经济就稳定，超过国力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反复折腾危害极大，只有稳定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只有持续发展才能踏踏实实地前进，只有持续稳步地发展才是实在可靠、快速高效的发展。这样的发展看似较慢实际最快，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持续稳步发展的原则。实际上，这也是一条不能违拗的经济发展规律。1953年的小冒、1956年的中冒、1958年大冒、60年代中又大冒和后来的“洋冒进”以及经济过热等等，都反复证明了违犯这条规律就要受到惩罚。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每一次较大的冒进，都是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

都伴随着通货膨胀的混乱。建国以后发生的4次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都是与冒进俱来的。这是对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都危害极大的经济危机。陈云说：“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问，也是一种通货膨胀……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12)陈云还说，1950年3月之前，中国人民遭受了10多年恶性通货膨胀的痛苦。实践证明，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因此，采取赤字预算和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刺激和推动经济建设是不妥的，有害的，而解决和消除通货膨胀的根本之策，还是要回到量力而行、稳步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这对当前治理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更具现实指导意义。

2. 综合平衡的发展观。

陈云说：“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13)这是陈云关于综合平衡求得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观点的主要内容。早在1954年，陈云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明确主张国民经济要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他强调说：“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台比例的。”(14)。

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按比例平衡发展，或者说综合平衡求得按比例协调发展，它不只是计划经济的规律，而且是一切社会化大生产乃至任何社会经济中都客观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用什么机制和手段，来实现按比例、平衡协调发展的问題。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是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作用，来实现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平衡发展的。如果这个平衡破裂了，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了，即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不平衡超过了事物存在的界限，就要爆发引起经济和社会较大动荡和混乱的经济危机，经济发展就表现为停滞、衰退和滞胀。这也是一条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遵循这个发展规律，要求得国民经济能够按比例、稳定协调、快速高效的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搞好综合平衡。对于这一点没有什么疑义。可在平衡的原则、形式和时序等问題上，人们的看法和主张就大相径庭了。这就是所谓积极平衡还是消极平衡，按长线平衡还是按短线平衡，是事前就开始平衡还是事后才调节平衡，是非常紧张的平衡还是比较宽裕的平衡的争论。陈云的主张是：“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以使非常紧张的平衡不致于破裂。周恩来非常赞成这样的综合平衡，在陈云阐述他的综合平衡发展观时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15)然而，陈云综合平衡的正确主张，当时却被批评为右倾保守的消极平衡而下取。而主张按长线平衡，先发展后平衡的所谓的积极平衡，最大的问題就是根本不能实现综合平衡，结果是综合平衡一次又一次的破裂，经济发展一次又一次的停滞

和倒退。这样的错误决不能让它重现。

3. 快速高级的发展观。

在陈云的经济发展观里，其灵魂、核心和根本目的是，追求经济发展的优质、快速、高效。持续稳定和综合平衡的最终目的都是国民经济优质、高效、快速的发展。他说，多快好省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这个方针既要求争取速度，又要求保证质量。速度和质量，这两方面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他一贯认为，从国情出发的发展，量力而行的发展，持续稳步的发展，综合平衡的发展，有计划按比例求实效的发展，才是最稳健、最实在、最可靠、最快速的发展，而且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快速、优质、高效的发展。他一直在努力积累和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形式。他说：“摸索革命的规律，我们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建设的经验，也必须有两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才可积累下来。”(16)陈云在这里非常谨慎，他只是说建设经验，没敢说建设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要摸索出经济建设和发展规律，没有30年、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是根本不行的。无疑，陈云为探索这些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云多次说过，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我们研究探讨陈云的经济哲学的目的就在这里。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委党校)

注释

(14)《陈云文选》第2卷，第257、242、115、267—271、241—242页。

(11)(12)(13)(15)(16)《陈云文选》第3卷，第55—56、52、210、188—189、34、196、211、210—212、50页。

《陈云文选》第1卷，第220、221页。

论陈云经济决策 的方法论原则

黄为民

经济决策哲学原则，也可简称为经济决策哲学。经济决策哲学是指经济决策主体在决策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坚持的思想路线、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体现了决策主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陈云作为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的战略决策。他是我国经济建设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们党内理财的能手，是建国后财政经济工作的总管。”他的工作方法和实绩，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每当经济建设遇到挫折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总是请他出来，组成中央财经领导机构，由他主持解决问题。他总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任劳任怨地承担中央交给的任务。他十分重视总结经验，肯定成绩，找出工作中的不足，包括自己经济决策中的过失，力求改进，使各项决策做得更符合实际，以保证决策取得成功。

《陈云文选》三卷雄文，是他各个历史时期，历时 60 多年的经济决策实践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长达 60 多年丰富的经济决策实践活动中，陈云始终坚持着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一 主张“不唯上、不唯书”，坚持经济 决策的“唯实”性原则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陈云在 40 年代初，鉴于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历史教训，针对当时一些干部存在唯上、唯书，甘当上级指示、决议的“收发室”、“电话机”，愿做书本的奴隶等情况提出来的。

“不唯上”指的是经济决策不能只是照抄上级文件，机械地照搬上级的指示，必须是根据当时当地实际情况，贯彻上级的文件和指示：“下唯书”指的是在经济决策中，不能采取本本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照抄照搬本本，而是要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情、省情、县情、部门实际和单位实际结合起来。“唯实”就是指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一切决策要“适合于客观实际情况”，“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

陈云认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关键是唯实。不唯上、不唯书是唯实的前提和条件，唯实是不唯书、不唯上的表现。因此，必须解决如何唯实的问题。为此，陈云特别强调调查研究在经济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弄清事实，是正确决策的关键。“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他主张，“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要弄清事实，就必须作认真的、周密的、全面的、细致的调查研究。

陈云在作每项经济决策前，都作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60 年代初期，我国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恢复经济，克服经济困难。他到青浦等地

区作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活动。听了当地领导的多次汇报，召开了10多次专题调查会，在农民家中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直接了解农民的意见和要求。陈云为了验证青浦调查结果，又到杭州、苏州找了与青浦情况相似的嘉兴地区的嘉兴、嘉善，苏州地区的吴县、吴江、昆山的县领导和村干部一起研究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了解了养猪和自留地的情况。另外，还找了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萧山和无锡两县县委同志，调查了当地的种植情况，研究了农作物种植安排上的有关问题。最后，他还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这3个问题，同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的领导交换了意见，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养猪、农作物安排、自留地等三篇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和决策，被以后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当时所提到的“包产落实、超产奖励、多劳多得”等一系列经济决策和措施，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农村所恢复和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二 主张克服片面性，坚持经济决策的全面性原则

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全面分析得出来的，而“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这里说的片面性，就是观察处理问题时，不是从事物的总体把握矛盾各方面的特点，往往只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看不到另一个方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进行决策时，只考虑局部，不顾全局；只顾目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陈云说过：“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把片面的事实当作全面的事实，必然导致决策的失误。

经济决策的全面性原则要求，就是“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这里说的“多方考虑”，就是指经济工作必须联系地看问题，或者说系统地看问题，所谓“统筹兼顾”，就是说处理经济问题必须从全局出发，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和要求，权衡利弊，综合平衡。

全面性原则不仅要求在横向方面照顾到方方面面，而且还要从纵向方面贯彻到决策过程的始终。为此，必须做到。

第一，时刻把握住全局。经济决策必须有全局观点，国民经济各生产部门、各生产单位是互为条件，相互制约、互为前提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进行经济决策时下多方考虑、不去统筹兼顾，就会顾此失彼，甚至影响全局。经济决策必须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要妥善地协调和处理好经济中的各种关系。要处理好诸多复杂的经济关系，没有全局观念是根本不可能的。陈云经济决策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始终坚持从全局出发，通盘安排，统筹兼顾，瞻前顾后。

第二，用比较的方法，从全局出发，择优选用决策方案。要进行决策，必须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根据全局的要求来权衡利弊，择优选用。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遇到了对粮食的需要量是越来越大，而粮食来源不足，收购与销售之间的差额很大，造成全国粮食供应的严重困难。针对当时的情况，陈云曾设想多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如减少市场粮食的销售量、减少出口

粮、减少军队和机关人员的口粮、减少库存粮和储备粮等。但是经过分析比较，这些方案都不能实行。后来，他吸取其他人的意见，一共提出8种方案，并对这8种方案一一作了论证，比较它们的利弊得失。经过反复论证，中央和地方部认为，又征又配即统购统销是当时解决粮食问题最佳的可行的方案。

第三，实行决策实施跟踪研究。陈云不满足在各种方案的比较中选定的最佳方案，而是继续注意和分析决策方案实施过程中存在弊与失的一面，想方设法限制和防止负作用的扩大。1953年，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他提醒决策者要考虑到实施这一方案可能出现的问题。他说：“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他还提出，实行这一政策后为了不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不仅要给农民钞票，还要供应农民物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统购统销已为合同订购所代替。那么，如何运用全面性原则去评价当时的统购统销决策呢？一方面，必须看到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是由当时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实践证明是必要和正确的。因为物价稳定，是“一五”计划期间我国成功地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之一。而统购统销决策的实行，是创造物价稳定的决定性步骤。在当时的条件下，粮价稳定是整个物价稳定的关键。当时如果下采取这个决策，“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严重的供销脱节的混乱局面，以致牵动全面的物价波动，影响整个国家建设计划。”后来，我国遇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大的灾难，而在粮食问题上没有出现更加严重的局面，这与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随着生产的发展，它的弊端就日益表现出来。”它的弊端主要是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的作用，因而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工商企业经济核算的实施。因此，用合同订购代替统购统销，也是全局发展的要求。

三主张注意“左”、右两种倾向，坚持经济建设规模的适度性原则

“左”或右，从政治上讲，指的是背离正确政治路线；从思想上讲，指的是人们思想认识的片面性；从经济决策上讲，指的是经济建设计划的规模、速度与当时当地的财力物力不相适应的两种倾向。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的“左”和右，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决不能把它们混淆等同起来，更不能把思想上、经济上的问题，无限上纲为政治问题。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沉痛的。

经济决策上的“左”或右，指的是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和保守两种倾向。所谓保守是指思想落后于形势，对国情认识不清，对国力估计不足，制定的经济建设规模过小，速度过慢，指标过低，丧失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所谓冒进则是超越了我国的财力和物力，经济建设规模过大，速度过快，指标过高，欲速而不达，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经济大起大落，造成财力、物力的巨大损失。陈云在经济决策中十分注意纠正保守和冒进这两种错误倾向，并认为纠正“左”比纠正右难，也就是说纠正冒进比纠正保守难。1980年，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

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11)陈云认为，冒进就会出现经济混乱。建设规模超过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适度，经济就稳定，就发展。

度是哲学的一个范畴，指的是事物存在界限即它的质和量的统一。就是事物保持自己质和量的限度、幅度、范围，是和事物的质相统一的数量界限。只有了解和准确地把握住度，才能提出指导实践活动的正确决策。人们在一切实践活动中，都要掌握适度原则。经济决策的适度原则要求“建设规模的大小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即适度，不适应则不适度。不适度有两种情况：一是“过度”，即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超越了当时当地财力物力，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一是“不及”，即经济建设规模和速度落后于当时当地的财力物力，或是把财力物力都用于“高消费”，结果丧失经济发展上新台阶的机会。前者决策是“冒了”，后者决策是保守，两者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经济决策如何才能做到适度？它不仅是理论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实践中，陈云强调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正确处理好消费与积累的关系，也就是“吃饭”与“建设”的关系、安排好这两方面的物资和资金。第二，寻找国民经济发展最佳的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内部能按比例发展。第三，冒进的危害十分严重，且不容易纠正，经济决策要十分注意防止冒进。第四，经济决策不能跟随政治风向跑。经济决策最忌时而大上，时而大下的折腾。为了保证经济决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要认真总结和记取过去盲目跟随政治风向走的历史教训。

陈云认为，综合平衡是制约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有效方法。在综合平衡中，第一要承认农业对我国国民经济有很大的约束力，能制约建设规模，防止冒进。农业的增产速度制约工业的增长速度，经济作物的增长速度制约着轻纺工业的发展速度；农副产品及其加工业的发展制约着部分出口产品的增长和外汇的收入；粮食和副食品的增长速度制约着城镇人口的增加。第二，要坚持财政、信贷和外汇平衡，从价值形式上制约建设规模。第三，要坚持物资平衡，从实物形式上制约建设规模。总之，陈云主张用一系列平衡关系制约冒进，以求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保持国民经济稳步地、持续地增长。这种增长看来慢，实际上算总帐，没有折腾，是最快的，也是效益最高的。

四 主张“利民强国”，坚持经济决策的无产阶级功利性原则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国家组织领导、全体人民参与的宏伟事业。国家投入大量资金，人民付出艰辛的劳动，目的就是逐步达到民富国强，因此，一切经济决策都必须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强大。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12)陈云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功利性原则。在根据地建设中，他提出党和工会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为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要把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列入地方党部的经常议事日程。在解放初的经济恢复时期，他指出：中国现在有几万万农民，有几千万手工业者，

有几百万产业工人，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我们每件工作都要对他们有利益。当时，他主张把城乡的物资交流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要动员全党力量去做，用廉价的工业品与农村土特产交流，避免鸡蛋卖不出，桐油跌价。他说：“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13)

经济决策怎样才能达到富民强国的目标？根本一条就是根据当时当地财力物力，发展生产，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为此，陈云早在1957年就提出必须切实解决人民吃穿问题，并提出了主要办法：第一，大规模地发展化肥，认为“发展化肥比起开荒来，既便宜，又快”。第二，今后解决穿衣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于发展化学纤维。第三，治涝、扩大灌溉面积。当时他说：“如果我们只注意搞工业，不注意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搞了工业以后，老百姓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再回头来搞农业那就晚了。”“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14)

富民与强国的关系如何摆好呢？1982年1月25日，陈云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但国家只有那么多钱，这里摆多少，那里摆多少，都要有一个计划。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可以改善，但改善的幅度要很好研究。还是那句话：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只要把握住这一条就好。”(15)

五主张宏观控制，坚持市场活动的规范性原则

国家计划与市场活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陈云作了这样形象而又有哲理地描述：“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鸟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活，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16)这个意见是针对当时市场管理反复出现“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抓”的现象提出来的，是为促使市场活动“抓而不死，活而不乱”，有序地健康发展。

在社会上，人们对这个意见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静态的理解，认为它是维护计划经济的产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是相悖的；一种是动态的理解，认为它提出了国家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体现了市场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笔者认为，应该历史地辩证发展地理解它。“鸟笼”的比喻对市场活动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这一要求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一，市场活动总得有个动态的“笼子”。这个“笼子”指的不是那种僵化、不变的“笼子”，而是随着市场经济活动的扩展而不断变化的可塑性的“笼子”。第二，当时强调国家计划指导，而没有强调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体现了市场活动的水平和人们对它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反映了当时一种合乎历史事实的认识。当时认为“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计划的指导。”这正如党的十二大只能提出“今后20年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要分两步走”那样，还不能明确地、具体地提出“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三，对市场活动要坚持规范性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具有普遍意义。正如“笼子”要经常调整那样，规范的手段也是会变化

的。当时强调用国家计划、行政手段干预、规范市场活动；现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要建立市场体系，不仅要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去规范市场活动，更强调用法律手段、用各种经济法规去规范现代市场经济活动，无论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国家，或跨国、跨洲的国际市场活动，都必须有与它相适应的法规加以规范，一切经济活动都得依法进行。这样，市场活动的规范性原则不仅不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相悖，而且还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决策原则。

六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性原则

陈云早在八大上作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中，就指出了我国迅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存在着若干不可忽视的弊端，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改进”，做到既要坚持计划经济，又要把经济搞活。他设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在生产领域，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自由生产是它的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掌握的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突破苏联模式的一种新的设想。他还根据这个总体设想，制订了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等3个《规定》，提出了一系列适合当时的实际的决策和措施，并提出了“改进”经济体制后要注意的问题。陈云认为，实行改进经济体制的种种措施，可以帮助解决当时国家市场上存在的若干问题，但是同时又指出这些措施也会带来一些新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解决。这一方面我们还缺少必要的经验，因此，我们必须“慎重从事，稳步前进，经过试验，逐步推行”。(17)这里就提出了改进经济体制要慎重、探索前进的思想。

1980年12月16日，陈云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18)人们往往把这里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仅仅从表面上，从感性的角度去认识、理解，甚至误认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主张“跟着感觉走”。其实，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与列宁早在1920年就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19)一样，是一种形象的比喻，都是要人们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去摸索和把握达到彼岸的规律和途径。也就是说，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决策时，必须始终坚持探索性原则。

经济体制改革一定要坚持探索性原则，这是因为，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率涉面广，问题复杂，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要求稳步前进；第二，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是开创性的事业，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靠自己边实践，边总结经验，探索前进；第三，经济体制改革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这也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论探讨过程；第四，实践活动是一个过程，从试点开始，到新的体制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探索就是稳步前进，企图跳跃前进，往往欲速

而下达，几经折腾，想快反而慢。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过程，就是坚持了探索性原则，边改革实践，边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推进，从而取得了今天这样巨大的改革成就。正反经验证明探索性原则是正确的，今后仍须坚持。

在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必须做到：第一，要勇于投身到各项改革实践中，不要在岸上徘徊和观望，而是身临改革的第一线，去探索和把握各项改革的规律和途径；第二，在改革大潮中，要深入实际，努力寻找改革的坚实支撑点和客观根据，并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使改革做到一步一个脚印，而决不能浮在表面、搞花架子和形式主义；第三，要有风险意识，不怕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在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力争以最小的代价去取得最大的成功；第四，改革实践是一个长期奋斗过程，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改革的规律也必然是个长期的过程，探索和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改革规律和途径，需要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使中国改革航船胜利达到彼岸。

上述原则并没有完全概括陈云长期实践积累的丰富的经济决策哲学思想内容，但这6个原则是陈云在经济决策中始终坚持的，它们彼此联系并融汇在《陈云文选》中，是陈云的理论精华，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是经济决策成功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应该继承、坚持和发展的理论精髓，因此，进一步学习、研究和宣传这些原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本文结束时，让我们再来学习陈云近期说的一段充满殷切期望的话。他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问题。”(20)这段话充满着经济发展和历史经验的辩证法思想，将鼓励着我们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不断解决新问题，继续探索前进。

(作者单位：中共广西南宁市委党校)

注释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105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469页。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0页。

《陈云文选》第1卷，第220页。

(11)(14)(15)(16)(17)(18)(20)卷，第46、189、281—282、80—86、309、320、13、279、379页。

(13)《陈云文选》第2卷，第98、210、128页。

《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1953年10月16日）。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611页。

(12)《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第864页。

(19)《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225页。

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原则的提出及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

刘书楷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在思想方法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对思想方法问题十分重视，认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在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特别是掌握毛泽东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总结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想方法原则。建国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又在参与重大决策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实践了这一原则，在言教和身教方面都给我们以教益和启示。

原则的提出：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哲学思考

一个正确的认识，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而是经过由社会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陈云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原则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首先，中国革命走过的曲折道路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认识的实践基础。

中国革命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中国条件下进行的。马恩曾设想，“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同时发生，“它是世界性的革命。”列宁在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应用于俄国革命实际后，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因而无产阶级可以在帝国主义战线的薄弱环节突破，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革命胜利。他领导俄国工人阶级通过城市暴动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走列宁指引的道路，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革命向何处去，道路该如何走的问题，在几年的时间内，党内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复杂尖锐的斗争，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在党内统治时间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他们把共产国际的指示与苏联的经验教条化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几乎沦于绝境。而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根据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和“左”倾错误进行不调和的斗争，领导中国革命实现了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

陈云亲身经历了这个转折。他随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毛泽东、朱德创建的农村根据地后，日益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并在他领导的工会和白区工作中，渐次提出了反对按千篇一律的条文办事的要求，强调“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中央的决议要“参考”，但不能原样照搬；他看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一再使红军遭到失败，而取得第五次反“围剿”最大胜利的温坊战斗却

是按实际情况实行机动的结果；在长征中他率领红五军团断后，更亲眼目睹了红军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屡屡受挫、伤亡惨重的严峻事实。实践迫使他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应怎样走的问题，并逐步接近了毛泽东关于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因而，当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后，他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还写了比较详尽的提纲，把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地传达给红军将士，为中国革命实现重大转折作出了贡献。在革命转折关头的正确抉择，来自正确的思想方法，说明他已从挫折和教训中初步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囿于马列本本上的现成结论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探索自己的道路。

其次，对毛泽东实事求是原则的深刻理解和掌握，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原则提出的理论基础。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者掌握正确思想方法的重要途径。陈云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哲学思考也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完成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遵义会议只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红军进入陕甘宁地区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发动全党总结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从哲学理论上揭露和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危害，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干部，要求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在此期间，毛泽东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系统地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强调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基本的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原则作了更加完整的论述，推动全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在此过程之初，毛泽东向陈云3次提出要学习哲学。陈云也正有此愿望。他从1938年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按中央要求组织了6人学习小组，在毛泽东的秘书和培元的辅导下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一直坚持了5年，比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化为科学的方法论的思想也影响了陈云，他在学习理论时特别注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认识到“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对党对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陈云在学习中觉察到，毛泽东著作和文电中“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这一认识，标志着陈云在思想上、理论上实现了飞跃。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根本的东西，抓住了它，就抓住了马列主义的根本点、基础和灵魂。自此，陈云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得到了理论上的升华，他深刻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指出其在思想方法上的毛病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用切断历史和生搬硬套的办法，把书本子上的抽象概念套到中国来，把生动的中国看成僵硬的中国，把复杂的社会看成简单的社会”；认为要发展革命形势，“必须彻底无保留地打破主观主义、公式主义和生搬硬套书本上的概念，从具体的中国情况出发，抓住中国的特点。”他也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要求注重理论学习，勉励党员干部“不要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又指出必须到实际工作中取得经验，否则，“单靠听讲看书，甚至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事实说明，对实事求是原则的深

刻理解和灵活运用使陈云具备了深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正确的思想方法已经具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再次，对纠正“抢救运动”错误做法的思考成为“不唯上、下唯书、只唯实”原则提出的契机。

陈云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实事求是原则观察分析问题，日益感到有个怎样才能坚持做到的问题，整风运动后期发生的“抢救运动”促使他对此进一步深入思考。

“抢救运动”的错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毛泽东从王实味事件认为党内有不少托派、国特、日特等坏人，要求彻底清查，批评“过去我们对这些是采取不着不查的自由主义”。中共中央随之发布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也对敌情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混入“数量至足惊人”的特务分子，指示立即在全党开展组织审查。此后康生的错误引导及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致使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从延安各机关学校的一万名干部中查出“特务”近千人，有的学校甚至半数学生成了“特务”。这种违背实事求是精神的做法，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在此过程中，担任总学委委员的陈云，一直关注着运动的进展。为什么在全党批判了王明的主观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以后，仍然出现背离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在运用实事求是原则中应注意哪些要点和关键？这不能不引起陈云的深思。不久中央组织部一位干部向他反映，对康生把许多好人和犯有一般错误的同志打成“特务”，感到想不通，工作不好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谈出了自己从总结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中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要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态度观察分析问题，对“抢救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做法也应这样分析对待。陈云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很快发现了反特扩大化的问题，指示停止了“抢救运动”。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原则的提出，意义是重大的。它不仅为正确掌握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具有补充作用和更具操作性的思想方法原则，而且，它更强调了实事求是原则在人们认识运动中的过程性特点，即在实践中迈出的每一步都必须坚持“只唯实”的原则，对上级指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整个过程中，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检验、丰富和发展，否则，仍然会犯主观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一点，已为大量事实，特别是陈云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所证实。

实践之一：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的态度参与重大决策

建国后，陈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提及“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原则，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和邓小平一起领导全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又重新提及。这当中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在实践上，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运用这一思想方法观察分析社会主义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在参与重大决策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谱写了实践这一原则的新篇章。

陈云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原则的最初实践是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会议在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讨论通过毛泽东

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过程中，很多人对防止党内产生张国焘、高岗这样的个人野心家、避免出大乱子的问题，提出要靠“毛主席万岁”，认为有毛泽东在，就可以避免。这种意见，表达了广大干部对毛泽东的信赖。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是其他人所不可比拟的。陈云长期和他共事，也一直对他怀着深深的敬仰。但是，陈云在会上发表意见说：“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然而这还不能足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出张国焘、王国焘，可靠的、永久的办法，是提高几百个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这批人才是不闹大乱子的保证。发言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和折眼。其实，在党的七大上，陈云在谈到如何正确对待个人作用问题时就讲过，毛主席领导得好不能否定。“但无论怎样，根本的东西是老百姓，是共产党。”“我们确实不敢把个人的作用看得过了头，看得太大。”

可见他是一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领袖的，既肯定毛泽东有伟大的历史功绩，有洞察事物的能力和卓越的领导艺术，又认为其生理上和决策上都不可能“万岁”；领袖是人不是神，也会犯错误，因而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把政权的稳固、党和国家的治乱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毛泽东后来在批判天才论时也指出：天才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天才是一个党；要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11)陈云和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这也是使反对高饶的斗争成为党在执政后进行得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党内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上级领导人已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而这种意见与实际情况有差距，会影响决策的正确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时，能否以对党对人民完全负责的精神，力排众议，坚持真理，是实践“下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原则的一个难点。在对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的认识过程中，陈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人们的认识是在实践中由表及里，逐步深入的。“大跃进”和自然灾害引起的国民经济失调，起初被说成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并对认为困难和错误都甚严重的彭德怀进行了批判。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经济失调的情况不断加剧，农业大幅度减产，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日益显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逐渐清醒地认识了问题，制定和实行了调整方针，使形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召开时，全党又一次面临着审慎地分析形势并进行重大决策。大会报告否定了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概括成绩和问题的提法，向实事求是地认识国民经济困难前进了一步，又经过毛泽东及与会者的反复讨论与修改，定稿为大会文件。陈云对大会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取得的成绩作了很高的评价，但对大会文件中提出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的论断，认为与亨实有差距，如不改变，必然影响全党对困难程度的认识 and 各项决策的制定，使国民经济尽快走出低石的计划不能尽快实现。经过思考，他以“不唯上、不唯书”的态度采取了这样的做法：一是在会上未发表意见。当毛泽东请他发言时，他答以有关调查尚未做完而未讲话。现在看来，这种调查没有结束决不轻易附和别人的做法完全是认真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考虑到他的身份和毛泽东的点名，采取拒绝的做法是常人相当不容易做到的；二是在大会闭幕的次日，他在陕西省与会干部会上作了怎样使认识更正确些的讲话，提出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避免片面性，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当时的情况和问题，说明他脑中已酝酿着不同意见；三是在大会的半个月后，他在

“四楼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系统地提出了对困难情况应有的认识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认为严重困难时期尚未过去，必须进行“非常措置”，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他的讲话虽然改变了七千人大会对困难程度的估计，但由于以事实为依据，分析细致并恰如其分，所以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后经中央批发，成为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陈云应用正确思想方法的举措，对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较快地克服国民经济困难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唯实”的基础上，对执行“左”倾错误的最高领导人敢于犯颜直谏，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重大决策，是陈云实践“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原则更值得称道的品格。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经他本人和报刊广泛宣传，是当时十分重要的“上头的精神”。特别是对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处分问题，华国锋一直坚持认为，这是毛泽东生前的决策。不能更改，不然就是“砍旗”。尽管如此，陈云还是本着唯实的精神，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为这两件大事平反，指出认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性质是没有根据的，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他的仗义执言代表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意愿，在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然而在华国锋的压力下，会议简报组却要他把所谓“敏感”的话删去，他没有妥协，结果讲话未登简报，由于陈云和很多党的高级干部坚持正确意见，不久两件大事终于获得解决。这场冲突，是上下之争，但更是正确与错误之争，是坚持实事求是、“只唯实”与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之争。那时，陈云刚刚从被批判的境遇中走出来，还未完全恢复职务，其表现出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刚正不阿的情操，为全党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实践之二：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的态度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

建国以后，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探索中有成绩，也有失误，过程艰难曲折。陈云在参与探索过程中，既有与其他成员的共识，也有独立思考的创见，在实践“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原则过程中收获颇丰。

陈云以“不唯书”的态度分析中国实际情况，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经济体制模式提出了新的见解。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社会主义要“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私有制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¹²⁾尽管他们也论述到不能一下子就消灭私有制，而是通过逐步的社会改造实现这一点，但又强调：“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强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¹³⁾苏联的经济体制就是按照这一思想建立的。

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和苏联的模式建立我国的经济体制，

还是按照我国国情探索新的路子？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由于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新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又已日益显露出来，所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形成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共识。陈云以他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主要领导人和经济管理家的胆识，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即工商业的经营以国家和集体经营为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按计划生产，一部分产品按照市场情况自由生产；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附有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在这个被称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中，允许多种形式的经营方式和所有制形式存在；商品交换、货币关系、价值规律以及与此相应的市场机制也受到重视并占有一席之地。陈云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和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力求避免在管理权上高度集中，在所有制上过于单一的缺陷，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情况和基本国情出发，在生产、经营、流通3个方面勾勒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它完全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反映了陈云“不唯书、只唯实”的思想成果。这一构想虽然遇到了曲折而未能实行，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以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八大前后的思考为起点的，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构想，也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而载入史册。

努力防止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热和大起大落现象，使国民经济脚踏实地、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是陈云社会主义时期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原则指导下探索的主要问题之一。一五计划的前几年，由于经济发展较快，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展迅速，国际环境又一直对中国人民压力较大，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超高速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1955年末，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启发下，对当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中一再削减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和某些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感到不满，进而认为计委编制的十五年（1953—1967年）远景规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的增长速度太低了。12月，他作出党内指示，提出利用国际和平环境加快发展，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并批评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随后，他又在年末定稿、1956年1月发行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指出：“右倾保守思想在农业、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等方面以及商业、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同经济事业的配合方面都存在，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14）毛泽东指示的下达和文章的发表，促使国务院各部委纷纷修改计划，以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大大超过了实际能够达到的限度。一贯以“唯实”思想观察问题的陈云，立即发现了经济工作中的不健康因素，是“唯上，唯书”还是“唯实”，他又面临着沉重的选择。1956年2月，周恩来也发现了问题，提出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问题，正好与陈云一拍即合。此后，两个人一起为组织好1956年的生产建设开展了反冒进工作。他们召开各部专业会议压缩生产指标，又建议召开中央会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1957年1月，陈云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指出“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会出现经济混乱”，而研究国民经济各方面合理的比例关系，“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15）这些重要的实践和思想，为一五计

划最后一年各项任务的安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以及指导经济工作实事求是的进行提供了理论依据，使经济工作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后来，陈云又以同样的思想力指导，在70年代末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一起，抵制了华国锋鼓吹的“洋冒进”，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使国民经济进入了快速稳定发展的轨道，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在国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利用资本主义的资源和技术，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是陈云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基础上形成的战略构想。建国之初，他为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做出过努力。由于国际条件的限制，这一努力成效不大。进入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毛泽东、周恩来适应形势变化需要，及时对外交工作做出了富有远见的决策，使我国对外事务出现了转机。但当时“四人帮”到处插手，把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原则强调到不切实际的地步，对外贸工作横加干涉。陈云恰在这时奉命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他深知，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外贸工作搞活，必须突破“四人帮”以“最高指示”为名设置的樊篱，否则就只能无所作为。他虽然长期“靠边站”，那时又无实际职务，但仍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从国内外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要研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指出：要顺应形势变化，研究资本主义，不研究资本主义就要吃亏，就不能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做工作不要被老框框束缚住，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理直气壮地担当利用外资的任务。(16)在指导实际工作中，他一再抵制“四人帮”的“紧箍咒”，指示要解放思想。当时进口棉花加工出口棉布，是利用我国较好的纺织工业基础和廉价劳动力扩大外贸出口的好办法，原来由于惧怕“四人帮”一伙指责，未能着手进行。陈云对此指出，我们是要坚持自力更生的，但是现在国内棉花不够，要等到能够自给，可能要等8年或10年时间。因此一定要在这段时间内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棉花加工以扩大出口，不利用资本主义就是傻瓜。(17)同时，他还提出要大胆进口外国先进设备及必要的配件，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易所进行期货交易，并利用价格手段在国际贸易中为国家赚取外汇等主张，为外贸工作既不违背自力更生原则，又尽量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源、资金和设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开辟了新的途径。这些“不唯上、不唯书”的思考和实践，反映了陈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资本主义世界实行经济开放的初步战略构想，在当时国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十分难能可贵，其中一些重要原则为党在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政策开了先河。

陈云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原则，与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原则一脉相承，与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完全一致。他在社会主义时期对这一原则的实践，充分证明了继续贯彻这一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邓小平曾反复强调，思想路线不是个小问题，它不仅是确立政治路线的基础，而且是正确的政治路线能否贯彻的关键。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要不断前进，就需要不断地从新情况和新问题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律，不断充实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因此，陈云提出的原则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21、217、221页。

《陈云文选》第1卷，第29、143、261、235、261、251、294—295页。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81页。

《陈云文选》第2卷，第232—233页。(11)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1970年8月31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

(14)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86页。

(15)(16)(17)《陈云文选》第3卷，第52—56、218—220、223页。

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徐文泽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一至理名言，是陈云于延安整风后，在仔细阅读毛泽东著作和认真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错误教训的基础上而得出的科学论断。它体现了我党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坚持党性原则立场和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毫不妥协的胆略、勇气和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认真学习《陈云文选》，重温陈云的这一论述，对我们分析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圆满完成 90 年代的伟大历史使命并胜利迈向 21 世纪，无疑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正确理解其涵义，牢牢把握其实质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体现。只有正确理解其涵义，牢牢把握其实质，才能真正坚持它。

（一）“不唯上”就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决策，反对机械地照抄照发。它与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不唯上”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而是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主人，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所领导和组织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人民的根本利益奋斗，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来完成和实现的。党和国家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上级和下级只是分工不同，决不能把上级与下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对上级指示和决策采取教条主义或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不唯上”就是要求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决策，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陈云讲：“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处处依靠人民群众，事事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他还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由此可见，“不唯上”的真正涵义就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唯上”就是不要对上级指示和决策机械地照抄照发，而要结合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决策，一般来讲是来自客观实际，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全面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的，是符合实际的。但由于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的具体情况错综复杂、千变万化，这些指示和决策并不能代替解决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的各种实际问题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因此，下级在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和决策时，一定要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结

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陈云指出：“政策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具体化。”下级对上级的指示和决策要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对政治路线“正确了解”，对具体情况“切实了解”，避免“只谈路线，不了解具体情况”或“只知道具体情况，不了解路线”的“空谈”和“盲目”现象。如果不这样，而是机械地照抄照发，“你说一他就一，你说二他就二”，下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充分地发挥，上级的指示和决策也不可能真正地贯彻和落实。因此，下级对上级的指示和决策要吃透其精神，并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积极主动和富有创造性地贯彻执行，这是“不唯上”的基本涵义。

“不唯上”不是不要党的纪律和中央权威，而是要求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不唯上”与遵守党的纪律，维护中央权威并不矛盾。以“不唯上”为借口，对上级的指示和决策采取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的实用主义的态度，甚至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态度，这与陈云讲的“不唯上”是毫无相同之处的。其实，“不唯上”不但不否定党的纪律，而且是以遵守党的纪律为前提的。陈云讲：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巩固自己，团结群众，坚持斗争，战胜强敌。”因此，所有党员都要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纪律，就要坚决执行“四个服从”。陈云讲：“‘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遵守党的纪律，就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陈云讲：“执行中央和上级决议才算是真正遵守纪律。”“党不容许任何党员在党的决议面前有‘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个人对组织，少数对多数，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服从是无条件的。组织、多数、上级、中央的决策正确时，自然要服从；如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怎么办？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同时应该按党章规定的权利，提出建议，或保留自己的意见。”“在革命成败的紧急关头，对错误领导者进行斗争是必要的，但仍须遵循党章的规定，采取合法的手续”。“对危害党的阴谋分子的斗争，在紧急情况下可采取特殊的措施，但仍应遵守党内斗争的原则”，“即使党员个人（或下级组织）意见正确，工作能力强，地位比较高，资格比较老，都不能作为不服从纪律的借口。”因此陈云强调，全体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自觉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他说：“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11)全党执行中央的决议，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团结战斗的共同的政基础，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每一个党员都要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自觉维护中央权威，这也是“不唯上”的应有之义。

(二)“不唯书”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指导实践，反对教条主义。它与不读书、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不唯书”不是主张不读书，而是要求认真读书，真正掌握理论。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和基础。陈云一贯高度重视学习理论。他指出：“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不是不读书。现在我们的毛病，是马列主义不够。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需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12)他多次引用列宁的话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有了革命的理论，才

能把革命工作做好。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13)他还特别指出领导干部应更注重学习，“部长、副部长要领导学习。……要把学习作为指导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领导干部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尽到领导责任”。(14)陈云还特别强调：“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15)这是我们与教条主义的原则区别，也是“不唯书”的重要涵义。

“不唯书”不是赞同盲目实践，而是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指导实践。这是“不唯书”的基本涵义和要求。能不能理论联系实际并用理论指导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同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理论联系实际是学好理论的根本途径和方法。也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用理论指导实践。因此，必须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结合起来。陈云多次讲：“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生搬硬套书本上的概念。我们既要向书本学习，又要向实际学习。如果“只停干实际，就不会有远大目光；只停干高远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和实际两者不能或缺。”(16)所以要使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者结合起来，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用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理论。陈云特别指出：环境在不断变化，“没有一套新的办法，就不能适应新环境的需要。要找出一套新办法，就要研究过去的办法，”总结过去的经验。(17)而“经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积累起来的，过去有缺点错误，今后也还难免。摸索革命的规律，我们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建设的经验，也必须有两三十五年计划的时间，才可积累下来。”(18)要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并“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1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多次提出要及时总结经验。1981年他就提出：“广东、福建两省的特区及各省的对外业务，要总结经验。”“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20)他强调指出：要总结经验，但不能照搬过去的经验，要学习外国，但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如果现在再照搬五十年代的做法，是不行的。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21)所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认真读书，但不唯书；及时总结经验，但不墨守成规；虚心向外国学习，但不照搬外国模式。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唯书”就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用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分析解决改革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三)“只唯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这是“不唯上、不唯书”的关键和实质。它与形式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只唯实”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陈云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尊重事实，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多次讲：“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22)其中的关键是弄清事实，因此，“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23)要保证党的事业

胜利发展，就必须“从具体的中国情况出发，抓住中国的特点”，“并根据这些具体特点来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24)决不能搞形式主义，作表面文章。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强调党和工会对经济斗争的领导，必须依照实际情况，不能脱离实际，千篇一律地抄劳动法。不能满足于形式上开了几次群众会议，也不能满足于已经举手通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79年他就批评“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25)并进而指出：我们国家是一个9亿多人口的大国，80%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是大头，需要改善生活。“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26)由此可见，“只唯实”就是要尊重客观实际，弄清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实事求是的重要内容和基础。

“只唯实”就是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了解情况是为了找到事物的内部联系，按客观规律办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陈云就强调：“必须善于去了解各种环境的不同，善于采取适合于当时当地环境的工作方法。”(27)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否则就会出现经济混乱。“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2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情况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29)由此可见，不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研究事物的内在联系，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陈云一贯的思想和作风，也是“只唯实”的重要内容。

“只唯实”就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前进。实际情况是复杂的，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要解放思想，开拓前进。陈云多年来就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联系起来。早在1958年他就指出：必须继续提倡创造性，“同时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墨守成规的倾向必须反对，应该提倡敢想、敢说、敢于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就不能前进，但是创造性必须和实事求是相结合，否则就会华而不实，不能真正地前进。”(30)1984年他又明确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31)只有如此，才能不断胜利前进。

二不断加强党性修养， 学会运用科学方法

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仅要正确理解其涵义，牢牢把握其实质，还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学会运用科学方法。

(一)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具有要讲真理不讲面子的品格。

能不能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党性强不强的问题。如果没有很强的党性，就不可能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必须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党性修养是多方面的，陈云50年前提出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加强这方面的修养，当前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年来，我们有不少同志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想个人的利益多了，想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少了，结果真理越来越少，面子越来越大。有的同志对自己讲面子，爱听恭维的话，

有了错误，躲闪遮掩，不做自我批评；对别人讲面子，爱打顺风旗，发现问题，息事宁人，不敢批评，他们分析和处理问题，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的面子出发，害怕真理讲到自己头上，亮了自己的丑，捅破了“关系网”，拔出萝卜带出泥。正如陈云早就指出的：如果一个人不讲真理，“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掺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会害人害己。”因此，应当采取正确的态度，这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32)要具有要讲真理不讲面子的品格，就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认真改造世界观，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发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光明正大，胸怀坦荡。只有如此，才能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真正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二）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掌握实际情况。

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要经常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抓住事物本质，掌握客观规律。不论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总是率先垂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早在1933年他就指出：党和工会的领导，“必须纠正官僚主义”。要“审慎地了解各业的每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33)他还亲自到汀州，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形，考察已订合同实行与否，了解工人的要求。在延安做经济工作时，他经常到新市场去了解情况，看农民卖什么，买什么，调查市场的供求情况。进北京以后，他也经常到百货大楼、天桥闹市、东单菜场等地方去了解市场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在二年困难时期，他为了了解实际，解决问题，还亲自到上海、杭州、苏州等地进行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的意见和要求，并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及时上报中央，以指导全局的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仍经常到全国各地，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每到一地，他不仅与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干部座谈讨论，交换看法，而且还亲自到工人农民家中，询问情况，听取意见。同时与党的方针政策联系起来，认真思考，总结整理，上报中央，指导工作。我们只有以陈云为榜样，经常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才能真正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处理解决好改革开放中的各种新问题，做好各项工作，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三）学会运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正确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要使自己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按规律办事，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还必须学会运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正确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陈云讲：“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34)“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35)陈云还特别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阐明了如何运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克服片面性和简单化。他指出，“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

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36)陈云还多次强调：“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也不可能搞好。”因此，要“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认真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37)在速度和效益问题上，他一贯主张既要速度快，又要效益好。强调“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38)“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陈云的这些论述，都是运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一贯思想。我们只要坚持这一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一定会不断胜利前进。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注释

(11)(14)(18)(20)(21)(22)(23)(25)(26)(28)(29)(30)(31)(34)(35)(36)(37)(38)(39)《陈云文选》第3卷，第33、321、210、31、380、45、50、307、337、188、34、252、250、52—56、268、113、338、46、188、332、347—348、237、311页。

(12)(13)(15)(16)(19)(24)(27)(32)(33)《陈云文选》第1卷，第220、195、124、348、126、197、261、142、143、216、189、235、32、296、10页。

(17)《陈云文选》第2卷，第340页。

论陈云“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的思维坐标

许德祥

陈云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长期坚持、多次重申的“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以下简称八字论），涵义十分深刻，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在学习体会到，八字论是陈云通过领导工作实践，从感性到理性、从经验到理论提炼升华的结晶。对于它的涵义和意义，只有抓住思维坐标，同时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跨世纪工程的背景上，从社会主义领导的个体主体的思维开发，和社会主义领导的群体主体的思想路线的维度和高度上，从社会主义领导的科学化和效能提高上，才能完整准确地作出理解和阐述，本文愿就此谈点自己的看法，供会议讨论。

—

陈云八字论的提出本身也是一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的过程。按照他自己的归纳，至少是在延安时期就已经自觉以这条思想原则为指导了。但作为明确表述，根据文选记载有以下几次：作为少犯错误的一般方法提出；作为从思想路线高度加深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而提出；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1978年12月），为了在党的思想路线上完成拨乱反正而重申；为了从世界观、方法论高度上对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求、表达期望而提出；最后是为了使新一代领导人更加完整、准确地领会和运用八字论思想而所作的规范性表述。

从八字论的提出过程可以看到，经过从经验到理论、从自发到自觉的升华，八字论表达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整体与精华，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也是陈云贯穿自己生平，经过“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具体化了的思维坐标和行为方式。

陈云指出：领导人的“高明不表现在人身的别部分，表现在人的思想上”。思维正是指理性认识（思想）及其过程（思考），它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思维坐标是对数学、物理等实体关系坐标所作的抽象和推广，是用来标志思维的独立性、方向性、层次性、有序性等特性的范畴。在实际工作中，思维坐标的确立和运用，关系着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思想建设的优劣成败。

陈云八字论为我们确立了4个操作性很强的思维坐标：

1. **唯实坐标。**唯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实事求是，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就是“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正是遵循唯实思维坐标的方向、次序，陈云反复强调：要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根据客观事实想问题、定政策；要提倡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精神，实而不华，真正地前进；要把心摆得非常正，毫无个人主义，看问题不带个人角度；做事经得起历史检验；——为此要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

唯实坐标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它的唯一性，它标志的是思维的出发点，任何高明的、先进的思维方式，都只能从实际出发、受实践检验，而不能从上级的文件或书本出发。我们思维活动的唯一出发点是实际；检验其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上级的话要听，文件和书本要读，但它们都不是思维的出发点。

2. 交换坐标。“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交换是思维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源而展开独立活动的开头。整个思维活动的目的在于更完整、更全面地认识实际事物，以便采取有效的行动，作为开头的交换更是如此。只有明确了目的，才能下决心听取不同意见。”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11)

交换要交心，共同商量，同心同德。交换是交思维，不仅是思维成果的信息交换，而且是思维过程的交锋，以引起交换主体思考问题。也还是思维坐标的交叉交换，使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的思维坐标得到整合、优化。

3. 比较坐标。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12)所以，比较是在交换信息、交换思维坐标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参照标准（参照系、坐标系），对思维过程和结果进行深加工。比较坐标既有时间维度（过去、现在、未来），又有空间维度（国度、民族、地域、地区），即有“前后的比较”和“左右的比较”。(13)客观世界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人的认识（主观世界）也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即使同样对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但由于客观事物的展现有时空条件，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创造力又有差别，因此得出的见解、方案还是会有不同的，只有通过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比较，才能使认识更清楚、更深刻，达到相对的完成。

4. 反复坐标。反谓“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大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而“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14)。反复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它的“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15)。

在思维到行为的推移中，反复思维坐标涵盖3个阶段：第一，决断前，“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16)第二，决断中，“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17)，“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18)。第三，决断后，“在实践中反复认识”，“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这是“最要紧的”(19)。可见反复坐标是一种在再认识（再思维）、再实践（再行动）的旋式运动中实现调控优化的思维坐标。

综上所述，陈云的八字论思维坐标，已经形成为围绕发展着的实践活动，从实践—认识—实践……循环往复，可操作性很强的一种思维螺旋，其中，每一个具体坐标，无非是这条思维螺旋上一个便于把握的结点。

二

陈云在表达对新一代领导人的要求和期望时说：“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24)邓小平很赞同这个观点，认为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现在我们的

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25)陈云的八字论坐标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又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我们学习、理解、运用时。一定要从哲学根底上，从哲学思维坐标上下功夫。

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维坐标，是吸取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思维成果而形成的。按列宁的说法，这是一个由“对立面统一”或“一分为二”这个辩证法细胞，通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展开，从而逐步呈现出丰富内容的过程。人类从自然界分裂出来后就逐步展现出客观与主观、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统一；整体与部分、系统与要素的对立统一；实践与认识、客体与主体的对立统一；静与动、事物与过程的对立统一，以及对立和统一本身的一分为二。正是这些矛盾运动，展开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五大思维坐标；即：（1）唯物坐标，主张精神统一于物质、主观统一于客观；（2）系统坐标：主张独立统一于关联，要素统一于系统，部分统一于整体；（3）矛盾坐标：主张对立面统一，一分为二，普遍寓于特殊之中；（4）过程坐标：主张静统一于动，事物统一于过程；（5）实践坐标：主张认识统一于实践、知统一于行。

陈云的八字论，不仅覆盖了狭义辩证法的基本思维坐标，而且也覆盖了广义辩证法的思维坐标，或者说，它作为世界观高度的思维坐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坐标系统中，不是“偏”坐标，而是“全”坐标，是全方位地体现和覆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坐标系统的一种运作性坐标。对应地看：

1. “唯实”，集中体现和覆盖了唯物论的思维坐标。遵循这种思维坐标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必须尊重客观现实及其规律，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它，不外加任何主观的成分。只有这样，只有老实地使自己的主观统一于外部的客观事物，才有可能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取得有效的实践成果。

2. “交换”，主要是对系统坐标的体现和覆盖。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存在着普遍联系，系统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极其重要的联系形式。人们要解决好主客观矛盾，求得正确认识 and 有效实践，就必须如实地把要素组合为系统、部分关联为整体，这样才能达到“系统的全面”、“整体的全面”。但是，由于每个个体主体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尽管努力也很难穷尽事物的一切方面、要素、部分、环节。因此，巧妙地运用交换这种办法，就可以通过人们互相交换意见、交流信息、交换坐标。取长补短，较好的解决“系统的全面”与“个体的局限”这一矛盾。

3. “比较”，可以看作主要是对矛盾坐标的体现和覆盖。如前所述，比较乃是以认识的矛盾运动来反映对象的矛盾运动。由于客观事物是对立统一体，要在统一中揭示对立（同中之异），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异中之同），比较是必须采用的方法。马克思说过：“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22)他正是利用包括比较方法在内的许多科学方法，才完成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把普遍寓于特殊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并通过这个特殊，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陈云强调比较，认为“所有正确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因为只有比较，才可能作出区分（对立面）找到联系（统一），才可能既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又把握矛盾的特殊性，进而把普遍寓于特殊之中，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

矛盾。简言之，只有比较，才可能理解和运用矛盾问题精髓思想。

4. “反复”，主要是对过程坐标的表现和覆盖。世界是由无数事物组成的，任何事物都处在生成、展开、灭亡的过程之中，因此，我们不能只见事物，不见过程，而应当把世界看作是过程的集合体。人们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承认客观世界是一个螺旋式发展过程，我们自己的认识也是螺旋式推进过程。“反复”正是强调了系统的反馈回路，使我们的认识和实践从开环关系变成闭环运动，从线性的单向活动变成非线性的旋式推进运动。这是辩证的过程论，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循环论。单纯的重复或当断不断、踌躇不决，都与反复坐标不是一回事。

5. “唯实”的思想还体现了实践坐标。陈云说的“唯实”，首先表达了以客观实际（物质）作为世界的本原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时又以此为基础表达了经过实践才能落实、检验、确证唯物主义的实践坐标，即唯有经过实践才能使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反映关系与价值关系、改造关系统一起来，在取得物质性成果的同时，检验并发展真理。可以设想，一旦脱离开实践基础，以物质为本原也好，交换、比较、反复也好，都将成为漂亮的空话。当然，强调实践坐标，不等于把“唯实”直接理解为以实践作为世界的本原。不能以为只要重视实践了，就一定坚持了唯物主义，因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社会行为，而不是纯客观的过程。以实践落实、验证主客观关系是重要的，而以实践替代、排斥主客观关系则是错误的、危险的。

此外，陈云的八字论，处处渗透着尊重群众、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众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坐标。这一点很重要，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

依上所述，陈云八字论所表达的思想是，要唯物主义，不要唯心主义（把物质的东西、客观实际的东西作为本原，而不要把上级的话、文件、书本等精神性东西作为本原）；要辩证唯物主义，不要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是把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的东西，客观实际的东西和上级的话、文件、书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要实践唯物主义，不要唯实践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落到实践基础上，在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中，检验和确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只要实践不要理论，以于代替一切，甚至把实践当作世界本原，最终混淆了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显然，只有这样的实践的辩证的唯物主义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工程最靠得住的原则。这在哲学思维体系中的确是“全”坐标，而不是“偏”坐标。如果把它放到思维一行为的转化过程中考察，那么，我们就能体验到八字论与一般哲学思维坐标的不同，它蕴含着对思维系统的超越、向行为系统的交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八字论在思维和行为的矛盾运动中，也不是“偏”坐标，而是“全”坐标。

三

在当代，思维方式变革已成为世界发展动力之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3）因此，对陈云的思想财富进行思维开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中央领导指出：陈云八字论“是一个充满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贡献。”可见，需要进行思维开发的维度很多，本文上述关于思维

坐标的分析，可以看作是从思维坐标化为一般方法论维度揭示了它的方法论意义。从八字论反复提出的背景看，它还有着其他许多重要维良的意义。考虑到八字论最终是作为向新一代领导人的要求和期望而提出来的，本文也就不罗列其他，而只就领导（管理。本文对领导和管理的区别略而不表。下同，不再注明）科学维度作些综合性论述。

（一）对领导群体主体的路线导向意义。

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24）因此，我们首先要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跨世纪工程的背景上，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原则的高度上，来理解陈云八字论的路线导向意义。

（1）陈云八字论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最重要原则的具体化。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正是实事求是，构成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陈云的八字论具体、明确地把指导思想的精髓原则，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思维坐标。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只要具体把握“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几个可操作的思维坐标，就能把握最重要的原则导向。

（2）陈云八字论从思想路线入手，为政治路线导向打下思想基础。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25）

（3）从陈云八字论的运用和概括提出的长过程看，它启示我们：对于思想路线的执行，贵在坚持和发展；对于坚持和发展思想路线，贵在变自发为自觉。八字论的反复提出、不断深化的过程，最好地表明了陈云坚持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的自觉性之高和路线导向意义之大。

（二）对领导个体主体的思维开发作用。

领导群体主体的路线导向，制约、牵动着个体主体的思维开发。

领导行为是以人为主体的、有人参与、为人服务的社会行为。人是自然、社会、思维三大属性的统一体。人力资源开发、领导主体的开发，必须以自然属性为基础，以社会属性为本质，以思维属性为灵魂。像陈云八字论那样的源于社会实践的科学而先进的思维方法，一旦形成民族的、主导的思维方式，将以巨大的内在力量促进科技经济的发展，并使中国立于世界各国之先列。因此，我们常讲的提高领导干部的素养，应当着重开发各级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即用现代思维方式武装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尤其是用最高层的哲学思维和次高层的交叉科学思维去对领导干部进行思维训练。陈云特别指出，开发主体思维要突出价值导向，“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26）

（三）对领导行为过程的整体优化意义。

领导行为是以领导者为主体，引导、影响被领导者趋向组织目标的领导职能的展开过程，即以决策为中心，由调研、咨询、决策、执行、效验、反馈调节等环节组成的系统运行过程。陈云八字论思想不仅对优化领导主体具有显明的作用，而且对于领导系统整体优化的诸多环节都有直接的指导作用。陈云在解释八字论的唯物主义根基时，总是教导我们要善于调查研究，甚至交待了具体要求和具体做法。例如通过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

人员搞调研，具有“真、快、广”的优点。(27)对于决策前的咨询，则是从提醒领导者的角度加以强调的，实际上“交换、比较、反复”的过程中也充满咨询作用。八字论对于科学决策的规范最为详尽，可以说八字论正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决策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从决策方案选定到方案实施，是实现思维向行为的转化，八字论对此特别重视，突出了这一转化阶段的“比较”意义。一旦采取行动之后，还要通过检查、总结，分析效能，建立反馈调节机制，形成“反复”坐标得以实施的回路。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八字论对领导系统整体优化的操作意义。

(四)对领导方法运用的全面规范作用(略)。

(五)对领导艺术境界的意会启迪意义(略)。

(六)对领导效能提高的激励动力作用。

陈云之所以终其一生，不断实践和提倡八字论，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作为领导思维，激励和推动着领导理论和领导方法(技术)转化为社会效能、经济效能和生态效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管理也是生产力。现代社会已是知识趋向型经济社会，现代生产力已是高科技生产力，相应地现代管理也已经不是在社会系统和生产力系统中无足轻重的因素，而是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关键性因素。作为社会生产力中关键因素的管理，也已经不是一般的“劳心”行为，而是以思维为魂的高新智力的行为。我们在学习、理解和运用八字论时，必须改变观念，自我激励，努力开发以思维为魂的管理生产力，为不断提高领导效能增添新的动力。

(作者单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浙江分院)

注释

(11)(13)(14)(15)(16)(17)(20)(27)《陈云文选》第3卷，第285、187~190、235、360~362、371~372、188、235、361~362、235、372、236、189、236、360、372页。

(12)(18)(19)(26)《陈云文选》第1卷，第343、251、343、345、345、346、346、346页。

(21)(2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3、19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467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

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陈云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特点

何梓林

长期以来，陈云一贯非常强调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对于做好各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早在1933年7月，他就指出：“领导方式是做好工作的关键，有了正确的决议案还不够，要把正确的决议运用到群众中去，成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还必须经过一种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

1957年1月，他又指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这对于任何工作岗位的同志，对于解决任何问题，都是最重要的。1987年7月，他再次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

陈云将自己在实践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精辟地概括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前几年，还亲自写成条幅，分赠几位省市负责同志。这15个字，字字珠玑，言必有中，充满了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实事求是的真谛。

如何理解和掌握这“十五字妙诀”呢？陈云曾作过多次阐述，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把它看作是应该狠下功夫的着力点。他说：“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于一件事，我有了一个意见之后，可以先放一放，再考虑考虑，听听有没有不同意见。如果有不同意见，就要认真听取，展开讨论，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驳倒错误意见的过程，也是使自己意见更加完整的过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常常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不讲出来。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

陈云对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论述很多，如何领会和把握其主旨要义，我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有不同意见是好事，鸦雀无声就不妙

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对客观事物有不同认识，这是正常状态。比如一个茶杯放在桌子上，两人对面而立，一个看见有花无把，一个看见有把无花。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都不全面。这是因为各自处的位置不同，视角有别的缘故。如果两人把各自看到的一面“交换”一下，那就全面了。社会情况更加复杂，认识之不统一确实司空见惯。例如财经工作，涉及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特别是涉及到老百姓的吃饭穿衣，多种多样的问题，经常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正是鉴于上述情况，陈云认为，在党内，在政府机关内，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也是好事。他说：“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

“肯用脑筋想问题、发议论的同志，是很好的同志。不想问题，不发议论，天天搞五福布的，就要差一点。”

陈云历来最怕别人不讲话，不发表不同意见，认为鸦雀无声，一点意见

也没有，事情就不妙。60年代初，他针对当时党内的沉闷空气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80年代初，他又针对当时出现的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当老好人的倾向指出：“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

只听顺耳的话，是不能做好工作的。陈云说：“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哪里有‘唱对台戏’的，哪里有‘反对派’，那里的工作就搞得好，否则，工作就搞不好。他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个万岁’，就是这个意思。有民主人士监督我们，对工作有好处。如果革命胜利以后，长时期没有‘反对派’，只有一派人讲话，听不到不同的意见，那末，工作就会出毛病。”有人“来当‘反对派’，专门同我们‘抬杠’；越‘抬杠’，工作就可能做得越好。”

“有个‘反对派’站在我们面前，可是好事，逼着我们多考虑问题。”(11)

对于“天天挨骂”，陈云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讲得很生动、很深刻。例如商业工作天天挨骂，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天天挨骂，可以改进工作，对革命事业大有好处。(12)1956年11月，陈云在一个会议上作报告，专门讲了一个关于“天天挨骂”问题。他说：常常挨骂，这说明工作有缺点错误，说明这方面的工作与人民关系密切。这不是提倡天天犯错误，而是说，挨了骂，可以提高我们的警惕性，从而发现工作中的错误，并加以改正，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只讲好处，有缺点不讲，那就对我们的事业很不利。(13)

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敢于讲 出不同意见

陈云多次指出，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开会就是翻语录本，“万寿无疆”还要喊三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打电话先要念语录，当时党内处于极不正常状态。由于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14)。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原则严肃地提出来。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这样，我们这个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就会兴旺发达，大有希望。”(15)

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都能讲话，不搞“赞成的举手”式讨论，也不把干部群众当“算盘珠”。早在1938年，陈云就批评搞“赞成的举手”式讨论，“形式上的一致通过”决议案的弊病。由于缺乏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有许多下级干部，把意见放在心里，不讲出来，

表面上看起来很顺从，开会的时候你问他：“同意不同意呀？”他说：“同意呵！”“同意的举手呀！”他举手。然而，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种形式上一致通过的决议案在执行的时候，就不能发生很好的效力。(16)50年代，陈云批评把干部群众当“算盘珠”，拨一拨，动一动，不要干部群众发表议论的官僚主义领导方法；强调实行让干部群众都能讲话，都有积极性，生气勃勃地去努力完成工作任务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多次指出，讨论重大问题的会议，要安排一定的时间听听意见，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他自己作重要报告后，也一再要求与会同志充分发表不同意见，展开讨论，以求得一种共同语言，使工作步骤更加稳妥，更加合理。

用什么方法形成民主集中制的气氛，使别人敢说话呢？延安时期，陈云在《论干部政策》的讲演中强调注意几点：第一，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如果一个领导者架子很大，面孔死板，甚至像阎王那么可怕，就没有人去接近他，即使和他讲话，十句话也要忘掉八句。很多人要看领导者的面孔，所以领导者必须注意这个问题。第二，开会的方式不要刻板，尽可能随便热烈地开展讨论。规规矩矩地一个一个发表意见，有的人就不说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有人常常不敢在严肃的场面中间说话。第三，少戴大帽子。不要把错误夸大，不适当地提高到原则的高度。第四，对有错误的同志，要和颜悦色地说服，善意地、诚恳地批评，不要气势汹汹地指责人。第五，要使下级有自信力、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要使他们谨小慎微，遇到任何一个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情，都向领导请示报告(17)。建国以后，陈云特别强调：只有领导干部虚心，人家才会说话。一般来说，相同的意见谁也不敢讲，容易听到；而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所以，领导者一定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18)

有些领导干部为什么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不让别人讲话呢？陈云认为，主要是两个东西作怪，即面子与地位。许多事实说明，给共产党员增光的，不是骄傲，而是谦逊。对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事物持慎重态度，请教别人，这不会丢面子，也不会降低自己的地位。(19)如果背上“正确”的包袱，自以为是，就会跌筋斗。不要以为只有上面的话好听，下面的话不好听，上面好，下面坏；上面的经是好经，就是小和尚念坏了，小和尚的嘴是歪的，歪嘴和尚念不出好经。这种说法是不对的。(20)

要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多谋以求善断

领导干部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作决策。从一定意义上说，领导就是决策。对于正确决策特别是战略决策，陈云历来是十分重视的。他多次指出，上层机构要有人专心考虑大问题。“瓜皮帽，水烟袋”，旧商人中都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21)

陈云认为，在领导决策工作中，难点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而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对情况有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这是毛泽东创造的方法。陈云说，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得出持久战的结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批驳一切经过团结

和一切经过斗争，得出既团结又斗争的结论。毛主席如果没有工明、张国焘这些反面教员，未必能那样的成熟。对于各种意见要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事物的本质。毛主席为了说明新民主主义，就把它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比较，加以区别，这样做就不会含混了。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上面这些，都是全面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22)

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对弄清楚全面情况也很重要。如果不反映党外人士的意见，党的政策就不会完全正确。这是陈云早就强调的。1941年12月，他在《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一文中就指出，各部门的负责人要经常听取非党干部的意见，非党干部有直接找该部门的负责人或各级党的干部部门谈话之权。要看到，非党干部的许多意见、批评、不满，常常是正确的，或反映了我们的某些缺点。非党干部有不满，发牢骚说怪话，并不等于思想上反对党。应该把非党干部善意的批评视为鞭策、鼓励我们的有力武器，欢迎非党干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只有彼此相见以诚，才能和衷共济。(23)

重视专家的意见，对于确保经济工作重大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是非常重要的、十分必要的。建国之初，陈云就明确指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24)财经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毛病，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机关的同志自己“业务不通”，又对专家的意见重视不够，发挥专家的作用不够。我们是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外行办事总是要吃亏的。例如天津盖仓库，和打仗一样，一看地形，说这个地方好，就在这里盖房子，一下雨，仓库塌下去了。像这样的冤枉钱花了不少。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因此，搞基本建设，事前一定要设计，要搞经济核算制，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25)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又明确提出，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不同方面的专家，往往有不同的意见，要注意和考虑多方面专家的意见，这要形成一项规定，从地方到中央，一律照此办理。(26)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正确处理各种不同意见

听到各种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就感到领导不好当，这是不少领导干部的看法。他们对待不同意见，有的采取“热处理”，当场顶回去，以权力压服；有的采取“冷处理”，束之高阁，说了也白说。这都是错误的。那么，正确处理各种不同意见的原则是什么呢？陈云说，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如果一切从自己的面子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掺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27)对不同意见，还应当采取“通气”的办法，交换看法，逐渐消除分歧，统一思想，养成一种开会讨论、随时商量的风气。在交换意见时，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决不要生气。应当看到，其意见无论对或错，对工作都有益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即使出现“闹呀，叫呀”的情况，也要沉得住气，冷静对待，妥善处理；也要坚持听他们

的正确意见，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

正确处理各种不同意见是一件难事，难点就在：当领导者有了正确的意见时，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而当领导青认识不到或认识偏颇时，能多思多谋，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不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勿因群疑阻独见，勿任己意废群言。”陈云正是这样做的，是我们效法的典范。例如解放初，第一汽车制造厂设在什么地方，当时争论很多，各主张设在北京、石家庄、太原、西安等地。陈云为此作了认真的研究。当时匡算，如果这个汽车厂全年生产量是3000辆，电力就需要2.4万千瓦，西安只有0.9万千瓦，光修电站就需要几年时间。一年需要钢铁二十几万吨，而石景山钢铁厂要五六年以后才能搞起来。木材要2万立方米，在西北砍木头，山都要砍光。还有每年的运输量是100万吨，而西安到潼关的运输量不超过200万吨，光汽车工厂就够它运的了。经过三次讨论，讨论的结果，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设在东北。又如1979年3月14日，陈云与李先念致信中央，提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尔后，有些议论，说“这会耽误三几年”。陈云态度坚决、理直气壮地说：不怕。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耽误了100多年。而且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果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因为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28)后来国民经济的发展，完全证明了陈云意见的正确和预见的准确。

综上所述，陈云运用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度的理论修养，对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形成了自己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显著特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理论，对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是陈云留给党和人民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倍加珍惜。

凡是具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广开言路，正确对待不同意见，这是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安邦治国的一个大问题。古人有言：“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百官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这些名言警句都是由无数历史事实铸成的。

怎样对待不同意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和挫折的教训。毛泽东曾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别人提不得不同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受听批评话。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大胆提意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们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员的进步。我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29)毛泽东读史时还写过这样的批注：“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对王任重等同志说过，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明代杨继盛（号叔山）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

气察群言”，并且照着去做。可是毛泽东在说这话不久，对彭德怀就没有这样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没有这样做，这是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在面临着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特别需要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信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认真总结了我们党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第6条就是“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明确规定：“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明确规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要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由此可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是从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高度来强调这个问题的。

从历史的简要回顾我们就可明了：在新形势下学习和研究陈云关于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论述，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值得各方面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重视。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员会）注释

(16)(17)(19)(23)(27)《陈云文选》第1卷，第24、114—115、115—119、260、244—249、296页。

(11)(12)(14)(15)(18)(22)(26)(28)《陈云文选》第3卷，第46、360、361—362、270、46、187、275、214、33、242—243、275、188、47、280、282页。

(20)(21)(24)(25)《陈云文选》第2卷，第329、331、299、334—335、46、132页。

(13)《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第39页。

(29)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5日）。

我国领导科学的重要基石

——读《陈云文选》的心得

陆剑杰

陈云是我党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具有丰富的阅历和卓越的智慧，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陈云的著作中，大量地论述了领导学说，同时，他在领导实践中功绩卓著，创造了许多的典范。我以为，在我党的领导学说的创立中，陈云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为我国的领导科学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作为陈云著作汇集的《陈云文选》，是这一科学体系的一块重要基石。

一 “领导方式”概念的提出和领导学说

的逐步完备

陈云在 1933 年 7 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说明他很早就自觉地把如何有效地实施领导当作必须专门研究的问题提了出来。这在我党领导人的著作中还是不多见的。他在文章结束时说：“我写了这些文章，希望大家来参加关于‘领导方式’的讨论，把个人的好的坏的经验统统写出来，增加我们自己的工作能力。支部的领导方式是做好工作的关键，有了正确的决议案还不够，要把正确的决议运用到群众中去，成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还必须经过一种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这一段话有几点很可注意：第一点，把“领导方式”作为一个需要独立地加以研究的问题提出来，并且希望引起所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的注重。我们知道，发现并确立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是创造一门学科的前提。如果我们没有察觉这样的区分性，把所研究的问题混在其他问题中间，那就根本无从建立一个学科。陈云当时的论点，已初步地把领导问题从其他问题中分离出来，向建立一个专门的学科迈出了第一步。第二点，指明了领导成败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正确的决议案”；二是对决议案的贯彻进行实际的指导。用现在通行的话，一是科学决策，二是实行决策。这应该说是领导职能的非常简明的概括。第三点，领导方式狭义地是指决策的落实。他要求做这个落实工作，必须有“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他文章中批评的那个巡视员，就是只知呆板地向支部提出工作要求，而完全不理会下面提出的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在这篇文章之后，陈云还写了一些文章，讨论领导学说问题，拓展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在《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文章中，陈云指出：“我们领导的艺术，不在于口号提得多，提得高，而在于每个口号为当时当地群众所能接受，并立刻起来斗争。”这里，仍强调领导的二要素，一是正确地提出口号，所谓正确就是合乎实际，为群众所接受，并能鼓舞群众起来进行斗争；二是组织群众实行正确口号。这二者是相互作用的。群众只能在实行某种口号的斗争中提高自己的积极性和政治觉悟，这时领导才有可能提出被他们所接受的更高的口号。

陈云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领导方式的中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这个论点，把他在 1933 年提出的“领导方式”概念具体化了，也更理论化了。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基本“关系”；而把握住事物或实践系统中的“关系”正是理论深化的重要标志。由此我们就会想到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上下级关系是领导方式的中心问题？答案是领导及其特殊实践活动的产生，是因为实践中的群体，必有其“头脑”，正如一个人的实践活动受其意志指使一样，群体的实践活动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意志，这意志的体现者就是领导人。建立了领导机制的群体，立刻就划分出若干层次，诸层次是各自内部具有特殊性和凝聚力、而相互间显著区别的结构层。在一个实践着的群体中，诸层次间有上位与下位的关系，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下级”。推而广之，又有第二个问题，除了上下级关系以外，领导活动中还有什么关系？我们从领导的首要活动——决策活动中可以得知，还有一个主体客体关系问题。因为领导是群体实践活动中的意志要素，而所谓意志要素是主体与客体发生关系的产物，它的目的也在于改造和创造客体，以满足主体需要。陈云在提出上下级关系的同一篇文章中同时强调：“领导机关决定计划，执行计划，检查工作，都必须主客观相一致。”

“计划是主观的，但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这是对领导者处理主客体关系的最基本的要求。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陈云在东北担任领导工作，建国以后长期主持党和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在这期间，陈云既对于领导学说的各方面包括决策方面和用人方面，提出了大量理论政策见解，又在一系列问题上为中央正确决策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进行科学决策的一个模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对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财政经济困难，对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决策意见，并对党的干部工作特别是新一代干部的选拔、培养的工作阐明了自己的卓越见解。

历史过程的简要分析表明：陈云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对党的领导学说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领导理论是相当完整的。陈云的论著启示我们，领导科学具有如下的理论系统：

陈云在“决策理论”、“组织理论”、“领导绩效理论”诸方面都有许多卓然不凡的论述，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毛泽东领导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二陈云决策思想中的若干基本理念

如上所述，领导科学的第一个基本部分是研究如何处理群体实践中主客体矛盾的决策理论。陈云的决策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很有特色，他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理念。

（一）政治路线和具体情况正确结合的理念。

我们听的多是理论和实践结合，但陈云的提法有些特别，他提政治路线和具体情况结合。他说：“组织工作要适合于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因此，有两个要求；对政治路线的正确了解；对具体情况的切实了解。只谈路线，不了解具体情况，是空谈。只知道具体情况，不了解路线，是盲目。要克服‘上级只谈政治路线，下级只谈具体工作，的缺点。”当然，政治路线归根到底也来自实践，由此，总的原则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的论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认识的全过程是实践中产生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这种“产生”和“指导”都是有中介的活动。拿理论指导实践来说，它的具体机制是理论指导规范，规范调控实践；这一机制是以规范（决策、设计等都是规范性认识活动）为中介的。陈云在这里谈的是规范活动进行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要以党的政治路线作为指导，研究分析各种具体情况，制订各种具体路线、方针、政策，用以指导实践。陈云提出的这个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二）“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的理念。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决策基本程序中的开发问题、确立目标、制订价值准则、制定方案、方案评估，都是一个调查研究过程。开发问题需要调查；确立目标需要调查和预测；制订价值准则需要进行环境分析；制定方案需要研究现实的情况和总结已有经验；方案评估需要预定方案同客观实际情况的比较。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个程序一个程序地办好，才有最后决策的产

生。所以，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研究情况，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的理念是完全正确的。

问题不仅在于以“后”追“前”——用现代决策科学的成果来证明陈云提出的理念；更在于以“前”引“后”——当我们确立了陈云所说“九一”说（十之九研究情况、十之一决定政策）之后，就能也才能实行现代决策科学所揭示的程序。这里的关系是思想原则或决策原则同具体决策程序和方法的关系。可贵的是陈云提出了这个思想原则或决策原则。

（三）正确认识 and 充分利用客观可能性的理念。

陈云的思想中，非常重视客观可能性的充分利用。他在1941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革命活动有扩大的可能性，……矛盾的存在和广泛深刻的发展，就使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大后方有广泛进行革命活动的可能性。”在可能性问题上，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反对夸大事物潜能的可能性，错误地把不可能性看作可能性，把非现实可能性看作现实可能性，把小的可能性看作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反对缩小事物潜能的可能性的倾向，如果说夸大可能性会导致冒进的话，那么缩小可能性就会导致保守。陈云在上引的那篇文章中，主要是反对保守主义，他批评这种现象说：“用切断历史和生搬硬套的办法，把书本子上的抽象概念套到中国来，把生动的中国看成僵硬的中国，把复杂的社会看成简单的社会，把广大的革命工作园地缩小到寸步难移，把容易深入的社会变成格格不入。”这种保守倾向是必须反对的。陈云也反对冒进的倾向，这在1956年—1960年期间表现得十分突出，在那里，他坚决反对过分估计客观可能性的冒进错误。

（四）“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理念。

陈云的这一整套辩证法理念不是偶然地提出来的，而有其思想的一贯性。1956年，他就说：“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他批评那些不弄清全面情况而想当然地发议论、作结论的同志，强调“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陈云认为，为了全面，必须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进行比较，包括正确和错误的比较。他说：“毛主席如果没有王明、张国焘这些反面教员，未必能那样的成熟。”把握全面，进行比较都有一个过程，因此必须反复。“反复”是“交换”、“比较”的历史展开。

陈云的6字原则，重点在用于决策。他讲“实事求是”与毛泽东同志所讲有一点区别：毛泽东把“是”解释为“规律”；陈云把“是”解释为“正确的政策”，“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

应该说他的解释说出了“求是”的认识终极。毛泽东曾经把“规律”分成两类：一类是客观规律，从逻辑上说，它是客观世界既有运动的内在规定的正确描述；另一类是“指导规律”，它是人在实践中把握的直接指导实践的正确规范。如果这样解释“规律”，那末两种“求是”的解释又是一致的。陈云讲“比较”，是在“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时拿各种方案来比较。陈云讲“反复”也是指“决定问题不要仓促，要进行反复考虑”。这6个字，概括了现代决策科学对于决策程序的阐述，成为决策的指导原则。

（五）决策就是选择的理念。

所谓决策，就是从各种可能的方案中找到一个既能达到预定目标、合乎

预期的价值准则，又有可行性的优化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决策之“决”就是从多中择一。陈云是承认选择、重视选择、研究选择并正确地把握了选择机制的。他在1980年就明确地指出：“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11)这种方案多元、比较择优的思想，正是现代决策科学的基本思想。他在决策中模范地运用着选择论，自觉地正确地进行选择。最明显的例证是他对于统购统销政策的选择和制订。1952—1953年，粮食形势渐趋紧张；1953年上半年，粮食供销矛盾进一步加剧。当时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同志包括陈云、薄一波等，汇总了8个方案：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认真思考后，陈云认为7种都不可选择，可选择的只剩下又征又配即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办法了。陈云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作报告，论证了这个选择结果。他说：“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12)选择就是比较，就是衡量利弊得失，就是估计后果并考察哪一种选择后果好些，工作成功的可能性大些。陈云认为：依当时的情况论，还是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办法好些。后来的实践证明：当时实行的办法为农民所接受，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

(六) 细考察、细计算、细论证的分析理念。

薄一波在介绍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时说：“毛主席说过，经济工作不像写诗，要越做越细。我体会，所谓越做越细，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做细考察、细比较、细论证，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通过周密的调查，通过计算，掌握充分的材料，研究它们内在的联系，经过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才能能动地制定出反映客观规律的计划。”(13)陈云在这方面是一个模范。

典型的例子是1959年对钢铁生产指标的调整。当年4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要求实事求是地重新考虑工业生产的指标，决定把钢的计划调到1800万吨，其中好钢1650万吨。全会以后，中央对压缩后的指标仍不放心，委托陈云进行研究。根据研究结果，陈云建议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这个900万吨就是陈云算细帐算出来的。这里，有一个数字链：

900万吨钢材 1300万吨钢 2000万吨铁 7000万吨铁矿石
1亿吨炼焦煤
600万吨耐火材料原料
多铺铁路线500公里

当时，7000万吨铁矿石等四项条件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由此就引出结论：“今年生产九百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14)

数量分析在现代决策科学中被广泛运用。这里的矿石 铁 钢 钢材……是一个因果系列。从数量的视角加以分析，就能得出我们所要求的最终结果——钢材产量。陈云给我们的启示，不在具体的数学方法上，而是决策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法上。他告诉我们，决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充分估计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必须把握住客观的条件系统，必须使主体的能动性和客体的物质

性统一起来，力争做好能做的事情。

综上所述：陈云的决策理念是很不平凡的，这些理念，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带着强烈的个性特征。这些个性特征正是陈云对我党领导理论和我国领导科学所作的杰出贡献。

三 陈云组织理论中的若干思想

也如前述，领导科学的第二个基本部分是研究如何处理上下级矛盾的组织理论。陈云在组织理论方面，特别是干部工作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这些见解即使放在跨世纪的背景上看，也是富有价值、富有光彩的。

（一）把握干部优缺点相互渗透的辩证认识方法。

人们对于对立统一辩证法，通常理解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对立面之间的关系。虽然也说它们既对立又同一，但对于这里的“对立性”特别是“同一性”理解很浅。陈云在讨论如何认识干部的问题时讲了非常重要的、称得上是对立统一辩证法真正隐秘的几

点：

其一，对立面之间的真正同一性在于它们的相互渗透性。陈

云这样写：“自高自大当然不好，是坏的，但是这种看法往往包含片面性。我们要进一步地看，每一个坏处同时也常有它的好处。这个人自高自大，但是做起事来有自信心，这种人多少有点才能，因为他起码总有点本领才敢自高自大。”“懦弱无能当然也不好，可是其中也有它的好处，好处是小心谨慎。”(15)这段论述对我们的启示，不限于如何辩证地认识干部，而在于生发开去，让我们了解辩证法的真谛。干部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作为矛盾着的对立面不是相互干干净净地分开，然后再有“对立统一”关系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地存在着，这是它们的真正同一性，有此同一性才有相互联结和相互转化的同一性。一切对立统一都是如此。世界上的一切对立物之间都是这样地用互渗透、相互包含的。在一定意义上说，知道干部的优点同时也就能推知干部的缺点；反之，知道干部的缺点同时也就能推知干部的优点。从鉴定上看不出缺点的干部，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缺点；在干部的优点之外，去找与优点无关的另一个缺点，这是认识干部的门外汉。

其二：对立面之间的特殊性在于它们的不平衡性。就干部问题而言，正常情况下，干部总是优点为主，缺点为次，缺点是渗透在优点中的潜在方面或次要方面。但是，我们的党委、党委的人事部门常常对干部的缺点看得多，看得细，时间、空间、表情、对话等等，都能绘声绘色，而对干部的优点看得少，并且很抽象，不具体。尤其是对于视野开阔、勇于开拓、敢于创新、气魄不凡的干部，从而也有与此相关的这样那样缺点的人，更是看不惯。作为一个杰出的组织家，陈云深知这种看干部的方法。他说：“只看到坏，不看到好，或者只看到好，不看到坏，这两种看法，哪一种多？一般地说，我们有些同志总是看坏的多，看好的少。有什么证据呢？如分配干部时，往往听到许多不好的话，说这个家伙自高自大，那个家伙懦弱无能，要不然，就说这个人背景复杂等等。”(16)我们必须改变这种颠倒主次的观察问题的方法。

其三：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认识干部的路线上，应当首先着重考查干部的优点、长处、业绩，再从而考查他的不足，进而研究他的优缺点、长短处的具体关系。我把这种认识方法叫做“1—2—3”。“1”

是看优点、长处，从这里入手；“2”是优点中含着缺点、长处中含有短处，要把干部的缺点和短处找出来；“3”是综合地研究他的优缺点、长短处的辩证关系，这就达到了全面性。认识的全面性既是认识的出发点（我们在认识开始时就有全面性的指导思想），又是认识的归宿（经由一个认识过程达到全面性），对干部的认识路线是如此，对一切事物的认识路线也是如此。

（二）人事相宜、用长克短的干部使用方略。

由认识干部的辩证方法，合乎逻辑地得出使用干部的工作原则。既然干部的缺点包含在干部的优点之中，那么使用干部就要用他的“长”，使这个“长”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得到规范、得到发扬、得到约束，这是克服干部缺点的基本方法。陈云提出了这样的具有经典意义的论点：使用干部“按照才干，按照需要，同时兼顾。量才为主，应急也不可免。量才的原则是用其长，不是用其短，发挥长处是克服短处的最好方法。”（17）

在使用干部时，“坚持人、事两宜的原则”（18）也很重要。人有其才干；事有其需要。应该说：人才结构和需求结构决不会完全相合，这就发生了“才”与“需”、“人”与“事”的矛盾。除了在干部教育和训练时按照需求结构来改善人才结构外，一些干部离开他原来所学的专业而改行也是正常的，并且也是有益的。例如，学自然科学的同志改做政治工作，书生改做武将等等。这样做的时候，当然必须考查干部的基本素质和潜在素质，仍然做到才尽其用。

（三）贯穿着平等精神的爱护干部的原则。

对于干部的爱护，我们党一贯重视。毛泽东就曾提出“爱护干部”的五项办法。（19）陈云在他的著作中十分重视对干部的爱护。他提出的原则，今天读来仍觉亲切。因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闹过多次“左”的错误，其特点之一就是打击广大干部。这从反面证明，爱护干部是多么重要啊！陈云的原则有如下几个重要之点：一是领导干部对下属必须采取平等态度，亲切和气地待人。他批评有些人“架子搭得很大，面孔死板板的像阎王那样可怕。”（20）这就不是平等待人，就使下级难以接近，不敢发表意见。二是领导干部必须谨慎细致地处理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他说了许多个“反对”：“反对轻视干部政治生命、随便摆布干部的倾向”；“反对滥用纪律惩办干部”（21）；反对乱戴政治帽子，“专门把任何问题都提到原则的高度”（22）；反对草菅干部政治生命，“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23）。三是对干部的训练、教育、培养、使用，让他们有所作为、大有作为，是爱护干部的最重要方面。陈云说：“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应该很珍惜地使用他们，使他们尽到传帮带的职责”（24）。对于青年干部，陈云主张“成千上万地提拔”，使他们在新时期中发挥作用。

（四）既重理论又重实际的干部教育路线。

教是为了用，教要适合用的需要。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并重，以德为主”。教育培养干部也必须从德和才两方面进行，并使之相互结合。在这方面陈云特别强调干部的读书学习，强调必须真正实行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原则。他认为干部必须认真读书，他自己就是一个苦读的模范。他说：“老干部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来指导以后的工作，但是，如果书还没有读懂，就不要急于去‘联系实际’，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还不如先把书上的东西读懂。”（25）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我们党内常有的一种经验主义性质的反读书空气是一个很好的批评。在这种空气中，乱扣“教条

主义”帽子而不让人读书，以及怕被扣上帽子而疏于读书都有。陈云却鲜明地提出：“不要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26)这里，涉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公式作为认识的总公式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就认识的分过程而言，就进入某种具体实践过程的人们而言，他们总是带着既有的认识进入实践过程的。现代的人们，必须有高度的知识准备和足够的理论武装，才能顺利完成复杂的认识任务和实践任务。这就必须强调知识准备和理论准备，强调‘干部的教育和培训，批评那种身在现代还说“刘项原来不读书”的谬见。在这一点上，陈云历来站在正确立场上，一以贯之地重视理论教育和学习，自己则身体力行。

(五) 与认识路线相一致的干部队伍建设和领导集团建设的观念。

党的干部队伍的核心是各级领导集团、特别是高级领导集团。陈云在认识路线上强调“交换、比较、反复”，这就在组织路线上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即强调集体领导，强调贯彻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否则，还会有什么“全面、比较、反复”呢？要全面，就得交换意见，集思广益，使本来是片面的看法逐渐全面起来。这就在组织上要求一个结构合理的领导群体。“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28)要比较，就得对比各种可能的方案，但比较的目的是要择取一个优化的方案，这就必须有民主集中制。可以说，发扬民主的过程就是一个比较的过程，而实行集中的过程就是对比较作出结论的过程。要反复，就要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倾听实践的呼声，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行。陈云对此解释说：“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显然，这必须是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按照认识路线和组织路线相统一的思路加强领导集团建设，这是领导科学必须重视解决的重大问题。

四几点结论

在一篇篇幅不长的论文中，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讲清楚，例如“领导绩效”问题，我就没有展开来谈，但我在上面的叙述已足以显示陈云的领导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把我学习《陈云文选》在领导学说方面的心得再简要地说一下。

第一点：陈云的著作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领导理论，甚至可以说是贯穿着领导理论，因为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和卓越领导人，一直从事党的事业的领导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来源，也是理论的主题。陈云处处时时重视领导学说，正说明他是一位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性的革命家。

第二点：陈云对我们党的领导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是他的许多重要论点，展示了领导学说的体系性，指导我们建构我国现代领导科学的理论体系；二是他在领导理论的许多基本方面都有明确的论述和思想，指导我们建立现代领导科学的基本原理。

第三点：陈云的领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表现，同时又有他的特殊的见解，特殊的实践方式，特殊的表达方式。按照着眼于特点和着眼于发展的认识方法，我们必须逐条逐点地研究陈云著作中的那些富有个性特征的论点，阐发这些论点。正因为陈云在理论思想上有他

的特性，他才对我们党的理论建设包括领导理论的建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第四点：陈云的领导理论同毛泽东、邓小平等同志的领导理论在一起，作为我们党的领导理论的整体，是我国现代领导科学的奠基石。领导科学的建设从80年代初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这项建设，当然必须重视吸收西方领导学的成就，但更应重视我党领导学说的深厚积累和杰出创造。在这样做的时候，陈云的著作应当受到更多的重视。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注释

(15)(16)(17)(18)(20)(21)(22)(23)(25)(26)《陈云文选》第1卷，第24、26、221、220、220、234—235、235、110、110、215、214、115、217、116、120、189、261页。

(11)(14)(24)(27)(28)《陈云文选》第3卷，第46—47、188、280、134、296、46、236页。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第478、527—528页。

《陈云文选》第2卷，第208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835页。

陈云和文艺工作

马荃伯

陈云并不是专门研究文艺工作的。他在一次同文艺工作者座谈时说过：“各种形式的文艺，都各有质的规定性。至于如何区别，这是你们搞文艺的人的事了，我是搞穿衣吃饭的。”确实，建国以来，陈云呕心沥血于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多次把我国国民经济从危机四伏的困境引导到健康发展的坦途，以致毛泽东曾借用《前出师表》中所引刘备的话，称之曰“能”，并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坦诚地说：“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这个评价是公正的。这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评价，而且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评价。

陈云过问文艺，除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在1943年召开的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以外，主要是在特殊机遇下业余的事。他因积劳成疾，于1957年和1959年两次到南方养病，在疗养期间曾遵医嘱欣赏曲艺。此后或在工作中有闲暇，或因政治上遭冷落，也常接触曲艺，由此对曲艺乃至整个文艺工作发表了不少意见。尽管这是一位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业余的事，是以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的身份提出来的，但由于陈云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深谙无产阶级领导艺术，因而发表的意见闪耀着真理的熠熠光辉，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仍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 强调摆正位置

陈云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身上，如何正确处理党员和文化人的关系。他说：“先得弄清楚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做党员的。可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这种党员是以文化人资格入党，而不是以千千万万普通党员中一分子的资格入党的。第二种是，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毫无疑问，党是要求确立第二种看法，反对第一种看法的。”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文化人，这里的位置必须摆正，决不能颠倒。

摆正位置，首先是党员，这个原则的根本含义是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质的规定性。什么是共产党员的质的规定性呢？按照党章的规定，他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具备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他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比工人阶级的一般成员更忠实，更勇敢，更守纪律，更有牺牲精神；他应当有共产主义觉悟，了解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一句话，共产党员应当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每个党员，不管他从事何种工作，必须在自己身上体现共产党员的这个质的规定性，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党员，而是不够格的党员，甚至是冒牌的党员。

陈云对党的文艺工作者提出这个尖锐的问题，首先是党的建设的需要。自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能不能引导我们民族抵于解放之路，能不能使革命和建设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用马克思主

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陈云要求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是党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一个原则争论，原则区别。”当然，要求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是一个党员，并不是抹杀文艺工作本身的特点。陈云根据列宁关于“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大地”的论述，强调指出：“每种分工都有它的特点，用做文化工作的方法去做军事工作不行，用做军事工作的方法去做文化工作也不行。”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对文艺工作者可以降低甚至放弃党员标准，允许他们以文化人资格入党，使党成为“各界联合会”。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蜕变成了“各界联合会”，那就只能使党丧失战斗力，名存实亡，只能使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挫折，归于失败。在这个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原则问题上，是不能有丝毫妥协的。

陈云对党的文艺工作者提出这个尖锐的问题，也是发展文艺事业的需要。我们党为发展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艺术规律、符合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方针政策。它们的贯彻执行要依靠最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文艺事业的繁荣昌盛有待于最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党的文艺工作者不必要也根本不可能包揽一切。但是，他应当在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列宁的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对党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严格的要求，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抓住了事物的关键。陈云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召开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要求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是党员，也正是抓住了整个链条上的主要环节。这对繁荣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关系极大。

应当肯定，不少党的文艺工作者是按照陈云的教导去做的，他们不愧为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但是，也应当清醒地看到，陈云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提出的这个问题，今天在文艺界的某些党员身上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文艺界的一些怪现象，有时恰恰不是出在党外同志身上，而是出在共产党员身上。你说作家应当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他说，“社会把作家捧得越高，作家的日子就越难过。我们宁愿让社会放作家一马，把小说看淡一点，小说无非是编出来的，大家看了可供一笑就不错了。”你说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吗，他说要“躲避崇高”，主张“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分的文学”。你说文艺工作者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吗，他就提出什么“心理补偿”说，“以毒攻毒”说，“乱而后治”说，“侧翼效应”说，认为一切皆不可预期，凡事都难以捉摸，把文艺效果问题搅成了一锅稀粥。你说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吗，他说：“希望政府将管作家的精力转去管更需要管的事，譬如民航，毕竟作家的活动不会比劫机更危险。”在某些党的文艺工作者中，不懂党规党法者有之，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唱对台戏者有之，只要党员的称号却根本不遵守党的纪律者有之……凡此种种，不是都证明了陈云提出的要摆正位置，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首先是党员这个原则的极端重要性吗？

怎样改变上述极不正常的状况呢？

一是要加强学习。用陈云的话来说，就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实际的政治”。他说：“要判断我们的文艺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的，合不合群众的需要，除了学习革命的理论 and 革命的实际，还有什么旁的办法？”

此可谓言之谆谆，我们切不可听之藐藐。

二是要分清是非。陈云早在1947年发表的《健全党内生活》一文中就指出：“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这是应有的原则态度，不是得罪人。否则，就会助长混乱，不能解决问题。”1982年他针对新时期出现的情况，在一次谈话中又强调：“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这对纠正当前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是非不分，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的堪忧的倾向，无疑是一剂对症的良药。

三是要严明纪律。陈云透辟地阐明了纪律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他说：“纪律与自由，是矛盾的统一。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我们的纪律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碍革命的东西，就像游泳木对于游泳的人只束缚他不要淹死一样。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

至于有些人视党的纪律为儿戏，硬要做违反党的纪律的事，那就只有按照党章的规定绳之以法。这几年来，在党员管理工作中，特别是在整党、党员重新登记、民主评议党员中，在严肃党纪、纯洁组织方面并不是没有采取措施，但确实存在着失之过软、失之过宽的现象，文艺界也不例外。这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盛衰荣枯，而且关系到党本身的生死存亡，实在不应当等闲视之，掉以轻心。

二 提出鲜明目标

陈云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把社会主义事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把党在文艺领域的方针政策概括为一个鲜明的目标：出人，出书，走正路。这本来是陈云针对曲艺特别是评弹提出来的。曲艺是我国最富于民族性和群众性的一种艺术门类，是民族语言的宝库，历史上很多大文学家、大艺术家都从曲艺中汲取丰富的营养。陈云抓曲艺，不仅出于个人爱好，更源于曲艺在文艺百花园中的地位。像曲艺这样的艺术，在社会主义时代决不能任其湮灭，而应让它大放异彩。出人、出书、走正路，这个目标固然是针对曲艺提出来的，却具有普遍意义。如果我们把“书”（书目）理解得宽泛一些，包括“书”（书籍）、“曲”（歌曲）、“戏”（戏剧）、“片”（影视）、“画”（绘画）等，这个目标就完全适用于各种艺术门类。

出人。这就是要大力培养艺术人才。从历史上看，一个文学艺术繁荣的时代，必然是人才辈出的时代。陈云非常重视艺术人才的培养。旧的传统观念往往认为评弹艺术不需要多高的文化，与此相比，陈云主张要帮助评弹艺人提高多方面的修养。他指出：“要努力提高演员的文化水平，包括地理、历史知识。要扩大眼界，增长见识，尽可能地让他们到处走走。”他还提到：“说新书，就要让艺人看报纸，看《参考消息》，了解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鉴于各门艺术的相互贯通，陈云主张汇集相关人才，促进知识互补，以形成

发展艺术的人才优势。他说：“要欢迎研究文学、戏剧、音乐的同志来研究评弹，请他们帮助，这对评弹是有好处的。”还说：“有一些新的文艺工作者参加评弹工作，很好。有适当的评弹艺人参加作协、音协、剧协的活动，也是有好处的。”为了使评弹艺术后继有人，陈云尤其重视艺术新苗的培养，他提出“评弹界也应该有自己的学校”。(11)在他的倡议下，评弹的发源地苏州终于办起了一所评弹学校，他亲任名誉校长。由此可见，陈云不仅提出了“出人”这个繁荣文艺的根本问题，而且在这方面有不少具体的建议和实践。

出书。这就是要生产优秀的文艺作品。繁荣文艺，归根到底要落实在出一批艺术精品上，否则喊得再多，也只能是一句空话。陈云十分重视评弹书目的创作和改编。在书目生产上，他主张整理旧书和创作新书并举。各门艺术都有自己的所长和所短，毫无疑问，应当扬长避短。但无论何种艺术，如果不能根据本身的特点，对亿万人民改造旧世界、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作出某种审美反映，仅仅是“老说老书，老书老说”，那么，它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有鉴于此，陈云大力支持新书目的创作，提出“对新的东西要撑腰”。对于整理传统书目，陈云也很重视。传统书目经过历代艺人的加工、提高，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这一份遗产我们理应加以珍视，并经过整理，使之流传下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创作新书目的借鉴。陈云主张对整理旧书目采取慎重态度，要“去芜存精，保留其无害的部分”。他认为对于同一个传统书目，整理方案可以“百花齐放”，通过竞赛比较，存优汰劣，取长补短。艺术生产，不论是“创新”还是“整旧”，关键是要掌握艺术的客观规律。陈云强调：“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他本人对评弹艺术的特点也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例如他说：“戏剧是现身中的说法，评弹是说法中的现身”；“评弹应以说表为主，但也要适当注意唱的部分。开篇可以成为独立形式演唱”，就是对评弹艺术特点的切中肯綮的概括。一个艺术精品的产生，往往要经过千锤百炼的过程，熊瞎子掰苞谷的做法不可能繁荣艺术。陈云指出：“书目要在演出中不断丰富加工。现在，有的书目是演出一个丢一个，叫‘一场戏结果’。”(12)这实在是切中时弊之论。陈云对于“出书”，不但大声疾呼，而且身体力行。他对评弹新作《真情假意》的扶持是众所周知的。他还曾抄录一份评弹长篇书目表寄给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的负责同志，供研究参考。这些本应由“搞文艺的人”做的事，却要由“搞穿衣吃饭的”陈云来做，怎能不使我们倍受感动和鼓舞！

走正路。这就是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走正路不走邪路，很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适应观众和提高观众的关系。各门艺术，包括评弹艺术，都应注意研究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审美心理，努力适应他们的欣赏要求。青年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完全脱离了青年观众的艺术是没有前途的。陈云说的“不要让青年就评弹，而要让评弹就青年”，“在就青年中去锻炼，出人才，出艺术”，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适应不等于迁就。观众的艺术趣味有高尚和庸俗之分，先进和落后之别，积极和消极之异。如果一味去迎合低级趣味，那就成了迁就，就会背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文艺负有提高观众的鉴赏能力的任务。陈云指出：“就青年，不停顿于迁就，要逐步提高他们。”他还反复强调：“群众喜欢听的书不一定是好的。”“书目中那些黄色的内容，过去很能卖钱，

现在仍会有人欢迎，但危害是很大的，其害处不下于传播封建思想。所以，调情的、下流的、色情的都要不得，这种传统不能挖掘。群众欢迎，也不能要。这一点绝对不能让步。”这充分体现了适应群众与提高群众的统一，受群众欢迎与对群众有益的统一。走正路，不走邪路，还要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陈云指出：“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这个原则是正确处理艺术生产中两个效益的关系的指针。陈云反对艺术商业化的倾向。他要求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前后这一段评弹的历史，说：“不研究这段历史，就不能了解评弹艺术发展的全过程。在这一段期间，评弹艺术趋向商业化，庸俗、黄色的噱头泛滥。”这实在发人深省。他说这话是在60年代初，那时文艺商业化的倾向不过是稍有苗头，如今，当这种倾向甚嚣尘上之时，我们回过头来读陈云30多年前说过的话，不能不为他的远见卓识所折服。怎样反对和抵制一味迎合低级趣味、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有害倾向呢？“扫”固然必要，但最根本的是要以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去“挤”，正如陈云所说：“我们要用走正路的艺术去打掉歪门邪道，去引导和提高听众。”(13)同时，加强评论这个“评”也很重要。陈云说得好：“批评也罢，自我批评也罢，都是我们党解决思想性质问题的行之有效的老方法。我们在文艺界也要提倡这个方法，使它形成风气，逐渐为人们所习惯。应当相信，只要是充分说理、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妨碍文艺的繁荣，而且是文艺繁荣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14)如果没有正常的文艺批评，一有批评就斥之为“大批判”、“打棍子”，乃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许正确的观点争，文艺工作要走正路不走邪路，不亦难乎？

三 敢于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要主观符合客观，思想符合实际。不实事求是，就会出现错误倾向。错误倾向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方针政策的问题上，急躁冒进，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一气，此之谓“左”；另一种是在方针政策的问题上，滞后倒退，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一味迁就，此之谓右。我们要实事求是，要坚持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要开展两争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又反对右。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某一种倾向可能是主要的，应该着重纠正，但是，如果把主要倾向看作是凝固的而不是可变的，不注意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某种主要倾向的同时对实际存在的另一种倾向视而不见，任其发展，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斯大林曾经说过：“如果想提出一种对任何时间和条件都适用的辨别主要危险和非主要危险的现成方法，那就愚蠢了。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方法。主要危险就是人们停止和它做斗争因此而让它发展到危害国家的那种倾向。”(15)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陈云最讲实事求是，因而在反对错误倾向时最敢于从实际出发。他不轻易用“左”、右这样的字眼，但在同实际存在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中毫不含糊，并且最善于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在文艺问题上也不例外。

1960年初，当“大跃进”的“左”的错误及其在各个领域的影响还在继续的时候，陈云在谈到评弹工作时就指出：“干巴巴也是缺点，应该是既严肃又活泼。穿插和噱头是要的，以前的滥放，现在又稍失之于拘谨。听众出

了两角钱，不是来上政治课，做报告也要讲点笑话。”(16)这无疑是对“左”的影响的中肯批评。

1961年下半年，党中央致力于落实政策，纠正“左”的错误，右的倾向有所露头。这时陈云指出：“对噱头、轻松书目、某些可疑传统书回的开放，应该采取谨慎态度。”又说：“挖掘、开放传统书目，千万不可一下子都放出来，回到老路上去。”(17)这不啻是一帖清醒剂，对于人们集中精力纠正“左”的错误时防止出现右的倾向是极为有益的提醒。

1962年底，当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左”的错误在政治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重又占据统辖地位的时候，陈云强调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不能以对现代人的要求来要求古人。他在谈到一部传统书目的改编时说：“书中有一些地方，古代人说现代人的话，是不合适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18)这在当时那种唯恐“左”得不够的政治氛围下，简直是空谷足音。

1977年6月，我们国家还处于徘徊时期，“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还没有得到清算和纠正时，陈云就对评弹创作发表了许多反“左”的意见，并理直气壮地说：“以前，有一次于会泳、徐景贤在上海听书，说有点‘回潮’，演员就怕了。照这样说，我今天说的都是‘回潮’。我看‘精干毕剥’，‘刮拉松脆’，一点也不‘回潮’。”(19)在幽默风趣的语调下面包含着多么坚决的反潮流精神！

1983年8月，当“文艺商业化”的倾向有所抬头时，陈云尖锐地批评说：“前些年，一些艺人在我们党落实文艺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主要表现是在书目和表演上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20)这股“风”现在已发展到“盛怒于土囊之口”的程度，而陈云的这些话是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说的，实在弥足珍贵。

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很不容易，因为这需要有敢于反潮流的胆识。当某种错误倾向像潮水一样涌来时，顺之则平步青云，逆之则引火烧身。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无私才能无畏。陈云对个人的进退安危毫不萦怀，所以他才敢于进逆耳之忠言，开苦口之良药。建国以来，他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政治上曾经几起几落，但他毫不在意，当国家建设遭到挫折的关键时刻，党需要他出来解决问题时，他总是不计得失，勇挑重担，因而被人们称之为“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种无私无畏、任劳任怨的精神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

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很不容易，因为这需要有善于避免折腾的睿智。陈云主张“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他对文艺特别是评弹发表的一些建议，从来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结果。他还主张采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以求得对客观事物比较全面的认识，避免来回折腾。他谈到评弹工作中开放噱头、轻松节目和某些可疑书回应取慎重态度时指出：“应该先经反复考虑后再开放，这样，比之乱开放后再收缩，其损失要小些。”他还说：“有些问题，没有把握宁可慢些，多考虑一下，其缺点是慢，但如果做错了，那就是失。慢和失比较起来，慢比失要好。”(21)“宁可慢些，避免有错。”这里揭示了极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较之那种违反客观规律的“快”来，陈云的主张似乎是“慢”，但其实是真正的快，因为它建立在客观条件许可的基础之上，又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是稳扎稳打、切实可行的。相

反，背离客观规律盲目求“快”，结果必然是来回折腾，求“快”反慢。“欲速则不达”，此之谓也。陈云讲的这些道理看来简单，实际包含了极为深刻的哲理，证诸现实，屡验不爽，值得我们反复咀嚼，深长思之。

四 讲究领导艺术

陈云尽管对文艺工作过问不多，但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的领导艺术。他善于根据文艺的特征和规律，为文艺工作者提供繁荣文学艺术的条件。

充分信任又不一味迁就。陈云高度重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早在30年代末，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他就强调要充分发挥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尖锐地批评了“不加分析，笼统他说知识分子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那种错误观点。他回顾了五四运动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指出：“在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22)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坚持这个符合实际的科学的估计。这是陈云充分信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根本依据。充分信任不等于一味迁就。陈云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知识分子往往有个毛病，叫做小事大方，大事小气。这里说的“小事”指日常的生活细节，“大事”指革命的紧要关头。他殷切地希望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中克服这个缺点。他还要求文艺工作者防止两种倾向，即特殊和自大。对此他反复说理，情真意切。这种爱之深、责之严的态度同那种要么骂杀要么捧杀的做法迥异其趣。

循循善诱而不强加于人。陈云从小对评弹就耳濡目染，从50年代后期起又多方接触，作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内行。但他对具体的艺术问题从来不作“指示”，而总是要求文艺工作者自己通过讨论和比较去研究解决。他说：“对疑难问题，可以用争辩的方式逐步取得一致意见。这也就是走群众路线。”当然，陈云也不吝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与评弹工作者的谈话记录和信件就有300多件，其中汇集了他对评弹艺术的真知的见。但这些意见都是以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的身份提出来的，特别是对一些具体书目的意见尤为慎重。例如，关于《珍珠塔》的整理，他不仅谈了自己的看法，还征求当时主管文艺的周扬的意见，转告给评弹界的同志，并一再叮嘱：“我仍然希望你们反复钻研一下《珍珠塔》的整理工作，不要因为我和周扬同志说了这些意见，使整理工作受影响。”(23)这既区别于那种“少过问，少介入”之类貌似超脱开明实则放弃职守的自由放任主义，又区别于那种对怎样写、怎样演指手画脚的简单粗暴作风，因而使文艺工作者感到如坐春风。

多做实事而不崇尚空谈。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如果停留在口头上，喊得再多也无济于事。关键是要为繁荣艺术做些实事。陈云在日理万机之余，对评弹艺术极为关心，常常于细微处见精神。例如，他对传统书目《描金凤》中从苏州坐船到朱仙镇或开封一节有些怀疑，不能断定明代是否有这样的一条水路，唯恐违反历史事实，闹出笑话，就特地请教了中国历史研究所的同志。经考证，这条水路在隋朝就通船了，明朝仍是通的，于是他把这个考证结果打印了寄给评弹团的负责人和老艺人，供他们参考。为了帮助评弹艺人提高文化水平，他还送给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一册《简明中国通

史》，一本《中国分省地图》，一部《辞源》。其中地图和《辞源》还是陈云自己用的。他在信中说：“送这几本书的意思，是想引起朋友们对于历史和地理进行考查核对的兴趣。”陈云对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他曾提出建议，希望评弹的伴奏乐器琵琶不用钢丝弦，说：“不用钢丝弦，有利于保护艺人的嗓子，延长艺术生命。”(24)他就是这样处处为文艺工作者着想。

“文艺工作者的良师益友”，这就是陈云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就是陈云的领导艺术的集中体现。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注释

(11)(12)(13)(16)(17)(18)(19)(20)(21)(23)(24)《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中国曲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0、24、95、106、14、64—65、78、89、114、64—65、49、83页。

(22)《陈云文选》第1卷，第273—274、274、275、277、347、197—198、276、180—181页。

《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

《陈云文选》第3卷，第274页。

(14)1984年2月2日《人民日报》。

(15)《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9页。

论陈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陈辽

陈云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我们党内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专家、理财专家著称。他的经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但他也极其熟悉文艺，他的文艺思想也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还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里，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与工人阶级内部的资产阶级风尚作斗争的问题，反对了存在于无产阶级作家队伍中的不良倾向。陈云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文艺思想，在《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党员，而不应该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文化人。“不要特殊，不要自大”。

由于文艺工作（创作、表演等）一般采取个体劳动的方式，文艺工作者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就以后，人们便称呼他是这个“家”、那个“家”，因此在文艺工作者中间，包括党员文艺工作者，常常自以为是特殊人物，旁的同志也把他们当作特殊人物。正如陈云所指出的，这些同志“感觉我是一个文化人，和旁的党员不能相比，对党的关系也要与众不同”。这种自视特殊的党内文艺工作者，搞不清楚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做党员的，竟以为自己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这种党员是以文化人资格入党，而不是以千

千万万普通党员中一分子的资格入党”。陈云批判了这种错误看法，要求确立“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的看法。陈云说得很明确：“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一个原则争论，原则区别”。“可否来一个妥协？妥协就是帮助‘各界联合会’的成立。所以。妥协的路是没有的。”

陈云从根本上批判了文化工作特殊论。他说：“党员中间是不是还有分别？有分别。分工就是分别，但是分工并不能作为特殊化的根据。……是不是文化工作比别的工作高一等？这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士大夫观点，而不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凡是对群众、对革命有必要的工作，都同样有价值，做好了都同样有功劳。一定要问什么工作最必要，那末，只有说劳动最必要。这才合乎历史的实际。而劳动者恰恰就没有向党向社会要求过什么特殊化。如果一定要求特殊，这个要求是前进的还是后退的？这是后退的要求，这是要使先锋队的党员向党外老百姓看齐，使党向‘各界联合会’看齐。”说得何等好啊！文化工作不能特殊，也不该有特殊，这是陈云对文化工作特殊论批评中的基本思想。陈云反对文化工作特殊论，但是他并不反对要照顾做文化工作的同志，他解释说，这不外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因为分工的特点。文化工作中个人活动要多一点，如果不照顾到这一点是错的。还有一个用意，是因为考虑到一部分文化工作同志的弱点。”所以，党照顾做文化工作的同志是对的，而从文化工作者方面来说，到处对人家讲，我有缺点，你们要照顾呀！这就并不漂亮了。反对文化工作特殊论；又要给文化工作者以必要的照顾；文化工作者自己则不能

要求长期照顾；这就是陈云在反对文化工作特殊论中的辩证法。

在思想上弄清这个问题以后，陈云认为，要克服文艺工作者自视特殊的问题，还得解决好遵守纪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实际的政治问题。陈云说，“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如果我们的党没有纪律，大家争论没有一个止境，我们怎么能有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怎么能不亡党亡国亡头呢！”但是，有些文化工作者却不习惯遵守纪律，因此，陈云提出，“要特别注意真心的遵守和具体的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至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实际的政治问题，对文化工作者来说，则尤其需要解决。因为，有些文艺工作者认为，做文艺工作的可以不学这两项。有的认为，学了反而妨碍文艺。也有的并不发议论，就是不学。陈云循循善诱地指出，“要判断我们的文艺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的，合不合群众的需要，除了学习革命的理论 and 革命的实际，还有什么旁的办法？严格他说，任何文艺工作都是脱离不了政治的。”“学习政治不但于创作有好处，于作家为人也有好处。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开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们去掉一些小气，少一些伤感。”这样，陈云从反对特殊的必要性，从反对文化工作特殊论和照顾文化工作者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解决特殊化这个问题等各个方面，彻底解决了文化工作者“不要特殊”的问题。

特殊来源于自大，所以，要反对特殊，就要进一步反对自大。陈云分析了文艺工作者所以产生自大的认识上的根源，“一是对整个文艺工作有不台事实的估计，一是对个人成就、才能有不合事实的估计”，并从理论上分析说明了不该自大、不要自大的问题。首先对整个文艺工作不应有不切实际的估计：“文艺工作的内容，无非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这些事情本身都是旁人做的，作家不过是将它们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是旁人不做，作家也就没有什么可表现。为什么表现实际，硬比实际做的更值得骄傲呢？”这是一。“而且天下的事情真是多得很，大得很，比如革命，就是要使全人类翻一个身的大事。文艺家就是能把这件大事完全表现出来，他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也还是不能和革命本身相提并论，何况文艺家所表现的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是二。“有些同志又觉得自己有许多读者，有许多群众，因此值得骄傲。这个想法适当不适当？我看也可以考虑。群众为什么欢迎一个作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反映他们的感情，所以一个革命的作家，一个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的作家，自然就能够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如果有人把这种关系绝对化，以为自己无论拿出什么作品来总是会有群众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不要说一个和群众走反对方向的作家，就是走同一方向，但是自己走慢了，落到群众后面去了，也会被群众所遗忘的。并且我们还要计算一下，现在我们多数做文艺工作的同志究竟有多少群众？应该承认，我们的读者还只是群众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离开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一步还远得很。在这个时候就忙着骄傲自己有群众，这就更加有害了。”这是三。从以上三方面看，确实下应该把文艺工作的地位抬得过高，对整个文艺工作有不台事实的估计。此外，陈云又指出，对个人在文艺上的地位更不要估计过高：“一个人的成就，要靠群众的判断和历史的考验，不是靠自称的。我们口称不如上秤称，看自己的知识够了没有。没有呢！我们的年纪还轻，知识还少得很。我们名为共产党员，但是对于党的知识就不多。工人工作是怎样一回事，农民搞土地革命、搞农业生产是怎样一回事，现在八路军、新四军打仗又是怎

样一回事,许多人都并不十分了解。不但革命的知识,就是社会的知识也很少。”

所以,自大是毫无理由的,而自大的后果则是很严重的。一是不求上进。“可怕的就是现在不学习,不深入群众,自以为差不多,到了四五十岁以后,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充分的知识,没有真正成熟的内容丰富的作品”。二是拒绝批评。自大的人,“自己不求进步,也不求旁人的帮助。他们最主张批评,是喜欢批评旁人,偏生最不喜欢旁人批评自己”;三是不能实行自我批评。而这“最容易丧失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架子搭得越高,跌下来就越痛。”陈云就是这样的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评和分析了自大问题,教育了文艺工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自大。

一个特殊,一个自大,是许多文艺工作者的通病。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有,外国的文艺工作者也有。陈云对这两种倾向的深切批评和从理论上的透彻阐明,具有普遍意义,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陈云对文化工作特殊论和文人自大的意见,时至今日,仍有其现实意义。我国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文艺创作的自由度扩大了;文艺创作的题材更加多样化了;青年作家、评论家在创作、评论中的作用增大了;文艺创作、文艺表演日趋繁荣。但是,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下,文化工作特殊论和文人自大的倾向也发展到颇为严重的程度。有人一味强调文艺工作特殊,文艺工作高人一等,一出场少则数千元多则二三十万元;有人否认“文艺工作的内容”“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而把超阶级的人性和人道主义作为文艺的唯一内容,或则只追求文艺的形式而不讲究文艺的内容;有人只讲文艺的主体性而不强调接触生活、了解生活、熟悉生活的必要性;有人无组织无纪律,未经政府电影部门同意,就把中外合拍的新片拿到国际电影节上放映争奖;有人化名吹捧自己,把自己抬高到令人可笑的、无以复加的地位;有人提倡文艺就是性和钱,肆意描写不堪人目的性行为,“一切向钱看”……看不到市场经济给文艺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十分错误的,听之任之不作批评和伞争更是严重错误的。在当前文艺形势下,重新学习陈云对文化工作特殊论和文人自大的批评意见,对于端正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搞好各个领域的文艺工作,无疑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

陈云喜爱评弹,而且对评弹有深切的研究。从50年代起,他就对有关评弹创作和评弹的改革、发展问题系统地提出意见。这些意见,不只对评弹创作,也对整个文艺创作都有指导意义。

一、陈云主张,文艺要反映新时代。他要求评弹艺人努力搞些新作品,反映新时代;“要反映现实斗争,说好现代题材的新书。这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评弹的传统书目,都是反映过去时代的东西。其中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传统的节目不可废,但也不能老是说旧书。陈云说得好:“不能老是用刀枪,现在喷气式飞机都快要不用了。新的总要搞。对新的,有三分好就鼓掌。我不反对老的,但要加些新的,两条腿走路。”一旦新的好的评弹作品出来以后,陈云总是满腔喜悦地加以鼓励,并希望有其他剧种加以改编。他在看了上海人民评弹团的《真情假意》后说:“上海人民评弹团的《真情假意》,是评弹中一个好的中篇,是适合青年、提高青年的作品,有切合现实的时代气息,对广大青年有教育意义。可否考虑在此基础上改编为话剧?改编时本意不变,但艺术处理应该适应各种剧种的特点。”陈云认为,新书目要积累,要保留,不能因为新书目粗糙就不支持它们。他说:“新的一年搞一个,十年就十个。现在唱十个开篇,五个新的,

五个老的，就很好。斩东西开始时难免不像样。但是新生事物有生命力。”陈云不仅提出了要创作新书目的问题，而且还讲了如何改编好、创作好新书目的问题，他提出，依据小说改编、创作的新书目，“要有所增删。唱本和看本有所不同，唱本要有更生动的描写和必要的扩充。情节可去掉一些，应突出的要突出。一个是去掉，一个是增加，再一个是搬家，旁的书上的，可以搬来。大胆增加，大胆搬家。作生动的描写，还要有抒情。”(11)陈云就是这样具体地对评弹要创新、要反映新时代、要鼓励新作品、要解决创新中的问题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意见。而这些意见的精神则不仅适用于评弹，也适用于曲艺、戏曲以至全部文艺创作。

二、陈云还提出了“要懂得观众的心理”的创造性的意见。文艺创作，说到底，是写给读者读的，演给观众看的、听的，展览给观众欣赏的，因此就了解熟悉读者、观众心理，在文艺学中也应当有读者、观众心理学的位置。但在过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家由于各种原因都未能涉及这方面的问题。陈云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而且作了论证，他说：观众、听众“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做报告也要讲几句笑话。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他批评削弱曲艺的娱乐性的做法：“目前，对评弹节目中的噱头、穿插注意不够，旧节目中原有的删得太多，新节目中则比较少，失之于过分严肃。”(12)为此，陈云研究了我国一般农民群众和工人群众的心理，说：“群众喜欢故事有头有尾，人物的结局要好。……听众有这种心理，好人不怕落难，却要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在这里，陈云只是说要了解、熟悉观众的心理，并不是主张什么题材都以团圆结束。他也肯定“苦戏”和“以悲剧结束的中篇书”，但他认为，从观众心理学的角度看，长篇说书，不能一苦到底，“不能连听七八天，尽是好人倒霉”，这却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他认为我们需要创作反映中国革命艰苦斗争的书目，“来教育青年，使他们不致忘记历史，使他们懂得政权来之不易。但是，不能只写流血牺牲这一面，还要写胜利这一面，以鼓舞人民。”(13)要不要了解、熟悉、研究群众、听众和读者的心理，这实际上是在文艺创作中有无群众观点的表现。而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心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心理。违背了民族的心理、时代的心理来创作文艺作品，文艺的民族性问题、时代性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很好解决。所以，这一观众心理问题，还关系到文艺的民族化和群众化的问题。自然，观众的心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今天观众、听众、读者的心理就和旧时代的观众、听众、读者的心理不同；我国90年代的观众、听众、读者的心理也和50年代的不一样。但是，“要懂得观众的心理”这一原则却是极其正确的，普遍地对的。陈云提出这一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贡献。

三、陈云主张，“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14)这不仅适用于评弹，也适用于一切曲艺、一切戏曲。所谓“京剧姓京”，也就是指的这一点。作为传统艺术，要改革、要发展是无可怀疑的，否则它就落后于生活的改革、发展，落后于观众、听众，影响到自己存在的前途。但是，离开了本艺术品种、本艺术剧种的特点来搞改革和发展，那就是另一样东西，不再是该艺术品种了。评弹改革中就曾产生过这一偏向，把评弹变成了四不像的新歌曲，但这样一来，评弹这一艺术品种也就不存在了。为了改革得好，陈云提出了“要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意见。出人，是最主要的。改革和发展都离不开人。没有优秀的艺术

人才，某一艺术也就不可能得到改革和发展。有了人有了艺术人才，也就有了新书目，好书目。但出人出书，都要走正路，不能搞歪门邪道。这三方面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陈云在提出“出人，出书，走正路”的同时，还就如何出人、出书、走正路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过去，艺人都是千方百计钻研艺术的。艺术必须靠自己集中心力去钻，勤奋出人才，同时还要有竞争”；“不要让青年就评弹，而要让评弹就青年。就青年，不能停顿于迁就，要逐步提高他们。在就青年中去受锻炼，出人才，出艺术”；“在编说新书时，艺术上要有所改进，老的一套也要有所改变。但不要歪门邪道，要走正路。歪门邪道中如有某些可以利用的东西，经过改造，也可以吸收过来”；“我们要用走正路的艺术，打掉歪门邪道，引导和提高观众。”(15)在改革、发展中保持传统特点，在改革中出人、出书、走正路，又在出人、出书、走正路中促进传统艺术的改革和发展，发扬传统艺术的特点，这就是陈云关于传统艺术改革、发展的基本思想。

四、陈云强调“要加强评论”，在评论工作中要发挥老艺人的作用，发挥报刊的作用。他说：“要加强评论。现在讲评弹的文章往往没有地方发表。要组织老艺人写些评论文章，他们能说出道道来，外行评论不行，要内行来评论，分析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艺术上的东西要他们来讲”。“要加强评弹的理论研究，报刊应该发表些文章”(16)。任何一门艺术的前进和发展，都离不开评论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艺术性的倡导。而在开展评论时，则必须计内行来进行这一工作，必须让报刊发挥作用。陈云的这一意见也是十分正确的。

五、陈云主张，“要加强管理，对书场和艺人要管起来”。这也就是要实施具体的领导，既要管书场，不让说坏书和内容反动的书，又要“提高艺人的思想，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提高他们的责任感”(17)。

陈云就评弹提出的系统意见，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如何改革和发展传统曲种、剧种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们对于发展和繁荣我国的曲艺、戏曲事业，其现实和深远意义都是不言自明的。而陈云也就以他的反对文艺工作者特殊和自大的思想，他的改革和发展曲艺、戏曲的纲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宝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15)《陈云文选》第1卷，第273，273—274、274、275、275—276、277、278—279、279、280、287—288页。

(11)(12)(13)(14)(16)(17)《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中国曲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81—82、30—31、51、57—58、81、108、108页。

功在于秋 ——陈云古籍整理指示与中国历史 文献研究会的发展

王酉梅

1981年，陈云先后两次对古籍整理工作作了指示，当年9月，中共中央就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专门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从此，中国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重新走上了有领导、有组织、出成果、出人才的发展道路。10多年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和陈云指示的深远影响和重大的历史意义。作为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15年来的发展，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陈云关于古籍整理指示精神的重大影响和作用。今天深入研究和继续贯彻陈云的这一指示精神，是我们每一个古籍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陈云关于古籍整理指示的出发点，首先是为了教育。他说：“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这就是说，整理古籍的意义深远，它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教育的千秋大业。当时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正如他所说，“我们的学校教育，注意理工科比较多，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但是，学理工的人也要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才行。”因此，陈云提出：“今后，在继续办好理工科的同时，应该加强大学的文科教育。”学校教育重理轻文的缺陷，不仅在大学中有、普通教育中也有，所以陈云又提出：“从小学开始，就要让学生读点古文”。在成人教育中，也有一个继承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问题。因此，陈云提出：“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得懂。有了今译，年轻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才会有兴趣去阅读。”由此可见，陈云指示的出发点是教育问题，是从小学到大学、从学校到社会，从文科到理科一切方面的教育问题。

陈云所谈教育的内容，在古籍整理指示中已经明确，就是“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这也是这项重要任务的最终目的。普及中国文化传统知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从来就应该是我国教育的重要内容，当时，全国刚刚经过一场空前浩劫，及时提出这个问题，确是陈云的真知的见。

然而，谈到继承，则非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保留下来的古籍备受摧残，原已薄弱的古籍研究队伍损失惨重。古籍整理任务十分艰巨。正如陈云所说：“我国的古籍，中华书局说有八万多种，北京大学图书馆反映约有十二万种。现已整理和出版的约两千多种，还差得很远。”

因此，要继承，首先要保存和整理，将现在还存在的，尤其是那些濒于灭绝的古籍抢救下来，把为数不多的专家和古籍研究队伍及时组织起来，进行整理研究和培养人才是非常急迫的事。陈云说：“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图书馆的安全措施要解决，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这就是说，保存和整理古籍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如何落实保存和整理古籍的任务？陈云作了非常具体细致的安排。他

说：“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连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稳定的核心力量。目前真正能够独立整理古籍的，一般来说得六十岁左右的人才行。现在这个班子中六十多岁的人，再干十年是七十岁，不能坚持工作了；五十岁的人到那时可以接上去，四十岁的人，再干二十年，也可以成为骨干力量和领导力量了。”这是从梯队来说的。从人员素质上，陈云明确指出：“从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已要有兴趣。”这样的人才，不易得到。因此，陈云说：“目前，整理古籍的专业人才，有许多分配不对口，要尽可能收回来，安排到整理古籍的各专门机构。一些分散在各地的整理古籍的人才，有的可以调到中华书局或其他专业出版社，有的可以分配他们担任整理古籍的某些任务。”(11)初步有了人才队伍，还要有一定权力的领导机构和可以依托的学术实体。陈云提出，要李一氓主持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要由规划小组提出一个为期三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第一个十年，先把基础打好，把愿意搞古籍整理的人组织起来，以后再逐步壮大队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可以像国民经济计划那样，搞滚动计划。”(12)“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钻研究所。有的大学文科中的古籍专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要适当扩大规模。”(13)这样一来，人才、机构、规划和可以依托的力量，包括整理古籍后继有人的问题，都得到了安排。

剩下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经费来源。陈云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指示应不惜抽出国家一些宝贵资金，投入这项事业。他悦，“为办好整理古籍这件事，尽管国家现在有困难，也要花点钱，并编制一个经费概算，以支持这项事业。这笔钱，用于整理古籍所需要的各种费用，主要是整理费甲和印刷费用，也包括解决办公室、宿舍等费用，要为整理古籍的专门人才创造好的工作条例和生活条件。”(14)他的指示，全面、具体而明确，为10多年来全国的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提供了关键性的物质保证。

党中央就此作出的决定及其贯彻，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的极大注意。事实上，近10年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发挥出并正在继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陈云说：“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15)的确，浩如烟海的纷繁古籍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决定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应是百年大计，是长久的课题。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研究古籍的群众学术团体，它走过的15年历程，充分显示出中国古文献研究的强大生命力和陈云关于古籍整理指示的重大作用。研究会的宗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整理祖国文献，批判地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为实现四化多作贡献。”(16)1979年研究会成立初期，正值粉碎“四人帮”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全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由于人们对于古文献的观念认识不一，有的尚未完全从“扫四旧”中转变过来，古籍资源匮乏，研究人员缺少，各大学都在恢复之中，加之研究会本身无专职人员、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等原因，研究会举步维艰。但是，会员们白手起家，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了起来。到了80年代初，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遇上了好时光。陈云的指示和党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决定，适时地为研究会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使研究会从此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近五六年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在促进科学研究，提高学术水平等方面，成绩更为显著

研究会每年开年会一次，自 1982 年起，每年出版学刊一辑。1990 年开始正式出版《历史文献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研究会每年举办的年会多结合开会地区的地方特点，讨论有关学术专题。如 1986 年在山西夏县司马光家乡开会，纪念司马光逝世 900 周年，讨论司马光和《资治通鉴》。在昆明年会上，讨论郑和下西洋。在福建同安年会上，纪念北未宰相、天文学家苏颂制造水运仪像台 900 周年，会后点校出版了《苏颂集》。在清代史学家钱大昕、王鸣盛的家乡嘉定年会上，讨论了钱、王二人的史学成就和乾嘉史学，以及嘉定人民的抗暴斗争。在汕头年会上，讨论了潮汕文化。在西安年会上，讨论了汉唐文化。在呼和浩特年会上，讨论了历史文献与民族文化，在陈寿故乡四川南充的年会上，讨论了三国文化。在河南驻马店年会上，讨论了中原文化与传统文化。

研究会创建时只有会员几十人，其中仅有 2 人为教授。现在已有会员 700 人，取得高级职称的达到 2/3 以上。当初会员集中在内地，现已遍及全国，包括西藏、海南和台湾、香港。近年来，法国、韩国、马来西亚有的汉学家也已先后入会。

研究会的科研成果除了会刊《历史文献研究》上每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外，还表现在论文集的出版和由本会组织编写的专题性研究论著的出版。

15 年来，曾列入研究会科研计划并已出版的集体著作有：

- 《册府元龟 新探》（中州书画社）
- 《中国史学家传》（辽宁人民出版社）
- 《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选注》（岳麓书社）
- 《中国古代史学家传记选注》（岳麓书社）
- 《中国古代军事家传记选注》（岳麓书社）
- 《古籍整理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 《资治通鉴 论丛》（河南人民出版社）
- 《古籍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
- 《司马光与 资治通鉴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司马迁和 史记 》（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三国人物评传》（三秦出版社）
- 《中国历史典故辞典》（三秦出版社）
- 《嘉定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
- 《汉唐史籍与传统文化》（三秦出版社）
- 《苏颂研究文集》（鹭江出版社）
- 《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选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史记 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
- 《三国志 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
- 《汉书 辞典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后汉书 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

此外，山东教育出版社委托研究会编写的“二十五史辞典丛书”，除上面已出版的几部外，其他各部也将陆续问世。“二十四史选注讲丛书”已出版 2 卷，后面 8 卷亦将出版。“中国人物评传丛书”除已出版《三国人物评传》外，其余即将出版。至于会员个人发表和出版的论著更下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仅就编、撰的专著看，80 年代以来，已有近千部书出版。

研究会对文献学理论研究和古籍的整理、注释、翻译等研究，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在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上，以每年年会为契机，先后对嘉定、潮汕、陕西、内蒙、四川、河南等地的地方文献和人文历史展开研究，促进了以上地区乡帮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15 年来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吸收人才，学者们能够济济一堂研究古籍文献，每年能被各地接待举行年会，科学研究能够得到支持，科研成果能够得以发表，除了因研究会领导团结、会员努力、办事心齐以外，也与中央和地方学术部门、行政部门的各级领导，以及社会上包括企业界在内的各界支持是分不开的。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党中央关于古籍整理问题的决定得到贯彻，陈云指示的精神逐渐深入人心的结果。

长期以来，我国整理研究古籍事业几经坎坷，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本已薄弱的古籍工作即逐年冷落。“文革”初期，古籍文物被当作“四旧”毁弃，破坏的规模是全国性的。大批知识分子成了“革命对象”，许多造诣较深的古籍文献专家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迫害。这一危机只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改变。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学者，对古籍整理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从孔子删《诗》、《书》作《春秋》，司马迁博览“天下遗文古事”著《史记》，到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都是中国独有、世界仅见的功绩。当然历代学者受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各有功过，正因此，才应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真正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更好地展开对历代古籍的整理研究，予以批判继承。所以，陈云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受到教育战线的广大学者由衷地热烈拥护。一位教授激动他说：“要向陈云同志行九叩之礼。”大家一致认识到，陈云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其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存亡继绝，抢救了濒临损毁的大批文物古籍和延续了中断的历史文献研究队伍的人展，从“左”的路线干扰和文化浩劫中扭转了局面，使中国历代整理研究古籍的传统得以继续；更重要的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确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大批的中国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对总结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经验，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厘订我国的历史疆域，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7)今天，我们整理研究这份珍贵遗产，并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真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将会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领域。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形成符合我国历史传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这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文化。”(18)因此，历史绝不能割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必须发扬，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战略意义，还在于对子孙后代的教育。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认为：“从一定的意义说，古籍研究整理工作是认识祖国的工作。……因为古籍著作，其中优秀的部分，是我们民族的重要结晶。我们民族为什么能这样悠久，为什么能有这样连绵不断的历史，而且为什么能

跟别的民族和国家不同，这都需要在我们古代典籍里找答案，这样才能对祖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19)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也说过：“李约瑟说，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不论东方人，西方人现在一谈就是四大发明，其实何止是四大发明，发明够一百项之多。……现在根据李约瑟的说法，中国文化至少是占一半的力量，跟希腊、罗马平分秋色。而这些事情由一个外国人发掘出来，我们中国人到今天没有发掘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对古典文献、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加以发掘。”(20)为了培养年青一代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使我们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和社会青年，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使他们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要为中国奋斗。正如列宁所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21)而我们的敌人历来是企图从否定我们的历史开始来灭亡我们国家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刘乃和教授说：“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我们要时刻教育青年知道自己祖国的辉煌历史。”无数事实证明，没有爱国主义的精神(22)神，共产主义世界观也不能真正确立。

总之，陈云关于整理古籍指示的精神，在宏观方面，着眼于古今中外，国家未来，明确历史不能割断，历代文明信息是靠古籍载体传递、延伸；在微观方面，着手为整理古籍出成果、出人才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周到部署。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正是在陈云指示精神的指引下健康发展，完成着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在培养劳动者素质这个关系到提高生产力第一要素的关键问题上，陈云关于整理古籍的指示的确发挥着百年大计的作用，意义深远，功在千秋。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注释

(11)(12)(13)(14)(15)《陈云文选》第3卷，第289—291页。

(16)(22)《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纪念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15周年专辑》，第4、33页。

(17)《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第533—534页。

(18)《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4页。

(19)白寿彝：《在古委会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载《高校古籍整理十年》第68页。

(20)邓广铭：《在古委会二届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载《高校古籍整理十年》第123页。

(21)《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8页。

陈云早期革命活动述略

李蕊珍姚元祥

—

陈云 1905 年 6 月 13 日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章练塘镇（今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 2 岁丧父，4 岁丧母，和姐姐一起寄居在舅父家中，靠裁缝出身的舅父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生活很清苦。他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在练塘贻善小学读完初小，经校长推荐免费进入颜安小学。镇上有个畅园书场，离他舅父家很近，陈云常常在做完功课后去书场听书。久而久之，年幼的陈云对太平天国洪秀全起义、《水浒传》农民英雄替天行道，《三国志》诸葛孔明用计等桩桩历史事件都十分熟悉，那些杰出人物义无反顾的造反精神，使他敬佩不已。同时，历代英雄豪杰不断起义惨遭失败，也使他领悟到要打倒压迫人，欺辱人的人，光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必须要组织同心同德，志向一致的人去共同斗争。陈云出生的年代，中华民族正处在危难之中，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使许多有抱负有志向的热血青年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陈云在颜安小学就读时，有位张老师在讲台上经常给学生讲鸦片战争，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故事，联系青浦教案、小刀会起义等历史故事和练塘镇日货充斥的现实，启迪青少年的爱国精神，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生活的青浦水乡也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掠夺和欺凌，这些都激励着青少年时代的陈云投身于民族救亡，祖国振兴的伟大斗争行列。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来，极大地振奋了青浦水乡人民的爱国热忱。5 月 9 日是国耻日，颜安小学师生响应全国学联号召，开展各种爱国活动。年纪比一般同学小的陈三处处领先，事事带头，在学校里首先发起组织救国储金会，动员同学捐献零用钱，一个铜板、二个铜板地凑起来。然后将捐献的钱买红绿纸，做小旗子，印发传单，张贴标语。成群结队的师生手擎小旗子，在练塘镇的街头巷尾举行爱国讲演。他们高喊着“睡狮快醒”、“不要当东亚病夫”、“打倒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等口号，慷慨激昂地向群众揭露卖国贼的罪行。不久，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运动迅速在练塘开展起来。在运动中，陈云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很强的组织能力。

陈云读完小学，进入青浦商业乙种学校读书。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国难当头，田园荒芜，民不聊生，舅舅家的生活越来越入不敷出。陈云被迫辍学，后经颜安小学张老师介绍，陈云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旧社会学徒的生活是十分艰辛的。年仅 14 岁的陈云，需要起早摸黑干活，凡是印刷手工活，他都要从头学起，什么苦活、脏活样样都做。陈云经受住了艰苦劳动的磨练，也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和注重实干的精神。学徒期间，陈云利用商务印书馆的有利条件刻苦自学，阅读进步书刊，并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他一面做工，一面读夜校，逐步提高了文化水平。在夜校，陈云结识了一位苏联籍同学，两人志同道合，感情甚笃。他向苏联同学学习俄语，对阅读俄文马克思主义小册子提供了便利。商务印书馆党的组织在工人群众中颇有影响。1925 年上半年，陈云在党小组组长董亦湘和党员恽雨棠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5 月，商务印书馆下属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总务处共设一个党支部，有党员五六十人。以后发行所单独成立党支部，由徐新之、章郁庵、陈云先后担任

党支部书记。陈云从此由一个学徒工、店员，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二

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陈云和商务印书馆职工个个义愤填膺。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商务印书馆成立了由沈雁冰、杨贤江、陈云等 10 余人组成的临时党团组织。1925 年 8 月 21 日晚，陈云主持了在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召开的党团员、工会执行委员和积极分子会议。会议议决罢工宣言和复工条件等文件，选举 15 人组成临时委员会，陈云任委员长，并决定次日开始罢工。这天陈云来得特别早，他主持召开发行所职工大会，由章郁庵报告五卅惨案经过，会场上群情激奋，纷纷要求举行罢工斗争。大会因势利导，成立职工筹备会。会后，陈云以职工筹备会名义，再去联络印刷所的职工，很快得到该所工友的响应。随即，他们马不停蹄地去总务处、编译所串联，成立了商务印书馆罢工执行委员会。在陈云等领导下，全体罢工执委日夜奔波在各所工人中间，了解情况，撰写文件，并派代表前往贤方谈判，发表宣言，开展演讲，经过斗争，迫使资方承认了工会，答应了保障工人政治权利，增加工人工资，改善病残医疗等条件。9 月 1 日，在斗争中表现突出的陈云、章郁庵等 11 位同志赢得了广大工人们的信任和拥戴，被选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陈云任委员长。

12 月，商务印书馆资方违反劳资双方签定的复工条件协议，无故解雇近百名工人。陈云等又组织工人第二次罢工，经过半个多月曲折斗争又获全胜。在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中，陈云日夜操劳，四处奔波，团结工人，撰稿演讲，显示了他出众的组织和宣传才能。

1926 年 7 月陈云在发行所职工会的刊物《职工》上发表了《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文，高瞻远瞩地指出，“震动全世界的五卅运动，将中国民族运动升至高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动摇了。”“五卅运动虽然遭受了挫折，可是在民族革命的行程里，已经显现了曙光。有组织有力量的几十万工人，已经成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先锋。五卅运动的结果证明，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同时，工人也感觉到自己力量的孤单，因为没有在中国民族运动上占着重要位置的强有力的主力——整个农民的参加。”“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唯一大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这说明，青年时期的陈云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现状、中国革命的对象、依靠力量及中国革命前途等重大问题有了清晰的、深刻的、透辟的分析和认识，已经开始表现出党的领导人的卓越才干。

经过罢工斗争，商务印书馆的工人阶级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得到锻炼，健全和巩固了工会组织，一大批优秀分子入党。1926 年 10 月和 1927 年 2 月，商务印书馆工人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1927 年 3 月中旬，北伐军抵达上海龙华，中共中央作了周密部署，成立特别委员会，并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直接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当时，闸北是起义的重点区域，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纠察队是闸北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力量，接受起义总指挥的命令，执行攻打闸北区警察署的任务。周恩来多次在赵世炎（中共特别委员会委员）、徐梅坤、陈云、章郁庵等陪同下，到商务印书馆召开党和工会骨干会议，分析形势，布置任务，鼓舞斗志。陈云等在工人中组织了

救护队、宣传队、消防队等，还进行军事演习。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战斗打响，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驱逐了直鲁军阀，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成立了上海临时市政府，起义取得了胜利。

正当革命势力迅猛发展时，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商务印书馆工会，逮捕革命同志，多数共产党员被迫离开商务印书馆，党的组织转入地下。身处逆境的陈云，表现出非凡的冷静和沉着，坚定不移地坚持地下斗争。1927年8月，在布满杀气的上海，陈云任中共沪中区委委员，继续领导党的工作。八七会议后，陈云奉中共江苏省委指示，深入青浦松江城乡组织发动农民暴动，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对革命的忠贞及大智大勇。

三

1927年9月底，陈云到达青浦，与中共青浦独立支部取得联系。他参加了青浦独支在上海刘公祠附近召开的党员会议，传达上级指示，研究部署斗争计划。

10月上旬，陈云从上海步行到青浦小蒸，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农会干部陆铨生、吴志喜联系，传达了江苏省委关于在农村恢复农民协会，培养农会骨干，建立党组织的指示。陆铨生、吴志喜听完传达转忧为喜，仿佛在茫茫黑夜里看到了启明星，他们和陈云一道深入小蒸附近20多个村庄做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陈云主持召开了青浦西乡和东乡的农会骨干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研究抗租斗争计划。会上，陈云指出：青浦是地处上海、苏州、嘉兴三角地区的中心，以青浦作为战壕，西可与松江农民联合起来，阻断沪杭铁路，支援浙江和浦东地区农民兄弟的秋收暴动；东可与嘉定地区打成一片，切断沪宁铁路，支援苏锡地区农民兄弟的秋收暴动，还可以和上海工人运动联合起来，拖住国民党反动派的后腿。陈云说理精辟透彻，参加会议的同志听完无不群情激奋。一位农会骨干说：反革命政变后，地主、走狗张牙舞爪，我们憋了一肚子气，好苦啊！陈云诱导说，为了翻身，我们妮必须革命。革命是艰苦的。过去人们说过，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应改一下，吃得苦中苦，才能得翻身！我们妮穷人只有跟共产党走，大家心连心，捏成一个拳头，才能砸烂千年铁锁链，翻身得解放。陈云通俗易懂的一席话，使农会骨干像久旱的禾苗适逢一场滋润雨。

陈云回家乡领导革命的消息不胫而走，革命群众觉得有了主心骨。一个多月后，小蒸20多个村庄建立和恢复了农会，积极准备秋收暴动，在斗争中吸收了12名积极分子参加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青浦西乡第一个党支部。为了夺取秋收暴动的胜利，陈云、吴志喜、陆铨生等决定，在一年一度的“十月朝”（农田十月初一）庙会期间，抓住成千上万的农民到小蒸迎神祭坛的机会，对广大农民进行声势浩大的抗租抗息总动员。10月25日那天，秋高气爽，附近30多个村庄的男男女女来赶庙会，镇上挤得水泄不通。中午时分，陈云和农会干部相继出现在庙会的高台上。一名农会委员说：乡亲们！陈先生来了，请他给我们讲话。顿时几千双眼睛注视着陈云。陈云微笑着向大家扬扬手，从容不迫他说：乡亲们，几千年来，我们种田人，马一样跑，牛一样做，熬辛吃苦，把垡头一块块翻转来，秧一颗颗种话，耘稻，下肥料，忙死忙活，收起来的稻谷属于我们自己的不到一半，而高墙头里的地主豪绅住

楼，吃油，穿绸，摇扇子，乘风凉，一点力气也不出，反而要拿六七成，大家看这合理不合理？群众异口同声回答不合理。陈云接着说：对！我们靠两只手劳动过日子，高墙头里的人也有两只手，为啥伊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要我们来养活？乡亲们，去年我侬减租减息，地主豪绅不答应，今年春天还要抓人杀头。今年秋收我泥一粒米也不交，干脆抗租抗息，看伊拉拿我侬咋办！我们有农会作主，共产党撑腰，大家不要怕。天下穷人要一条心。我们只要团结起来，打倒地主土豪，就能人人有饭吃，过上好日脚……。陈云精彩的讲演，不时被群众的热烈掌声打断。

11月，江苏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青浦县委，陈云任书记，（后陈云任松江区党的负责人，夏采曦接任书记），吴志喜为常委，下辖小蒸（西乡）、观音堂（东乡）、枫泾三个区委。同时成立农民革命军总指挥部，陈云任政治委员，吴志喜作总指挥。东乡观音堂地区建立农民武装纠察队，小蒸枫泾地区建立农民军，按吴志喜编写的《农民军编制法》配备了各级负责人，在松江大方庵等地制造简易武器——弹冲。陈云奔赴上海筹款购买武器，还把江苏省委拨来的10余支枪运回武装农民革命军。革命声势越来越大，暴动时机日渐成熟。

在抗租怒潮中，地主汪倾干，地保胡祖文勾结练塘水警队进行镇压。水警队长袁伯祥派水警2号枪船在小蒸三官桥摆开逼租架势，气焰十分嚣张。为打击敌人气焰，1928年1月2日晚，中共青浦县委扩大会议在小蒸河南头村召开，讨论举行农民暴动问题。陈云传达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江苏省各县暴动计划》。文件要求青浦等22个县，在阳历年关发动武装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会议议决小蒸西乡地区3日举行暴动，首先打掉袁伯祥的枪船。3日清晨，农民发现袁伯祥的2号枪船企图逃跑。陈云当机立断，兵分二路。一路由农民军总指挥吴志喜率领队伍拦截逃船，向枪船开火。另一路由陈云指挥曹家浜、姚渡等各乡村群众相继赶到现场示威，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杀尽大地主！”的口号，震天动地的呼喊声和四起的枪声，吓得水警队长和水霸们纷纷落水，弃船仓皇逃窜。这次行动，打击了青浦、嘉定两县国民党反动派，揭开了小蒸枫泾地区农民暴动的序幕。

四

打枪船战斗结束后，陈云、吴志喜将农民军和农运骨干转移到塘南、枫泾附近农村休整。地主汪倾干等勾结水警疯狂报复，他们到农会骨干家中翻箱倒柜，抓人逼租，谩骂殴打。农民军闻之，决定严惩这些地头蛇。1月5日夜，陈云指示农民军从西河山浜出发，越过铁路，渡过大蒸塘，直奔小蒸，处决了地主汪氏兄弟，几天后又出兵塘北，惩办了枫泾地区血债累累的5个恶霸。农民军杀地主，斩恶狼，一下干掉7个恶霸地主的革命行动，成为小蒸枫泾附近农民称颂的惊险传奇故事。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共产党，扒平王，财主人，泪汪汪，一夜打死7只狼！”从此，农民军声成地震，地主豪绅再不敢轻举妄动，平日里张牙舞爪的恶霸地主吓得纷纷逃到上海等地避难。

随后，陈云和吴志喜商议决定领导农民军扩大战果，先后在小蒸附近缴到各地团防局枪支三四十支，还没收地主的银元、财产、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加农民协会的积极性。东从松江石湖荡，西至枫泾，

南至朱泾，北到练塘，方圆 30 里的六七十个村莊，五六万农民参加了农民协会。当年没有向地主交一粒谷子，农民们过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不交租年。农民革命军的队伍也进一步壮大，他们经常把枫泾和新浜之间的大方庵作为活动中心，学习军事、研究工作，准备新的斗争。1928 年 1 月 12 日，陈云向江苏省委报告工作后又急速返回枫泾，与吴志喜等布置打下枫泾进攻嘉善的计划。15 日，陈云在松江草场浜何明金茶馆前，召开 500 多农会会员参加的动员大会，号召会员团结起来与地主豪绅作坚决斗争，并决定于 1 月 22 日（农历十二月三十日）乘逃亡在外的豪绅地主回家过年之机，出其不意地将其一网打尽，举行枫泾暴动。陈云亲自赶赴上海，设法运来一批枪支弹药，加强了农民军的力量。

枫泾镇上的自卫团得知农军要攻打枫泾的消息，向江苏省政府和松江县政府急速密报，并联合请求浙江嘉兴驻防的二十六军驰援，向农民军进攻。19 日凌晨 4 时，千余名敌人分水陆两路包围农民革命军活动地区，一路沿沪杭铁路搜捕，一路从水路直扑林家浜、蒋家浜。当时大雾迷漫，农民军被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包围。在突围时，吴志喜和陆尤飞殿后掩护，弹尽被捕。当天下午 3 时，正在上海开会的陈云，不顾被敌人逮捕的危险，赶到枫泾了解情况，商量对策后又火速返回上海，把被捕人员情况向江苏省委报告。省委派王若飞、陈云、夏采曦到松江设法营救。后经多方努力没有成功。1 月 26 日，吴志喜、陆尤飞英勇就义，小蒸、枫泾暴动虽遭挫折，但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强大的上海、江苏地区高举暴动的义旗，对封建恶霸地主和国民党反动军阀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同时，也教育和锻炼了广大农民群众，扩大了我党在上海、江苏农村的影响。小蒸、枫泾农民暴动，充分表现了陈云、吴志喜、陆尤飞等中国共产党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

五

暴动失利后，青浦、松江两县国民党反动政府先后进行 7 次大规模武装搜捕，松江驻军团部和松江县政府贴出布告，通缉枫泾区“案犯”陈云等 24 名人。陈云临危不惧，于 1 月下旬从容布置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转移到上海，并给被捕同志送药、送钱。他勉励同志们说：吃官司是到外婆家去走亲戚，枪毙是告老还家，有何怕呢？要革命就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陈云化名陈亨，隐蔽在群众家中坚持斗争，后到浙江嘉善，住在舅父可靠的朋友家中，继续联络和指导各地斗争，从未间断革命工作。他时而深入松江、青浦，时而出入上海。在直接分管浦南工作后，曾指派枫泾的党员到金山浦南区委帮助工作。

1928 年 7 月下旬，陈云在金山召开会议，贯彻江苏省委 6 月《关于江苏农民秋收斗争决议案》，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浦南秋收暴动决议案》，精心指导浦南区委组织工农（盐民）群众，发展党组织，准备秋收抗租抗债抗税斗争，并筹建农民武装，亲自设法力区委购置枪支。8 月，陈云根据江苏省委秋收斗争决议案的精神，指示松金青县委负责人袁世剑和颜桂龙、王子琴等迅速奔赴枫泾地区沪杭路南片发动群众，恢复基层组织，建立 17 个支部（有党员六七十名），重建枫泾区委，领导反霸减租斗争，使革命烈火重新燃起。10 月，中共淞浦特委在松江钱家草村成立，管辖松江、金

山、青浦、奉贤、南汇、川沙、嘉定、崇明、大仓、宝山等 10 县，书记杭果人，陈云任组织部长。10 月下旬，陈云回练塘秘密召开小蒸、练塘地区党员骨干活动分子会议。他语重心长他说：“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但也不要轻举妄动。在敌强我弱形势下，要采取隐蔽斗争，加强团结，积聚力量，继续奋斗。”

1929 年入春，陈云重回练塘，主持召开青浦县党员代表大会，传达江苏省委关于建立中共青浦县工作委员会的决定。会议确定今后的任务是整顿组织，改进工作方法，采用单线领导，总的方针是力求隐蔽，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坚持斗争。8 月，陈云被增补为江苏省委常委、农委负责人。9 月，他又担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1 月，他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并作了《江苏农民运动的报告》，指出：“党在现时农民运动中的政治路线，仍然是加紧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在指导思想，党必须坚决领导农民，深入开展上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在国民党军阀统治较为巩固的江苏，斗争是十分艰苦、复杂的，但从地主那里夺取武器，装备自己，小的队历的存在是可能的。而且，即使游击战争暂时失败了，但是它的影响将会扩大，游击队将会继续发展，农村斗争一定能够开展起来。陈云的报告，对明确农民运动的政治路线，促进江苏农民运动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1930 年 9 月，陈云任江苏省总行委外具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0 月任组织部氏、外县工委书记。

在上海，陈云先后担任闸北、法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运动。1930 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 年 1 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5 月，任中央特科书记。9 月被指定为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2 年 3 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1) 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陈三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党的优秀领导人。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青浦县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青浦教案：1848 年 4 月，英国 3 个传教士违反规定至青浦传教，与中国漕运船水手发生争殴。被逐回上海后，英驻上海领事无理要求中国拿犯惩凶，清政府卑怯求和，革职官员，拿办水手，并扩充英租界 2000 余亩。

参见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

《陈云文选》第 1 卷，第 2 页。

参见《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

参见《中国共产党青浦县组织史》。

参见青浦县小蒸乡 1958 年征集史料。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组织史》。

(11) 参觅《中共中央组织史资料》。

陈云在中央苏区反对 “左”倾错误的贡献

盖军

在 10 年国内革命战争的前 8 年，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指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及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连续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经历过三次“左”倾错误的陈云，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注重求实，一次比一次更清醒。例如，1930 年 4 月，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错估当时形势，不顾主客观条件，要求五一节在全国，首先是在上海发动群众举行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当时担任法南区委书记的陈云，同在沪东区的刘少奇一样，注意从实际出发，认为当时形势不具备举行飞行集会的条件，没有积极贯彻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决定，因而 5 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被指责为“采取敷衍的形式”，使中央的决定没有完全实现。本文着重叙述他在中央苏区时反对“左”倾错误的一些史实。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使中共中央在上海不能立足。1933 年初，陈云随临时中央迁入了在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近两年的时间里，陈云先后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和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职务。在领导工作中，陈云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注意从当时当地实际情况出发，撰写和发表了 10 余篇文章，对纠正苏区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指导白区工作策略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批评照抄《劳动法》的教条主义

1931 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以后，其“左”的一套方针、政策陆续贯彻到各个方面。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个劳动法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商议起草制定的，体现了保障工人阶级的权益和工会组织的权利。1932 年 1 月 1 日劳动法生效以后，苏区工会组织在贯彻劳动法、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改善生活待遇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工人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支援了革命战争。但是，这个劳动法是照抄了苏联的劳动法，没有从中国当时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多是在山区或几省交界的边陲地区，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只有规模不大的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劳动时间很难作固定的规定。有的部门，如军工、农业、航运等部门，还须允许工作时间长一些。但劳动法不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而是机械地规定成年工人一律每日工作 8 个小时，青工 6 小时，童工 4 小时。按此规定，如果一个贫农雇佣每日只做工 4 小时的牧童，须雇佣两个以至三个牧童来放牛，显然这个贫农负担不起工钱。其结果，农民不再雇佣牧童，而使牧童失业。劳动法不从实际出发是十分明显的。

劳动法还规定了过多的休息时间，如规定“工人每周经常须有继续不断的 42 小时连续休息（即星期六工作半天，停止夜工，星期日整日整夜休息）”；“在任何企业内的工人继续工作到 6 个月以上者至少须有两个星期的例假，

工资照发”；还规定每年除地方性的纪念节日外，还有全苏区性的8个纪念日都要全天休息。这些都是脱离中国实际，照搬了社会主义苏联劳动法的做法。中共中央照搬苏联劳动法，根据地又照搬“一苏大”的劳动法。执行的结果，在汀州、瑞金、会昌、石城等地有不少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师傅不愿带徒工，有的县只有几个学徒工，农民不愿雇用牧童，牧童也失业。

陈云进入中央苏区后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1933年4月25日，他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了这种教条主义做法，指出：“机械地执行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不问企业的工作状况，机械地实行八小时和青工六小时的工作制。”同年6月，他以全总党团书记的身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巡视工作中，他发现“中央苏区的职工会过去虽然领导工人与雇主订立了许多合同，但是很多合同的条文，都是照抄劳动法和江西、福建两省工会所发的斗争纲领，所以大半是千篇一律，没有地方性，没有企业的特殊性，没有时间性”，所以“不能适合当时企业的实际情形”，“好些没有实行”，“就连工人也感觉到难于实行。如店员和木船工人都机械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和星期日休息。这就不能动员工人积极地为自己合同的每一条文的实现而斗争。这是过去签订合同中普遍存在的毛病。”陈云指出这种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我们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间，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并不深入群众，不去估量商店、作坊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形，只是提出一般的并不适合每个企业的笼统的要求和纲领。所以，各业的集体合同虽然不断地订立，但是每个行业工人的迫切要求仍是没有解决。”针对这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陈云要求：“党和工会对于经济斗争的领导，必须纠正官僚主义。要重新审查各业集体合同的具体条文，审慎地了解各业的每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不能不顾实际情况，不体现出各企业的不同工人的具体要求，千篇一律地抄录劳动法。”为了纠正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陈云还在汀州亲自指导企业重新订立劳动合同。1933年7月2日，他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介绍了他领导京果业订立合同的办法，强调要“首先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形”、了解“对于企业在现在情形下订立合同的意见和要求”，“经过这个考察，使我对于企业情形和工人情绪有了大概的了解”；第二，“以党支部为中心去动员群众，加强支部对工人签订合同的领导”；第三，根据当时国民党加紧对苏区经济的封锁，许多货物不能运进，“即使工人不吃老板饭、不拿工资、老板仍要亏本”的情形，应该订立实际的适合汀州京果业目前情形的“有弹性的合同”。他在详细介绍了合同的9条内容后，又着重指出：“对于八小时工作和星期日休息这两个条件，不是呆板的，而是灵活的。我们应该领导工人坚持要求八小时工作和星期日休息，因为这是工人阶级的基本要求，不能放松。但是，八小时工作时间的运用，星期日休息的办法，是活动的，不是机械的。这正是估计到商店营业上特殊的情形。”文章既批评了过去的错误，又具体地介绍了汀州订立劳动合同的指导思想、办法和条文内容，用汀州的典型经验推动全面，从而使根据地的工人与雇主签订了较为切实可行的劳动合同。此后，苏区的学徒工逐渐增加，工会工作也有改善。

1933年3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38次例会决定修改劳动法，并于同年4月组成修改劳动法的起草委员会。10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颁布了经过修改的《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劳动法》，宣布 1931 年 12 月 1 日颁布施行的劳动法作废。经过修正的劳动法，修改了某些脱离苏区实际的过高的经济要求的条文，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倾劳动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对劳动法的修正，陈云是有重要贡献的。

二反对“左”倾的经济政策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坚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根据地必然推行“左”倾经济政策。同时，由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教条化和苏联 30 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使当时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还不懂得在农村根据地应当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提高生产力。“一苏大”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虽然在工商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方面的某些原则是正确的，但在当时严重的“左”倾思潮下，不可能正确对待私人工商业。例如，在中央苏区的汀州、瑞金、会昌、石城等城市，除了上述对工人工资、工时、福利待遇等都作了当时苏区经济条件不能允许的过高规定，造成了许多私人企业倒闭以外，甚至还提出了“吃完再说，不管将来”的口号，实行强迫介绍失业工人的方法，不管企业是否需要，工人是否合乎条件，都要求收下来，也使一些私人企业垮台。再如，“一苏大”通过的土地法没有规定要实行保护地主和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的政策，相反地，却规定要没收地主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没收富农的水碓和油榨等作坊，这就使地主和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受到侵犯，使许多私人工商业倒闭。

对私人工商业的“左”倾政策还表现在 1932 年 7 月临时中央政府公布的修改后的《暂行税则》。1932 年上半年，临时中央错估当时形势，认为很快就会夺取中心城市，完成湘鄂赣几省的首先胜利。为实现这个冒险计划，党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于同年 6 月解除了主力红军筹款的任务，由苏维埃政府以增加税收课征的办法来筹措急需增加的战争经费。为此，临时中央政府发出训令，决定“提高营业所得税的累进税率”。贯彻这个决定就使商业税的起征点由资本 200 元改为 100 元，降低了 50%。这样，仅有资本百余元的小商小贩比过去的负担也加重了，既不利于发展商品流通，也不利于团结小资产阶级。

“左”倾错误还表现在把国民党统治区工人斗争的方式同革命根据地工人斗争的方式不加区别，在苏区采取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的斗争方式。例如，1933 年的年关斗争中，中央苏区几个仅有的小城市，如汀州、黎川、建宁、石城、寻都、会昌等地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有的甚至对雇主实行扣押、监禁、罚款、戴高帽子游街、没收财产、货物，等等，使许多手工业作坊和店铺被迫停业，工人也因此而失业。1931 到 1932 年苏区经济不仅没有多大发展，相反从 1932 年下半年，苏区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工业品缺乏，物价昂贵，有些地方发生粮食饥荒，影响了革命战争的进行和根据地的巩固。这些困难的造成，除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加紧经济封锁等客观原因外，主要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在苏区推行了“左”倾的经济政策。

陈云到苏区不久，即着重批评了苏区经济斗争中的“左”倾错误，指出苏区当时存在着“一种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只看

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这种‘左’的错误领导，是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话虽不多，反映了陈云当时认识问题的高水平。第一，当时有的倾向和“左”的倾向都存在，但“左”的倾向是极端危险的；第二，“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经济政策和劳动政策上，这些错误不仅破坏苏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共产党政权的巩固；第三，“左”的倾向主要是领导上的错误，它会丧失政权，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

陈云还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经济斗争中举行总同盟罢工，不但妨碍商品流通，妨碍红军的作战行动，而且会被资本家利用来反对工人的斗争，对苏维埃政权实行经济总工。因此，这种总同盟罢工，不但是斗争方式上的错误，而且是政治上的极大错误。”

在列举经济斗争中的“左”倾错误及其危害之后，陈云指出：“这种错误，主要来源于政治上的工团主义。”所谓工团主义，即鼓吹工会高于一切和管理一切，极力把一切斗争引导到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日等经济要求上去，主张实行罢工、怠工、抵制、示威，甚至破坏机器、原料和产品，以达到经济利益的满足，总之，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不顾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陈云指出：“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把发展苏区的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要使工人了解，不彻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因此，要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地联系起来。”可见，在陈云看来，工人阶级不仅要把发展苏区经济放在首位，并且要把发展经济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

三开始扭转脱离实际和 关门主义的白区斗争策略

1933年冬，为了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加强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成立白区工作部。

同年12月5日之后，陈云根据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情况，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连续发表文章，在肯定某些成绩的同时，着重批评白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陈云在《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一文中指出：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的开展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然而我们为什么没有开展起来呢？因为我们工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最重要的是没有积极地组织、发动与领导广大群众的日常斗争。他指出：已往的观点，“仅仅注意发展组织”，想“等到组织好了再领导斗争”，这是不能得到预期效果的。党“必须领导群众一切日常斗争，才能从群众切身的经济的政治的要求上，把群众斗争发动起来”。他特别强调：“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是组织群众与领导群众为政权而斗争的最重要的步骤。”这些日常斗争，就是“反抗强迫修路，反对限制卖盐（白区群众贩运盐、布等日常必需品进苏区，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来源）等等白区群众生活上的迫切要求”。“党在每一个环境中，每一个斗争中，提出的口号，必须是群众自己斗争的口号，每个口号必须为群众自己所了解，而巨为了这个口号来斗争。”

他还指出，我们在城市中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也必须“放到领导工人日

常经料争的任务上去”，例如，要求改良待遇与反对失业饥饿；在敌军的士兵中，也要认识日常经济斗争的重要性，发动他们“要求发清欠饷”、“要求发清伙食尾子”、“反对官太太的‘合作社’的剥削（强迫士兵高价购买官办‘合作让’的日常用品）”、“反对长官的压迫”等，“这些斗争的发动，都可以提高士兵反对国民党的情绪。”

陈云强调注意领导群众日常的斗争，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斗争，是总结了“左”倾教条主义不顾条件、不顾群众觉悟，每一次斗争必须联系政治口号的经验教训，是白区斗争策略转变的开始。“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他们在白区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方面总是搬用一套机械的公式——小斗争发展成大斗争、大斗争定会发展成为暴动。他们常常提出过高的要求，把政治要求机械地加在群众的经济要求上，不顾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一些群众不理解或接受不了的政治口号，即刘少奇后来所批评的“只管原则。下去实事求是”（11）。这样就不能真正发动群众，常常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也就无所谓积蓄力量。

在1934年1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陈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并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在实际指导白区工作中，他注意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灵活地广泛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重要思想。1934年5月，他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福建事变中党在福建的职工运动》一文，批评党在福建事变时领导工人斗争中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出，我们在福建事变中“争取群众的基本策略，应该灵活地广泛地运用统一战线，这个策略的实际运用，就是一方面在反帝反国民党，反对资本进攻，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等等口号之下，聚集和联合共产党影响下的，和一切无组织的工人，来共同地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南京政府，来共同地争取共同要求——反对资本进攻，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真正广泛地开展工人群众的反帝反国民党反资本进攻和组织工人自己工会的运动。如果拒绝或过早地破坏这个必须的统一战线，那就非但不能开展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客观上实际上帮助了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12）这段后的基本精神，简言之就是聚集和联合一切派别的工人的斗争力量，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当然，这段话仍然有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与反帝反封建并列起来和下层统一战线的“左”倾观点，但提出联合一切派别的工人，这在转变斗争策略方面是一个明显的进步。文章指出：“如果我们精细的检查我们在职工运动中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成绩的原因，这就必须指出我们福建党与工会工作的同志，不曾正确地了解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具体工作中不会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拒绝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开展，阻碍了党去争取群众。”（13）

陈云在文章中列举了关门主义的表现，主要是：

（一）只是清高地空喊一些口号，没有去实际地领导斗争。他说，在福建事变中，“我们党的任务，必须去领导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建与厦门的暴行，发动与扩大这个运动，组织工厂学校的反日的大会示威，组织各个工厂的反日会，进行抵制日货，检查日货，以这些群众行动来开展反日运动。”“但是，在这些具体的实际工作上，我们除了召集准备不足的一个反抗飞机轰炸的大会以外，其余没有进行”，没有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反日反蒋与组织抗日人民军的空谈变成实际的行动。

(二)不懂得利用合法组织形式与合法机会去争取工人群众。文章指出：“当着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允许’工人组织工会与开始登记时，党与工会完全没有利用这种可能去公开地在群众中去组织工会，反而是单独依靠自己狭小的力量去组织群众，对于文化委员会与黄色工会在工人中的活动，采取完全忽视与不愿‘同流合污’的清高的态度。”陈云说，“关门主义最标本的例子”是，当着黄色工会高叫组织工会时，“我们党的支部与工会不但始终不理，等到黄色工会向着我们工会小组的会员登记时，我们拒绝登记。我们把成千的同一职业的工人组织工会的运动完全不理，而满足几十人名词好听的‘赤色工会’。”拒绝登记后的第二十步骤，“就是‘准备当文化委员会组织了该业黄色工会时，我们的小组才加入黄色工会进行革命反对派的工作’，(14)这种狭隘蠢笨的关门主义，非但不能组织工人群众的工会，而且相反的，将给黄色工会以后在群众中宣布我们破坏工人的团结”。陈云在这里实际上是批评来自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他指出，组织工会是工人的要求，决不能简单地看成文化委员会要组织工会，那么，我们“就不但下应拒绝登记，拒绝组织工会，相反的要积极领导来组织自己的工会。当然，文化委员会的企图是要组织一个他们控制与垄断下的工会，党的策略是要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但是，在那种情形之下，我们也要参加文化委员会的登记运动，“只要把组织工会与改善工人生活的经济斗争联系起来，我们将完全可能争取群众于我们影响之下。”他批评说：“这种关门主义也同时暴露出我们同志把赤色工会看成不是群众工会，只是工人小团体，或者赤色工会总比群众工会高一些的错误观点。因此将许多政治条件来阻止工人加入工会”。因此，他论述了什么是赤色工会。他说：“只要工会是工人自己管理的，只要工会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只要工会脱离党政机团的关系，只要工会掌握在共产党员领导之下，虽然还有许多工人不了解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革命，或者名称不叫赤色工会，但这个工会也无疑义地就是赤色工会。”陈云接着指出，福建政府文化委员会改组一些国民党的黄色工会，成立总工会，这是共产党利用合法去争取群众的好机会。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引起积极的注意，总工会所召集的一些工人的群众代表会等，我们没尽一切可能去参加，争取在会议上发言。我们对于海员、码头、各工厂黄色工会的工人，采取了‘清高’的关门主义，因而我们对于争取工人群众的工作，没有什么成绩可言。(15)

陈云在这篇长文中，从实际出发，敢于尖锐地批评党和工会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并以大量的事例揭露错误，论述了他关于白区斗争策略方面要充分利用合法的思想。这说明在陈云担任白区工作部部长时，白区斗争的策略已经开始有了转变。

1934年6月7日，陈云为中共中央编印的一本内部学习的小册子所写的前言，即《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进一步总结过去“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更明确地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党在白区的一切组织的任务，“是要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如反对苛捐杂税，要求减捐减税，要求自由买米买盐，反对抽了筑路，要求筑路给工资，等等”；在城市中“要抓注工人和贫民任何的细小的不满，领导和组织他们的斗争”，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的群众。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陈云指出：“在领导斗争中，不是要提出许多要求，不是要提出过高的群众还不了解或不能立刻为这些要求而起来斗争的口号。在提出要求时，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适合

他们的需要，并估计到争取每个日常斗争胜利的可能性。我们领导的艺术，不在于口号提得多，提得高，而在于每个口号为当时当地群众所能接受，并立刻起来斗争。”他还提出，“组织上的发展和争取每个日常斗争的胜利，是检查领导个争的成绩的主要尺度。”(16)

从上面概略摘引陈云关于白区斗争策略思想的论述来看，不仅标志着党的白区斗争策略的开始转变，也是他对于我们党关于白区斗争正确思想形成的重要贡献。

无论对苏区工人斗争中的“左”倾错误的纠正，还是对白区斗争的策略，陈云都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意见。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在会后撰写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样重要的历史文献，就决不是偶然的了。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16)《陈云文选》第1卷，第9、13—14、9—10、13—19、9、11、9、10、26—27页。

《斗争》第37期，第14页。

《斗争》第38期，第13页。

(11)《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

(12)《斗争》第58期，第16页。(13)《斗争》第59期，第16页。

(14)这里引的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指示。

(15)《斗争》第39期，第16—19页。

陈云与《随军西行见闻录》

吴忠才何成学

陈云在莫斯科化名写作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长征的光辉业绩，1936年发表后，在国内外都起了很好的影响。这篇约3万字的长文，也是至今研究红军长征的重要文献性资料。探讨陈云写作这篇长文的有关问题，对研究红军长征的历史，阐述陈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很有意义的。

一长征中的陈云及其奉命离开 长征队伍返沪赴苏的情况

长征之前、陈云就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1月，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并兼往白区工作部部长。2月，当选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长征前曾负责管理军需生产。10月参加长征，先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1935年1月红军占领贵州省遵义城时，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5月初，红军北渡金沙江，任渡河司令部政治委员。在遵义会议上，陈云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他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到部队传达会议精神，并支持和配合毛泽东指挥乌江战役。5月底，红军夺取泸定桥后，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会议。会上决定派陈云回上海恢复白区工作。不久，陈云在当地地下党组织派出的党员席懋昭 and 随红军长征的冕宁地下党员陈梁的护送下，从灵关殿出发，经天全、雅安、成都到重庆，转乘“民生”号轮船，于6月底到达上海。

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的目的，一是为恢复党的白区工作，二是为了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央在遵义会议总结中指出，“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遵义会议后不久，3月5日，中共中央接到红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知道上海中央局已于1934年10月被敌破坏，我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因此中断（后来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局和与共产国际取得一些联系的情况，中共中央不了解）。为此，3月间，张闻天（洛甫）通知长征队伍中的潘汉年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再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电讯联络。潘由遵义到贵阳，绕道广州、香港到上海。潘到上海后，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之一的浦化人说，上海方面“已没有国际方面负责人”。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不安全，浦就让潘到香港去等候消息。因此，潘汉年去上海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5月31日晚上（一说5月29日晚，误），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了会议，会议决定再派陈云、李维汉去上海执行任务。陈云回忆说：“1935年6月，到了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我就离开了。这是中央开的泸定会议决定的，决定恢复白区工作。”李维汉回忆说：“部队飞夺泸定桥后，就向天全、芦山前进。休息时……洛甫对我俩说，白区工作很重要，中央想派你们两位去白区工作……后来我因为有事，没有去白区工作，陈云就从天全、芦山一带出发，到白区去了。”

关于陈云离开长征队伍的时间，有遵义会议后不久、5月、5月底、6月、6月中旬等几种说法。笔者认为，6月中旬说较为准确。若说“遵义会议后

不久”，显然不对。说5月和5月底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周恩来、毛泽东是5月31日傍晚才先后过泸定桥的。因此，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的会议，最早也应是5月31日晚上才能召开，而不可能是5月29日召开。既然如此，陈云也就不可能当晚离开长征队伍。从上述陈云、李维汉回忆的时间看，陈云是红军占领天全、芦山之后才离开的。陈云的向导亦持此说。而天全、芦山是红军先头部队于6月7日、8日攻下的。因此，陈云至少是8日以后才能离开长征队伍。又据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说：“不久两支赤军即已会合，而我于此时……得安全返抵家乡。”查两支红军即红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是1935年6月12日在懋功达维镇会合的，而陈云离开队伍的地点灵关殿则在懋功附近。因此，陈云应是在6月12日之后离开长征队伍。再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一辑）中所收录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这三篇文章所反映第一方面军长征中前后衔接的行军轨迹来看，第一篇文章叙述事件结尾的时间、地点与第二篇文章叙述事件开头的的时间和地点均力6月中旬、懋功地域。是故说6月中旬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是比较准确的。

陈云到达上海的时间已是6月底。在上海，他一时找不到组织关系，几经周折于7月底才找到了早年与他在商务印书馆一起工作并任党支部书记的章秋阳（章乃器的三弟），又通过章找到了在临时中央局机关工作的杨之华、何实嗣（何叔衡之女），终于接上了组织关系。这时，党组织通知在香港等待指示的潘汉年来沪见陈。与此同时，陈云等接到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指示，要他们立即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是，在宋庆龄的安排下，陈云、陈潭秋、杨之华、何实嗣、曾山等，于1935年8月5日前后，从上海出发，乘坐苏联客轮秘密地到达海参崴，两天后又启程赴莫斯科。他们到达莫斯科的时间是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刚好也在这一天闭幕。陈云回忆说：“途中经半月，列达之日适逢国际七大结束。”

二 《随军西行见闻录》 的写作和发表情况

有人说，是美国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也有人说是王稼祥于1936年初在苏联治伤期间，最早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情况。其实，斯诺的书的英文版首次出版是在英国，时间是1937年10月（因其为英文版，在世界传播影响范围比《见闻录》和《英勇的西征》大一些）；而王稼祥在苏治伤时间也是在1937年。这都比《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要晚一年多时间。由此可以说，是陈云首次比较全面地把英勇卓绝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事迹向世界人民宣传的。

陈云是于1935年秋在莫斯科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他化名廉臣，以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时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随军医生，又在红军中工作了一段时间的红军医生的假托身份，叙述了红军从准备长征到出发，历尽千难万险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情况。作者（医生）也正在这时被“冲散”，在朋友帮助下及时回到“家乡”。在当时情况下，作者之所以以这样的身份来写作，是有其深刻的用意的。一是医生易接近红军上层领导，这样可以叙述从上层看到的一些红军长征全局的情况，又因系医

生，未能参加决策活动，因而也可以避免谈一些党内机密（如遵义会议等）；二是可以从中间立场上来反映红军长征历史，可以从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作为中，宣传共产党得民心的事实，从而攻破国民党反动派污蔑共产党和红军的谰言，又可以从一个在国共两党军队中工作过的人员身份，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呼吁国共再度合作抗日。这样有利于向世界上不同观点的人宣传，利于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传播。

《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最早于1936年春公开发表在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全民月刊》上。该刊是我党领导的一个宣传阵地。同年10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从现有资料看，这是第一本问世的长征专著。1937年3月，王福明在北京编辑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中，曾将《随军西行见闻录》列于书后，并附有照片、歌曲和红军长征路线图。1938年，《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首次在国内出版单行本，书名改为《随军西征记》，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发行。1949年6月，又以原书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群众图书公司发行。这时上海刚刚解放，此书的出版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此外，抗战初期，有的人以为廉臣和斯诺都是美国人，也有的将廉臣的书和斯诺的书当中一些片断台编为小册子出版。如明月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时，署（美）廉臣著《从东南到西北》；大文出版社1939年1月出版时，署（美）史诺廉臣等著《长征两面写》。以上是《见闻录》出版的第一阶段。

该书出版的第二阶段是建国后至1984年。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就收进了《见闻录》。1958年2月，此书再版。1959年，此书以《长征》为名在莫斯科出版，《见闻录》亦作为《长征》的第一篇收在书中。此外，一些地方文史资料中也选录或摘录了《见闻录》一文。如1983年由《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合编的《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中，就摘录了该文。

该书出版的第三阶段是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同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一次说明廉臣是陈云的笔名，并以作者陈云的名字公开发表了《见闻录》全文。同年6月，红旗出版社重印了该书的单行本。此后，一些地方文史资料也多以作者陈云之名收录或节录该文。1986年11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过云南》中也以同样署名节录了该文。但也有仍署廉臣之名节录该文的，如1985年3月编的《红军长征在黔西南》一书。

《随军西行见闻录》从署名廉臣发表到公开作者陈云之名发表，这固然有历史档案保管和公布年限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历史见证。《见闻录》以廉臣之名发表，是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该文担任特殊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建国后，国际国内的复杂情况，也不宜立即公布作青的真实姓名身份。8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长征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与此同时，也陆续公布了不少关于红军长征的历史档案。在这时，回顾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斗争的历史，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体会当时条件下采取的斗争形式和手段的艺术，是很有值得回味的意义的。

三 《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主要内容及其作用和影响

《随军西行见闻录》全文约3万字。文中作者以亲身经历的事实，描述了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中旬由江西兴国县出发，至1935年6月中旬到达四川懋功，历时8个月，行程一万二千里的长征历史。其内容主要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全文以一半的文字描述了红军在长征中艰苦卓绝斗争的英勇事迹。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并取得了乌江、遵义两大战役的重大胜利；红军官兵同甘共苦，团结一致，跨越万水千山，越过人迹罕见的老山界，翻越了高寒的大雪山；红军智勇双全，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红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起着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的模范带头作用。文中记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祖涵、徐特立等领导人与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谈家常话，将马让给伤员骑，与指战员们同时宿营路边等动人的事迹。

二是通过历史事实宣传了遵义会议精神。文中虽然没有从正面描写遵义会议，但作者通过事实，宣传了这次会议精神。如文中不仅对会议前的毛泽东作了不少记述，而且对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更倾与了浓重的笔墨，并以四渡赤水的灵活战术为例，宣传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三是用约1/3的篇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爱护人民、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动事例。同时，也揭露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各族人民的苦难生活。作者写道，贵州人民深受军阀压迫，民不聊生，农民“冬穿单衣，且无完整者”，“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居民唯一御冬之物，即为‘烤火’”。红军一到贵州，就将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无偿地分给广大贫苦人民，红军领袖毛泽东“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乌江战役中被俘的黔军伤兵不仅由红军卫生部担架队抬着走，而且朱德总司令到卫生部病房看望红军伤病兵时，还慰问了被俘的黔军伤兵；对俘虏的黔军进行宣传教育，许多俘虏自愿加入了红军，凡不愿加入红军者，则发路费送出红军警戒线。红军对少数民族人民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争取各民族解放的口号，取得了汉回苗各民族的同情，一路上许多汉回苗民加入红军。

四是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倡议的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作者随红军长征时，党虽然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主张，但党的“八一宣言”还没有发表。到莫斯科后，作者了解了全局，因而在文中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宣传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文中用北伐时期国共合作的历史事实，说明国共应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必要。在叙述朱德召集被俘的黔军中上级军官谈话时，宣传了红军抗日主张，希望全国军人一致合作。在记述一、四方面军会合时，谈到我党我军的中心任务是抗日。最后在文末以近千字的篇幅，从时代的紧迫感和历史的趋势，论述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和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重要性，指出，如果国民党“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作者以其在长征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政治家的政治眼光和思想水平，以其亲历的见闻以及距离长征时间很近所具备的历史真实

性而写作的这本长征专著，无论在国内和国外，还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其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and 影响。

如前所述，《随军西行见闻录》是第一本向世人比较系统全面、深刻地宣传红军长征的专著。无疑，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宏大的篇幅，生动地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和江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其作用是巨大的。但“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成功地打通世界人民“通往红色中国大门”的却不能说是斯诺，而是陈云。陈云的这一本专著，以其不可抗拒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那夜沉沉、雾茫茫的黑暗年代，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闪烁的人民革命曙光洒向世界，对于世界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对法西斯独裁分子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消息的封锁，敞开红色中国的大门，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对于共产国际正确地掌握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正确地指导帮助中国的革命，也都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当时苏联的《真理报》就报道说：“中国红军力量在四川的会合，给中国苏维埃运动打开了更大的前途，现在这种运动已到了发展的新阶段。”

在国内，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量出版发行《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来看，这对于向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宣传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日，揭露和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号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奋斗，争取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曾访问过广西地下党的一些老同志，他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名叫廉臣的医生写的红军长征的那本书在当时给他们的影响，他们也拿这本书作为教育进步青年认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教材。

今天，《随军西行见闻录》仍是一本史料价值极高的历史著作，也是一本进行党的光荣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科书。《见闻录》还以其独特的视角、独特的风格，生动的、饶有兴味的文字，作为红军长征的报告文学著作、耸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林。

这里还必须指出，陈云之所以能够写出如此有重大影响的著作，除与他在红军中的亲身经历，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以外，还与他在革命实践中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性的认识，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认识有重要的关系。陈三出针农村，当过工人，入党后从事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白区工作经验，也参加领导过工人、农民的武装斗争，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从此进入中央领导机构。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后，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有了一定认识。特别是长征中忙乱的搬家式行动以及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使他对“左”倾错误和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他在遵义会议上积极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并在会后把会议精神写成传达提纲到部队中传达。一渡赤水时，陈云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果断地处理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赢得了有利战机。到莫斯科后，条件相对好得多了，他更觉得有必要把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以及我党得到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的喜人消息向共产国际和国内外人民宣传。于是，历史留下了这样珍贵的一本虽然字数不多但极有意义的书。

四 《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报道红军长征历史中存在的一些局限性

由于历史的条件，写作的目的和作者以第三者旁观的身份来写作等原因，《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反映红军长征历史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其一是，《见闻录》中对红军长征中的一些极力重要的历史事实未能叙述。如为了从正面宣传红军长征，因而文中没有叙述惨烈的湘江战役，以及红军损失近2万人的史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和党内团结，对湘南之争和遵义会议上对错误路线的斗争等均没有叙述。当然，也由于作者假托的身份所限，这位“医生”不可能了解上层的这些情况，所以文中也就下应该提及这些问题。

其二是，文中叙述的某些历史事件与事实有些不相符。如文中说红军长征“显系有计划之行动”，有“充分准备”，“红军得平安无事渡过湘江”，这显然是服务于当时正面宣传红军的需要而写的。文中女英雄李小侠的事迹亦有虚构成分。有些数字、日期也有虚写和夸张的成分。如文中说作者“至本年七月上旬”才离开红军队伍回家，就是虚晃的一笔。又如说红军在遵义十二日中有“四五千加入红军”、“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汉回苗民之加入红军者五六千人”，“会理（五天）招募红军新兵五千人”等，虽有其事，但在具体数字上，从当时宣传角度出发，有某些夸大的成分，就现在的资料看，在扎西加入红军的约1000人，在毕节、东川、宣威加入红军的也只是千余人。再者，由于作者匆匆离开红军队伍，且在战争情况下也不能个人保存或带着文件资料，到莫斯科后仅凭个人记忆写作，因而也难免在文中对一些时间、地点的记述有误。如说“部队达到威信（旧名扎西）之时，正系；日历正月初三”（实为正月初六，即公历2月9日）。又如说红军在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活动的情况，则把红军2月和4月两次进入云南分别达到的这些地区合在一起叙述了。

文中存在的这些局限性，现在的读者读起来，是可以理解的，是不必苛求于作者的。必须说明，存在的这些局限性，丝毫不会影响这本书的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注释

转引自《党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7页。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59页。

《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说是遵义会议后不久；《长征新记》（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1986年新华社参考材料编辑部译编）第112页说是5月；《中共党史侨料》第16辑第11页说是5月29日；陈云于1978年5月18日说是6月；《党史信息报》1994年8月16日第2版说是6月中旬。

转引自《党支信息报》1994年8月16日第2版。

《长征新记》第2页；参见《伟大的长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7—718、727页。

《党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7页。

转引自《红军长征大事记略》（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1页。

《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9、70 页；
《伟大的长征》，第 773 页。

《红军长征过云南》，第 114、107、111、112、102、16、17、19
页。

陈云在新疆援接西路军左支队的经过与贡献

任伊临

1936年12月初，陈云奉命来新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和援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余部，力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开展工作，保存革命种子，培养我军现代化军事人材作出了贡献，受到周恩来的赞扬。本文综合有关回忆和资料，试对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的过程和陈云在其中的贡献，作一简述。

一 受命于西路军遭遇危难之际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会师甘肃会宁，胜利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1月8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意见，决定将“徐（向前）、陈（昌浩）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西路军西进途中遭到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马步芳、马步青军队强有力的拦阻和围攻，损失惨重。至1937年3月，部队由组建时的21000多人锐减为千余人。3月12日凌晨，徐向前、陈昌浩发电，称：西路军“现全不足三团”，“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大”，向中央告急。中央即复电，让西路率剩余的三个团“向外蒙冲去，”或“打游击”。根据这一指示，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石窝山山顶（今肃

南县境内）开会，决定陈昌浩、徐向前回陕北向中央汇报，原西路军分为左、右两支队和以妇女、伤员为主的支队三部分，转入祁连山打游击。3月17日。中央同意西路军建议。但西路军分散不久，右支队及以妇女、伤员为主的支队战斗失利溃散，只有左支队仍在祁连山的冰天雪地里孤军奋战。

党中央、毛泽东十分关注西路军左支队的命运，早在1936年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奉中共中央命令，已令在莫斯科工作的陈云、滕代远等组织迎接西路军的代表团。12月，中共中央再次指示他俩，“西路军损失惨重，应想法如何组织起来，整顿一下找个出路。”当时，苏联通过外蒙向中国工农红军运输物资的设想，因绥远抗战在1936年爆发，已无法实现，不得已只好改道新疆哈密援助红军。为此，“共产国际特派陈云（化名施平）、滕代远（化名李广）、段子俊、冯铨（即何晓理）、李春田5人前往新疆，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他们5人的分工是“陈云总负责，滕代远协助之，冯铨作翻译，段子俊负责电台，李春田管译电，他们的任务是：赴新疆迎接打散的西路军”。因此“这个代表团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是以双重身份离苏赴新疆的。

陈云等离苏前，曾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

洛大等作了汇报。斯大林积极支持这项工作，曾计划拨给西路军大炮90门，坦克90辆，同时又“下了很大的决心，说服了盛世才，方同意西路军人员进入新疆”。据当时曾在盛世才边务处工作的刘进中（化名陈培生，原中共党员，1936年由中共派往莫斯科，转为联共党员）回忆，“西安事变”不久，盛督办突然交给他们一项任务，让他们去寻找红军西征部队。这证明苏方在陈云等入疆以前，已经开始作迎接西路军的准备工作。

在取得苏联大力支持后，陈云一行于 1936 年年底启程赴新疆。他们到达中苏边境霍尔果斯后，因国内发生“西安事变”，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电告他们就地待命，陈云此时又流鼻血不止，当地无法治疗，正好利用就地待命的时间乘飞机到阿拉木图治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陈云已恢复健康，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来电让他们到新疆去，陈云一行即乘坐盛世才派来的汽车进入迪化，开展了建立统一战线及援接西路军左支队的准备工作。

二驱车星星峡，安定左支队

中共中央电告陈云等去新疆援接西路军的同时，也将这一决定电告西路军。西路军因战斗紧张，直到 1937 年 3 月 23 日到达海巡堡塔实村时，才用当时仅存的一部电台与中央联系上，并立即接到中央的指示：左支队“应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前进的方向是新疆或蒙古，设法去新疆，并将派陈云和滕代远去迎接。”左支队领导研究后立即回电：向新疆前进。4 月 7 日，他们又接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电报：“你们可以向新疆去，已电彼方（指盛世才）设法援接。”（11）4 月 12 日，左支队在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等率领下，按中央指示精神走出祁连山，向新疆前进。4 月 20 日，他们又收到毛泽东、朱德的电示：“远方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转赴远方求学问题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指陈云、滕代远）在该地迎候你们。”（12）24 日，由于参谋长李特判断失误，在安西又遇强敌，部队再次受到重大损失。经全体指战员拼力战斗，在 26 日晚才摆脱敌人，走向甘新边境。左支队余部 400 多人，在渺无人烟的大戈壁上走了 4 天 4 夜，才按中央指示进入新疆境内的星星峡。

由于苏联的努力，西路军左支队入疆前，盛世才已派出新疆边务处人员去河西一带寻找，并让边务处总电台主动与西路军联系，代中共中央转达西进命令。1937 年 4 月，他又派一名顾问和一辆汽车，带着防寒的牛皮大衣去霍尔果斯接陈云等 5 人来迪化。陈云在 1984 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与盛世才最先建立联系的是苏联。我们党和盛世才的联系是通过苏联建立的，对盛世才采取的统战做法也是从苏联的做法延续下来的。”（13）

陈云等到迪化后，先由边务处第二副处长陈培生引荐，拜会了盛世才。盛世才对陈云一行表示欢迎。事后，陈云多次找盛世才商谈援接方案，积极开展援接的准备工作。当陈云听到盛世才已派人去星星峡时，立即表示感谢，说督办掩护、关怀了西路军。（14）盛世才也接受陈云的建议，在陈云等未去甘、新边界前，先指令边务处星星峡办事处的边务人员和边卡驻军，打着红旗，开着汽车，寻找迎接西路军左支队，并答应派一名苏籍顾问，带 50 多辆汽车的服装、食品，和陈云等一起去星星峡。因此，当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来到星星峡时，当地“驻军就打着红旗迎接我军。他们在星星峡已为我们部队准备了房子、猪肉、羊肉、馍馍和米饭，”非常客气地招待入疆的西路军人员。（15）“盛世才的星星峡边务处主任（即新疆与甘肃文界处的哨所）王孝典，除把边务处办公室让出做我们的支队部”外，还转达了盛世才的电话，说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反对他们进疆，要派人缴他们的枪，让他们做好应变准备。（16）由于西路军同志有了准备，这一阴谋才没有得逞。

陈云得知西路军左支队入疆的消息后，立即给星星峡边务处打电话，请他们转告左支队，让他们就地休息，他很快就赶到。1937 年 5 月 1 日，陈云、

滕代远等率几十辆汽车，带着大批的生活用品来到星星峡。他除代表党中央进行慰问外，还在生活上做了体贴入微的安排。陈云看到转战千里、风尘仆仆的指战员，“心疼他说，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以后慢慢再讲，你们先给我执行两个任务，第一要吃饱饭，第二要睡好觉。”(17)为了让同志们尽快恢复体力，他把从迪化带来的物资分给大家，“每人一套棉衣，一套单衣、一套衬衣、一双皮靴、一双皮鞋、一双袜子、一个瓷杯、一双筷子”，还有“大批的羊肉，苏联的纸烟和白糖”(18)。同时，又商请盛世才再空运一批物资。盛世才答应了，两次派飞机空投衣物、粮食、枪枝、弹药。这使聚集到星星峡的400多名指战员装备一新，很快恢复了精力。

安顿好生活后，陈云、滕代远“深入到部队的住地向同志们间长间短，和同志们同吃同住，给同志们讲时事、讲苏联革命故事鼓励大家。”(19)除此，陈云还把部队集中一起进行了两次集体谈话。第一次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大会上，这是部队进疆后第一次集中，大家看到眼前只有400余名指战员，不免想起半年来的悲壮历程，心情十分沉重。陈云鼓励说：你们历尽千辛万苦，艰苦战斗，今天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我代表党中央向同志们慰问！然后，他提高了声音说：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胜败是兵家常事。你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团结一致，奋战到这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你们是革命的精华，是红色的种子，你们的光荣是黄金也买不来的。现在你们是几百人，将来可以扩充到几千人、几万人和几十万人，它将会燃起燎原的烈火，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20)左支队同志听后很受鼓舞，对前途重新充满了希望。

第二次集体教育是在沙窝里进行的。5月4日下午，左支队余部在星星峡经过休整，面貌一新，部队分乘几十辆汽车奔赴迪化。为了使部队了解新疆的复杂形势，对未来的工作任务和事物的发展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汽车开出星星峡40余里后，到苦水暂停前进。陈云把部队集中在沙窝里再次讲话。他说：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还剩几百人。你们是沙里淘金，是党的宝贵财富。然后他向大家介绍了新疆的社会状况和党的斗争策略。他说：新疆与苏联接壤，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督办盛世才为了自身利益，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对我党也表示友好。我们进入新疆，是利用统一战线的特殊环境，保存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他是国民党政府的新疆督办，是上将军官。我们同他打交道，一定要提高警惕，坚持原则，谨慎从事。(21)

由于陈云从关心生活入手，有针对性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使西路军左支队余部在短时间里摆脱了战斗失利后的低落情绪，重新振作了革命精神，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对未来复杂斗争也有了较充分的思想准备。有的同志回忆说，陈云充满深情的讲话，使找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大家清楚了今后的任务和环境，每个同志的脸上都绽开了回到党的怀抱的幸福笑容，满怀信心地向迪化前进。(22)

三 建立“新兵营”，组织部队学习 现代化军事技术

西路军左支队余部在陈云、滕代远等率领下，坐汽车颠簸了4天，于5

月7日下午到红雁池，休息了3个小时，等夜幕降临后才进入迪化，暂在西公园西北面的阜新纱厂驻扎、治疗和整顿。两天后，盛世才在督办公署东花园贵宾室秘密会见了陈云、滕代远和左支队主要领导人。7月，中共中央任命陈云为中国共产党驻新疆第一任党代表，并领导西路军左支队。10月，他又参与筹建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工作。

陈云受命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了在新疆的工作任务：（一）搞好统一战线，执行盛世才在我党帮助下制定的“六大政策”，维护祖国统一；（二）巩固抗日后方，保护国防交通线；（三）筹集抗日物资，支援前线；（四）培养骨干，为抗日战争培养人材；（五）接待好延安——苏联的往返干部及有关人员；（六）了解、反映、指导新疆的工作。(23)6项工作的关键是做好与盛世才的统战工作，这方面主要是陈云负责的。段子俊回忆：在新疆期间，与盛世才谈判，主要是陈云与滕代远一道去的。有时陈云一个人去，有时与李卓然等一起去。(24)滕代远在回忆录中讲得更明确，他说，“和盛接头等全由陈云同志负责，陈是中央代表。我不公开，只是个助手，所以有些事我不知道。”(25)滕代远是来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的回忆可靠性、准确程度较高。

在援接西路军左支队问题上，陈云和盛世才及有关人士商谈的内容有三点：（一）在不放下武器的原则下，同意部队改穿盛世才的军装。盛世才对红军人疆始终存在疑虑，只是迫于斯大林及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暂时没有表露，但他的这种情绪通过下属于部表现了出来。5月初，盛世才派的顾问随同陈云到星星峡后，曾借口“避免出事”，要左支队放下武器。陈云当时反驳说，放下武器是投降，我们部队到新疆整训，不干涉其他事务，盛督办是同意的，为什么要我们放下武器？盛的顾问无言以对，只好作罢。为打消盛世才疑虑，免生其他口舌，陈云经请示党中央后，取消了西路军左支队番号，对外称“新兵营”，说是盛世才从夫内新招来的修建迪化到兰州公路的军队，并且同意盛世才的要求，脱下红军服装，不戴红军的帽徽领章，换穿盛世才部队藏青色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徽。（二）原驻地阜新纱厂太小，陈云商请在迪化市东门外（今五星路）盛世才部队营房旁，腾出一套独立的，四五间相邻的院落作为新兵营的驻地。（三）希望“用苏联援助盛世才军队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训练‘新兵营’，培养各兵种的军事人才”。经交涉，苏联总顾问和盛世才“欣然同意”。(26)

陈云在与盛世才周旋的同时，对西路军左支队的整编与学习也做了大量工作。这一工作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7年6月7日到1937年9月，任务是整编部队，组织文化知识学习。第二阶段是9月以后，任务是分班学习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为人民军队培养未来各兵种的干部。在第一阶段，陈云首先抓了整顿组织的工作。因为西路军左支队在西进途中大量减员，原建制已名不副实，陈云与滕代远及原西路军工委领导人李卓然、李先念等研究决定改称西路军左支队为西路军总支队，总支队队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参谋长饶子健、党总支部书记喻同金。总支队下属一、二、三、四大队和干部队共5个队。大队设队长、政委各一名。干部队除队长、政委外还设党支部书记一人，由吕黎平担任。总支队严格执行共产国际及苏联在新疆建立统一战线有关的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组织的“三不”规定，但在总支队内部仍保存党组织。(27)为严肃军纪，陈云对总支队作了几条严格规定，注意保密，不准外出，只准在驻地活动；旧衣

服洗好上缴；分散在个人手中保存的原部队财物全部上交；在此待命去苏联学习……，使总支队保持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好传统，获得迪化人民的好评。

西路军进疆前，中共中央根据斯大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应建立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独立部队，要打通国际交通线的意见，曾经有过组织总支队去苏联学习现代军事技术的决定。但总支队建立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中共中央撤销了原决定，让总支队留迪化学习。陈云向总支队传达了决定，并立即组织总支队指战员学习政治和文化课。政治课有《联共（布）党史》，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文化课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和物理常识。

为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陈云召开了学习动员会。他说：在中央没有新的指示前，总支队要抓一切时间学习，学好政治，学好军事，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他又强调，文化知识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基础，没有文化就像盲人。我们在战场上冲锋，是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现在学习文化知识，也是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两者内容不同，目标一致，希望大家要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那样向文化进军。(28)大会动员后他又分头到各大队找干部、战士谈话，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向指战员反复说明学习的重要性。有一次，陈云问一位干部：“什么是帝国主义？”回答说：“帝国主义是黄眼睛、红头发的人。”陈云笑了，他立即耐心讲解了帝国主义的概念和本质，激发了这位于部以及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学习开始后，陈云又要求总支队根据识字的多少进行编班，把具有中学程度的指战员编为甲班，小学程度的编为乙班，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编为丙班，以便因材施教，取得好效果。

陈云还设法筹集资金，在迪化购买中小学课本，并亲自编选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的声明、决定等文件油印下发，作为政治教材。为解决教师的不足，陈云决定，首先，实行能者为师的原则，从总支队选拔文化程度较高又适合教学的人员当教师；其次，向苏联和延安聘请教员；其三，取人一技之长，向盛世才部队聘请教师。经多方努力，教师仍然不够，他只好请滕代远讲语文，并让自己的助手小李（肖立）也出来给总支队讲文化课。陈云费尽心机为总支队创造学习条件，使学员们十分感动。为帮助学员提高觉悟，陈云还亲自给总支队、给干部大队讲《联共（布）党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陈云备课十分认真，为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曾多次到迪化仅有的一个小图书馆里，搜集有关日本和日本侵华的史料。”(29)他的课既有理论又有实际，讲得深入浅出，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针对总支队中大多数人没有上过学，文化程度低，学习困难较大的具体情况，陈云还建议各大队推选自己的小教员，加强课外辅导活动。由于陈云精心计划，多方努力，使总支队经过近4个月学习，大多数人都掌握了二三千个单字，能记笔记、阅读书报，也学会了算术四则及百分数，为顺利过渡到学习军事技术奠定了较好的文化知识基础。

1937年9月，总支队进入学习军事技术阶段。陈云根据党中央要充分利用与盛世才的统战有利时机，利用新疆的和平环境，用苏联援助盛世才的现代化装备，训练“新兵营”，为中国工农红军培养各兵种的军事人才，不失时机地把总支队的文化班转变为学习多兵种军事技术学校指示的精神，集合总支队同志作了第二阶段的学习动员。他指出：“日本侵略者仗着有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横行霸道，使我们吃了不少亏，流了很多血。我们要战

胜日本侵略者，不能光靠步枪、刺刀，也需要用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来对付侵略者……如果我们这 400 多号人每人学会摆弄一两件机械化武器，将来回延安，一个人再带会十个八个，这对建设我军的技术兵种，对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将是多大的贡献呀！”(30)。大会动员后，陈云又深入学员中谈心。肖显清回忆，9 月的一天，他正在值勤，陈云过来和他谈心。他告诉陈云，学习没有打仗痛快。陈云笑着回答：“既要能打仗，也要能坐下来学文化。这可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打仗。”(31)从此，他终于安下心来学习了。

学习动员后，陈云和总支队领导一起根据需求和学员文化素质，将总支队分成汽车、装甲车、炮兵、无线电、空军、军医和兽医等几个班。原一、二、三大队 200 多人编为驾训班，学习开汽车。三大队学会开汽车后再学装甲车。四大队 100 多人学习各种火炮。干部队重点学习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后来，陈云又从中挑选一些人学习无线电技术。1937 年 11 月初，总支队开始组建航空班，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为组建航空班，陈云化了很大精力。他不仅要和初选上的学员个别交谈，交代任务，鼓励他们上进，还要个别考察。“每个进航空队学习的同志，都是由陈云同志或邓发同志亲自谈话交代任务的”(32)。他对吕黎平说：“空军是很复杂的技术兵种，要建立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我想我们可以利用新疆的统战环境，借用盛世才的航空队，为我们党培养一支既会驾驶飞机，又会维护修理的航空技术队伍。只要有了人才，再想办法通过国际援助获得飞机，我们的空军不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吗！”(33)经挑选，他在总支队里初步物色了 30 名年轻干部、战士推荐给邓发，（1937 年 9 月，党中央根据工作需要，决定把邓发从莫斯科调到迪化，任第二任党代表，接替陈云工作）。邓发从中挑出 25 人参加学习，回延安后，陈云仍然关心着航空队建设。他从抗日军政大学、摩托车学校、保卫部三个单位抽调了 19 人，测试他们的反应能力及文化程度，经严格考察后送往新疆，与邓发最后确定的 25 人一起编为两个班，在 1938 年春季开始学习。

总支队学习理出头绪后，陈云在 1937 年 11 月 27 日奉命和王明、康生同机离迪化回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在新疆工作半年多时间，既负责与苏联联系，又负责和盛世才搞统一战线，但主要精力集中在援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入疆上。他经过努力，稳定了他们的情绪，改建了他们的组织，把他们由战斗队变为我军第一所多兵种的军事学校，为我军培养现代化军事技术骨干作出了贡献。1939 年 9 月，周恩来赴苏联治疗受伤的胳膊，途经迪化时，曾专门听取吕黎平等两位航空班学员的汇报。当他听说学员学习积极性很高，成绩不错时，高兴他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好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34)

（作者单位：中共新疆乌鲁木齐市委党校）注释

(27)朱培民：《新疆革命史》，第 61、62、60、62 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23)《滕代远传》。

(14)(25)滕代远：《新疆迎接西路军和成立八路军驻新办事处情况》。(13)《新疆冤狱始末》，第 22、3 页。

乌鲁木齐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资料。

(11)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致西路军工委电（1937 年 4 月 7 日）。

(12)(29)(30)(34)《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第 2、5、6、

14 页。

(15)(18)(19)杨南桂：《扑不灭的火焰》。

(16)(31)肖显清：《在新兵营的日日夜夜》。

(17)(22)(23)吕黎平：《西陲星光》。

(20)根据吕黎平、曾纪银、杨南桂、杨锡光、王崇国等回忆。

(21)根据吕黎平、冉正全回忆录。

(24)段子俊：《迎接西路军进疆》。

(26)《滕代远传》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斗争纪事》，第 9 页。

(28)《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第 4 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斗争纪事》，第 9 页。

(32)袁彬：《难忘的新疆航空队》。

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三大贡献

刘信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下失时机地进军东北，经略东北，决战东北，使东北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部解放的大区，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这一辉煌的胜利，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陈云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之一，自始至终乡加领导和指挥了东北解放战争。他的贡献多方面的，但对东北解放战争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突出贡献则主要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系统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思想，初创北满革命根据地，坚持南满斗争，扭转东北敌攻我守的战局，解决东北根据地的经济困难，统一东北财经。本文力求以翔实的资料再现陈云的丰功伟绩，以对陈云革命生涯的研究有所裨益，并借此机会求教于大方。

一系统提出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思想，初创北满革命根据地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鉴于我党我军在东北的迅速发展，进而提出了“独占东北”的计划。但由于苏联对美、蒋妥协及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下，于1945年11月强行攻占了战略要地山海关、锦州，迅速向沈阳推进；再加上东北境内十几万土匪蜂拥而起，配合国民党军，攻城略地，从而使我党独占东北成为不可能。据此，刘少奇于11月20日致电东北局，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方针。

但是，在当时东北党内干部中，有许多人对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在与战问题上模糊不清；留恋大城市，忽视农村工作，缺乏长期斗争的准备。这种思想状况如果不克服，必将造成我既无法控制大城市，又不能建立根据地的局面。在这个决定东北前途命运的关键时期，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凭借敏锐的政治头脑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得出与中央一致的结论，从而为建立东北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根据东北具体情况，1945年11月26日至28日，陈云在哈尔滨主持召开北满分局成员会议，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起草了给东北局及中央的关于《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电报，系统阐述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思想。陈云指出：“首先独占三大城市（指沈阳、长春、哈尔滨——引者）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是，把主要的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北满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此外，陈云还就如何建立北满根据地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意见。陈云的真知灼见，与在此前后刘少奇、黄克诚等人所论不谋而合，但陈云的论述更详细、系统。该电前后分两天发往中央，中央收到一半阅后，立即回电表示完全赞同。

紧接着，陈云在12月1日召开的北满分局扩大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创

造包括中小城市与铁路支线在内的广大农村根据地”的思想。12月7日，中央再一次指示东北局：“我独占东北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来布置一切。”陈云的思想再次与中央的指示合拍。12月28日，毛泽东向东北局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再一次肯定了陈云关于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思想。

1946年初，东北局在进行了短暂的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后，遵照中央的指示，于3月制定了《东北大会战部署》；尔后，指挥东北民主联军于4月18日至5月18日在四平街同国民党军进行了长达31天的阵地战。结果，我军被迫做出四平，退到松花江北。国民党军乘机占领长春、吉林。此时，东北解放区处于敌兵压境、土匪骚扰、部队哗变、经济紧张的严重困境。

在此期间，北满分局书记陈云仍然坚持创建根据地的主张，并在北满开展建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1946年2月5日，北满分局发出《关于目前对匪之政策》的指示，要求北满各省负责人清剿土匪，发动群众。2月21日，陈云致电黑龙江省工委书记王鹤寿，指出：“必须争取时间动员党政军民一切可用的力量发动农民，经过土地斗争，达到武装农民的目的，创造根据地的真实基础。”25日，陈云致电东北局：“应立即执行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指示……将必要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带领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4月20日，陈云给东北局及中央起草了《北满根据地建设的进展状况》的报告，提出了北满工作的三大任务，即继续积极主动地肃清残匪；把发动群众看成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建设北满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但由于国共双方在东北大打出手，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并未采纳陈云的正确建议。此后，陈云便脚踏实地地从事开创北满根据地的工作，开展剿匪斗争；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分配日伪土地；摧毁敌伪势力，建立人民政权，发展革命武装。此外，还开展了财经、后勤、兵工、交通、城市、文化、建党等方面的工作。至1946年7月，在以陈云为首的北满分局领导下，我党建立了东北第一个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北满革命根据地，从而为我东北党政军机关撤到北满，休养整顿，提供了条件。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北满分局陈云等人初创北满根据地，我党政军在四平作战失利后将撤往何处呢？陈云确实功不可没。

尽管陈云等初创了北满革命根据地，但四平保卫战后的困难形势表明，我党在东北还没有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东北党在敌我形势、和平与战争、城市与乡村、我军作战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没有统一认识。为此，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6年7月3日—11日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并在7月7日通过了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深刻总结了东北党的工作经验和教训，澄清了党内部分同志存在的各种错误观点，着重强调要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并把重点放在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群众。我军的作战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保卫根据地。“决议”号召东北党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7月11日，毛泽东在对东北局《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所作的修改稿中，充分肯定了陈云的思想，指出，“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

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决议”的通过及毛泽东主席所作的指示，标志着东北全党的工作方针和战略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正确轨道，从而为解放战争在东北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可见，陈云是最早、最系统地提出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在东北党的战略重心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最可贵的是，陈云将自己的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在北满率先开展了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因此，我们可以说，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在提出并实施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问题上，陈云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二坚持南满斗争，扭转东北战局

国民党军占领四平街后，深感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无力北进，但又无法增兵东北。为此，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制定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并于10月中旬集中8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重点进攻南满解放区，企图吃掉南满我军，解除后顾之忧，转而全力进攻北满，独占整个东北。11月初，国民党军占领了南满大部分地区，并将南满我军主力压缩于临江、长白、抚松、濛江、辑安（12月22日失守）5县狭小地区。此时，南满根据地处于群众尚未真正发动，兵员不足，装备无着，给养奇缺，土匪作乱的险恶境地。更为严重的是，对于能否坚持南满，军区领导人的认识很不一致，主力部队已准备开过松花江与北满部队会合。根据敌我严重态势，东北局制定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方针。该方针的关键是能否坚持南满。为了加强南满的领导力量，10月31日，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决定调东北局副局长陈三兼任辽东分局（亦称南满分局）书记，派肖劲光兼任辽东军区司令员。11月27日，陈、肖到达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要不要坚持南满的问题。

1946年12月11日—14日，辽东军区在七道江召开了军事会议，主要讨论南满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及今后作战方针问题。会议一开始就在是否坚持南满根据地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多数人认为南满只剩下5县，不利大兵团作战，坚持下去有困难，因而主张撤出南满。少数人主张坚持南满，做长期斗争打算。去留两种意见各有理由，相持不下，会议连开两天没有结果。12日晚，辽东军区首长获悉敌1个师已进至梅河口，一个师正进犯辑安，军情万分火急。但由于会议对去留问题未达成统一，因而影响了具体作战方针的最终确定。在此危机关头，肖劲光将会议情况报给

陈云，并请他参加会议，作最后决定。

13日晚12时，陈三冒着暴风雪从临江赶到七道江，14日主持了会议。在了解前几天会议情况经过后，陈云生动形象地讲述了敌我态势及坚持南满的重要意义。他说：“东北的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于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个关键。”尔后，陈云对“留下”和“撤走”的利害得失算了一笔细帐，作了反复比较，用以说明目在南满对全东北战局有利。最后，陈云加重语气说：“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人也不走！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陈云有理

有据的分析和果断干脆的决定，统一了人们的认识，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赞成。会议一致通过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斗争的总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正面与敌后战场相配合，内线与外线、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这就顺利解决了要不要坚持南满这一重大问题。40多年后，肖劲光高度评价道：“这是关键时刻决定性的一板，这是陈云对坚持南满斗争的一大贡献。”(11)

战略与战术方针确定后，如何坚持南满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陈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46年12月20日在致林彪、彭真、高岗的信中，以及12月28日辽东分局给各省委、各纵队发出的《关于坚持南满敌后斗争的几点指示》中，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其一，当前，“坚持敌后成为坚持南满坚持东北最重要的任务”，其步骤是“主动积极地消灭敌人，打破敌人方面的占领计划，一点一点立稳自己的脚跟。”“敌后打击的对象除坚持消灭那些可以消灭的敌人正规军外，目前放在大量消灭敌之地方武装与保安团队，”(12)使敌正规军后方空虚，“顾了后方顾不了正面，顾了正面顾不了后方；从东北全局看，使敌人顾了南满顾不了北满。”(13)其二，敌后斗争要坚持三种配合，即游击区与游击区的配合；正面与敌后的配合；南满与北满、东满、西满的配合。“在这一点上，首先应该确定，南满准备打烂坛坛罐罐，吸住敌人，使之不能北进，以便北满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东、西、北满要吸住当前敌人……南满各区我们自己督促配合。再大一点来说，关内、关外要有配合。现在关内正打，配合我们关外。如此配合下去，敌关外不能增兵，则北满与东、西、南满很有可为。”(14)其三，农民的向背决定我敌后的胜负。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保粮保丁，我应以一切努力来使农民享受到今年分地所得粮食；发动农民，保护其利益，“今冬是机会，决不能放过。”(15)其四，改编、整理地方武装，要建立完全可靠的地方基干团。其五，敌占时要尽量减少干部、资财的损失，要处理好领导之间的关系。陈云深思熟虑，从理论上系统地解决了如何坚持南满的问题。陈云的思想得到了东北局的充分肯定，并在实际斗争中加以灵活运用。仅以南、北满配合为例：在军事上，在南满我军进行四保临江期间，北满我军三下江南作战，有力地牵制调动了敌人，打乱了其“南攻北守”的战略计划；而南满我军的艰苦奋斗，为北满我军提供了休整、扩充的宝贵时间；在陈云多次请求建议下，北满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南满，从而解决了南满缺少兵源及粮食的严重困难。可见，陈云坚持南满的斗争策略在实践中是富有成效的，它是确保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的重要指针。

经过108天的艰苦奋斗，南满我军在东、西、北满民主联军配合下，取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从而保卫、巩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战略计划，扭转了东北敌攻我守的战局，从而为我军开始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辽东分局的党政军领导，尤其陈云的杰出贡献是不可湮没的。对此，东北局的评价是十分公允的：“以陈云为首的辽东分局，是正确地分析了当时辽东的形势，确定了明确的方针，团结了全党全军，进行了艰苦奋斗，扭转了局面，坚持与发展了辽东根据地……”陈云“领导辽东全党全军扭转危局，起了决定性作用。”“以陈云为首的南满分局……扭转了辽东在一个时期内的严重形势，完成了党给予的任务，成绩很大。”(16)这些评价既充分肯定了辽东分局其他领导人的作用，又突出强调了陈云的重大作用及卓越贡献。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总结。

三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 统一东北财经

东北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后对铁路、工矿的严重破坏和苏军占领期间大规模的拆迁，从而使解放区财政经济困难重重。在财政方面，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在金融方面，通货膨胀，物价波动；在物资方面，军需民用物资供不应求，极为缺乏。因此，解决根据地的财经困难成为东北党的又一重要任务，在这方面，陈云作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生财理财之道，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统一东北财经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6年2月22日，陈云领导的北满分局给所属各省工委发出《关于目前解决财政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指示，提出了三条具体措施，即征收救国公粮，妥为保管，以便将来进行对外贸易，解决财政困难；清算和搜集敌伪资产，恢复和发展工矿业，征收必要的税收；暂时不宜大量发行纸币，以免通货膨胀。3月13日，陈云在通河干部座谈会上，着重指出：“政经济即收与支的问题，亦即生财之道与理财之道。”(17)在生财之道方面，他提出了财政收入的6个来源：没收敌产，搞好税收，发行公债，征收公粮，发行钞票，开展贸易。据此，1946年各省、市、县均成立了“敌伪资时清理委员会”。清理的主要物资是武器、弹药、粮食、布匹、运输工具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吉林市一地在这期间所清理的物资，总价值即达百亿元（为东北币，以下金融数字同）以上，台江省没收敌伪财产的收入，占该省1946年财政总收入的36.7%；为了发展生产和减轻人民负担，各省重新调整税收，减少税目。如1946年合江省省级税收为700万元，仅占财政收入的2.6%，而东北一级财政收入中，税收只占0.99%；(18)有的县市如双城县、宾县、哈尔滨市、东安地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都在1946年先后发行过公债；公粮是按实物征收的，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地方可征5%，累进率不得超过20%；在发行钞票方面，陈云强调“纸币发行要加以控制，不能无限制地发下去，否则必然遭致恶性的通货膨胀。”(19)为此，一些省份如绥宁省委在控制货币发行上做了一些工作。在陈云等人积极建议和支持下，1946年末，东北解放区打开了对苏贸易渠道，到1947年12月止，出口各种粮食76.5万吨，换回了大量的军需民用物资。

在理财之道方面，陈云提出了紧缩开支，提倡节约，防止浪费，搞好生产等办法。这些办法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哈尔滨市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1月底，实行精兵简政，每月节省开支400万元以上。吉林省规定，自1946年9月1日起，各级政府所属机关一律实行菜金自给。与此同时，党在解放区积极领导广大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1947年共扩大耕地面积800万垧。上述措施，对于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保证战争需要，解决解放区经济困难起了重大作用。

1946年8月，东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加强了对财经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以陈云为主任的财政委员会。其主要工作是：进一步清理敌伪资财；筹建东北银行，发行东北地方流通券以代替其它货币；稳定物价，整顿金融等。9月，财政委员会提出了整顿财政的步骤，决定先由各省统一，然后实行东北解放区的整体统一。尽管陈云于10月27日前往南满任分局书记，但他的经

济思想仍然得到了贯彻执行。如 1947 年 1 月召开的北满各省财经会议，确定了“长期打算，发展生产，增进贸易，厉行节约，保障供给，支援战争”的方针，基本上体现了陈云的生财理财思想。又如，1947 年 8 月召开的东北解放区财经会议《关于统一财政制度的决定》，无疑是陈云关于整顿财政思想的体现。1948 年 7 月，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东北行政委员会设立了以陈云为主任的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进一步贯彻财政统一的方针，迅速将东北解放区的财政于 1948 年末实现了统一预算，统一管理，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48 年春我军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地区除沈阳、长春、锦州等 12 个城市尚被敌占领外，其余 140 多个城市先后解放。因而，城市工作和经济建设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为实现东北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1948 年 8 月，陈云起草了《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和他给中央的《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报告等。在这些文件中，陈云强调：“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²⁰⁾为此，他提出了加强工业的计划性；管理工作实行企业化和民主化；要重视和培养技术、管理干部；要特别注意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的政策等措施，为城市管理工作和经济建设作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11 月 2 日沈阳解放后，陈云兼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负责接管沈阳。他创造的“各按毛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和迅速恢复秩序的办法得到东北局及中共中央的肯定，后由中央作为成功的经验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前委。

东北解放战争期间，陈云的财经思想对于克服解放区的经济困难，统一东北财经，接收和恢复城市经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陈云经济思想的初步形成。

综上所述，从 1945 年 9 月至 1949 年 7 月，陈云在东北历时近 4 年，身兼数职，多方运筹，功勋卓著。尤其在关系东北党政军存亡的根据地建设、坚持南满、东北财经等重大问题上，高瞻远瞩，有胆有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纷坛变化的复杂形势下，推动了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并对全国解放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必将与日月同辉，光照千秋。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注释

(19)《陈云文选》第 1 卷，第 300—301、309—311、373 页。

(12)《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28、28、43、96 页。

《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01 页。

《解放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7 页。

(11)《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55 页。

《中共党史资料》第 1 辑，第 57 页。

(13)(14)(15)陈云致林彪、彭真、高岗信（1946 年 12 月 20 日）。

(16)《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档案汇编》（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处 1954 年编印），第 323—338 页。

(17)(18)陈云在通河干部座谈会上的报告（1946 年 3 月 13 日）。

接管沈阳经验的创立 及其重要意义

张国新

陈云有着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整的正确的城市政策思想的创立、提前夺取大决战最后胜利，作出了多方面贡献。他创立的接管沈阳的经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接管大中城市经验的内容，对提高和统一全党全军接管城市的思想认识起了积极作用，为中共中央全面总结接管城市的经验，制定完整的正确的城市方针政策创造了新的重要条件，不仅在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而且也在他个人历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研究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接管城市的政策思想，特别是其创立的接管沈阳的经验，对于全面的完整的研究他的生平和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沈阳经验与石家庄和北平经验

城市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人城市工作中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及归宿。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实行了有目的的正确的接管城市的政策，才提前夺取了革命与反革命大决战的最后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各大中城市的影响不同，解放各大中城市的各种准备工作的时间不同，解放的方式下一定相同，解放的速度不一定相同，接管的速度也不一定相同，为此，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接管各大中城市的方式方法，甚至某些具体政策或重要政策也就不能一样，因之产生的经验或者说模式也就是多种多样的了。归纳起来讲，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解放大中城市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战争解放，一种是通过和平谈判解放。由此而产生出接管城市的三种基本经验或者说模式：一种是战争解放城市前有一定接管准备工作、战争对城市的破坏较严重、接管城市的速度稍慢的石家庄经验；一种是和平解放城市的北平经验；一种是战争解放城市前有一定接管准备工作、战争对城市的破坏不严重、接管城市速度快的沈阳经验。

沈阳经验，是以陈云为主任的沈阳军管会创立的，其创立于石家庄经验之后北平经验之前，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完整的正确的城市政策思想的创立，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关于沈阳经验的文件，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接管沈阳的经验简报》；一个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沈阳接管经验之补充报告》；还有一个是《经济处（工业部）关于接收沈阳国营企业工作总结》。这三个文件都是得到中共中央特别重视的文件，也是陈云城市政策思想的重要反映。

接管沈阳经验的创立

在解放战争时期，以陈云为主任的接管东北重镇沈阳市的军管会，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接管大中城市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在认真学习和研究其他部队乃至苏联红军接管大中城市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城市工

作经验以及根据所接管的沈阳市的市情，创造了一种接管大中城市的经验或者说模式，即沈阳经验。

思想观念的真正转变是沈阳经验创立的思想基础。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 1947 年 7 月至 9 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个蒋介石 20 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伟大的事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现时的形势已是我强敌弱，城市已永远为人民所有，我们开展工作的步骤，应该把过去 20 年来先农村而后城市、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改变为把大力量转到城市，抓住城市来推广农村的道路。这不仅在军事上有可能充分发挥城市的人力、物力来生产军需品，支援解放战争，而且在政治上也可以控制城市以影响农村，在经济上可以掌握城市来为农村建设服务。以陈云为主任的沈阳军管会，在认真掌握中共七大精神上下了功夫，对这种伟大的转折，有着深刻认识，并真正实现了观念的转变。他们彻底认识到，“战争已是大规模的大兵团的集中作战，不仅要依靠广大的农村，而且要依靠城市。如果我们不改变过去的观点，还以旧的观点来看待城市，那就是错误的了。”“应当爱护城市，发挥城市的作用，使城市生产更多的军需品和日用品来支援战争，来繁荣解放区的经济”。“每个革命军人、地方党政人员、解放区人民，都应把城市看作是人民革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力量”。“不能用农村的观点来管理城市，农村是个体的，分散的，生活方式上简单朴素。城市是集中的，复杂的，生活方式是多样性的。因此，对城市管理必须要有国家政权的思想，掌握城市特点，重视革命法抬。”

正是由于有了上述观念转变的思想基础并以上述新的基础来制定政策，指导行动，以陈云为主任的沈阳军管会才创造了接管沈阳的经验，而且是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正确经验。

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是沈阳经验创立的基本因素。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样一个伟大的事变的时候，中共中央除坚决教育全党全军转变观念外，还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一系列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如关于军事管制、新闻宣传、教育和知识分子、工商业政策、处理敌特敌伪人员、组织各界代表会、公共房产和职工工资、培养产业工人干部，以及关于货币、税收、法律、公安、处理脱党分子、处理自首和叛变分子、政权建设等问题的指示。党中央强调指出，“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要保护城市、爱护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城市，要坚决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陈云对于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一系列基本方针政策非常重视，除自己认真学习研究外，还强调对于部和群众进行党的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的教育。他没有死搬硬套中央的政策，而是结合所接管的沈阳市的实际情况，“严格遵守党和政府的工商业政策、城市政策和法令”，并对接管沈阳的全过程做了认真研究，把研究出的较完整的经验报告了中央，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

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习苏联红军接管城市的经验是沈阳经验创立的重要因素。怎样学习苏联，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要解决的大事。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以斯大林为领导的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相当微妙，尽管如

此，由于苏联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丰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所以，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视苏联为老大哥，非常重视并努力学习其经验。对此，陈云有明确的论述。他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接管沈阳的经验简报》中，在讲到总结接管沈阳的经验时，开始就说：“怎样才能接收得快而完整？军管会在出发前即确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这是苏军和熊式辉的接收方法。我们一九四六年进哈尔滨时，因干部少，也被迫采用过，这次则是自觉的实行。”在结尾时，他又说：此次接收沈阳，使我们有一感触，即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要准备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苏联军队中就有这样专职的接收班子。陈云这些话，很清楚地说明，学习苏联红军接管城市的经验是沈阳经验创立的重要因素。在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陈云在沈阳经验简报中说，学习苏联红军接管城市方法，在哈尔滨市是“被迫采用过”，而在沈阳市“则是自觉的实行”。“被迫”是死板学习经验，“自觉”则是灵活学习经验，而灵活是从实际出发的。由此可知，陈云主张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学习苏联经验，反对生搬硬套别国经验，并且也是这样实践的。第二，怎样向外国学习也是陈云的很重要思想。沈阳经验关于学习苏联经验的论述，反映了他在解放战争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对学习外国的基本态度。

借鉴其他解放区接管城市的经验也是沈阳经验创立的重要因素。陈云在创立沈阳经验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大量大中城市，并且已经总结出相当一部分接管大中城市的经验，如曾山的《关于接管济南经验的报告》、接管洛阳的经验、习仲勋《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关于收复石家庄经验的介绍》等。这些经验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有些基本内容也基本上适用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特别是接管石家庄的经验已创立一种模式。所以，中共中央将这些经验报告转发给了其他前线和其他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从陈云创立的沈阳经验来看，他对其他解放区和其他前线的领导同志所总结的接管城市的经验，特别是对于石家庄经验是熟悉的，认真研究过的，并且是借鉴了的。

陈云自己的城市工作经验是其沈阳经验创立的有利条件。陈云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曾长期从事大中城市的革命工作，对城市了解熟悉，不仅有诸如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上海等城市进行革命工作的经验，而且还有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接管哈尔滨、长春等大中城市的经验。这些经验无疑会给其以后实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行动以启迪，以借鉴。关于这点，陈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接管沈阳的经验简报》中明确说，接管沈阳的“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方针，就是接管哈尔滨的经验。

在《经济处（工业部）关于接收沈阳国营企业工作总结》中也明确说：“关于职员问题。基本方针仍按《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职工问题的决定》及六次劳大决议中关于职员问题的方针执行。”再从沈阳经验尤其公安工作经验来看，其与接管哈尔滨市后对公安保卫、消除敌特、肃清盗匪、建立革命秩序的经验，也是有许多相承性的。沈阳经验的创立，正是陈云重视城市工作并结合实际灵活运用自己以往城市工作经验的合理产物。

沈阳解放前夕和刚解放时的具体情况是沈阳经验创立的客观条件。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大方面认识：第一，沈阳解放前夕的实际。沈阳历来是东

北地区的重镇，一方面是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后方基地性质的大城市，工业发达，商业发展，交通方便，机关系统众多，人员复杂；另一方面又是无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的大城市，中国共产党在此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很有利于解放。第二，接收沈阳时的实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前，其军管会已经成立，并配备了各方面能称职的大量干部，做好了许多接管的准备工作。占领沈阳时，一方面“未经激烈战斗，我军纪律良好，再加上人心向我，故极少破坏”，“一般工厂机器未被国民党搬走，均保持得完整无损”（11）；另一方面由于军管会人员进城快，11月2日，沈阳战斗结束即进了城，接收迅速，领导上方针正确，比较有计划步骤，所以给顺利接管造成了有利条件。陈云正是把握了这样一个机遇，综合而灵活地运用上述所说“基础”和“因素”以及“条件”，于其他解放区和前线领导同志创立接管城市经验之后，创立了沈阳经验。

陈云创立沈阳经验的重要意义

沈阳经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接管大中城市的经验。它的创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沈阳经验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前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

其一，对中国共产党人在1948年11月取得解放全东北的伟大胜利，对东北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有利于全国的解放战争，东北地区是中国工业、农业以及交通业的重要基地，经济实力雄厚。东北根据地的巩固，有利于其工农业和交通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有利于其凭仗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正如1945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总结报告中所说，“东北四省极重要”，“有了东北就有了基础”，我们的事情就好办。然而，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在辽沈战役之后，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其大中城市的巩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城市是夺取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力量。沈阳经验的重要作用，恰恰在于导致了东北根据地大中城市的巩固，从而促进了全根据地的巩固，使其开始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工作”（12），有了更充分的物资基础，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

其二，使没有解放的城市的广大群众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良好的信任感。相当一部分没有解放的大中城市的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及政策缺乏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占领和接管沈阳这样的大城市所采取的方针政策，群众很快就知道了，从而从更多的方面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合理性，因之有了迎接解放的良好心理准备，这无疑给中国共产党人顺利占领和接管更多的城市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三，沈阳经验在新解放城市被广泛地自觉地借鉴并取得良好的效果。陈云创立的沈阳经验，立即得到中共中央重视，被作为重要经验转发给各解放区和各前线的领导同志学习参考，被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入《一九四八年以来政策汇编》，影响很大，为许多新解放城市的军管会借鉴。如接管重庆市就是一例。以刘邓为首的第二野战军，在进军重庆途中，就借鉴沈阳经验作好了接管重庆的准备：首先，组成了由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任主任、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任副主任的重庆市军管会，抽调了4976名干部作为接管的骨干力量，做好了接管的思想动员工作。1949年11月30日，重

庆一获解放，接管人员即迅速进了城，并根据沈阳经验的“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方针，采取迅速恢复秩序的许多政策，仅以50多天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接管工作。

第二，沈阳经验为怎样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学习苏联经验提供了宝贵经验。关于学习外国，毛泽东从原则上指出，应该学习外国，但是“并非不顾情况的死搬”，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学习，“必须我们自己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生长”（13）。但是，究竟怎样正确实行这一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学习苏联，中国共产党人有很长历史，有经验，也有教训。不过，从沈阳经验创立看，陈云学习苏联经验的实践应该说是一个成功范例。因为，虽然采取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针，但根据这个方针所进行的10多个方面的接管工作及采取的政策却是根据中共中央城市政策基本原则和沈阳的客观实际确定的，没有硬套苏联红军接管城市的方法和步骤。陈云在接管沈阳时，把中国自己的东西与苏联红军的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从而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人式的接管城市的又一成功经验，这不能不说是陈云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贡献。可以说，陈云当时在这方面的思想和成功实践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第三，沈阳经验的创立为中共中央全面总结接管大中城市的经验，为制定完整的正确的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创造了新的重要条件。对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三个大方面认识：

其一，在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接管大中城市经验方面起了模范作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马列主义是当着要到农村去时就去农村，当要到城市去时就去城市。现在要好好准备，把重心转变到城市去，要注意城市问题。可是，在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伟大历史转变以后，“如何去收复城市，收复后又如何管理，这在党内一般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14）为此，中共中央强调指出：“多年以来，我们占领很多城市，也有丰富经验，但没有总结，埋没了这些经验，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使好的经验只限于一地，而未能为全党所取法”，这种现象已相当严重地影响到党的工作之发展，“为了今后取得的城市工作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与组织两方面的准备”，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必须写出接管大中城市的总结，上报中央。（15）陈云很重视中共中央指出的问题，在接管沈阳的第一个月内，就写出《关于接管沈阳的经验简报》，第二个月则写出《补充报告》，第三个月又写出《关于接收沈阳国营企业工作总结》等有独创性的经验总结，这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这个有独创性的经验总结，受到中共中央重视，中央除将其转发全党全军学习参考外，还在一些指示中加以赞扬，如在《关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中就肯定沈阳经验提拔和培养自己的懂工商技术的干部来接管城市的经验等。这些表明，创立沈阳经验在中国共产党人中起了模范作用，对提高和统一全党全军接管大中城市的思想认识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其二，沈阳经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接管大中城市经验的内容。沈阳经验创立前，中共中央虽然已经制定了接管大中城市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政策，石家庄经验也已经创立，毛泽东还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提出了关于城市政策应注意的9点政策，但是，如关于准备专门办

理接管大城市的班子、“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方法、迅速处理俘虏与疏散弹药、军管会内部要尽力减少扯后腿抵消精力之事、人城部队必须与军管会公安机关协同处理国民党监狱在押人犯、建立训练有素的专门卫戍部队、不能中断税收、重视城市内的电话簿子等内容，以及关于接管大城市国营企业的若干具体政策，却是没有的或者是不够明确的。而沈阳经验则明确地总结出了这些内容，使接管以战争解放的城市的政策完善化了。

其三，沈阳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完整的正确的城市政策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人接管城市的三种基本经验或模式，首先是石家庄经验创立，其次是沈阳经验创立，最后是北平经验创立。沈阳经验创立于石家庄经验的基础上，北平经验则创立于沈阳经验和石家庄经验的基础上。在沈阳经验创立前，已有接管和平解放的大中城市的事例。但为什么仅在石家庄经验基础之上未能创立接管和平解放城市的经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接管以战争解放的城市的经验还没有完善化，制约了新经验的产生。沈阳经验的创立，则使接管以战争解放的城市的经验完善化了，从而为新经验产生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北平军管会抓住了这样一个机遇，在充分学习和参考沈阳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和平解放北平的实际，创立了接管城市的新经验，即北平经验。关于沈阳经验的这种承上启下作用，可以从叶剑英于1949年2月25日写的《北平市接管工作初步总结》的具体内容看出。

综上所述，陈云在解放战争时期创立的沈阳经验或者说模式，内容十分丰富，相当重要。研究他创立的沈阳经验，应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建设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过去，陈云研究和解放战争研究对此虽有涉及，但不够深入系统，为了全面地深入地研究陈云的生平和思想，今后还应拓展沈阳经验的研究。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注释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1948年6月10日）。

《中共中央社会部关于东北城市公安工作经验通报》（1948年8月4日）。

《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第1324、1285页。

(11)(14)(15)《一九四八年以来政策汇编》（下），第199—205、17、10、205、310、307、199、17、10—11页。

(12)《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今年农业生产的总结与明年农业生产任务的决定》（1948年12月12日）。

(13)参见《和根瑟·斯坦因的谈话》（1945年3月29日）。

陈云建国初期在稳定物价、 统一财经工作中的历史作用

马巧良

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经济，是新中国经济战线取得的第一个伟大胜利。陈云为这一胜利的取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建国初期，我国在财政经济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一是国家财政收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赤字。二是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物价飞涨使整个社会经济陷入混乱和动荡的局面，人心波动。这是我们党从推翻国民党政府到掌握全国政权过程中所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帝国主义者预言中国人民不向他们乞讨将无法活下去。资产阶级讥笑“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一些不法资本家还试图在经济上和我们较量。我们的朋友中也有人对我们的治国能力表示怀疑，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显然，在这种形势下，能否迅速消灭财政赤字，稳定物价，关系到解放后全国大局的稳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以及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果断地采取坚定而有效的措施来克服财政经济的困难，向世人表明：我们有能力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也有能力领

导人民治国安邦。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就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1949年5月31日，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要求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它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

“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决定建立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着是从东北调回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陈云同志是新中国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在抗战后期“主持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工作很出色。解放战争时期，他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的工作，顺利实现了东北全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较早地把经济稳定下来。党中央和毛泽东任命他为中财委主任，是再合适不过了。”

陈云受命于新中国财政经济严重困难之时，上任伊始，他发扬“唯实”、“稳健”的作风，首先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以上海为重点，解剖“麻雀”，对财经困难的状况和原因、性质和前途做了全面而科学的分析，然后确定了对策和解决办法，把稳定物价、统一国家财政经济作为第一个战役，并亲自指挥了这场斗争。

二

陈云指挥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从上海财经会议拉开序幕。

1949年7月，陈云来到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这是资产阶级

最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当时投机风潮最猖獗和经济困难最大的城市。上海经济形势的稳定与否，对全国的影响极大。陈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7月27日至8月15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在会上，陈云作了《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的报告和《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的大会总结，提出了克服财经困难的措施，明确了领导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

第一，用政治观点来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这就是要立足于革命战争的全局看问题。从全国的范围看问题，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找到解决的有效办法，坚定自己的信心。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处在诞生的前夜；另一方面财政经济遇到困难，尤其是在南方前线，在较大的城市，困难更大。做财经工作的同志首先要对这种困难有个正确的认识。陈云认为，“这是胜利中的困难”，是解放战争推进到国民党区域后出现的暂时困难；全国解放了，新区的工作开展起来了，困难就会减轻，回旋的余地也会更大。到那时我们“是在一个发展的环境中，加一点税不会出大问题。如果赤字不大，可以用增加税收的方法，努力求得收支大体平衡。以便使经济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到那时，货币比较稳定，发了票子物价不上涨，就大有文章可做。”因此，从当时的全局看，“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不论财经工作有多大困难，仍要把支援战争放在第一位，在支援战争的前提下谋求经济的稳定。离开这个前提，孤立地看问题，就经济论经济，路子不会宽。

第二，克服财经困难要着眼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财经困难怎样克服？物价如何稳定？重要的一条是制止通货膨胀。那么怎样制止通货膨胀？陈云说，不是靠发票子，而是靠增产节约，“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陈云非常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对克服当时财经困难的重要性。为解决上海的财经困难问题，原来曾设想用

“工厂搬家”的办法，减轻上海的负担。陈云考虑到这样做对下一步恢复生产不利，因为工厂不是随便搬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生产的，不具备一定条件形成不了生产能力。而经济困难的最终解决，离不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上海会议决定由各区共同努力来维持上海。陈云指出，“改造旧上海，主要是使生产事业得到恢复和稳步发展。”

在恢复生产上，陈云强调“反对百废俱兴”，主张“经济上重点恢复”。重点恢复主要抓两个：“一个重点在交通，尤其是铁道；另一个重点在水利和农业。”陈云认为，“运输是全国经济的杠杆。”如果交通阻塞，就将使全国城乡经济处于瘫痪局面，根本不可能进行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是“头等大事”。陈云指出：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而整修水利则是恢复农业的关键。陈云的这种重点恢复思想，对我们较快地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克服财经困难，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三

陈云把稳定金融物价作为克服财经困难的突破口。

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的较量。当时作为投机市场领导力量的官僚资本已经被我们没收，但大批的私人投机资本还继续存在，成为破坏国民经济的主要因素。它们趁着国家财政经济还

有暂时困难和社会主义经济力量还不十分强大的机会，凭借着在市场上占有的经济优势，扰乱金融物价，疯狂地追逐暴利，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动了猖狂的进攻。陈云指出，这是资产阶级“要在经济上同我们较量”（11），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整个国民经济领导权的斗争。

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就必须狠狠打击破坏性最强的投机资本。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没有采取简单的没收的做法，而是按照经济工作的特点，采取了行政手段和经济措施相结合，并以经济措施为主的方针，陈云在直接领导这场斗争中，把政治手段和经济措施巧妙地结合起来，表现了很高的领导艺术。

首先，打击金融投机资本。在旧中国，由于通货贬值，物价飞涨，投机倒把就成为官僚资产阶级追逐暴利、掠夺财富的主要办法。币制的不稳，使黄金银元充斥市场，于是滋生了一批专门从事金银买卖的投机分子。他们以银行钱庄为据点，专门以倒卖金银为业，兴风作浪，扰乱市场，常常成为物价波动的先导。解放后，他们不顾人民政府的警告，利用国家物资短缺和人民币立足未稳的机会，继续进行金银投机活动，使金银黑市价一日三涨。这种资产阶级的金融投机主要在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从上海解放到6月9日，短短的13天中，黄金上涨2.11倍，银元上涨1.98倍，物价随之上涨2.7倍以上。（12）买卖活动中也大都使用金条银元，使人民币的通货地位和信誉受到严重的冲击。对此，各阶层的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

为了打击金融投机活动，稳定市场，各地党政部门一方面发动广大工人、学生开展宣传活动，揭露金融投机的危害性和投机破坏分子的阴谋，另一方面严令禁止金银的流通使用和私自买卖，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对非法的金银投机活动和机构，则严加取缔。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与支持下，经党中央批准，派公安部队包围并占领了金银外币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并法办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要投机奸商238人。其他各地也先后逮捕处理了一批投机分子。经过这一打击，金银投机活动基本被制止了，市场得到了初步的稳定。

其次，打击不法资本家对粮食、纱布等重要商品的投机。银元风潮被挫败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并没有受到重大打击，还不服气。那时，物价不稳定，粮食和纱布往往代替货币充当筹码，成为囤积的对象。于是投机资本家又把眼光转到粮食和纱布上。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捣乱市场，先后掀起了四次全国性的物价大涨风，其气焰极为嚣张。为了反击投机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在陈云的亲自主持下，部署了全国性的统一反击行动。陈云起草的中财委给各地党委的指示强调指出：应在这次行动中给投机资本家以“教训”。（13）

这次反击的特点，主要是运用经济措施，依靠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挫败投机资本。做法是，调集大量商品，选择有利时机，集中抛售，平抑物价，打击投机。陈云认为，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不可缺少的手段。他提出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掌握棉纱以稳住农村，从而遏制投机资本家乘机兴风作浪的方针。当时，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建立起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并拥有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机构，控制着大份额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为我们战胜投机资本，控制市场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党和政府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这一优势，给投机资本以毁灭性的打击，有效地平息了他们掀起的涨价风，如1949年11月，当投机资本家掀

起涨价风，活动异常猖狂之时，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和其他主要物资，经周密准备，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于11月25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按国营牌价大量抛售，到26日就使物价下降，稳住了市场，投机资本家不得不把抢购囤积的商品吐出来，赔本出售。这次行动给投机资本以毁灭性的打击，有相当一批投机资本家破产，显示了共产党搞经济工作的能力。上海工商界人士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14）

再次，严格市场管理和加强金融管理。运用行政力量加强市场管理和金融管理，是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控制和稳定市场不可缺少的措施。在陈云和中财委的具体指导下，我们将足以带动市场物价的主要物资置于政府的指导与监督之下，集中进行交易；政府对交易市场实行整顿，建立管理机构，审查交易员，实行凭证入场制度，场内一律现金交易，禁止买空卖空和场内转帐；保护国营商业的牌价不受私商破坏，成为市场上的领导价格，对没有牌价的商品则采取议价、核价制度；对投机倒把扰乱市场者，严加处理。同时国家加强金融管理，收紧银根；征收税款，收缴公债款，要求资本家按时发工资而不准关厂；公家的钱只能存放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对取缔和限制投机活动，控制物价涨风，起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人民政府还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健全税收机关和加强税收工作，开展折实存款，回笼货币，以紧缩通货，稳定物价。陈云在1949年12月2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报告，并具体起草了《公债和钞票的发行计划》。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陈云的精心指导下，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这期间虽发生了四次物价涨风，但政府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每次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加以平息，把物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之内，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进入1950年3月后，全国市场就完全稳住了。这样，在建国后仅仅半年时间内，我们就克服重重困难，把物价稳住，把市场控制住，树立起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四

打击投机资本、控制市场、稳定物价的几番斗争，我们都取得了胜利。但这仍旧是暂时的，辽不能从根本上防止物价的波动。因为我们的财政经济没有统一起来，收支脱节，中央财政缺乏坚实的基础，随时有出问题的可能。陈云指出，1949年每次物价大波动被制止后，“短时期中虽也有过金融物价比较稳定的状态，但那种稳定是暂时的，并不是因为财政赤字缩小了。……不是建立在财政收支的平衡上面，继之而来的波动，就是不可避免的。”（15）

当时，我们“支出很大”，而“税收甚微”，所以“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因而钞票发行过多”（16）。支出很大表现为：其一，解放战争还在华南、西南等大片地方进行，军费开支浩大。1949年军费支出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1950年占41.1%。其二，我们对于一切不愿抵抗的旧军队与旧人员采取一律包下来的政策，连同我们自己的军政公教人员，国家需要供给的脱产人员达900万人，行政费用也很大。其三，政府还要支出相当数量的现金和物资去救济失业工人和灾民；以及重点恢复交通和其他生产事业。因此

整个国家开支浩大。“税收甚微”是因为：第一，老解放区人民10多年来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已付出过巨大的人力物力，解放后上交的公粮约占其总收入的19%强，已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第二，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其税收或者是因战争而陷于停顿，尚待整理与恢复，或者是受季节的限制，暂时不能征收。第三，用于恢复生产和交通的投资，短时间不能收回成本，更说不上得到利润。这样，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差距很大，1949年国家支出中财政赤字达到2/3。为了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人民政府不得不暂时依靠银行透支，发行钞票。人民币的发行额，以1948年为基数，到1949年11月增加约100倍，到1950年则增加270倍。其结果，一方面了解放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出现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的局面。

同时，还有一个严重的情况是收支脱节。公粮和税收等收入大多由地方人民政府掌握和管理，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而支出则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收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统一调度困难重重。

因此，要从根本上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就必须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平衡收支。

早在1949年8月，陈云在上海会议上就提出统一财经问题。12月，陈云在他起草的复华东时委的电报（并发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区财委）中，再次强调了“财政经济要统一管理”的重要性。1950年2月，在陈云的亲自主持下，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会议详细讨论了如何平衡财政收支、平衡货币吐纳、平衡物资供求的问题，决定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管理。陈云在会上反复阐述了统一财政经济的重要意义，提醒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增强对战胜困难的信心。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颁布了由陈云亲自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尔后，政务院陆续发布了《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〇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关于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的决定》、《关于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拨的决定》、《关于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的现金管理决定》等一系列重要决定和法令。它们奠定了我国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的雏形。

陈云指出，缩小财政收支之间的不平衡和防止金融物价的大波动，“其关键在于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财政收支的管理。”(17)上述各项决定和法令的基本精神也就是节约支出，增加收入，统一管理，缩小赤字，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其主要措施是：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收入中主要部分的中央收入，集中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使国家财政收支有可能达到平衡。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即重要物资，如粮食、棉花、纱布、工业器材由中央统一调动，把主要物资由分散状况集中起来，变为有效的力量，使国家有可能在国内互相调剂，保证重要物资在市场上供求平衡，从而有效地制止投机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在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样既减少市面上的货币流通量，又增加国家能够运用的现金，从而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这三个统一的共同结果是，避免了人力和物力的分散和浪费，达到了集中使用的目的，保证国家财政收支、物资供求、现金出纳三大平衡。这是我国财经工作上的一个重大转变。陈云指出：“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将不仅有利于克服今天的财政困难，

也将为今后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18)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在陈云为首的中财委的精心策划安排下，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在很短的时期内收到巨大成效。到1950年4月，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而支出相对减少，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已不需要依靠增发通货来弥补财政赤字。物价随之回落，并趋于稳定。以后国家的财政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这表明党和人民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剧烈波动的金融物价稳住了。从此，我们党完全掌握了财经工作的主动权，结束了我国历史上长达12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的局面。

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斗争的胜利，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这一胜利，迅速改变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对比，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权，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以后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从经济上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对陈云领导的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财政经济委员会过去六个月在整理收支、稳定物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成绩。财经委员会的方针是正确的。”(19)毛泽东对陈云的理财能力更是倍加赞赏，称其为“能”。这是毛主席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来赞扬陈云的理财之能。(20)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注释

(2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70、89页。

(11)(12)(13)(14)(15)(16)(17)(18)《陈云文选》第2卷，第1、9、1、18、5、71、17、143、60、31、52、77—78、34、64、74—75页。

陈云：《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载《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

(12)《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8页。

(19)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载《新华月报》1950年5月号。

陈云与建国初期的 城乡物资交流

杨基龙

建国初期，我党为振兴全国经济，采取了几项重大的战略措施。其中的一项，便是在陈云的领导下，开展了城乡物资交流活动。这一活动取得了重大成就，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稳定和活跃了市场。回顾一下当时城乡物资交流的情况和经验，对于我们当前发展经济，搞活市场和流通，有着十分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 “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交通瘫痪，物资交流阻塞，市场萧条，物资奇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显而易见，新中国成立时所面临的经济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因此，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就成为摆在人民政权面前急迫的战略任务。

为此，党中央和当时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根据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比重的农业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和农民的状况对国民经济的全局关系极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把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农村经济复苏和活跃起来，作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头等大事来抓。

要使农村经济复苏和活跃起来，就必须使农村的商品交换恢复和发展起来。当时农民手中有的和可以交换的，是农副土特产品：如猪鬃、桐油、茶叶、鸡蛋、药材等，它们占了农民收入 20%—40%，甚至更多。但是，由于多年的战争，原来的商品交换关系和物资流通渠道大多被打乱，城乡物资交流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美帝国主义对我禁运封锁，又使我国的物资出口十分困难；加上我们一些干部有“左”倾情绪，对私商盲目排斥，重视生产轻视流通，结果农副土特产品大都积压在农民手里，估计其价值约等于 240 亿斤粮食。这种局面造成了一方面在大城市和工矿区粮食奇缺，居民生活需要的农副土特产品断档脱销，许多工业品也找不到销路而缩工或停产。另一方面，在农村又谷贱伤农，土产无从运销，农民急需的工业品无钱购买，也很少供应，农民困难甚大。这时中央又确定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重要一环是增收，如增加公粮附加税、征收契税、酌收若干种货物税、进出口税等，合计约值几十亿斤小米，这些大部的负担都落在农民头上，农民能否拿得起？针对这种情况，陈云认为，要使农民拿得起，“我们要做的一件工作，就是实行近地交流、全国交流、内外交流，让农民销出农副土产品。只要能够把农副土产品销出去，农民就可以负担得起”，也可以使农村经济的机器运转起来，从而带动起全国经济工作的恢复。如此，“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是中国目前经济中的头等大事。” 因为，建国半年来的财经工作完全证明，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占农民收入 20%—40%（甚至更多）的农副土特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或消灭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的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

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所以，陈云一再强调：“城乡交流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城市工商业，也有利于国家……这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

过的，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为此，他决定把城乡交流作为 1951 年财经工作的第一件大事来抓。

二千方百计搞好城乡物资交流活动

陈云认为，活跃城乡交流，主要的是要疏通渠道，从打开农村土特产品的销路入手，进而扩展工业品在农村的市场。为滞销的土特产品打开销路，最主要的是掌握大宗土产的种类、数量、质量和季节性，研究战前土产流转的规律，千方百计恢复旧的商业网和开辟新的推销路线。因此，为了畅通和搞好城乡交流，各地应根据情况采取如下的具体措施。

第一，努力搞好运输，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陈云强调：“应该恢复从前的运输公司，通过这些公司使所有的零担土产集中装卸。”但在目前条件下，运输还应该充分利用落后工具。因为中国汽车太少，而且大部分是木炭车，单靠汽车是不能完全解决城乡交流需要的。北方大车的总运量超过汽车的总运量，南方木船的总运量超过轮船的总运量，是最基本的实情，假如不注意这一点，就是没有抓住大头，没有抓住重点。搞好运输，长途贩运，互通有无，是城乡交流活跃的前提。同时还要“解除互相封锁，取消某些乡、镇人民政府所规定的不适当的市场管理办法”，真正使其活起来。

第二，有计划、有准备地召开县、省、大区三级土产交流会和物资交流展览会，广泛吸收本地区以及全国有关地区的各行业贸易部门、合作社、私商代表以及各类土产生产者代表参加，沟通相互的需要，恢复和建立彼此的商业联系。

1950 年 11 月，华北地区最早组织了土产品交流会和以销为主的物资展览会。到 1951 年 2 月，全区 5 省 2 市的全部土产即已销出 70%，合原粮近 50 亿斤，从而推动了城乡物资交流的活跃。以陈云为主任的中财委即刻大力向全国推广这一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的好形式。1951 年 3 月，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要求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各专区，各县和各区乡，在两个月以内召开一次土产会议，并指出：有计划地召开土产会议，组织城市和乡村，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打开国内市场，活跃城乡经济，是解决各地农村日益恢复和发展的农副土特产品销路的问题的关键。响应这个号召，全国各地均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土产交流会和物资交流展览会，形成了全国性的城乡物资交流高潮。例如，上海市、中南区、东北区、华北区等均举办了土产展览会和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共订立合同和协议达 1.4 万多件，成交总值 10 亿余元。到 1952 年的下半年，规模更大，全国各地举办的这种形式的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共 7789 处次，成交总值 33.93 亿元，比 1951 年增长 2 倍以上。

第三，组织群众性短距离物资交流，利用集市、庙会、骡马大会、药材大会等传统初级市场，进行物物交换，互通有无，也是一种易于成功，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土特产品通常是分布广、品种杂、数量多、体积大、“腿脚”短，因而组织群众在本乡、本地贩运，对于收购和推销农民的农副土产品以及贩运工业品下乡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国营贸易公司作主导，遍布于广大农村的供销合作社作助手，积极参加城乡物资交流工作。

国营贸易公司担负起主要的大宗的农副土产品的采购与主要的工业品的供应。仅据 1951 年的不完全统计，国营贸易公司即从农村收购供应城市粮食达 50 余亿斤，棉花 600 余万担，还有 9.4 万多斤鲜蛋，51 万担茶叶以及其它数额巨大的农副土特产品。与此同时，遍布于广大农村和集镇的供销合作社又以适当的价格，收购农民的农副土特产品，还采取了订立“预购合同”、“结合合同”等形式，帮助收购农民的农副土特产品。到 1952 年底，合作社收购农副土特产品额为 37 亿元，约占国家收购此类产品总额的 60%，其中，粮食为 40—50%，棉花为 79%，麻为 72%，烤烟为 51%，茶叶为 56%，羊毛为 24%，蚕茧为 95%。

第五，制定合理政策，鼓励和组织私商下乡收购土特产品，供应生产资料和工业品，充分发挥私商在人力和资金上的作用。陈云分析说：“农村是很分散的，我们的国家又这样大，生产方式是零零碎碎的小生产，东西是在一家一户的，城乡物资交流单靠我们的贸易公司不行”，因为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不可能对一般土产全部经营，而中国私营商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又众多（座商和摊贩，共有七八百万人），如果对他们盲目排斥或取缔，势必会造成农副土特产品交流的阻滞，这样会害了农民。（毛主席说，也害了共产党，害了人民政府）。因此应该鼓励私商积极参加城乡交流，而且还应在经营范围、批零差价、税收政策、银行贷款、市场管理、劳动条件等方面，给私商以照顾，调动他们的经济力量，把城乡物资交流推向更普遍和深入的领域。

事实证明陈云分析的正确以及政策制定的灵活性。由于采取了上述政策，广大私商积极参与城乡物资交流。据统计，1951 年私商收购农副土产品价值 24.6 亿元，占全国收购土特产品总价值 44 亿元的 55.4%。又据 1951 年中南区统计，该年全区收购烟叶、松香、信石等 17 种土产品成交量中，私商占 89%。可见他们在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活跃社会经济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六，必须照顾少数民族地区，解决他们购销物资的困难。国营贸易部门为此先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 1100 多个门市部、采购站，加工厂、流动贸易小组、扶助合作社，帮助他们大量推销畜产品和生活资料。例如，在西南区的物资交流大会中，为少数民族找到了贝母、麝香、虫草等土特产品和积压多年的毛呢的销路，同时满足他们对哈达、茶叶、毛绸等必需品的需要，从而使城乡物资交流得到了全面发展。

此外，根据陈云的倡导，建国初期的城乡物资交流，也展开了内外交流的有机结合，扩大土特产品的销路，弥补城乡交流的不足。如 1952 年某些口岸大城市所举行的物资交流大会，就积极组织和带动了私营进出口贸易，争取了一部分土特产品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输出，同时换回了国家需要的物资，这样不仅解决了一部分土特产品的销路问题，而且也换回了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部分物资，从而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

一般估计，自 1950 年秋到 1952 年止，通过各种形式的物资交流会，从农村推销出去的农副土特产品总值达 100 亿元以上，实践证明它确实是“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由于全国有领导地把推销土产、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从而扭转了市场呆滞的局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对全国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为巨大的促进作用。诚如陈云在《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等文章中所预计的那样：首先，它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地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了农村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据统计，1952年与1949年比，各地农民的收入一般增加30%，平均每人消费水平约增长20%。其次，它使旧有的商业渠道得到恢复，并且开辟了新的商业路线与新的商业活动方式，从而促进了全国各地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活跃了国内市场。例如中南区的瓷器、土布、砂糖、竹器、水果等，就远销到西北、内蒙古，而内蒙古的天然碱、奶油、瓜子和其它地区的土产品也销到中南区。再次，农民购买力的提高，为工业品下乡创造了条件，从而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据统计，1951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8.8%，轻工业由维持、恢复转向发展，机械工业由没活干到订货应接不暇；商业购销比上年大幅度增长。经济的繁荣，使就业人数显著增加，据各省市不完全统计，1951年1—6月职工人数增加了12万人。最后，全国经济的繁荣，也使国家的财政收支出现根本性的好转，连年结余，物价趋向稳定。1951年结余10.6亿元，1952年结余7.7亿元，有力地支持了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

三 城乡物资交流的特点和经验

建国初期城乡物资交流的巨大成功，体现了陈云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和领导经济工作的才能，可以说，它是陈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领导经济工作所作出的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典范，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那么，建国初期陈云领导的城乡物资交流活动，有何特点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呢？笔者认为：

第一，新中国工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国内市场的主体在农村，只要农民的购买力提高，工业就能恢复和发展。这一点，在今天依然重要。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和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

第二，建国初期的城乡物资交流，从推销农村土产品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经济问题入手，把整个经济转动了起来。这一事实说明：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是互为市场的，只要努力沟通它们之间的联系，促进社会再生产的实现，就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疏通流通渠道，应发挥各种经济形式的各自优势，才能更好地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搞活市场，搞活流通服务。国营企业无论资金、运力及网点设置等，都只能担负主要的大宗的农副土产品的采购与主要工业品的供应，必须有农民自己组织起来，遍布于广大农村的供销合作社作助手，并且制定合理政策，发挥私商的积极作用，调动小商小贩的经济力量，采取多种交流方式，以补充国营经济的不足。建国初期的城乡物资交流，三种经济成分一齐参加，从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需要各方力量参与，才能调动各自力量和积极性，发展国民经济。建国初期城乡物资交流强调发挥各种经济形式的各自优势来搞活市场搞活流通的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挥。

第四，沟通市场商品信息，掌握社会需要的脉搏，明确生产经营的方向。

建国初期城乡物资交流中十分重视针对社会需要来安排生产和组织经营。当时在土产交流中，就注意分清哪些是畅流的，哪些是行销的，哪些是滞销的及其发展趋势，从而研究对策，引导农民按社会需要进行生产，相应的商业部门按农民需要组织经营，组织适销对路的工业品下乡，满足农民生活和生产上的需要，做得很成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强调开拓国外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可以吸取建国初期城乡物资交流中这一成功经验：了解信息，掌握社会需要的脉搏，有的放矢，组织生产和经营。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注释

《陈云文选》第2卷，第118—119，127、128—129、252、

94页。

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

蒋永青

1958年，我国开始掀起“大跃进”运动；接着，又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两个运动使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使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

对此，陈云早在1959年4月就已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向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粮食要省吃俭用”，“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必须从生产入手，定出有效办法，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国营、集体、个人三种形式可以同时并行，三条腿走路。”“压缩购买力，认真精减去年多招收的工人。”陈云的意见，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5、6月间，中央陆续发出一系列紧急指示，指出农村要恢复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畜家禽等。7月，毛泽东在同一些领导同志谈话中，明确肯定陈云提出的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的意见是对的；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首先要把农业搞好，并指出：在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但这些认识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仍在进行而受到很大局限，特别是在7月底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后，被完全改变。结果，“左”倾错误再度泛滥，使已经十分困难的农业遭受到更大的打击。

1960年，也就是大跃进的最后一年，粮、棉、油、猪、大牲畜的产量和存栏数大都退回到1951年的水平。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普遍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甚至发生农民逃荒和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下半年，仅山东省逃荒人口就达90多万。1960年底，河南省仅信阳地区就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京、津、沪和辽宁省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库存挖空，达到随调随销的地步。全国人民的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1960年9月，陈云前往河北、山东两省，实地考察农业灾情，研究安排农民生活等问题。回京后，他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接着，他又从10月份起，对灾情严重的黄淮海地区进行考察，重点在河南、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历时3个月，行程上万里。所到之处，他都详尽了解实情，同省委负责人共同研究解决困难的措施，并不时致信在北京的周恩来，提出各地急需满足的一些具体要求。1961年上半年，陈云回到故乡青浦，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对农业问题进行了全面调查。通过将近一年的考察，陈云对解决当时农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对策意见。这些意见有些为党中央所采纳，对扭转农业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则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被采纳，但却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改革起到了积极的启示作用。无论这些意见在当时被采纳还是没有被采纳，也无论这些意见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否还适用，我们今天都可以从中领悟到陈云对中国农业问题思考时所贯穿的出发点和方法，这种出发点和方法是具有长远意义

的。

一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应急的首要措施

“大跃进”运动中兴建了大批工矿企业，建起的大洋群的钢铁企业又大多是建立在手工矿山和手工短途运输的基础上，因此，从农村大量招工，使城镇人口增加了3000多万。城镇人口都要吃商品粮，这就大大加重了农业的负担，使粮食的紧张状态更加突出。1958年到1960年这3年，粮食征购量占总产量的比重分别为29.4%、39.7%、35.6%。尽管如此，由于粮食大幅度减产，仍不能保证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导致粮食库存不断下降，1960年降到573亿斤，比1955年减少了29%。为此，城镇人口不得不普遍减少粮食定量，农村人口不得不以瓜菜代粮。至于食油、肉、禽、蛋等副食品供应，比粮食更紧张。很明显，要在短时间内缓解全国性的粮食危机，首要的措施是减少城镇人口。

前面说到，陈云早在1959年初就提出了精减工人的建议，并为党中央所采纳，当年9月，已减少了500万人，但反右倾斗争开展后，各地又开始招收职工。因此，不从领导者的思想上解决问题，城镇人口是减不下来的。1961年11月，陈云在杭州对浙江省委负责人说：“我们有些同志不懂得，城市人口的增加，要看农村能提供多少商品粮而定，城市、工矿的发展，是要受农村的约束的，这是工农关系中重要的一条。”

为了进一步打通领导干部的思想，陈云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一篇题为《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陈云首先摆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4条办法：第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把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出来；第二，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使化肥、拖拉机、排灌机械等的生产跟上去；第三，进口粮食；第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他指出，第一条是根本的，但是，由于粮食库存减少了，因此，国家掌握的粮食，1962年度要比1961年度还要紧张。如果城市人口不下乡，就只好再挖农民的口粮。如果对农村粮食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积极性仍然不会高，那么，为调整农村政策而制订的农业“十二条”和“六十条”就起不了应有的作用。第二三条虽然都很重要，但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因为工业转产短期内不能见效，进口粮食又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和运输力量。因此，陈云提出第四条是必不可少，非采取不可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在讲话中还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粮食供应紧张状况的原因，指出：“这四次当中，有三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产生的，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因此，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他说：“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

陈云在作了上述分析之后，又进一步分析了不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会产生严重后果。他指出，那样，第一，灾区没有粮食，只能挖高产的省、县和社队农民的口粮，高产不能多吃，这种平均主义一年两年可以，长期下去就打击了这些地区农民增产的积极性，最终使高产区变成低产区。第二，农民口粮不够吃就会把牲口的饲料粮拿来吃掉，导致牲口继续大量死亡。第三，

农民吃不饱，为了吃饭，就会想方设法挤掉经济作物而多种些自己吃的口粮，从而影响轻工业品的生产，影响人民生活日用品的供应。第四，城市人口不下乡，一年要进口 100 亿斤粮食，把很大一部分外汇用在买粮食上，势必削减成套设备和重要工业原材料的进口，从而大大影响国家工业建设。

当时，影响人们下决心动员大批城市人口下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对农业恢复快慢的估计，二是怕影响工业生产。对这两个疑虑，陈云在讲话中也给予了分析和回答。他说：农业生产恢复得很快是不可能的，要达到 1958 年的水平，即使从 1961 年起每年增产 200 亿斤到 300 亿斤粮食，也要三四年，而增产的手段，包括化肥、排灌机械等一下子增加很多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让很多人在城里吃着饭等待农业的发展，还是要马上就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以减轻农业的负担。至于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会不会影响工业生产的问题，他说：会有点影响，但不会大。不减人，工业生产也上不去，减了人，可能反而有好处，他在具体分析了当时煤炭生产、铁矿石开采、解决炼焦问题以及基本建设战线和轻重工业生产的具体情况后指出：“工业生产上得去上不去，目前不在于人多人少的问题。”

有人指出，工人下乡，也一样吃饭，不在这里吃，就在那里吃。对于这个问题，陈云是这样答复的。他说：“在城市吃饭和在乡下吃饭大不一样。究竟差别有多大，我看相当大。工人头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一百五十斤粮食，下去一千万人就是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三十亿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还在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们就不要再国家供应粮食了。这样，下乡一千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四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九十亿斤。”另外，他还指出，工人回乡，总可以生产出一些东西出来，多增产一些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

最后，陈云作出结论：“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

陈云认为虽然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有困难，但城市人口过多也带来了许多困难，从全局看，这两方面的困难相比，还是城市人口过多的困难更严重。因此，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根据陈云的意见，制定了《关于减少城市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 3 年内减少城镇人口 2000 万以上，当年内减少 1000 万人。1962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会后，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迅速得到贯彻落实，1—8 月，精减职工 850 万人，减少城镇人口 1000 万人。1963 年 7 月 31 日，中央精简小组宣布，减少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 1961 年 1 月到 1963 年 6 月，全国职工减少 1887 万人，城镇人口减少 2600 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 2800 万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了工资开支和粮食销量，使城乡关系进一步得到了改善，农业形势特别是粮食的困难局面得到了大大缓解，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二 加速发展化肥工业，为农业提供持久而强劲的动力

陈云认为，减少城镇人口只是为缓解农业生产由于天灾人祸遭受破坏的应急措施，要使农业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还要吸收世界各国的科学经验，努力发展化肥工作，使农作物产量得到较大幅度的持续的增长。他在 1960 年 11 月底同当时浙江省的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工业、农业两头，一个时候侧重一头是对的。去年、前年侧重工业，现在国家要拿出投资侧重农业。计划部门过去只管工业、交通，是苏联的传统，有其历史原因。我主张管工业的同志管一管农业，管农业的同志管一管与农业有关的工业，如化肥、农药、农机具等。”同年，他在视察黄淮海灾区时又说，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粮食增产 60%，一半靠良种，一半靠化肥。日本人过去靠侵占我国东北起家，战败后，他们就靠化肥发家。正是根据陈云的这个意见，中央决定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列为工业支援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且成立中央化肥小组，由陈云任组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陈云在 60 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曾把相当大的精力用于解决化肥厂的建设问题。

当时，我国化肥工业还十分落后，年产 2.5 万吨或 5 万吨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厂，全国只有 6 个。为了加快化肥厂的建设速度，使省一级机械厂也可以承担设备制造任务，并为了适合农村分散的条件，易于满足各地对氮肥的普遍需要，陈云曾主张土洋结合的方针，多搞年产 800 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

早在 1960 年 6 月，陈云在上海时，就派人到安徽几个小合成氨厂了解情况，同时参观了上海润华染料厂、四方锅炉厂和冷拔钢管厂，考察小合成氨厂所需钢材和有色金属的技术及产量问题。7、8 月份，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接见了化工部张珍等人，着重讨论了年产 800 吨小合成氨厂在生产和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应采取的措施。之后，陈云每个月都要定期听取化工部关于 800 吨小合成氨厂的工作汇报。这年下半年，陈云视察黄淮海灾区时，更是把小合成氨厂的问题挂在心头，在行至安徽省时，特意请化工部的同志前来向他汇报 800 吨合成氨厂的技术问题。

但是，经过一段实践，证明小型氮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并没有过关。在 1960 年底建成投产的 20 多个年产 800 吨的厂子，只有 5 个厂生产比较正常；7 个年产 2000 吨的厂中只有 3 个厂生产比较正常。而且，即使这 8 个生产比较正常的小型氮肥厂，由于设备的质量不好，技术操作很难掌握，事故比较多，生产也不稳定，实际产量未达到设计要求，且原料和动力的消耗都很大。针对这种实际情况，他改变了原先的想法。1961 年 3 月，他在听取化工部汇报时说：我们本想搞小型氮肥厂经济，可是搞了许多都未搞成，反而不合算。大、中、小之间，现在看来小的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在大、中之间选择。1 万吨合成氨的中型氮肥厂技术上也不能说过了关，现在推广要我签字我不签。年产 2.5 万吨或 5 万吨的大型氮肥厂，不论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都是成熟的。至于设备、材料问题，从进口方面解决。如果中央会议要我发表意见，我的意见是搞大型厂，大型厂搬的是外国的，和老太爷一样稳当、牢靠，有把握，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这种实际的东西。他同时鼓励小合成氨的试验还要积极干，说他搞小氮肥是积极分子，现在搞大的是被迫的，小的绝不要放松，不要等待，先发展大的，这和小的要加紧过关丝毫也不矛盾。

1961年4月4日至10日，陈云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有中央化肥小组一些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专门就大型氮肥厂的材料、设备定点制造、成套供应及建设规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在讨论中，他讲：真正增产粮食还要靠化肥和水，中央一致的意见是多搞、快搞化肥。目前最难解决的是重要设备所需的金属材料。进口材料的建议是个大发明，是件大好事，是很重要的措施和保证。一个年产5万吨合成氨厂需要的重要材料，约需外汇320万美元。320万美元只能购买4.5万吨粮食，很快就吃完了，而用来购买重要材料建设一个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生产的化肥每年可以增产粮食五六十万吨。在几天的热烈讨论中，会议提出在三年内集中力量，陆续建设8到10个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以使每年形成20万到25万吨的生产能力。在讨论到设备定点制造、成套供应及今后建设规模时，陈云说：定点制造并不是要求制氧机、冷冻机、鼓风机等制造厂今后只生产氮肥厂所需要的设备，不能为其他工业部门制造设备，而是要把制造氮肥厂所需设备的任务，在这些工厂中固定下来，避免现在存在的氮肥厂所需要的通用设备不能保证供应或者不能如期供应的现象。氮肥设备成套供应的范围要扩大，除了要保证氮肥主要生产设备和全部辅助车间的设备能够成套供应以外，还要保证有关的洗煤、炼焦、电站、交通运输和公用工程等所需的设备，能够成套供应。今后，大型氮肥厂建设的原则是先求其成，然后求数量。这次座谈会后，陈云就会议讨论的问题给中央写了题为《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报告。这个报告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报告就氮肥厂的规模、建设的部署以及需采取的重要措施，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之后，陈云倾力对化学工业进行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考察，并深入到公司、工厂中，了解建设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帮助解决问题。根据陈云的意见，衢州、吴泾、广州三个氮肥厂首先进行了建设。这时，正值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广大职工发扬艰苦奋斗、勇挑重担的作风，使3个厂终于胜利建成投产。由我们自己设计、制造设备、施工建设大型化肥厂的决策，使我国化肥工业进入了新阶段，为我国农业渡过困难、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

三 农作物的种植要因地制宜，尊重当地的耕作习惯

“大跃进”运动中，农业生产方面刮起了一股不顾客观规律的瞎指挥风，各地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被一些想当然的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方式所取代，使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陈云认为，各地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是与当地气候、地理环境、人口状态等自然条件相适应的，是不宜轻易变更的。

陈云的家乡青浦县小蒸地区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历史上不种双季稻，小麦也种得很少。可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一些领导主观地把“单改双”作为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号召农民多种小麦，多种双季稻，并规定播种指标，搞强迫命令。农民对此抵触很大，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陈云在1961年7、8月份在家乡进行农村调查研究时，专门调查了小蒸地区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

在调查中，陈云了解到，种双季稻在表面上虽然比种单季稻每亩多收250斤，但全面算帐，各项损失却合310至330斤稻谷。其中，因种双季稻要在

单季晚稻中寄秧，影响寄秧田每亩少收约 150 斤，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多用稻种 40 斤，因种双季稻损失夏熟蚕豆或小麦 60 至 80 斤。此外，因多施肥料，多费劳动力，红花草肥效损失一半以上，稻草少而且短，这些损失加在一起，也合稻谷几十斤。据此，陈云明确指出：“两相比较，种双季稻显然是得不偿失。”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陈云又到了种双季稻比较多的萧山地区，了解到这里多种双季稻的原因是无霜期长，人均耕地少，劳力多，肥料足，且该地是半水稻、半棉麻地区，种水稻和种棉麻可以错开时间。他由此得出以下结论，即：“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主要决定于无霜期的长短，以及人口和耕地的比例等因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长江三角洲的南部地区，如果耕地每人不到一亩，可以种较多的双季稻；每人一亩半左右，就只能种少量的双季稻；如果每人二亩半左右，则以不种双季稻为好。偏北地区（例如无锡），即使每人不到一亩，种双季稻也不一定适宜。”

青浦县小蒸地区的地势和土质都不适宜种小麦，历史上农民是多种蚕豆，少种小麦。在“大跃进”中，农民对种小麦反对一次，领导上就把播种面积增加一次。县委认为，种麦子农民不能吃，而种蚕豆，农民补了口粮就收不上来了。陈云在调查中对有关领导说：种蚕豆吃到农民肚子里，肥水不落外人田，我们城乡是一家。农民吃了青蚕豆，就少吃些粮食，算总帐是一样的。蚕豆出口的经济价值很高，豆箕还可作绿肥增加土地肥力，农民当然愿意多种蚕豆。他指出：“最近几年，由于多种小麦和双季稻，少种蚕豆和红花草，土地的肥力有逐渐衰退的趋势。虽然由于多施化肥，使粮食的亩产量仍然略有增长，但土质已经不如以前那样好。从长远着想，必须下决心把这种不合理的耕作制度迅速改变过来。”

经过调查研究，陈云完全赞同当地农民少种小麦，不种双季稻的强烈要求。他在同上海市委、浙江省委、江苏省委交换意见后，向中央提交了《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的调查报告。这种实事求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安排农作物种植制度的意见，得到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及当地大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使江浙一带的农业生产得以尽先长足的恢复和发展，为全国渡过困难时期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 农村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合 农业生产力的水平

“大跃进”运动中农村生产关系方面发生了巨大变革，全国普遍建立了农村人民公社，实现了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于这是在农业生产水平比较低的基础上人为搞的“穷过渡”，因此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成为陈云反复思考的一个内容。

在 1961 年夏天青浦的那次调查中，陈云发现，一公一私，农民的积极性截然不同，对农业恢复和发展的效果也大不一样。比如养猪，他召集饲养场工作人员和养猪农民座谈，了解到，小蒸公社在公社化以前，全年饲养猪一万五六千头。公社化收归公养后，到 1960 年饲养量下降到 5628 头，下降近 2/3。公养猪死亡多，苗猪死亡率高达 89%，长肉少，积肥少，浪费稻草，浪费劳动力，两年来亏本 608239 元。私养猪则相反，死亡少，长肉多，积肥

多，节省稻草和劳动力，一头母猪一年可赚 200 元。农民私养母猪，就像对产妇一样关心，对苗猪就像对婴儿一样关心，垫圈时夏天垫青草，冬天垫干草，饲料搭配讲究，母猪保胎保得好。公社同志一致要求迅速把公养猪折价交给农民私养，以赶在水草、野草旺盛时期储存冬季用的青饲料。陈云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坚决同意这种把母猪迅速下放给农民私养的呼声。他在给中央写的题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事实告诉我们，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

在青浦调查中，陈云还了解到，农民所分自留地大田只占耕地总数的 0.5%，不到高级社时期的 1/4，社队干部一方面认为多给农民分点自留地可以补充口粮，恢复和发展竹园，便于养猪积肥，使农民手头有些零用钱，另一方面又顾虑这样会不会发展资本主义，会不会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等。对此，陈云是极力主张给农民再多分一些自留地的，按社队干部提出的意见，把自留地扩大到占耕地总额的 6%，其中大田占耕地总额的 3.5%。针对社队干部的顾虑，陈云说：我国集体生产的耕地仍占 90% 以上，决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多分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多得一点口粮，对巩固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好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粮食征购任务必须服从于农民的需要，必须先让农民保留必要的口粮，然后完成征购任务。

调查结束后，陈云就自留地问题也向中央写了题为《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位面积产量比生产队高。增加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的口粮得到一些补充，生活有所改善。再加上包产落实、超产奖励、多劳多得等一系列的措施，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就容易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种这样一点自留地决不会妨碍集体生产，相反地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了，国家规定的征购任务也就更容易完成。”

这次在青浦家乡以及嘉兴、嘉善、吴县、吴江、昆山、萧山、无锡等县调查研究后，陈云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开始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调整，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

1961、1962 年，在全国一些灾情严重的农村，群众创造并实行了包产到户这种比较符合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据估计，当时全国搞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地区约占 20%。1962 年春夏之交，陈云在杭州休养时，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后，非常重视，立即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安徽调查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与他在农村所见、所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个路子。他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实行《国际歌》词中的“全靠我们自己”的号召，依靠广大农民，尽快恢复生产。当时，党内对包产到户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尤其是毛泽东，虽然同意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明显的偏差进行局部调整，但能否接受在全国普遍推广包产到户的主张，谁也说不准。在这种情况下，陈云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决定尽快回京向毛泽东本人直接陈述。1962 年 7 月初，陈云回到北京，在和中央常委的同志交换意见后，当面向毛泽东阐述了关于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并存，

当前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克服困难的意见。毛泽东在谈话时虽然没有表态，但事后严厉批评这种意见是主张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邓子恢、陈云等支持“包产到户”的作法，批成为刮“单干风”，并在大会上发表了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讲话。从此，再没有人敢提“包产到户”的问题，陈云也因此而遭到了长时期的冷遇。

陈云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推广包产到户的主张，虽然在当时没有被采纳，但却为以后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包产到户这种联产计酬的形式，收到了举世公认的显著成效。在1982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谈起1962年他同毛泽东的那次谈话，他说：那次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在北戴河开会，把问题上纲到主张分田单干。说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我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现在比以前大进了一步，比我那个时候大进了一步。

“大跃进”运动以及此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距离今天已经30多年了，现在的农村和农业情况与当年相比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这些思考和对策，直到今天对我们仍然具有宝贵的启示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

《陈云文选》第3卷，第125—127、161—163、165、169、180、183、181、172、186页。“十二条”指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全文共12条。“六十条”指1961年3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60条。

“文革”后期陈云关于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问题的几点思考

孙业礼

“文革”后期，1973年到1974年，陈云曾出来工作过一段时间，协助周总理抓外贸。当时，林彪集团的覆灭，曾使国内出现了短暂的相对宽松的环境。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尼克松的访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也进一步好转，从而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陈云针对我国外贸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见解和对策，对我国的外贸领域注入了勃勃生机。尽管好景不长，不久，由于“四人帮”的阻挠，陈云在外贸领域的工作被迫停止，但陈云这一时期的一些探索，对当时我国的外贸工作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也为后来的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

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随着世界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并转化为生产力，各国经济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全世界已找不到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出自己所需的一切产品，也不可能有一个国家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的全部资源和所有的先进技术。因此，世界范围内的平等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成为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

其次，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但经过调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度过了危机，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客观事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并且在一些方面占有优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将处于一种长期相对和平与竞赛的共存状态。

第三，发达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直接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逐步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而发达国家则希望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因此，双方的经济关系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又有着一些共同的利益，相互利用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

此外，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原来主要面向苏联和东欧转而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 and 了解，但6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起来的极左思潮却在人们的思想上形成了巨大的障碍。“左”的思想一方面认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很快要灭亡的，现在正在做“垂死的挣扎”，没有利用的必要；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又不敢接触资本主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了解非常少，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也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

对此，陈云非常忧虑。因此，1973年他出来工作不久就首先提出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1973年5月5日，他在听取外贸部周化民等同志汇报外贸计划和价格方面的情况时即提醒他们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他说：“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外贸特别是对我进口贸易很有关系。”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因此，这里陈云首先提到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对于资本主义一般情况的研究陈云也特别重视，在这次谈话中，他还以价格为例，说明了研究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现在消息真快啊！美国的播种面积，各地的气候变化都会很快影响市场价格。”“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和过去上海交易所一样很敏感。我们进出口今年如按八十亿美元算，在价格上如果差百分之一，一年就要差八千万美金，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6月7日，他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又一次明确指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有的地位。”

当银行的同志汇报说：文化大革命前，银行有金融研究所，专门研究国际金融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研究所被撤消了。陈云立即指出：“研究机构还是要搞起来。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供求关系、货币关系的变化统统反映到外贸上来了，不搞研究机构怎么能行。”

为了解除一些人的顾虑，放宽研究的范围，他还指出：“机构搞起来之后，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像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

8月4日，在外贸部价格小组会议上，陈云针对新闻单位不注意报道国外商情的情况也作了委婉的批评，他说：“新华社关于商情的报道少，可同人民银行、外贸部合作。外电有关商情的报道要充分利用。例如最近二十国财长会议的发言要全文译出来。”

这一时期，陈云不但要求外贸部门的同志注意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非常注意研究资本主义。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他特地向银行的同志提出了10个问题，希望他们围绕这10个问题帮他搜集资料，供他研究。这10个问题是：

- 1.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1969年至1973年的货币发行量是多少？外汇储备是多少？其中黄金储备是多少？
- 2.现在世界黄金年产量是多少？其中主要产金国的年产量是多少？
3. 800亿欧洲美元分布在哪些国家和地区？
- 4.作为经济繁荣、衰退、危机的标志，工业除了钢铁以外，还有哪些行业？

从1969年至1973年，美、日、英、西德、法各国的钢铁、机械或其他基本建设投资是多少？

- 5.美、日、英、西德、法各国度过危机的办法是什么？每次危机间隔时间多少？

6.美国同英、日、西德、法各国的矛盾，除了政治上的以外，经济上的表现在哪些方面？主要矛盾是什么？

7. 美国和日、英、法、西德各国在贸易和货币方面存在的问题，估计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

法国财长德斯坦是主张把货币和黄金联系起来的。世界上货币总流量和世界上黄金总持有量，是否可以算出一个大致的比例来？

8. 美国 1973 年对外赤字是多少？包括转移、驻军、投资、旅游、贸易等方面。

9. 对世界经济和货币、金融情况的近期和远期的估计。

10. 对外国银行给我们的透支便利的利害估计。

从这些问题看，陈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是非常认真的。这 10 个问题到现在也仍然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须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事后，根据银行提供的资料，陈云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目前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危机的比较》、《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等笔记。

陈云关于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指示、要求和身体力行的表现，对冲破当时外贸领域里“左”的思想的束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解除了一些同志的顾虑，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外贸领域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

不要把自力更生与利用资本主义对立起来

自力更生是延安时期我们党针对敌人的封锁造成的困难提出的一条生产自救的方针。这一方针在当时对于鼓舞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建国以后，自力更生被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条基本方针确立下来。自力更生的原意是鼓舞人民群众依靠本国力量发展经济，它与利用资本主义并不矛盾。

早在 100 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深刻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交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列宁也曾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

建国初期，对于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并无疑义。50 年代，在坚持自力更生和主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同时，我们也曾积极开拓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到 1957 年，我国已同世界上 82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并同其中 24 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或议定书。当时，我们同西方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都建立了贸易关系。1957 年，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比 1952 年增长了 6 倍多。尽管当时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但我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从西方国家进口了许多经济建设急需的物资。

60 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当时，日本经济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为了同西欧竞争，大企业集团打算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扩大出口。中国有关部门抓住这一时机，于 1963 年 6 月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打开了

西方国家从技术上封锁中国的缺口。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9个国家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成套设备和技术，共84项。

这一时期为了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根据陈云的建议，中国还通过法国转口，买进了美国的大量小麦。这些在当时都没有引起大的争论。

但是，6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严重歪曲了自力更生的方针。他们攻击引进技术是“崇洋媚外”、“爬行主义”，出口创汇是“出卖资源”、“外汇挂帅”，他们还把按照国际通用的原则做买卖诬蔑为“右倾迁就”、“丧权辱国”、“叫洋人牵着鼻子走”，并集中攻击对外贸易部为“卖国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谈资色变，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交往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等工作受到严重干扰。1973年，尽管林彪集团已经覆灭，但这种极左路线并未得到纠正。这时，陈云出来抓外贸工作，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陈云并没有被这种“左”的势力压倒，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明确提出了不要把自力更生与利用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原则，对“左”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当时我国外贸领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能否利用国外信贷资金的问题。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许多国家的闲置资金找不到出路，因此，千方百计试图挤入发展中国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由于“左”的思想的束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迈不开步伐。1973年6月7日，银行的同志在向陈云汇报历年来的资金运用情况时，特地就这一情况进行了汇报。他们说：我们可以从外国银行得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汇信贷资金，但是在国内碰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即这样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路线，以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即要把国内的一些规矩变动一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利用国外的信贷就行不通。陈云听后立刻明确指出：“你说的，一个是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一个是规章制度问题。我看，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有条有理，不会和国内冲突的，总之，只要承认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针对当时左的思想的束缚，他还特地指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当然还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过去没有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有些同志没有看到，所以要向他们解释这些。”

陈云还从理论上对利用国外资金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说：“这和过去上海、天津那些银行、钱庄一样，看到哪家生意做好了，就找上门来了，无非是要些利润。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平均利润率。你信誉好的时候人家找上门来，不好的时候就要逼债。”

陈云的这些指示和论述对当时盛行的“左”的思想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击。根据陈云的指示，中国银行在“文革”中、后期开办了对国内企业的外汇贷款业务，尽管数量不大，但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并且摸索了宝贵的经验。

70年代初，能否利用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也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

题。有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其实，利用国外资源，发展来料加工业，是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曾走过的道路，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当时，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对我国也非常有利。70年代初，国际上的产棉大国是美国，但美国不会大搞棉布出口，因为官当时的工时工资是3.8美元，搞棉布加工不合算。英国是靠纺织工业起家的，但到70年代，英国的工时工资是1.6美元，搞棉布加工也不合算。日本50年代曾大量出口棉布，但当时日本的工时工资也达到了1.9美元。这些国家的工时工资水平都大大高于我国，我国当时的工时工资只有1角外汇人民币。因此，我国棉布的生产成本大大低于这些国家，价格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当时，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也生产棉布，但纺织工业水平不及我国，因此，我国的棉布出口是很有前途的。

根据对上述情况的分析，1973年10月，陈云在听取外贸部副部长陈树福等同志汇报广州交易会的情况时，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指示。他说：“我们是要坚持自力更生的。但是，现在国内棉花不够。……国内棉花要做到自给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有人怕用外国的棉花靠不住，其实，计划中打算用的国内棉花，有时也有靠不住的。买到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以赚一笔钱；买不到棉花，无非是赚不到这笔钱就是了。买外国棉花有时靠不住，事先就要预料到。如果三年或五年中有一年买不到棉花，其他年份能买到，还搞不搞？我看还是要搞。要长期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

陈云不仅主张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在这次讲话中，他还提出要进口钢材，加工小五金产品出口。他说：“进口一吨好的钢材加工小五金出口，可换回四五吨钢村。搞小五金出口，我们潜力很大。我看要定产品，在京广、陇海、浙赣、胶济等铁路沿线，选好工厂，专门生产。”“这要作为一个方针提出来，从创造外汇的全局着眼来搞。外贸这样做，方向是对的。”

陈云的这些思想与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提出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些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党所接受，但20年前，在“左”的思想横行的年代，提出这样的想法是要有很大勇气的。这也是陈云的一贯风格，看准了的事，就坚决地说，坚决地做，从不顾及个人得失。60年代初，他看准了包产到户能够解决我国农村的困难，虽然明知道提出这样的观点可能受到指责，但他还是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事后他因此事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他并不后悔。这次重新出来工作，他仍然坚持自己的风格。

在有些问题上，陈云同“左”的思想的斗争是针锋相对的。当时“左”的势力打着自力更生的幌子，反对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1973年，在周恩来等同志的主持下，国务院决定从国外进口一套3亿美元的轧钢设备，但“左”的势力从中进行阻挠，他们主张只进口主要设备，不进口附件和相应的原材料。在他们看来，连附件都要进口，破坏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是十足的“洋奴”表现。对此，陈云针锋相对地指出：“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

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正是由于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抗争，“文革”中后期我国在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72年至1977年，中国从西方十几个国家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谈成了包括化肥、化纤、石油、化工、轧钢、采煤、火电、机械制造等方面的222个进口项目。

要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

商场如战场。国际市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因此，要在对外贸易中掌握主动，就必须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但“文革”中由于“左”的思想的束缚，人们思想不解放，不敢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从而丧失了许多好的贸易机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1973年至1974年，陈云协助周总理抓外贸时，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不少工作。

当时对外贸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能否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的问题。1973年4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尽快购买年内到货的原糖47万吨。当时国际市场砂糖求过于供，货源紧张，价格趋涨。五丰行认为，如果我们立即大量购糖，必将刺激价格上涨，可能出了高价不一定能按时买到现货。为了完成购糖任务，五丰行采取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每吨82英镑左右。然后立即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买现货41万多吨，平均价格89英镑左右。从5月20日开始，市场上传说中国要购入大量砂糖，纽约、伦敦砂糖市场大幅度涨价，然后，澳洲、巴西先后证实我向其购糖，市价又进一步上涨，至5月22日涨至每吨105英镑。我因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5月22日起至6月5日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利润60万英镑外，我五丰行还多赚240万英镑。

五丰行当时为了完成任务，破例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但怕违反政策，事后主动向陈云请示。陈云听取汇报后，当即指出：“我们可以利用交易所。”“交易所是有两重性的：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的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的投机性的一面，忽视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因此，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

后来，陈云专门就此事向国务院写了报告，提出：“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陈云的指示和建议，解除了外贸部门工作人员的思想顾虑，提高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从此以后，在我国对外贸易历史上开始出现了期货贸易的方式。我们不但通过交易所买进商品，也通过交易所卖出商品，贱买贵卖，又买又卖，搞活了外贸。

对于对外贸易方式中的其他一些问题，陈云这一时期也有许多论述。例如：关于如何扩大市场的问题，他就指出：“要巩固和扩大西欧市场，千方百计打开美洲和其他市场。”“保持发展高档货，重点发展中低档货”。“要以较低的售价进入新的市场，先进入市场，占稳之后，再按情况逐步提价”。“要充分利用香港德信行和其他商人”，“要充分利用香港。”等等。陈云的这些论述，在当时，对于指导我国的外贸部门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扩大国外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4年底以后，由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对外贸部门的攻击也进一步升级，加之周总理因病住进医院，陈云在外贸部门的工作不得

不停止下来。

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要彻底纠正“左”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但陈云这一时期的这些活动，对于一定范围内，特别是对于外贸领域冲破“左”的束缚，坚持正常工作，探索新形势下外贸工作的新路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

《陈云文选》第3卷，第218—219、217—218、218、219、219—220、223—224、224、222页。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页。

陈云与 70 年代 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

陈东林

1971 年林彪叛国出逃、自取灭亡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纠正“左”的错误、落实党的政策的措施，解放、起用了一大批“文革”前期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让他们重新发挥作用，各项工作都开始出现转机。在打开中美关系新局面、推行新的外交战略之时，毛泽东、周恩来又不失时机地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国外成套先进设备的方案，由此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1972 年 4 月底，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长达二年半之久的陈云返回北京。他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出：希望安排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春秋到外地下面做些调查。7 月 22 日，毛泽东对陈云来信作出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7 月 31 日，长期不能公开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陈云与王震、苏振华、杨勇等人出席了国防部庆祝建军 45 周年的盛大招待会。此后的 1973 年和 1974 年，受周恩来委托，陈云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对外经济贸易的指导和研究工作。

两年多里，陈云以他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和特有的领导艺术，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的见的战略性意见，在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高潮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闪烁着光辉的许多理论观点，对“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建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体来说，陈云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经济活动和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 4 个方面：

一抓住时机，大胆地提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外资的新课题

6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初，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虽然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占有一定的经济优势，但也面临着新一轮经济衰退危机。随着苏联、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斗争的加剧，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内部经济协作体系逐渐趋向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往来。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发展本国经济，发达国家则试图凭借经济实力，从发展中国家寻找新的市场和获利更高的投资场所。表现在国际金融领域，便是长达 28 年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于 1973 年崩溃解体。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在国内开始批判和纠正“文革”初期“左”的错误的中国也具有了以西方国家为主要经济交往对象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陈云敏锐地看到了这一有利的经济形势变化。1973 年 6 月 7 日，他在家中约见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不久的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等人，就国际经济贸易作了重要谈话。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他强调这样做的重要

性时说：“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针对“文革”前期林彪、江青集团煽动砸烂对外经济研究机构、废弃规章制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陈云鲜明而又具体地提出了一系列恢复研究的措施。首先，要恢复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研究所。他指出：“供求关系、货币关系的变化通通反映到外贸上来了，不搞研究机构怎么能行。”机构恢复以后，要认真研究西方国家领导人如尼克松、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等的国情咨文、讲话材料，提出对策。

在谈话中，他还亲自拟定和提出了要认真研究分析的有关国际金融货币的10个重要问题。10个问题中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了解世界经济形势所必须把握的黄金、货币、投资、赤字等基本数据方面的静态材料，又有分析判断西方各国之间经济矛盾及解决办法的动态问题；既有对过去若干年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活动的规律性总结要求，又有对西方各国现行政策的捕捉，还有世界经济、金融情况的近期、远期估计。这些问题不仅对经过“文革”前期动乱之后的金融贸易恢复工作起到了提纲挈领的关键作用，而且在今天，也仍是把握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活动脉搏的重要视角。

由于林彪、江青集团在前几年中造成的严重思想混乱尚未得到清理，有人担心利用外资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路线，是否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而且将触动“文革”以来对外经济领域被设立的枷锁式规矩。

对此，陈云在谈话中遵循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尖锐地指出：“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针对那些“左”的清规戒律，陈云针锋相对地说：“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陈云的这次重要谈话对外贸经济工作的恢复、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按照他的意见和周恩来多次关于银行要研究国际经济动态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对国际货币、金融变化趋势，西方各国间的经济矛盾及缓和办法，美国的经济状况及国际收支状况，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同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1973年筹措到的外汇资金达10亿多美元，支持了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

二顶住“四人帮”的压力，积极开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及管理手段的对外经济工作

1972年2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价值4亿美元的14套化纤、化肥成套设备的报告。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又向国务院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的报告，获得批准。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同年9月，中央又批准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技术项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的引

进，也是打破“文革”中对外引进停滞局面和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重大步骤。

在中共十大上攫取更多权力、结成“四人帮”的江青集团，对这次大规模引进竭力反对，设置重重障碍。1974年2月，江青到四机部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蜗牛礼品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还说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崇洋媚外”。6月，王洪文又在几封来信上批示，诬蔑向国外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在他们的破坏下，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项目被迫中断。

面对压力，协助周恩来、李先念领导引进工作的陈云没有退让，反而进一步要求引进国外设备的同时，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连同必需的附件、配件一起进口，并提出了许多积极而稳妥的意见和措施。1973年10月12日，他在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时指出：“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针对“四人帮”挥舞的“洋奴哲学”棍子，陈云坚决表示：“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在引进中，陈云十分注意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和旧中国的有益经验，做好引进前的考察工作。他在国家计委关于一米七轧机和旧轧机订购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上加批语指出：“如要买旧轧机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准备好新配件。过去旧中国有过买旧设备的经验，例如南京的水利化工厂、山西阎锡山的太原钢铁厂、山西的窄轨铁路。据侯德榜说水利厂的设备是便宜的，但要化很大力量到国外去看和检看拆卸装箱。所以我们买旧轧机要慎重从事。”周恩来对陈云的意见十分重视，批示“交计委立即执行，随时检查”。其后，由国家计委组织多个考察团到国外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核验，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在引进“硬件”的同时，陈云还注意利用和借鉴“软件”，即现代金融管理经验和手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1973年10月10日，他在为外贸部起草的向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在今后两年里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

过去，我国外贸部门在国际市场上购买货物往往只求完成任务，有时价格越涨越要买，而没有掌握好价格涨落的时间差，因此，外商常常乘机抬价，给我们造成多花钱的损失。在新的思想指导下，外贸部所属中国粮油公司接到购人原糖47万吨任务后，不急于购入现货，而是于当年4月购入期货26万吨，然后再购入现货41万吨。待到5月砂糖价格大幅度上涨后，卖出多余的期货。这样，不仅完成了购买砂糖任务，而且还为国家赚取了240万英镑的外汇。

今天，中国金融、外贸体系不仅全面参与了国际商品交易中的期货市场，而且在国内也建立了自己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回溯22年前陈云的这些意见和部署，不能不为他当时表现出的胆识和远见所折服。

2. 提出商品价格必须有竞争性，要照顾中间商的利益。经过“文革”前期的混乱，当时外贸部门存在一种极左谬论，认为出口商品提价会导致外商再度提价，是把负担转嫁到国外劳动人民身上；照顾中间商利益是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对此，陈云明确地指出：“商品价格必须有竞争性。要大力推销换汇率高的商品，但决不放弃可以推销的换汇率较低的商品，目的是为了多得外汇。”“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

因此，他要求在价格竞争中，对代理的中间商予以照顾：“要在打开销路的前提下，照顾中间商。”“要给推销商、中间商好处，在价格上使他们有利可图。”“因为外贸部一般不做零售，必须经过中间商，照顾中间商有极大的重要性。”事实证明，这样做主要利润仍是为国家所得。如前述的砂糖期货交易中，为我国代理的中间商费用和利润虽有 60 万英镑，但我国外贸部门利润却达 240 万英镑。

三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 成品出口，扩大对外贸易

60 年代后期，由于“文革”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干扰和棉花歉收，国内棉布供应紧张，而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偏低。因此，如果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不仅可以缓解国内困难，而且棉布出口还可获得一定利润。但是，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经过调查和分析之后，陈云在听取外贸部汇报时指出：“我们是要坚持自力更生的”，但是，国内棉花产量不够，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他还具体分析了棉布加工出口的有利条件：美国、英国的纺织工业过去很发达，但每工时工资高，棉布成本也高，因此不会大搞棉布出口。印度、巴基斯坦、埃及都生产棉布，但他们的纺织工业水平不如我们。所以，“在棉布出口方面，我们还很有搞头。”“要长期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

由此及彼，陈云考虑到在外贸方针的整体安排上，必须注意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他指出：我们要打大的算盘。中国人多，进口化肥设备和化肥，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和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加工棉布出口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11)当年，经国务院批准，外贸部门进口了 850 万担棉花，进行棉布加工。

手工艺品是我国的传统出口产品，但在“文革”中，被扣上“为外国资产阶级服务”、“鼓吹封、资、修”的帽子，工艺品的生产和出口都极度萎缩。1973 年 12 月，陈云在听取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汇报时，特别指出了工艺品出口的重要性。他说：“工艺品是必保的出口商品。”理由有三点：一是绝大部分品种货源充足，可以扩大销售市场；二是这些商品相当多是农民和街道居民生产的，扩大出口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是小商品可以积少成多地创汇。他要求外贸部门除保持和扩大港澳、日本、新加坡等市场外，要千方百计地打开西欧、北美、大洋洲的市场。”(12)

根据他的意见，遵照周恩来要扩大工艺美术品出口的指示，我国的工艺

品生产和出口取得了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还举办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

四在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的同时，颇具远见地提出坚持独立自主、防止被资本主义利用的战略问题

正如进出口贸易是一种双向性行为一样，在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利用外资问题上，除了利用之外也存在着被利用的可能性。陈云对此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两年多里，他多次指出：外国资本家和我们做生意是为牟取利润，“这和过去上海、天津那些银行、钱庄一样，看到哪家生意做好了，就找上门来了，无非是要些利润。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平均利润率。你信誉好的时候人家找上门来，不好的时候就要逼债。”(13)因此，引进外资、借外债时要考虑到偿还能力，不能受制于人。

关于利用商品交易所做期货买卖，他指出，交易所有投机的一面，“我们这次利用交易所，不是为了做投机买卖，不是为了赚二百四十万英镑，今后也不做投机买卖。”(14)这样做是一种保护性措施，使我们不吃亏或少吃亏。因此，购买期货只买进确实需要的物资，每做一笔要请示报告，总结经验。在购买原料之前要进行风险分析，比如“买外国棉花有时靠不住，事先就要预料到。”

关于引进国外成套设备，陈云特别强调注意同时进口配套的设备和零部件，以免被别人事后卡脖子。比如进口旧轧机，要“估计到旧轧机的地下电缆等设备拆下时可能已坏了，用不上。”(15)

关于对港澳的出口贸易，陈云指出，既有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的条件。有利条件是食品 and 传统出口品我们可以占领主要市场。不利条件是：香港、澳门是自由港，竞争激烈，国外资本家会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杀价倾销，企图挤垮国货，“尤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对此种不利条件，许多同志还未认识。”(16)

除了估计到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手段可能制造的不利于我的后果外，陈云还提醒在政治方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他指出：“对港澳贸易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时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难。要加强对港澳贸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使他们有两点自觉性：一是责任重大，二是能经受特殊环境的考验。”(17)在和外国中间商打交道时，我们的干部“必须严守党纪，不能浪费分文”。如果请外商吃饭“只需要一百元的话，决不要多花一元。”(18)应该严肃教育干部和党员，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在周恩来、李先念、陈云的领导和指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73年到1974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是1970年的45.8亿美元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45.7亿美元，是1970年的3.2倍。一方面，成套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化工业的发展，为我国80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1973年出口总额达到58.2亿美元，是1970年22.6亿美元的2.58倍，1974

年更达到 69.5 亿美元，是 1970 年的 3.07 倍。(19)

对外经济工作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和陈云在两年多时间里的大胆开拓和悉心指导密不可分的，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一贯思想和工作作风。正如邓力群予以总结的，陈云用“交换、比较、反复”6 个字，深刻地说明了认识的辩证法；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9 个字，精辟地表达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20)陈云在 70 年代指导对外经济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就是这两句话的生动反映。

(一) 从实际出发，大胆提出“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新课题，表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开拓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面对外界的封锁，中国采取了“一边倒”和自力更生的方针；“文革”中，由于错误路线的影响，一度形成了相对孤立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21)70 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对外经济工作也有了较大改观，但在“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江青集团仍掌握着一定权力的情况下，这种改变主要反映在具体政策的实施（如引进设备），总体方针尚未得到突破。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依然存在的压力，陈云审时度势，提出把研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打交道作为主要任务，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结合他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如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利用商品交易所等）进行分析，他所说的“研究”已包括了利用外资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符合科学的管理经验等内容。回溯“文革”前的 17 年历史，联系“文革”后对外开放的方针，应该说，陈云的这一思想是新中国对外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一个新起点，是其后改革开放思想的先声之一。

(二) 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充分考虑不利因素，表现了“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精神。

所谓“交换”，就是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陈云在提出研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科学先进成果课题的同时，始终对被资本主义利用的可能性持有警惕，制订了政治、经济上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借债时要认识到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质，考虑偿还能力，防止人家逼债时被动；如对港澳贸易时要考虑到资本家利用低价倾销的不利条件等等。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二是前后的比较。如在制订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方针时，他既调查了“左右”各国美、英、日本、巴基斯坦、印度、埃及等的条件，又分析了我国过去棉花生产不足，今后仍有一个时期不能解决的“前后”状况，从而得出正确的判断。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如在引进一米七轧机设备之时，陈云既坚决支持这一利国利民的举措，又强调要反复调查研究，派人出国实地实地考察，考虑配件、损坏等因素，慎重从事。

应当看到，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不正常状态尚未结束，陈云还没有直接回到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岗位，他的一些卓有见地的构想和措施也难以全部得到贯彻实行，甚至再度遭到批判。1976 年 6 月张春桥、姚文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又诬蔑陈云主管的外贸部“问题严重”，“在外贸工作上执行的是一条卖国投降主义路线”。这恰好从反面印证了陈云在两年多时间里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的重要性。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22 年后的今天，面对改革开放中的引进利用外资新热潮，我们回顾当年陈云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方法和政策，更加

感受到其中蕴含着不可磨灭的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冷”时，可以使我们激发热情；“热”时，可以使我们保持冷静。对此，无疑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

（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

注释

(11)(12)(13)(14)(16)(17)(18)《陈云文选》第3卷，第217—218、218、219、224、222、228、224、226、223—224、224、225、219—220、222、228、229、222页。

(15)陈云对国家计委关于进口一米七轧机报告的批语（1973年9月3日）。

(19)见《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下册附录三。

(20)《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实事求是，拨乱反正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宋毅军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中央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使我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恩格斯认为，探究那些非常杰出的人物使广大群众、整个阶级、整个民族行动起来，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自觉动因（尽管它是以明显或不明显、直接或以思想形式反映着），“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究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本文意图通过对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活动、思想的研究，客观地反映他在当时所起到的重大历史作用。

一提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思想战线拨乱反正

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它概括为“实事求是”。陈云对毛泽东这方面的言传身教体会很深。他在延安工作时，认真通读了毛泽东的著作，“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为做到实事求是，陈云提出15个字，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纵观陈云几十年革命活动和思想发展，无不体现着实事求是这一鲜明特点。

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在晚年逐渐违背了他在相当长时期中所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其思想观点明显脱离了作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加上林彪反革命集团、“四人帮”的利用和破坏，我党正确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遭到空前破坏。“四人帮”被粉碎后，陈云为了党和国家、人民利益，与邓小平等毅然担负起指导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当时，整个国家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工作千头万绪。他们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否则，仍旧由“左”倾错误思想作主导，拨乱反正工作就只能在徘徊中进行，甚至是无从起步。

1977年4月，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转党中央，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针对当时盛行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又于5月24日对汪东兴等人说：“两个凡是”不行，这是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以前那样正确对待这个问题。

邓小平率先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此陈云深表赞同。他在1977年9月28日的《人民

日报》发表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长文中明确指出：目前“报刊上有些文章还是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还不是

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实质，用它作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为批驳这种教条主义态度，文章引用斯大林的话说：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这完全不是说要熟读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拘守着这些公式和结论的每一字句。要

精通“首先就要学会怎样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清楚”。文章认为，用“两个凡是”态度对待毛泽东讲过的话，实际上正是毛泽东曾批评过的“幼稚者的蒙昧”。这些人把马列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我们对他们“应该做启蒙运动”。

陈云认为，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以来用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其流毒之广，危害之大，在我党历史上是罕见的，受上述反动思想的毒害，我们“一些领导机关，一些党员干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精神“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事吹得很厉害”，甚至靠说假话办事。这些不正之风和错误做法，为“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盛行提供了广泛的市场。因此，“应当引起我们全党的严重警惕”。

为了纠正上述不正之风和错误做法，陈云在文章中特别讲了实事求是问题，指明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否则，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认真回顾了我和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过程，认为当时革命发展的那种排山倒海，摧枯拉朽，迅猛异常的形势大大超过了预料。“从革命的主观条件来说，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通过延安整风掌握了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这个优良的作风，的确起了决定的作用”。（后来他又讲过：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与此同时，文章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陈云讲话历来言简意赅，这时却发表长达万字的文章，确实是非同寻常的。可以说，这是一篇进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的好教材。

邓小平、陈云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党正确的思想路线的一系列论述，极大地促使全党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摆脱“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束缚，对于1978年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是继延安整风以后我们党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先声，是指导全党拨乱反正工作的根本准则。

二力主平反各类冤假错案，在政治领域拨乱反正

为“文革”中形成的各类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是顺乎民意，保持安定团结局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亟需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拨乱反正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由于“文革”遗留的案件大都是经毛泽东批示决定，或者党中央下发文件同意的“定案”，所以，复查平反工作可说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因此，陈云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把“定案”中的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特别

是对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不能靠有关部门，必须由党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具体做法是：

第一，无论是谁批示过了，错误的就要纠正。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首先平反的错案是天安门事件。1977年3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直接导致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天安门事件就提出这样的看法：当时参加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恩来，尤其关心党的接班人是谁。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是否插手需要查实（后来陈云又着重指出：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予以肯定）。而邓小平与此事无关，让他复出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但是，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依据“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关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重要意见未被及时采纳，连他的书面发言也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后来，经过陈云、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1976年发出的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郑重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此前，党中央下发文件，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这些重大决策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第二，无论新案旧案，只要是错案就必须全部纠正。作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的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事先规定的议题是经济问题，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准备解决的也主要是这方面的问题。而陈云在会议划分的东北组上发言，提出平反薄一波等61人，陶铸、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和批判康生错误等6个问题。他说：不解决这些冤假错案，很不得人心。彭德怀同志，曾担负过党和军队的重要工作，“对党贡献很大”。至于康生，他在“文革”中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的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有重大责任的，其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适时给其以应有的批评。因为这几项提议出自德高望重的陈云之口，充分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所以，简报全文登载后立即引起与会代表们的热烈响应，会议气氛骤然活跃，使会议预定内容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在揭批“四人帮”基础上批判“左”倾错误的新突破口。会议结果表明，这个新突破口位置选择得准确，攻击时机恰

邓小平通过听取各讨论组召集人汇报和印发的会议简报，得知陈云讲话内容，很快做出了反应。他首先从彭德怀谈起，在三天时间里，先后三次讲到“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对康生的错误，邓小平话虽不多，却很明确，认为他是发动“文革”的错误纲领的“组织者之一”。紧接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他为党和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决定对康生进行审查。

第三，无论案件多么复杂，“都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潘汉年是我党的高级干部，战争年代长期战斗在敌人内部，多次担负党中央直接赋予的特殊使命。1955年他被秘密逮捕，1963年被认定为“长期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受到长期关押，直至1977年病逝。这是我们党建国后处理较早的一起错案。由于案发时间长，工作环境特殊，证人又少，潘本人也确有不符合党纪的做法，所以，案件比较复杂，陈云调阅了公安部门和与潘同案人的材料后，认为潘并无投敌确证，便于1981年3月1日写信

给邓小平、李先念，建议党中央对此案重新立案复查，复查工作可由中纪委办理。邓小平对陈云这个建议十分重视，阅信后表示“赞成”，李先念也表示同意。于是，中央书记处转告中纪委：按陈云的建议和邓、李意见办理。中纪委经过细致复查，认定原结论不能成立。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文件，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并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这在广大党员干部中间引起极大反响。

在陈云、邓小平及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和积极干预下，全国各类冤假错案迅速得到平反昭雪，党心、军心大振，人心大快。这一果断举措，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政治胸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有错必纠的可贵精神。事实表明，我们党非但没有因为公开平反大批冤假错案而降低威信，在人民心目中，威望反而更为提高了。

三建议调整国民经济，在经济领域拨乱反正

陈云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纪委书记，重新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不久，就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依据我国当时经济发展状况，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这是陈云等在指导经济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

1. 力主进行经济调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经济领域的“左”倾错误还没有被清除，反而又出现了发展经济急于求成的问题。对此，陈云敏锐地指出：“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随后，他和参加国务院务虚会领导同志谈话；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就经济形势讲话；他草拟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他同李先念联名给党中央写信，主要内容都是反复陈述他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关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性建议，重申指导经济工作要认识国情、量力而行。特别是他在1979年3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集中反映出他在当时对全国经济工作的周密思考。

陈云认为，经济工作讲实事求是，就应该把“实事”搞清楚，“这是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当时的国情是：全国9亿多人口，80%在农村，人民亟需提高生活水平。这时，“文革”虽然结束，但国民经济还没有达到综合平衡，比例失调情况相当严重。“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根据这种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所以，国民经济工作要进行适当的调整，“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

因为从长远来看，国民经济如果能按比例发展，就会使发展的速度更快。陈云殷切地希望，经济建设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比如，规定钢产指标就要切实可靠，在现有生产能力基础上，规定到2000年达到8000万吨就比较合适。在生产钢铁时，要把重点放在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

邓小平觉得，陈云的这些意见“有道理”，“很值得重视”。他在23日的会议发言中指明：三年经济调整工作，是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个“大方针、大政策”。

由于陈云和邓小平及李先念等力主，党中央于同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8字方针，会议强调，经济建设工作中要认真清理经济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真正做到按经济规律办事，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

在党内，邓小平多次发表讲话，充分肯定陈云在60年代我国经济调整时期发挥的巨大作用，多次称赞他提出的措施非常得力，办法“非常有效”。邓小平还谦虚地表示：自己对经济工作不够懂，这方面还是要由陈云、李先念来下决心。在制定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时，他几次嘱咐有关部门同志，对积累与消费比例，国民经济增长幅度等问题，“要充分重视陈云的意见”。言语之间，表现出对陈云的信任。

但是，由于对国民经济调整问题“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直到1980年底，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基本变化。

2. 批驳阻碍经济调整工作的“左”倾指导思想。1980年11月28日，中央常委、书记处听取国务院调整1981年经济计划的工作汇报。陈云针对经济调整方针贯彻不力的情形尖锐指出：“经济工

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东西。”“历史上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再机会主义一次！”他在随后召开的中央12月工作会议上又讲：“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他寓意深刻地说：“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关于调整问题，他坚定地表示：从明年起我们要真正开展经济调整，这是清醒、健康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后退，而且要退够，否则就会造成大的耽误。他恳切地呼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11）。

邓小平也先后在这两次会议讲话，表示“完全赞成”陈云的意见，认为陈云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他很赞同陈云关于调整是“健康、清醒”的说法，指出这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当前，重点要抓好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点，但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12）

经过一年多争论，陈云提出并得到邓小平积极支持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才真正得以贯彻落实，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并为以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支持《历史决议》的起草，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拨乱反正

1980年初，邓小平等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陈云对此完全赞成，大力支持。《决议》草稿形成后，他在一个月内，4次同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对《决议》修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他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去写，“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对成绩特别是对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

乎实际，反复推敲，反复斟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13）。

1. 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恢复邓小平职务，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冤案平反过程中都间接或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当时，对毛泽东的不同评价，实际上是历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毛泽东一生是与非、功与过问题上的直接交锋。

陈云大力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反复强调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从1977年开始至1981年《决议》通过前后，陈云在各种报告、谈话中，多次称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功绩，回忆他对自己的教育、关怀和保护。例如，他肯定毛泽东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他指出毛泽东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制定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毛泽东写了许多重要著作，这很了不起，“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他称赞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毛泽东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4）

关于如何在《决议》中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问题，邓小平作过多次谈话，概括起来是8个字：“实事求是”，“恰如其份”。陈云也作过几次谈话，中心内容是要全面评价毛泽东。《决议》修改稿完成后，陈云建议：在修改稿中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历史的段落，这样就能写明毛泽东在革命紧要关头的历史作用，他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功绩第一位、错误第二位，讲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15）。邓小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指示《决议》起草小组落实。对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但要写得集中、概括、恰当。

2. 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是要起草的《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16）。当时，党内外、国内外出现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与怎样正确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怎样科学地论证毛泽东思想完整体系有密切联系。

陈云和邓小平认为，首先，《决议》要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写清楚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特别是要概括出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其次，要重申毛泽东思想是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就是转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另外，要强调全党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好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重点学好毛泽东哲学著作。为此，《决议》要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写得更丰富、更充实。他们认为，如果写不好毛泽东思想这部分内容，“整个《决议》还不如不做”。如果我们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17）。

陈云和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特别是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多次讲话、重要论断，抓住了指导拨乱反正工作中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结合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决议》的灵魂所在。根据他们多次谈话精神为纲领形成的《决议》，总结过去，摒弃了“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开辟未来，重申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真正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

团结全国人民的目的。它现实意义重大，历史影响深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确处理领袖、政党等问题，也提供了新鲜经验。

五提议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 在组织建设上拨乱反正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具体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培养造就接班人尤其是党中央的接班人，成为十分重要而又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对此，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重视。

1979年10月3日，陈云与邓小平交换意见后提出要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说这是“为了党的利益”，“如果组织上不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的工作搞不动。”(18)半年后，陈云等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提出，这个问题之所以“非常紧迫，非常必要”，一是因为身负领导重任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年事已高，却日夜操劳，积劳成疾，急需中青年领导干部接替他们担负重任，以利于老同志集中精力，更好地研究和解决国内外重大问题。二是为了反对某些人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真正实行党中央集体领导，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三是鉴于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痛苦的教训”，出于“党的交班和接班”问题的考虑。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有利于培养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便于培养党的接班人。此外，陈云还认为，中央书记处工作范围，是要管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是个工作班子。其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在各级领导部门中提拔培养合格的年轻干部。书记处要讲求工作效率，注意身体条件。要允许书记处或其中的同志在工作中犯错误，老同志和其他同志要帮助他们。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希望，重新设立的中央书记处要带头集体办公，不要光在文件上画圈，要开短会，讲短话，“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19)

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既是组织上拨乱反正，恢复我党的传统，又是适应新时期的需要。”(20)这不仅在国内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上也会有很大影响。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了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11人中央书记处，这是党中央及时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事实表明，这一重要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云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清除“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带领全党同志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力正确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之所以能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绝非偶然，除了他曾接受毛泽东的言传身教，汲取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其他核心成员的优秀思想成果外，还在于他非常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重视在工作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在历史上，他曾遭受过“左”倾错误的排挤，因而，对“左”倾错误有着切肤之痛。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他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智慧，使他在党内外形成崇高的威望。因此，由他作为主要决策人之一，参与领导党在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工作也就势在必

然。

历史事变是由无数交错的力量相互作用而产生出的结果，是由每个人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21）。同陈云一起指导拨乱反正工作的邓小平，以及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他们虽然担任不同职务，各自主管的工作也不相同，就是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对同一项工作指导也各有侧重。但是，他们都以党和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彼此信赖，同心协力，“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表现了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历史的伟大转折关头，力挽狂澜，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邓小平、陈云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为党和人民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245、478—479页。

1991年1月18日《人民日报》。

（12）（16）（17）（1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354、354—362、296、300、283页。

（11）（13）（14）（15）《陈云文选》第3卷，第234、230、252、250、252—253、281—282、283—284、284—285、284页。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3月23日）。

（18）陈云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发言（1979年10月3日）。

（2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81页。

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卓越贡献

刘传增

陈云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最杰出的领导专家，他不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朽业绩，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

—

从建国伊始到 60 年代中期，陈云竭尽全力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勇于开拓，大胆实践，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贡献是巨大的。

1949 年 10 月，陈云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首先，他具体组织领导了我国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统一财政经济，稳定物价；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接着，他主持制订、组织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进大规模经济建设。这些工作不仅迅速稳定了经济形势，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6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从“解放生产力”转变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来的重大决策，重申了此前不久中共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路线的形成及其重大方针政策的确定，无疑凝聚着陈云的一份心血。在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经济工作的新形势，1957 年 1 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以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领导。

遗憾的是，八大的正确路线，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五人小组在实际上中止了工作，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为了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中央于 1962 年决定恢复中央财政经济小组，并经过反复酝酿，依然任命陈云为组长。1962 年 2 月，陈云发表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等重要讲话，指出了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克服困难的措施和办法。陈云的正确意见和主张，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和重视，对于顺利渡过难关，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们党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阻碍和破坏，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在这期间，包括陈云在内的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受到错误批判，被解除职务。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不久又被任命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再次担负起恢复濒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并使其尽快发展的历史重任。

建国后的 30 年，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是坎坷的。每当国家的经济建设遇到严重挫折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邓小平总是毫无例外地请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或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解决问题，度过难关。在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的同时，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的探索，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这些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主张在全国夺取政权以后，党和国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工作上，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早在建国之初，陈云就强调要抓经济建设。国家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事必躬亲，自始至终致力于此项工作。他坚持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拟定建设计划，准备干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上面。1956年3月，为了使大力发展生产力这种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他提出了“到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并且指出要通过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以至第五个五年计划、第十个五年计划，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办法来实现。

第二，最先提出建立科学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和运用市场机制的主张，防止和克服盲目求纯的思想和现象。陈云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在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三十为主，三个补充”的思想，为党的八大所采纳，在经大会批准的周恩来所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作出了相应的决策，事实证明，它不仅对克服当时经济体制盲目求纯等弊端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新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发挥和发展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一些重要思想，极力主张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陈云指出，“必须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这个事实”，要求中央对地方、地方对工商企业的权力“集中不能过分”，“中央不可能包揽全国的事情，所以应当有适当的分权”，“扩大地方的职权是完全必要的”，“有些企业的管理权要下放，财务要下放，利润也要下放”。他的这些主张，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的肯定，委托他主持制定改进经营管理体制的具体实施方案。他亲自代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等三个文件，在全国实施。这些措施的提出和实行，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的重要尝试。实施以后，虽然由于忽视了统一计划，忽视了综合平衡，不得不上收了一些权力，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对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四、极力主张国家基本建设的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陈云认为，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要使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保持平衡并略有节余；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要使人民的购买力有所提高，提高的程度要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要单看当年，要瞻前顾后，避免陡升陡降；鉴于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具有很大的约束力，还要从农业丰歉的实际考虑；如果基本建设的规模超出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就必须进行调整，缩小规模，恢复农业、工业生产，放慢工业速度，以使之与国力相适应。

第五，积极主张在农村经济中，使个体经营和合作经济长期并存。60年代初，安徽等地干部群众创造了“责任田”等形式的农村经济形式，陈云表示赞赏和支持。他向毛泽东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不仅要通过“责任田”等形式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战胜眼前的严重困难，而且应该允许个体

经营与合作经济在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并存，成为一种制度。陈云的这种观点和意见，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责任田”等农村经济责任制形式被扼杀。但事实却清楚地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继续执著地进行探索，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

首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开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接着，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决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 1978 年 11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言，表示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与此同时，为了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他就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同志功过是非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就当时的经济问题，切中要害地提出 5 点意见，并且郑重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他在以后的岁月里，尤其是在 1979 年 3 月到 1980 年 3 月兼任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期间，为四化建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的主张，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观点，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相一致的。

其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对国民经济不断进行调整，实现综合平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根据国民经济由于“左”的错误的影 响而造成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经济没有实现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使其按比例发展，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他主张：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并提出要有两三年，最好三年的时间用于调整。对于陈云的主张和建议，党中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根据陈云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1979 年 4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集中三年时间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有的人顾虑重重，担心会影响发展。对此，陈云强调，某些方面“要退够”，并指出“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实践证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实行，使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得以稳步前进，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强调注重国情研究，尊重我国特殊的国情。陈云对我国的国情有着清醒透彻的认识，认为我国自从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便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低下。早在 50 年代，他就指出，我国是“大国小生产”。1979 年 3 月 21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说：“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到了 1980 年 12 月，他又说：“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¹¹⁾他并且指出：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 and 欧美日本各国都没有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特殊国情。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陈云格外重视农民问题、粮食问题、10 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在 1978 年 12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经济工作提出 5 点意见，第一点就是每年进口两千万

吨粮食。他说：“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12），“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13）因此，他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要求农牧副渔业的投资“要用在刀刃上”。陈云明察我国特殊的国情，坚持按国情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过显著成效，同时也使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内容更丰富、更深刻。

第四，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风建设，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陈云认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改善和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为了使我们的党能够适应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他又强调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尤其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通过对党的作风现状的分析，他深感党风问题的严重性和端正党风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高瞻远瞩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14）陈云站在这样的高度论述党风问题，充分证明党风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须臾离开的。

在注重端正党风问题的同时，陈云还十分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15），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陈云还认为，精神文明建设与党风紧密关联，指出：“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16）他号召全党同志刹歪风、正党风，增强全体党员的党性，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来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除以上所述，陈云还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他问题，如计划和市场、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三

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悉心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认识、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条件下的各种问题。

陈云是深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之精髓的。早在40年代初，他就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富有创见的观点，精辟地阐明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之点在于“唯实”，简洁地表述了共产党人必须采取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到了50年代，他又提出了认识客观事物的“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方法。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对上述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方法又作了详细的阐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入手，再一次郑重地论述了关于实事求是的问题。他严肃指出：“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17）

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做到实事求是，陈云从两个方面做出了锲而不舍的努力：

一是深入调查研究。他一贯重视调查研究，积极主张用90%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努力把

事实搞清楚，尤其是把重大变革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搞清楚。他的调查研究，突出地表现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初以及3年困难时期这些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的转折时期。充分的调查，使得他取得了确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然后经过分析论证，广泛听取意见，再向中央提出决策性的建议。即使决策付诸实施了，他还要坚持通过试点，总结经验，采取最佳方法，务求每事必成。

二是敢于同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错误倾向作斗争。这是陈云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具有彻底性的重要标志。针对“大跃进”热潮中多数人头脑发热的问题，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说：乱撞乱碰的人，往往不顾客观条件，违反客观规律，把幻想当成真理，凭主观意志办事，或者把将来有实现可能的事情勉强地放到现在来做。“大跃进”中，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订得比前一年翻了一番，粮食指标订到一万亿斤。陈云深感距离实际可能太远，为避免被动，建议不要公布这些数字。1959年春天，他又受毛泽东委托，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将钢产量指标从1800万吨降为1300万吨。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他“右倾”，他全然不顾。从1959年起，虽然有不少同志听不进他的意见，他却再三要求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他的很多主张和意见未被采纳，但实践却证明了其正确性。在严重的“左”倾氛围中，他的这种果敢精神和巨大魄力，反映了他坚持唯物主义的执著程度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列宁指出：“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研究的。”(18)陈云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实践、理论和巨大贡献证明，他不愧为全党坚持实事求是，以事实力基础制定政策的楷模。薄一波说：“他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是务实的”(19)。毛泽东曾高度赞誉说，陈云所管的财政经济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的。(20)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注释

《陈云文选》第2卷，第308页。

(11)(12)(13)(14)(15)(16)(17)《陈云文选》第3卷，第31、75、235、248、252、282、250、281、258、350、273、338—339、348、235页。

(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792、792、1053页。

(18)《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6—267页。

(20)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附录

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陈云文选》的总体思想

《当代思潮》编辑部

陈云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精神品格、思想观点，却同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永生。江泽民同志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陈云同志的著作，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

陈云同志的思想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三卷文选中。这部文选的时间跨度，从1926年到1994年长达69年之久。毛泽东同志曾作过这样的比喻：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篇大文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上半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下半篇。凝结着陈云同志毕生心血和智慧的三卷文选，可以当作这一篇大文章来读。总题目就是：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这句话初看起来，就如同说“人需要吃饭”一样，仅仅是重复了一遍人所共知的真理；然而，在今天重申并强调这一平凡的真理，却有着极不平凡的现实政治意义。陈云同志针对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以最严肃、最深切的话语告诫我们，“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我国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了、发展了；但是，历史的另一面是，和平演变的危险性也出现了、增加了。对这一重大的历史现象，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一切对近十余年来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挑战的严峻性认识比较清醒，对我们党内和社会中发生的消极、腐败、丑恶现象，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私有化的严重性有所警觉的同志，一切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都会深切地感到，陈云同志如此叮嘱全党同志必须明白、必须牢记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是何等的语重心长！真是字字千钧！

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评论陈云同志：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平和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事实正是这样。陈云同志在为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的一生中，总是坚持正确坚定的政治方向，总是保持清醒冷静的科学头脑。尤其是在进入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针对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偏差、失误，提出既尖锐又中肯的正确意见。在新时期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陈云同志要我们时刻牢记“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再一次显示他看问题有眼光、尖锐，真正抓住了新时期全部工作、全部问题的要点。

大家知道，中国人民经历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才建立起独立统一的社

会主义国家，开通了奔向富强、民主、文明之路。如果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两千多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稳定发展的中国就会变成动乱不止的中国，团结统一的中国就会变成四分五裂的中国，独立自主的中国就会变成附庸西方的中国，中国独立、统一、富强、民主、文明的前途将被断送。由于确实存在着发生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我们在致力于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时候，千万不可淡忘了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总题目。否则，就是没有眼光，没有抓住问题的要领。

二

在当代中国，在矫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如何继续做好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陈云同志在他的文选中，进行了多方面、多视角的论述。据我们理解，有如下 5 点，就是陈云同志殚思竭虑从而抓住的整个事业和全部工作的要点。

1. 我们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建国 40 多年来，无论陈云同志在第一线主持经济工作，还是退居二线、三线，他都非常关心经济建设，把搞好经济工作看作是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他始终强调必须用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处理经济建设问题。从国民经济的宏观规划和调控，到具体企业的微观管理和搞活，从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到人民生活的吃穿用，以及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从战略高度重视水资源问题，等等，无不牵挂在陈云同志的心头。陈云同志一贯严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摸索我国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发表了许多真知的见，至理名言。如：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制定经济计划必须作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才能取得最快的速度 and 最好的效益，“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十亿人口的吃饭穿衣，是我国的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等等。我们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这些思想观点符合我国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凡是按照这些思想观点办事，我国的经济就健康、快速、持续发展；凡是不按这些思想观点办事，就会碰壁，甚至碰得头破血流。只要我们遵循这些思想观点办事，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2. 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

陈云同志是最早对改革开放进行探索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早在 50 年代中期，他就对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了“三个主体”（公有经济、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个补充”（个体经济、自由生产、自由市场）的改革构想。进入新时期后，他更明确提出，60 年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我们需要改革。这个改革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关于对外开放，早在“文革”期

间，陈云同志就指出，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进入新时期后，他更进一步指出，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经济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特别宝贵特别重要的是，陈云同志倡导改革开放，着眼点完全在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因此他旗帜鲜明地强调，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他还反复提醒我们：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1989年后他更是大呼特呼，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可迷失方向，决不可丧失应有的警惕。

3. 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能否做到两个文明一起抓，这是关系着我国的发展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因而也就是陈云同志反复强调、着重论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是不能分离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又不可能是单纯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也不可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然后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干部，如果忘记或放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总之，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整个事业就会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我们的社会才能全面进步。

事情为什么必须是这样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单纯的经济发展，那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是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高一级的新型文明。社会主义是高度发达的经济、新型的民主政治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三位一体构成的社会形态，这三者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它们互为发展条件：经济的发展为民主政治的建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新型的民主政治建设又推动着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又推动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的进步。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那里三者是分高的，矛盾的，三者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促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方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指导方针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来制定的，因而是不能违反的。

4. 执政党的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党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执政党的状况如

何，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亡。陈云同志非常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他说，党在全国执政前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前，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的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因此，陈云同志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他认为，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他鲜明地指出，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因此，现在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陈云同志说，我们是执政党，目前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在思想建设方面，他指出，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在组织建设方面，他指出：“现在有同志常说，要开拓型干部。开拓型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德才兼备，才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我希望政治局、书记处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他主张必须成千上万地培养、提拔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中青年干部，把他们提到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使他们经过锻炼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保证党的领导权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

5. 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是维护国家统一，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决定条件

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指出，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依靠和运用自己的权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威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中有极其巨大的作用。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多民族的国家，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艰巨的事业。我们处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因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和发展必须依靠坚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发挥统一领导作用。否则，中国就会四分五裂，前途不堪设想。因此，陈云同志把维护和加强中央权威，作为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战略问题一再加以强调。针对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而导致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出现了严重问题，陈云同志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以为教训。”“各级党组织都应把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抓好，都要积极维护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针对权力过于分散，地方主义发展，中央由于财力不足导致中央权威有被削弱的危险，陈云同志1988年10月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特别指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陈云同志一直明确地坚定地支持这个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针对近年出现的情况，陈云同志1994年2月9日在上海发表了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权威的非常重要的谈话：“现在的中央领导班

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陈云同志把这篇重要谈话作为他的三卷文选的终卷篇，充分体现了陈云同志对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信任和厚望。这篇谈话，对于稳定大局，推进改革和建设，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陈云同志生前谆谆教导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要拿出一定时间来“踱方步”，考虑战略性问题。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杰出贡献为人们所一致称道，但他首先是一位坚定的卓越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是一位目光远大、思想深邃的社会主义战略家。以上5点是陈云同志“踱方步”提出的5个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命运和中华民族前途的战略问题。正确地、准确地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然而问题的实际解决，却在社会实践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实践中。我们应该继续循着陈云同志的思路，思考这些战略问题，解决这些战略问题。

三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是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指南。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价值目标的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甚至走到邪路上去。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灵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丢掉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变质了；苏共50年代中期以后，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了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修正主义，垮台了。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些沉痛教训，陈云同志着重指出：“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和解决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

列宁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掌握唯物辩证法是准确、完整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打开马克思主义丰富理论宝库的金钥匙。正因为如此，陈云同志特别重视唯物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宣传和运用。陈云同志认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他反复倡导领导干部要学好哲学。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曾亲自给他讲过3次要学哲学。陈云同志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研读了，从中学到了唯物辩证法，终生受益。陈云同志将自己运用唯物辩证法做好工作的主贵经验作了一个简明的概括：“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他说，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一贯自觉地采取唯物辩证的方法认识和处理问题，这是陈云同志的思想观点、意见主张总是能够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的关键所在。通观《陈云文选》，论述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篇篇言简意赅，无论问题多么复杂，皆能深入浅出，抓住要领，一语中的。《陈云文选》190篇无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锋芒，唯物辩证法的光华。

《陈云文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思想观点的一贯性、创造性和正确性

的完美统一。没有自相矛盾，没有“左”右摇摆，没有僵化保守，没有浮躁冒失。这个特点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来源于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建设实践内在发展逻辑的准确把握，来源于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贞。陈云同志的思想观点，既是始终一贯的、坚定的，又是在中国革命改革建设的实践中发展的、前进的。本文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屈原的名篇《桔颂》，现据郭沫若的译文摘取数句，抄录如下——

你志趣坚定，
竟与桔树同风。
你心胸开阔，
气度那么从容！
你不随波逐流，
也不固步自封。
你谨慎存心，
决不胡思乱想。
你至诚一片，
期与日月同光。

这就是陈云的形象！

《陈云文选》的珍贵价值在于它是异常丰富的中国自己的革命与改革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正确总结，因而对我们当今和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建设有着重大的长远的指导意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汲取世界其他民族的历史成就和文明成果来丰富和营养自己。但在如何干社会主义事业这个问题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由于其社会制度使然，都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直接可用的经验，更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理论指南和目标模式。以它们为效仿的榜样，只能使我们南辕北辙、走向灾难。原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社会基本制度上的共同性，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都应成为我们的镜鉴。但它们毕竟同我们的国情和民族历史传统有很大差异，我们也不可能从中学到现成的东西。探索在新形势下怎样继续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最主要、最现实、最有效的途径，是从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中学习在中国大地上干社会主义的本领。《陈云文选》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历史记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一伟大事业历史经验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同中国革命改革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第二版出版对于我们排斥错误倾向，继续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其意义之重大是不可估量的。

注释

《陈云文选》第3卷，第347、359、362、371页。

陈云思想的基本出发点——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评述

卢继传

在陈云同志诞辰 90 周年之际，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多位专家学者怀着对陈云衷心爱戴和尊敬之情，出席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组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共同在北京举行的《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学者们从陈云伟大光辉的一生及其经济思想、党建思想和思想方法论等方面，畅谈和交流了研究心得。大家一致认为，陈云在长期从事领导工作实践中所概括的思想和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用和重要发展，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重要指导意义。

一、陈云经济思想的基点：从人民利益出发，从国情国力出发

陈云在领导国民经济建设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特点的经济思想，其中，“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有市场调节”等，最集中地体现了陈云经济思想的特征，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史中，陈云曾主持制订和参与制订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使“一五”时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他还受命主持“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两次国民经济调整，使垂危的国民经济重新获得生机。与会学者展开了充分的研讨后指出，这些事实充分反映了陈云所一贯坚持的经济思想的正确性，他对发展我国经济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将彪炳史册。陈云之所以对经济思想有重要建树，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就在于他确立经济思想的基点是合乎中国实际的。与会学者在认真研讨陈云经济思想的同时，着力分析其考虑和探索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而领悟陈云经济思想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真知的见，并从中得到启迪，感触甚深。

——把安排好人民生活作为搞好经济建设的前提。陈云始终把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摆在首位，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主张，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坚持在安排好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主张经济工作的一个大方针是：“一、要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陈云由此出发，提出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他精辟地阐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强调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解决好的大问题，否则“会扯我们前进的后腿”。一再提醒我们“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今后全党还必须把粮食放在重要位置上”。

——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但是，经济建设既要快速发展又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为此，陈云明确指出，量力而行，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人们称之为“国力论”。这

是陈云的一贯思想。早在“一五”计划期间，他就指出：我们国家大，一不小心就会盲目发展，必须坚持量力而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强调基建投资必须做到没有赤字。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订基本建设规划。

——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在稳中求快。国民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稳步与前进，避免折腾，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这是陈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积数十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之经验必然得出的思想。回顾以往走过的道路，我国经济建设遭受的几次挫折，都是由于超越国力，急于东成，片面追求过高发展速度，造成比例关系失调。究其原因，还是按比例发展原则的重要性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今天，我们要坚持陈云提出的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稳中求快的思想，减少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切实注意在稳中求快，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

在一些重大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陈云总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国的国情，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陈云党建思想的基点：加强党性教育，提高党员素质

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陈云对党的建设作了系统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与会学者认真从陈云的建党思想与实践中去分析他长期探索党的建设的基本出发点。这就是他始终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共产党员的特殊品格来考虑党的建设问题，尤其重视党风建设，强调加强党性教育。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从党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和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的新情况出发，加以深邃思考，并在1980年的一次会议上，严肃而尖锐地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学者们认为，这是新时期陈云对党风建设问题重要性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贡献。

党风是一个政党及其党员的行为准则，是党的世界观在行动中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建立的。党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党还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从会议提供的论文中所论述的和列举的事实表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成效，必须通过党员的行为表现出来，通过党风建设予以巩固和发展。因此，抓紧党风建设，纠正不正之风，消除腐败现象，发扬优良作风，就能为党的其他几个方面的建设创造良好的客观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陈云要求每个党员模范地遵循这个宗旨。他说：“共产党员无论何地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否则，就会败坏党的风气。陈云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一切工作的主体力量，只有获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革命和建设才能成功。他早就指出，在领导干部中要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显然，滋长官僚主义的领

导作风，是由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其思想根源在于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因此，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而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陈云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提高党员的素质，尤其是要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加强党性教育，重在世界观教育，引导和教育党员自觉地用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武装自己，改造世界观，这是解决党风问题的一项治本之举。陈云对党风建设问题的科学论断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如学者们所强调的：把党风问题提高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才能使全党同志自觉地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自己，加强世界观改造和党性锻炼，努力实践党的性质和宗旨，从根本上把党建设好。

三、提倡学习哲学的基点：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少犯错误

江泽民同志指出：“从我国国情出发，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清醒地科学地分析和判断情况，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踏实细致地开展工作，并下大的决心一干到底，干出成果，这是陈云同志鲜明的工作特点和领导风格。”这种特点和风格渊源于他具有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深刻地理解唯物辩证法。他不仅自己潜心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而且应用它去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工作。因此，在陈云的经济等方面论述中，充满了哲学的理性思考。他切身体会到“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所以，他大力提倡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习哲学，要“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要犯大的错误呢？陈云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时，他以自己积累的亲身经验，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人犯错误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所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不合乎实际，这就是所谓认识上的片面性，使人犯错误。因此，陈云作出了明确的回答，要少犯错误，要做到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他说：“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九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换言之，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就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

身负重任的领导干部能否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对社会主义事业至关重要。学者们指出，在新的时期，陈云对此看得更重了，考虑更多了，感觉更急迫了。1987年7月17日，他同当时的中央领导谈话时，反映了他的这种心情。他深情地说，邓小平同志已经84岁了，过不了多少年，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我们国家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它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全党同志和各族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就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在世界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他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哲学”。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于《陈云文选》的始终。陈云从切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是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具体运用，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可操作性。把握住这15个字，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应该成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座右铭。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他的忠告：“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要犯错误”。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

迟爱萍

陈云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从 30 年代初起进入党中央领导层；建国后是党中央第一和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曾长期主管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在经济工作、党的建设、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提出过许多极其重要的思想，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过许多重大贡献，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对陈云生平与思想的研究，是党史和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期以来，国内不少学者对陈云生平与思想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研究状况概述

对陈云生平与思想的研究是从 1980 年 11 月《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在党内发行后，逐步拓展开的。至今，其研究过程大致经历了 3 个阶段。

一、研究初步发展阶段：1980 年 11 月至 1983 年底。

1980 年 11 月和 1982 年 4 月，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以下简称《文稿选编》）1956 年至 1962

年卷和 1949 年至 1956 年卷，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党内发行。这两部《文稿选编》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和鲜明的实践性，为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工作和全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陈云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就是从研究这两部《文稿选编》开始起步的。

这个阶段的主要研究课题是陈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方针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经济管理、经济工作方法等问题。1981 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一书。这本书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30 几年的经验，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 80 年代初期改革实践中的问题，深入浅出地阐释了陈云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这一研究阶段最权威的研究成果。另外，有林、赵少平、王梦奎合著的《我国经济建设中的若干原则问题》，也是这一时期出版的一本重要辅导读物。同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王琢、黄菊波所著《国力论》是对陈云著名国力制约建设的理论方法的专门性的研究著作。这本书，对陈云“国力论”产生的背景、在实践中的发展与运用，以及所含的理论内容，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是目前所见的唯一专门论述陈云“国力论”的著书。这一阶段，学术界还出现了部分有价值的文章，如关梦党的《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 4 期）等。

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是：对陈云的经济思想研究成果较多，对其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较少；学习体会、宣传类型的文章较多，理论研究性的成果较少；个别观点的研究著述较多，总体性研究的著述较少。

二、研究深化发展阶段：1984 年至 1986 年 5 月。

1984年1月和7月,《陈云文选》(1926—1949年)卷和(1949—1956年)卷相继出版,陈云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深化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之所以称为研究深化发展阶段,是因为对陈云思想的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都有所发展。对陈云思想研究的深度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党建著述较多。1983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随即,第一期整党在部分单位开始。由于《陈云文选》(1926—1949年)集中反映了陈云关于党的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的卓越思想,因而不少理论工作者结合整党,对于陈云党建思想进行研究,使这方面的著述处于领先地位。代表性的文章有陈野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思想武器》(《红旗》1984年7期),刘武生《陈云同志对党的建设的理论贡献》(《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1期)等。

第二,经济、哲学思想的研究与前一阶段相比有所提高。集中反映于一些文章已由单纯阐释陈云的思想转为从历史和理论两个角度去评价和论述。如关梦觉《陈云同志经济思想》一书,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高度,对陈云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和经济思想核心以及杰出贡献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见解,并结合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裴元秀、杨荣绅合著《陈云财政论著浅谈》一书,是一本专业性较强的首次集中论述陈云财政思想的专著。朱小迅(朱佳木)《用比较法作决策》(《红旗》1985年7期),郑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红旗》1984年5期)等文章,都对陈云哲学思想的某一个方面作了较为透彻的论述。

第二,出现了部分质量较好的《陈云文选》辅导性读物。学习、宣传、介绍陈云思想的文章在陈云研究中一直占相当比重,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的是,这一阶段出现了汇集成册的论文集子和典释性读物。这些书对于辅导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陈云文选》起了一定的作用。加王梦奎、陈群主编的《学习〈陈云文选〉(1926—1949年)论文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组编的《〈陈云文选〉辅导讲座》,李星《〈陈云文选〉成语典故注释》等。

对陈云思想研究的广度主要表现在研究面有所拓宽:

第一,出现了陈云早期革命实践活动与思想的宣传和研究。1985年时值遵义会议50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刊载了陈云1935年所著《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和《随军西行见闻录》。另外,学术界也出现了少量的研究陈云早期活动的文章,如黄甲元《“四保临江”的战略战术思想研究》(《通化师院学报》1984年2期),王礼琦《苏区职工运动的正确指导思想》(《人民日报》1984年3月16日)等。

第二,出现了陈云文艺思想的研究。1983年末,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报刊上陆续出现了不少研究陈云文艺思想的文章,如《陈云同志与评弹艺术》(《红旗》1984年13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实践》1984年8期)等。

第三,出现了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如肖劲光《回忆和陈云同志在一起的岁月》,唐凯《坚持斗争扭转战局》,薛暮桥《运筹帷幄之中——回忆陈云在建国初“三大战役”中的情况》等。这些老同志以自己与陈云一起工作过的亲身经历,生动地叙述了陈云的革命实践活动,为这一阶段的陈云生平研究作出了贡献。

三、研究全面发展阶段:1986年6月后迄今。

1986年6月，《陈云文选》（1956—1985年）卷出版。这本文选收入陈云自“八大”以来的30年间的主要著作。在这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从顺利发展到严重挫折、又从严重挫折到顺利发展的曲折道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而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新局面的复杂历程。陈云这一时期的论著，表明他在这些复杂历史过程中，在若干重要关头，对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和若干重大问题，坚持和运用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正确的看法和意见，并从中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他在这卷选集中所阐述的许多观点，对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等重大现实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因而，这一阶段研究状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论与现实密切结合，比较集中研究的课题都与当时的现实问题紧密相关。

第一，有关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向城市推进。在经济体制改革并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的同时，对陈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研究逐步增多，尤其对陈云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的研究比较广泛。如苗长发《“笼子”和“鸟”：宏观管住，微观搞活》（《经济日报》1986年6月21日），高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体——补充”模式的断想》（《党的文献》1988年6期）等。

第二，关于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思想的研究。这一研究主要是围绕1989，1990两年治理、整顿的经济形势展开的。文章多是从研究陈云思想的角度去反思现实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对这一课题研究的重要成果集中反映于199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云论著研究论文集》之中。

第三，关于党风建设思想的研究。党风问题一直是新时期群众关心和议论的热点问题。质量较高的研究文章有朱佳木《重温陈云同志关于新时期党风的论述》（《人民日报》1991年6月10日），籍传厚《论陈云同志新时期党风建设理论的重要贡献》（《晋阳学刊》1992年6期）等。

之所以称这一阶段为研究“全面发展”阶段，是因为这一阶段的研究表现出这样的特征：

从研究对象而言，呈全方位态势。陈云的论著基本可以概括为哲学论著、经济论著、党建论著三大部分。第一阶段，经济论著的研究是重点；第二阶段，党建论著的研究是重点；从第三个阶段的研究著述来看，这三大类的研究基本持平，经济论著的研究稍有突出。第一阶段的研究仅涉及到陈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活动和思想；第二阶段向前延伸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三阶段由于《陈云文选》（1956—1985年）卷的出版，研究时限向后扩展到社会主义新时期。至此研究领域从时空上全部拓开。

从研究成果而言，呈多样化状态。一是出现了体系性论著。如陈光林《陈云经济工作方法艺术与艺术》和《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王杰《陈云经济论著研究》、刘凤岐《陈云经济思想研究》，这些论著与前一阶段的论著相比，可以说是对陈云某个方面思想的研究，已从局部跨入整体，更加系统和全面化了。二是出现了包含陈云在内的领袖群体研究论著。如由高狄主编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大辞典》，卫兴华、洪银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论》等。三是出现了回忆性文集。如《陈

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出版），（陈云同志和评弹艺术》（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4 年出版）。四是出现了研究综述文章。五是出现了介绍国外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的学术动态文章，如孙业札编译的美国政治学家戴维·M·贝奇曼所著《陈云与中国政治体系》一书中的部分内容，题为《贝奇曼谈陈云的经济思想》（载于《党的文献》1989 年 6 期）；以及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尼古拉斯·拉迪和斯沃恩莫尔学院政治学教授肯尼思·利伯索尔台编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 1956——1962》英译本序言——《陈云的中国发展战略》（载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 年 5 期）。

从研究方法和形式而言，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法除阐释性、论析性研究之外，出现了综合概括性的理论研究论文。如欧阳斌《陈云哲学思想初论》（《东岳论丛》1988 年 2 期），许庆朴《陈云经济理论体系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 年 3 期）等。研究形式由个人单独研究到出现群体性交流的研究讨论活动。如 1990 年 6 月，中国管理科学院在北京发起召开的“陈云同志论著研讨会”；1991 年，上海文联、文化局和上海曲艺家协会联合召开的“陈云同志‘出入、出书、走正路’指示发表 10 周年文艺理论研讨会”等。此外，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1989 年 4 月，中央正式批准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设立陈云研究组，从而使陈云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工作更加深入和专业化了。

主要研究问题综述

一经济思想研究

（一）陈云经济思想体系和特点的概括及评价

理论界普遍认为，陈云的经济思想是成体系的完整学说。不少学者尝试着从总体上对陈云经济思想体系作出科学概括。由于考虑问题的逻辑角度不同，划分方法也是下一样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从陈云经济思想内容本身去概括，把陈云经济思想概括为 10 个方面：1. 建设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2. 国营经济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形式。3. 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4.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5. 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6. 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7. 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8. 必须讲求经济效益。9. 积极慎重地利用外资。10. 经济和政治互相配合。

二是从经济学理论框架方面去概括，把陈云经济思想体系概括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经济结构、经济管理、建设方针、经济工作方法 5 个方面；还有的概括为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农业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经济效益理论、计划理论、综合平衡理论、经济改革理论 9 个方面。

三是从大的宏观视角将陈云经济思想体系的框架拟为国力论、国情论。求实论三大部分。

与此相适应的是，对其经济思想特征的总体把握。如石世印《试谈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一文，将陈云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概括为 4 个字即“实”、“稳”、“活”。“细”。其中“实”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根本特征。还有的学者将陈云经济思想的特征概括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探索

与决策的辩证统一、创造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3 个方面。

对陈云经济思想的评价是与对他本人的评价紧密相联的。比较典型的有这样几种说法：（1）陈云是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不仅理论造诣很深，而且有丰富的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范。（2）陈云是一贯保持清醒头脑的经济实践家，在经济工作的几次“左”倾浪潮中，他始终坚持科学态度，从不放弃经过自己周密调查、反复思考形成的切合实际的观点，表现了具有高度党性原则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本色。（3）陈云善于在历史的重要关节点，针对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及时提出正确的方针与对策。他的许多观点和主张都已被实践所证实。

陈三经济论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是一面旗帜，树经济科学一代新风，在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关于综合平衡和有计划按比例思想的研究

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与综合平衡是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思考最多的问题，自然也就成为学术理论界的一个研究热点。

对于陈云综合平衡理论的提出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综合平衡理论的基本框架在 1954 年陈云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已经形成。尽管陈云当时未提出“综合平衡”这一概念，但事实上已经有了综合平衡的基本理论内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早在建国初期，综合平衡理论就已经初步提出，表现在 1950 年 3 月 3 日，陈云代政务院起草的《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和 3 月 10 日，他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等文章中。尽管对综合平衡理论最初形成的时间各持己见，但都明确认为，1957 年 1 月陈云所作《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讲话，标志着财政、信贷、物资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

学者们在论述陈云综合平衡理论时，大都阐述了他关于综合平衡的关键在于财政平衡的思想。有的学者针对近年来经济学界一些同志提出“赤字无害”论，特别指出，陈云关于财政收支平衡在综合平衡中的关键作用的观点，需要深入研究和领会。

有的学者对陈云“紧平衡”思想进行探索。认为陈云在五六十年代根据我国生产力落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完善的基本国情，从总量和结构各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经济运行的平衡问题，指出平衡的基本状态不是宽松的而是紧张的，即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平衡是“紧平衡”，建设规模和国力之间的平衡是“紧平衡”。有论者认为，陈云不仅提出了平衡问题的理论框架，而且提出了组织平衡的操作思路——从短线入手，这是很有胆识的见解。因为，当时围绕平衡是从长线出发还是从短线出发的问题，党内有过“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之争，这场争论说到底是在综合平衡中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已证明，陈云的“短线平衡”观点是正确的。有论者指出，陈云“紧平衡”思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宏观控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于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的评价，有的论者说，这是陈云经济论著的精髓，也是我国经济建设极其重要的指针；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和计划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探讨出来的一个旨在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按比例发展的重要方法，是具

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理论，是陈云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一大理论贡献。还有的论者说，这一理论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它萌发、形成于 50 年代 5 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时期，因而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陈云的经济思想中，综合平衡理论和有计划按比例理论是紧密相联的。因而，学者们在研究综合平衡理论时也渗透着对有计划按比例理论的研究，反之亦然。从二者关系的研究角度出发，论者们普遍持有的一个观点是：综合平衡的实质是按比例，并由此将陈云平衡与按比例相关的观点归纳为 6 个方面：（1）平衡是合比例的重要标志。（2）平衡不平衡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3）没有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4）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5）调整的实质就是实现平衡。（6）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

陈云是较早认真研究我国经济体制问题的领导者之一。因而，陈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是研究较为集中的一个领域，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

1. 八大前后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

1956 年党的八大前后，我党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探索，陈云在这一探索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1）提出了重要的改革思路，主要有 5 点：第一，坚持经济体制上的大集中、小分散。第二，把大计划小自由结合起来。第三，坚持经营方式的有统有分，把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结合起来。第四，讲求经济效益，实行经济核算。第五，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论者则从所有制结构、经营方式、经济体制 3 方面，将陈云的改革思路简明地概括为“统”“分”结合和“放权让利”两个方面。（2）提出了完整的改革模式。研究者们一致认为，1956 年，陈云在“八大”讲话中所提“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直接反映了他在 50 年代后期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总体格局的认识，展现了社会主义经济运动总过程中 3 个相互联系的根本问题，即：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建立在这个结构基础上的计划生产；统一的市场，对这一理论模式，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作出了评价，主要观点包括以下 3 个方面：第一，符合中国的国情。第二，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构想。第三，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具有启发和先导作用。

不少研究者认为，陈云 50 年代后期对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贡献还表现在，1957 年，他就对我国的某些具体的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许多至今尚有重要意义的见解。这些见解直接反映于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以及他主持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财政管理体制 3 个规定中，共包括 4 个方面的内容：在计划管理方面，需要减少指令性的指标，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计划管理的职责；在企业的管理权限方面，调整企业的隶属关系，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一部分企业下放给省（市）自治区领导，作为地方企业，为此还规定了相应的物资分配、利润分成等方面的权限，扩大地方的权力；在财务管理制度方面，主张国家和企业实行利润分成，并且指出企业在使用分成所得的时候，必须把其中的大部分用于生产事业方面，同时，适当地照顾到职工福利方面；在人事管理制度方面，除厂长、副厂长、主要技术人员以外，其他一切职工均由企业负责管理，企业有权在不增加职

工总数的条件下自行调整机构和人员，增加地方的管理权限。

2.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论述

对于陈云计划与市场调节关系问题论述的研究，一般都是从两方面展开的：（1）论述这一理论提出的客观依据，多涉及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我国国情、我国经济建设实践等方面的认识。（2）探索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也就是如何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这方面的研究，往往是将陈云的论述，与正在进行的改革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来进行的。

陈云曾形象的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比作“笼子”和“鸟”的关系。有论者专门撰文指出，陈云强调要有一个“笼子”的思想，就是强调要抓好宏观管理，他讲的“笼子”和“鸟”的关系，就是要使国民经济在宏观管理下把微观搞活。

（四）农业发展思想

1. 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思想的研究

陈云有关农业问题的思想有一个主体思想，从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我国的农业问题，把农业始终看作是从事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做出各种战略性决策的基础。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农业关系到国家政治安定和人民政府的巩固。第二，农业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很大的约束力。第三，农业对国家财政收入有着很大的影响。第四，农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城市的繁荣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

还有论者专文阐述了陈云的农业战略思想：第一，把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集体生产与分散经营的关系、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关系、农业机械化和科学地利用现有人力、物力、财力的关系。第二，在生产领域中，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政策；在分配领域中，要执行统筹兼顾的政策，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流通领域中，执行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价格政策，贯彻等价交换原则，使货畅其源。

2. 对统购统销政策的研究

学者们对这一政策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作了研究，对这一政策作出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这一政策是解决当时落后的农业生产与工业化之间的矛盾的有效方法，是正确的决策，也是陈云的贡献所在。它在解决粮棉供需矛盾上起了重要作用，是在我国当时情况下保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的一项重大政策。在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和不断完善过程中，陈云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体现在他所阐述的3项原则上：第一，要同时抓好统购和统销两方面的上作。第二，制定公道的价格与购粮指标。第三，组织工业品下乡，促进农民多卖粮食。但也有论者认为，统购统销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政策，是暂时的选择。

3. 对粮食和粮食工作论述的研究

有的研究者将散见《陈云文选》各篇中有关粮食问题的思想综合在一起，从强调粮食的重要意义的角度作了综述：第一，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主要手段。第二，从农业特别是粮食的发展制约着整个经济建设规模的角度出发，强调粮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三，10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政治问题。有粮则稳，无

粮则乱；粮食定，天下定。论者认为，陈云关于粮食工作的思想，即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指导意义。

（五）国情论与国力论思想

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陈云经济论著中的基本思想，国情论与国力论是这一基本思想中的两个重要理论支点。

国情论思想是由毛泽东创立，由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二代领导集体完善、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其中，陈云关于“国情论”的论述是较为丰富的，理论界有两种概括：

一种是三点论：第一，中国是一个 10 亿人口、8 亿农民的农业大国。第二，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中国是一个处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农业大国。

另一种是六点论：第一，国土广大、资源丰富。第二，工业基础薄弱，地区分布不合理。第三，农村人口占 80%，而且耕地少。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农民。第四，一方面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 20 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第五，我们实现现代化有两个“基础”：现有工业是物质基础，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第六，我国人口多，提高生活不容易。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陈云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制约方法进行了研究，并将其概括为 6 点，第一，搞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收支的平衡，从价值形式上首先制约住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使建设规模与财力相适应。第二，在物资供应上，按照先生活、后生产、再基建的原则排队使用，并适当地留有一定的余地，确保建设项目的物资供应。第三，外汇收支平衡，即对外贸易的出口进口大体持平。第四，要重视农业发展状况对建设规模的巨大约束力，以农业的负担能力来决定生产扩大的规模，应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再生产的比例。第五，坚持做到社会总需求的增长速度与社会总供给的增长速度大致适应，以生活资料的可供总量为依据来确定走非农产业劳动力的增长幅度，从人力上制约建设规模的增长幅度。第六，基本建设的规模和国家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仅要看当年，而且还要瞻前顾后，避免陡升陡降，造成大起大落。

在研究中，学者们对陈云国力论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作出高度评价，认为：国力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规律的生动的创造性的运用。是陈云本着实事求是精神，从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极为宝贵的经验。有论者特别提出，陈云国力论思想虽然是针对传统计划管理体制下的再生产所阐发的，但对于我国当今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改革与发展等经济问题的处理，对于新体制下宏观经济的调节与控制，再生产的组织和协调，仍然是有科学的指导意义的。

有论者特别指出，陈云国力论思想，不是排斥对速度的要求，而是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高速度。陈云国力论思想，说到底就是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论者说，陈云在认真总结我国历史上组织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扩大再生产的新路子，那就是在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和途径上，应以

挖潜、革新、改造为基本方式，即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这条新路子正是以陈云所分析的“国情”和“国力”为依据的。

二 党建思想研究

（一）关于对党建理论的贡献问题

研究者从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个角度，将陈云对党的建设理论的贡献概括为5点：第一，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完整而准确地提出了共产党员的6条标准，把党的思想建设的内容具体化了。第二，明确指出了组织建设的总原则是，组织建设要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第二，一贯强调用民主集中制统一党的意志和行动，第四，讲究用人之道，把毛泽东建党学说中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五，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命题，把党风建设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有论者指出，唯实求是的科学性、立意高远的战略性、一以贯之的坚定性，是陈云党建理论的基本特色。

（二）关于执政党党风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研究陈云对党风问题重要性的论述，以提高全党的认识水平。二是研究陈云提出的关于搞好党风的具体措施，以指导全党的实践。

有论者分析了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命题提出的历史条件，认为陈云这一命题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之初党内存在的种种不正之风，尤其是以权谋私的行为而提出来的；另外，这一命题的提出还与党在执政后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以及在全国执政前他就十分重视党风建设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探讨陈云关于党风论述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时，有的论者作了如下概括：第一，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党风建设理论，并与新时期邓小平关于党风建设的论述互相补充。第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第三，抓住了新时期党的建设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第四，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有重大的实践意义。第五，对我们党的前途和命运具有重要作用。

（三）关于加强党纪，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陈云担任过7年中组部部长、9年中纪委第一书记，在党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的建设方面，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深刻的思想。

1. 关于党纪思想的研究。许多研究者指出，陈云始终重视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指出加强党纪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论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陈云是从统一性、自觉性、强制性3个方面论述党纪特点的，强调党的纪律是自觉的和铁的纪律的辩证统一。

“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是陈云新时期党纪建设方面的一句名言。有论者指出，这一思想是针对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后，

有的地区、有的同志提出“纪律要松绑”的口号提出来的。它有着以下的含义：第一，党的纪律是党性原则的体现，同时又维护着党性原则，党纪“松绑”就是丢弃党性原则，而丢弃党性原则，无论是党的整体还是党的各部分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第二，党的政策的调整不能等同于党的纪律“松绑”。第三，越是搞活经济，越要加强党的纪律。

2. 关于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阐述这个问题时，论者们大都提到陈云 1947 年 4 月所著《健全党内生活》一文，指出：他在此文中所提健全党内生活的 3 项原则的中心是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陈云这一思想的分析大致包括，第一，民主和集中的统一首先体现在它始终以民主为基础，“只有民主，才能集中”是陈云突出强调的思想。第二，民主又必须集中，陈云“没有集中，也办不了大事”的观点，正确地反映了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和作用之所在。第三，以民主集中制规范党内生活，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四个服从”的纪律。

（四）关于加强党员修养的问题

研究者一致认为，陈云始终注重党员的思想建设，强调加强党员思想修养。主要有以下 8 点：第一，必须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第二，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三，必须把革命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第四，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树立坚定的组织观念。第五，要做群众的模范，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和敬重我们的党，第六，奋发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水平。第七，对党要忠实，言行要一致，不说假话。第八，积极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除此之外，有论者还提出，在论述党员修养的时候，陈云十分强调要实事求是。认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绝对不可缺少的思想修养，是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

（五）关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

陈云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经验与理论，内含一套包括考察、培养、使用、爱护干部的各个环节的理论和可操作的方针。有论者从宏观上将陈云对干部建设理论的贡献概括为 4 个方面：第一，从辩证发展的观点出发，提出考察干部坚持历史、全面的原则。第二，从干部成长规律出发，提出培养干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第三，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高度出发，提出使用干部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第四，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出发，提出爱护干部，坚持“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原则。不少论者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陈云的“用人之道”，认为他的许多用人观点和方法，无不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如：选拔干部方面的德才并重，以德为主的方针；使用干部方面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的方针；处理上下级关系方面的相互信任，敢说敢作的方针；培养新干部方面的用中有育，育中有用的方针；用人与知人方面的知人要全，用人要稳的方针；用人与客人方面的气量要大，善用百家的方针。

在探讨陈云新时期关于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思想时，

研究者们比较一致的认为，陈云这一思想带有战略性的意义，第一，是防止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兴风作浪、篡党夺权的根本措施。第二，把接班人的培养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党在这一问题上的被动状态。有论者指出陈云关于成千上万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思想，在江泽民提出要保证各级领导权由忠诚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掌握之后，更显示了它的战略意义，更需要搞好这一系统工程。有论者指出，陈云这一思想的核心是成千上万。即：（1）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干部队伍保持梯队结构，以应付需要。（2）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党组织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以便把班交给确实可靠的人。（3）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那些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

建设好一支干部队伍，既需要党组织正确地执行干部政策，也需要干部本人严格要求自己，加强个人的修养锻炼。在 1954 年党同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陈云提出的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证的思想，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对今天仍有指导意义。第一，高级领导人要学习马列主义。第二，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要时刻牢记社会主义方向。第三，高级干部要严重注意和警惕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袭。第四，高级领导人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

三关于哲学思想的研究

有论者将陈云的哲学思想浓缩为 8 个方面：第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第二，“做到主观与客观一致。”第三，“交换、比较、反复。”第四，“抓住中心，照顾其他。”第五，“要从一点一滴做起。”第六，“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第七，“基本的环子就是开展群众工作，”第八，“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一）实事求是思想

不少学者认为，在陈云的革命生涯中，实事求是已成为他的人格特征。而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他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多数论者将陈云实事求是思想概括为他所阐述的 3 句名言，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还有的论者将陈云实事求是的思想概言为“唯实观”。除此以外，论者认为，权衡利弊，忍小谋大；留有余地，两手准备；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等，也都体现了陈云实事求是的思想。其中，他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方法论原则是学者们论述的重点。从哲学上来看，这个方法论原则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的来源和起点的基本思想；旗帜鲜明地与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同时，这个原则还总结了党的认识史上的基本经验与教训。

（二）认识论思想

有论者认为，陈云是把哲学作为认识论，作为认识世界的工具来掌握和运用的。他在总结自己长期担负经济建设领导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理论的思考和哲学的概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的贡献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原理，深刻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即“领导机关制定计划，执行计划，检查工作，都必须主客观一致。”二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原理，精辟地阐发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即“交换、比较、反复”的认识方法。可以说，这两个基本的方面，构成了陈云认识论思想。其中，“交换、比较、反复”的认识方法，又是理论界阐释的一个重点。从理论上，这6个字深刻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是对毛泽东关于研究忌带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坚持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的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挥。从实践上看，这6个字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有效方法，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三）工作方法

陈云在长期的领导经济工作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工作方法。理论界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他的调查研究方法和决策思想方面。研究陈云调查研究的方法一般与他实事求是的思想相联系。有论者根据《陈云文选》中《青浦农村调查》一文，介绍了陈云调查研究方法的几种形式：（1）抓点；（2）算帐；（3）比较。还有论者专门阐述了陈云调查研究中经常运用的数量分析方法。对于陈云的决策思想，有论者认为，这一思想主要凝聚在他常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交换、比较、反复”的实事求是原则中。还有论者认为，比较法是陈云决策中常用的一个方法，其主要内容是，在央策时不能只有一个方案，而是要尽可能把一切可以提出的方案都提出来，进行比较，并认真听取意见。当可供选择的方案都是弊大利小时，可两害相权取其轻。论者归纳和论述了陈云运用比较法作决策时应掌握的几条原则，即尊重客观规律；从全局出发；用全面、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另外，论者分析了陈云在决策实施阶段对比较法作用的发挥：第一，清醒地看到被选作决策的方案本身所固有的弊与失的一面，并在实施中设法加以限制，防止这一面的扩大。第二，在决策实施过程中必须密切结合实际情况，因时因地制宜，防止出现“一阵风”、“一刀切”的现象。第三，在决策实施过程中必须不断总结经验，随时纠正偏差。

上述仅介绍了陈云思想研究中的几个主要方面，除此之外，理论界对陈云的财政、流通、商业、金融的思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思想，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思想，文艺和文化方面的思想等都有论述；史学界对陈云早期革命活动和部分生平事迹亦有研究，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后 记

为推进对陈云生平与思想的研究，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批准，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研究组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于1995年6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在研讨会筹备期间，共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论文近500篇，经过有关专家学者的两轮评选，选出其中84篇参加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我们将这84篇论文和15篇特约论文合在一起，编辑了这本论文集。论文集将江泽民总书记在《陈云文选》（1—3卷）、《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代序，并收入了一些领导同志在研讨会上的讲话、发言和给研讨会的贺信。同时收入的还有研讨会组织委员会负责人在研讨会上的致辞和总结发言，以及《人民日报》关于研讨会的报道，另外，有三篇分别从总体上论述《陈云文选》和综述这次研讨会以及前些年陈云研究状况的文章，作为附录收入本论文集。

本论文集的主编为朱佳木，副主编为刘书楷、迟爱萍、赵士刚。孙业礼、熊亮华、蒋永青参加了论文集的编辑工作。在编辑过程中，对一些论文、特约论文作了必要的文字修改，并统一了全书的体例。

论文部分的文章顺序，按照经济思想研究、党建思想研究和哲学、文化思想及生平研究这三大类加以排列。每一类中的文章，又按照文章内容分为若干组。在目录上，类与类之间用*区分，组与组之间用空行区分，以便于读者查寻。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编辑中的疏漏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995年11月30日

